

# 目 次

## 第二部 三月革命及其后果

第一章 德国革命的阶级斗争 .....	3
一 三月十八日 .....	3
二 资产阶级的背叛 .....	12
三 议会 .....	22
四 汉泽曼内阁 .....	31
五 牺牲农民 .....	43
六 国王和容克地主 .....	54
七 十一月的悲喜剧 .....	59
八 叛逆的小资产阶级 .....	72
九 革命的无产阶级 .....	83
第二章 《新莱茵报》 .....	95
一 德国的政策 .....	95
二 欧洲的政策 .....	103
三 莱茵省的鼓动 .....	117
四 历史地位 .....	129
第三章 斐迪南·拉萨尔 .....	136
第四章 德国革命的尾声 .....	152
一 法兰克福和柏林 .....	152
二 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 .....	162
三 德国的流亡者 .....	175

第 五 章 科倫共产党人案件 .....	193
第 六 章 五十年代 .....	206
一 政治衰退 .....	206
二 經濟繁荣 .....	220
三 資產階級的文学和哲学 .....	226
第 七 章 科学共产主义的进步 .....	234
一 馬克思和拉薩尔 .....	239
二 馬克思論商品和貨幣 .....	246
三 拉薩尔的《赫拉克利特》 .....	254
四 拉薩尔写的悲剧 .....	262
五 拉薩尔的法哲学主要著作 .....	271
第 八 章 一八五九年的欧洲危机 .....	289
第 九 章 普魯士宪法糾紛 .....	308
一 新紀元和俾斯麦內閣 .....	308
二 拉薩尔的战役計劃 .....	323
三 拉薩尔和进步党 .....	332
四 資產階級退出政治舞台 .....	350
注釋 .....	366
入名索引 .....	373

## 第 二 部

# 三月革命及其后果



## 第一章

# 德国革命的阶级斗争

### 一 三月十八日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德国浪漫主义彻底破产了。在工商业的新生力量面前，它变得软弱无力，无所作为了。1847年，普鲁士国王在联合议会开幕时发表的冗长的御前演说，是德国浪漫主义的尾声。有教养的阶级和工商业家阶级的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尤其是那个凶暴的压迫者——财政困难迫使国王把八个省的省议会组成一个联合议会。他认为这样就履行了他的父亲曾经许下的制定宪法的诺言。

联合议会不会是一个现代的议会，而是一个封建的等级会议，事实上也是这样。八个省议会的议员分为两院，一个是贵族院，由七十二名上层贵族组成，一个是三等院，其中有骑士代表二百三十一人，城市代表一百八十二人，农民代表一百二十人。议会的权能只限于通过发行和平时期的公债，通过征收新税或提高旧税，如果国王准许提出一些新的法令草案，议会也可以审核这些草案。国王在御前演说中斩钉截铁地说，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使他变成一个立宪的君主，他决不允许在上帝和这个国家之间插进来一

張写滿字的紙片，仿佛是第二天命，用它的条文来实行統治并用它們来代替旧日的忠誠。他在給他的朋友本生的一封密信中，虽然沒有带着这样濃厚的浪漫主义气息，但是更为簡明地說明了“长篇演說的很簡單的意义”：要求宪法的人比牛还愚蠢几倍，已經有一个宪法，而再頒布一个宪法的人就是一个更大的笨蛋。王位继承人普魯士亲王<sup>①</sup>更彻底地代表这种可爱的立場。他已經从联合議會看到旧普魯士的灭亡了。

不管怎么說，他在反动的狹隘性方面比他那聪明的哥哥有更好的本能，也比那些資產階級思想家有更好的本能，他們对于这样实现旧理想表示蔑視，其中有一部分人还建議決不要通过这种宪法。資產階級也有自己的好本能，它不听这些思想家的建議。資產階級本来就心胸狹窄，軟弱馴順，加之无产階級的最初的断断续續的生存呼声已經使它惊惶失措，無論是国王对它提出的要求，还是国王对无产階級提出的要求，它都认为是适当的。有一部分資產階級化的貴族通过农村工业的商品生产进入了大資產階級的利益范围，跟在他們后面的是許多在等級會議中代表农民階級的富农和中农。資產階級同这部分貴族联合起来，构成了联合議會中的自由主义反对派，汉澤曼用“在金錢問題上是沒有溫情可言的”这句名言打垮了国王的御前演說的溫情的浪漫主义。議會紧握住錢袋不放。它不仅不願做当时所謂的破产的专制政权的“借錢机关”，并且声明在定期召开議會沒有得到保证和它的权力沒有扩大以前，它无权同意发行两千多万塔勒的公債，兴建东部的铁路。因此，它同国王不欢而散，不过它並沒有因此而大伤脑筋，它知道国王还是要来找它的。

<sup>①</sup> 即后来的普魯士国王威廉一世，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弟弟。——譯者

可是这时世界历史的一场风暴侵入了宁静的普鲁士。连年歉收加上 1847 年的商业危机使得欧洲发生了巨大的震动。一切腐朽建筑全都垮台。巴黎工人推翻了路易·菲力浦的统治，宪章运动在世界市场的首都有力地开展起来。现代工人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第一次独立提出自己的要求；一个道地的无产者成了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的成员。弗莱里格拉特赞扬二月革命比七月革命进步时说：“这不是 30 年的闪电，这是 48 年的暴风雨”。这场风暴席卷整个欧洲，直到俄国边境；被压迫民族——爱尔兰人和波兰人，意大利人和匈牙利人用争取独立的英勇斗争同西欧无产阶级的起义相呼应。

在德国，革命的西风头一阵就刮走了一大堆陈年垃圾。在中小各邦，国王的宝座都摇摇欲坠。于是这些君主就急忙成立自由派的三月内阁来维护自己的王位。使他们又惊奇又高兴的是，他们利用这批正直人士比利用昏聩的官僚和顽固的容克更易于进行统治。他们共有的迫害人民的工具，邦联议会已经在 3 月的头几天投降，把黑红黄三色旗当作德意志的官方旗帜升起。邦联议会曾不止一次咒骂和取缔这面旗帜，成千上万的人为了这面旗帜被邦联议会夺去了美丽的生命。可是，这样一来，邦联议会由于受到普遍的蔑视，垮台得更快了。3 月 5 日，在海德尔堡有五十一个自由主义者（主要是南德人，只有四个莱茵普鲁士人和一个奥地利人）决定召集德国各地为人民所信赖的人到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开会，这些人“应当协助祖国和各邦政府”，尽快地召开德国国会。

这一切只不过是政治上的幻想。起决定作用的是维也纳，尤其是柏林。只要奥地利帝国由于国内的民族革命，由于它的各个组成部分普遍不和而瘫痪无力，普鲁士邦及其整个制度和传统，它的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它的军队和官僚就是德国革命的唯一

凶恶的内部敌人。同时，普鲁士还是关税同盟的领导国家，尽管普鲁士的枷锁在德国受到痛恨，可是自从无产阶级发生骚动以来，德国资产阶级却惯于把这种枷锁看做是它日益需要的统一德国的手段。自从法国工人的铁拳打垮了资产阶级王朝以后，联合议会的缓慢但可靠的方法已经不可能采用了。相反地，在普鲁士，胜利的革命进展极快，这个革命当然能够根据情况一举推翻中小邦的自由派的三月内阁。

三月革命前的普鲁士本来没有想到，对资产阶级哪怕只做一点可以满足其要求的让步。它依仗自己的军队和其他权力手段，而首都的资产阶级还很年轻，小资产阶级只会说，却不敢做，因此它并不觉得它们可怕。资产阶级不是由于热爱自由，而是由于害怕无产阶级，才在3月间举行头几次集会。3月7日《福斯报》发表了一篇安定人心的文章，谆谆劝导工人，不要被法国革命所迷惑，应该相信，在资本主义国家，他们可以受到最好的待遇。3月9日市议员决定要为工人阶级比过去多做一些事情，并用向富裕市民募捐的办法，筹款举办一些公益事业。在同一天开办了经过漫长的准备阶段的市职业介绍所，马上就有六七千失业者去登记，除了一个例外，其他人没有找到工作。

国王认为用下述办法可以使资产阶级反对派安静下来：他答应定期召开联合议会，并定于4月27日开会，此外他还答应向邦联议会要求交保证金的出版自由，向梅特涅要求德国的统一。这些奇怪的诺言确实使得柏林的庸人大喜若狂，他们的机关报《福斯报》，他们的代表机关市议会作为“稳步前进的朋友”，对于这种了不起的让步表示“欣然感谢”。当然柏林的无产阶级不会上这个当。尽管它作为一个阶级还不够发展，不够成熟，可是它还是有力量在城门前举行了盛大的群众大会，除了要求出版自由、结社自由以及

其他资产阶级自由而外，已经提出工作要有保障以及设立劳动部的要求。

不幸的是，国王错误地认为，他也能很快制服这个反对派。头几次的群众大会他忍耐过去了，后来就下令用武力驱散群众大会，用马刀砍回家的群众，或者向他们开枪，城里的街道上布满了军队。事先，近卫军在兵营里听了普鲁士亲王的煽动性演说，一个个都起了杀心，甚至砍倒在马路上看热闹的最无辜的老百姓。3月13、14、15和16日都发生了这种屠杀事件。起初，资产阶级袖手旁观，甚至关上大门不让被军队追逐的人们逃进来。可是，当“最老实的市民”也毫无分别地尝到马刀滋味的时候，资产阶级就开始反抗了。

3月13日，维也纳人民推翻了梅特涅的统治，并把这个罪魁赶走，这个消息像一个火星落到层层堆积着的燃料上。这时，政府终于感到火已经烧到眉毛。以莱茵省长为首的一个大代表团从科伦到了柏林，相当率直地向国王表示，如果他不马上决定进行改革，那末他就可以等待莱茵省脱离普鲁士。这样一来普鲁士政府就更觉得形势逼人。于是它急急忙忙在3月17日和3月18日颁布了两个特别命令。3月17日的命令是宣布有保证金的出版自由，3月18日的命令规定在4月2日召开联合议会，并附有一个一般的纲领，这个纲领规定成立一个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邦联，普鲁士要实行立宪制。签署这两个特别命令的是三月革命前的内阁，全是遭人痛恨的人物。

同时，维也纳的革命也在柏林居民中引起一种羞愧的感觉。这座只懂得大言不惭地炫耀自己的“知识界的城市”，在政治见识和魄力方面却不及那多瑙河畔的被人轻视的享乐城市，这也未免太使人难堪了。正是几天前市政府为了使“秩序破坏者”安静下来而成立的那些“自卫队”决定3月18日中午在王宫前面举行一个和

平的群众大会，要求国王撤走军队，组织武装的市民自卫团，实行无条件的出版自由，迅速召开联合议会。国王的特别命令完全同意了这几点要求中的第四点，第三点只同意了一半。至于第二个要求，至少主张提出这个要求的绝大多数人都不认为是武装人民同军队对抗，而是主张由市民组成一支自愿的武装镇压叛乱者，使得第一个（无论从重要性上或者从次序上说都是第一）要求即撤走军队得以实现。这就是准备举行的群众大会的首要任务。由于军队的屠杀，由于暴君把人民当作没有意志的羊群任意杀害，三月革命前的专制政权终于感觉到三月革命前的臣民的忍耐已经到了尽头了。

大家知道，革命就在这时候爆发了。3月18日中午在王宫广场上集会的群众对国王的特别命令表示欢迎，但是浪漫主义的国王和他的官僚—封建的内阁欺骗他们的次数太多了，对于决定整个局势的要点他们是不会放过的。当司法大臣萨维尼在王宫门前对蜂拥而来的群众解释，国王所同意的比他们所要求的还要多的时候，一个工人对他說：“老头儿，你不知道，他什么也没有答应”，这个回答所包含的历史意义比整个历史学派所能表达的还要多。尽管国王从阳台上说了许多安撫的話，要求撤走军队的呼声仍然愈来愈高。而当一连龙骑兵从枪刺比赛場冲来，一连步兵也从王宫内开出要把群众赶出广场时，群众的呼声就变成了一场风暴。步兵队伍里放了两枪，这就成了街垒战的信号。

这两枪是不是偶然放出来的，还是普鲁士亲王下令叫军队进行攻击的（一切事情都跟这一点有联系），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清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可能是两枝枪走了火，可能普鲁士亲王（一般都认为他是军事进攻的祸首，由于他在军营里做过煽动演说，因此应该受到这种怀疑）在这时候碰巧没有进行反动阴谋，但是，只要

撤走军队这个问题成为迫切的实际问题，争执的双方都不能，也不愿退让，武力冲突就是不可避免的。即使不在这个偶然的情况下发生，也会在另一个偶然的情况下发生。

在这十三小时的斗争中，到底是誰胜利了，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争论也是多余的。所谓战斗胜利，就是迫使敌人接受自己的意志。不能理解，为什么每个普鲁士小学生在學習布呂希爾和老弗里茨的會戰時所學到的簡單邏輯，對於國王同人民之間的斗争就不適用了。3月19日上午國王命令軍隊撤出城外，而在3月18日下午他還寧冒街壘戰的危險而頑固地拒絕這樣做。有人說（正如一些好心腸的歷史學家多次說過的那樣），撤走軍隊的命令是在沒有充分理由和糊里糊塗的情況下頒布的，可是不知道由誰，也不知道為什麼頒布這個重要命令的大本營並不是遭到一次，而是遭到三次攻擊。舊普魯士確實在1848年3月18日到3月19日夜間無可救藥地崩潰了，這是由於它罪惡的負擔太重，而革命的有力衝擊又加重了它的負擔。

熱狂的軍隊殘酷地進行街壘戰。解放戰爭的愛國官兵都因此發出痛苦的叫聲：這是普魯士軍隊的恥辱。相反地在街壘上戰鬥的柏林人民不分老少都是勇敢頑強，堅持不屈，而且具有人道主義精神，一切沒有偏見的目擊者都証實了這一點，甚至一個軍事記者也不自覺地承認這個事實。人民的武器十分缺乏，可是他們却使同他們對峙的一萬四千名士兵，三十六門大炮一夜功夫就變得十分狼狽，以至第二天早晨五點，司令官不得不命令疲乏得要死的軍隊停止戰鬥。街壘戰士不斷地從居民的同情中汲取到新的力量。毫無疑問，這個三月之夜的春天的風暴，使得小資產階級的核心跳出了苟安的小圈子。

但是斗争的主要担子是由无产阶级担着的。3月22日在庄严

隆重的葬礼中埋葬了一百八十三名死者，其中有一个候补法官和两名大学生，有一个大学生根本没有参加战斗，是被嗜杀成性的兵士杀害的。死者中有许多手工业者，从名单上可以知道只有很少几个是行东，绝大部分都是帮工，此外还有许多工人，有机器匠、店员和学徒。没有人认尸的三十三名死者显然都是工人阶级的成员。后来，反动派对这些无名的死者制造了一种恶毒的谣言，说3月18日的战斗者是由外国的密探，流浪汉和罪犯组成的。可是反动派并没有任何证据，尽管它费了很大力气，也没有能够在没有人认尸的死者中，或者在七百名被捕者中找到一个密探，流浪汉，罪犯，或者哪怕是一个“受过刑事处罚的人”，虽然在三月革命前的柏林，在马路上吸烟就会受到“刑事处罚”。甚至一个普鲁士的枢密顾问格奈斯特都简短有力地驳斥了这种可耻的造谣，他说：“常常有人硬说，牺牲者之中有几十个受过处罚的小偷。当然其中不会有枢密顾问。要是这种说法是真的，那末这种死就使那些人变得光荣。”

普鲁士亲王随着军队离开首都，同一些决不英勇的冒险家一起化装逃到伦敦。一些最受人民憎恨的旧大臣和上层社会中那些吓得发抖的人们也离开了柏林。国王委托一个暂时充作自由派的大地主，阿尔宁伯爵组织新内阁，但是谁也不能把墜落的政权抓到自己手里。王宫的许多房间里一片混乱，宫中的庭院里，人越来越多，拥挤不堪。街垒战士被一种共同的本能所驱使，从城市各处拥进宫门。他们手中握着胜利的武器，脸上还带着战斗神采，肩上抬着牺牲了的战友的棺木，死者的伤口都坦露着，妇女们把不易凋谢的花草和月桂装饰在他们流血的额头上。群众一声不响地迎接他们，嘴唇在抖动，眼泪往下流，只有抬棺木的人的坚定脚步声在宫中的庭院里发出回响，抬棺木的人不时高声喊叫牺牲者的姓名，“五个没有受教育的孩子的父亲”；“在科伦市政厅旁的街垒上被打

死的”；“投降以后没有得到宽恕，被刺死的”；“今年十五岁，在我旁边被打死的，是我的独子”。于是对霍亨索伦进行了一次连斯图亚特和卡佩<sup>①</sup>在断头台上都没有受过的审判。在弗莱里格拉特的不朽的诗歌中永远保存着这个法庭的强大威力：

“就是这样呀！子弹穿进胸膛，头颅劈成两半，  
你们用担架抬着我们向阳台走去！  
‘滚下来吧’——他摇晃地走着——摇晃地走到我们的床边；  
‘脱帽！’——他脱了——他鞠躬了！（本来是一个演员，  
现在成了木偶！）——他面色苍白侷促不安地站着！  
这时军队离开了这座我们以死夺得的城市！  
你们在书上看到的是‘我信赖耶稣！’  
在这里更适合的是‘我信赖钢铁！’”

从此以后，诗中的死者对活着的人们的轻微责难常常被人用来加在胜利的街垒战士的身上。为什么使国王遭受难以忘记的屈辱，而不坚决果断地粉碎王朝呢？正像人们因为巴士底狱的攻击者没有立即成立共和国而指责他们一样，这种责难是正确的，也是不正确的。无产阶级齐心奋起粉碎了可耻的枷锁，在一天的血战中洗刷了几十年的耻辱，划定了一条历史界线，世界上任何力量都不能再退过这条界线。毫无疑问，无产阶级也能够暂时推翻王朝，但是它不能建立统治，因为它还不够发展，不够成熟；它不能解决它刚刚模糊地感触到的任务。无产阶级没有忘记“信赖钢铁”，因

<sup>①</sup> 斯图亚特是统治苏格兰和英格兰的王朝，卡佩是统治法国的王朝，此处“斯图亚特和卡佩”大概是指英王查理一世和法国皇帝路易十六。——译者

为抬着死者到王宮去游行，不仅是人民法庭对一个有罪的君主的报复，而且也是3月18日的革命事业的巨大成就，因为这次送葬迫使国王承认了人民武装力量。无产阶级只能起到为资产阶级扫清道路的作用。资产阶级根据其历史发展水平，应该先进行统治。它的义务是同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进行清算，在这次清算中可以决定，3月18日的英勇事业是成功了还是被出卖了。

资产阶级背叛了革命事业。这些毫无心肝的人们使埋葬人民战士的公墓荒蕪不堪。十字架生了锈，字迹变得模糊不清，坍塌的坟墓上青草丛生。但是，觉悟的无产阶级终于了解了三月革命的历史意义，又使弗里德里希·斯哈茵的墓地成为一个神圣的场所。马克思后来为另一个3月18日的烈士们所说的话，用于这些死者也是适合的：他们永久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sup>①</sup>。

## 二 资产阶级的背叛

德国革命从柏林的街垒上得到了一个坚固的基础。这个革命席卷全国，破坏了封建社会的根子。农民阶级为了摆脱无可名状的苦难而举行起义。在南德，在奥登瓦尔德，在黑森林，从农民战争的古老土地上燃起新的火焰；豪门贵族的收租息的官员被赶走了，土地登记簿和什一税册被销毁了，地主的府邸被捣毁了。在萨克森王国，大火烧毁了一些封建王宫。在易北河东的普鲁士，农民运动的声势最为浩大，而这里又以西里西亚为最。农民们成群结队地来到庄园，强迫他们的压迫者写下放弃所有租税的文书。普鲁士唯一有组织的政党，封建政党被无数次的农民暴动搞垮，随着它

<sup>①</sup>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82页。

的倒台，三月革命前的国家的最后支柱也就垮台了。

这时候，在柏林，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明显地暴露出来。三月之夜的激昂热情几乎还没有消失，资产阶级就开始不顾一切地叫嚷“结束革命”，过安静日子了。资产阶级掌握了市区各机关，并利用职权把由军械库交给市民自卫团的二万五千枝步枪拿过来。它规定了参加市民自卫团的条件，第一是本地人，第二能够找到保人，保证将来归还领到的武器，第三能够独立谋生，规定这些在最大范围内适用的条款的目的，是想把无产阶级排除于人民武装之外。刚刚取得胜利，胜利者从斗争中取得的果实就被人窃取了。

新的市民自卫团马上变成一支警察部队，它可以使人想起三月革命前的警察。它像一只受了枪伤的野猪疯狂地卫护神圣的财产，反对“煽动者”。同时，三月斗争的所谓过火之处不过是一个退职军官的住宅和一个手套厂的店房被捣毁，因为他们把街垒战士出卖给军队。同样的命运威胁着普鲁士亲王的王府，可是由于一位冷静沉着的群众领袖解释说，这是人民的财产，因而王府才没有被烧毁。此外，在三月革命的那一周中，也像过去常常看到的那样，显示了革命的崇高力量：一般的犯罪，特别是侵犯所有权的罪行减少了。具有特色的一件事是，警察大臣博德尔施文克在3月18日以前几天，当他正在“谈论广大群众的政治危险性的时候，就已经从侵犯所有权罪行的减少看出革命的苗头”。3月18日后正好一个月，柏林警察总监公开宣称，“一般说来，帮工和工人至今的态度是值得公开赞扬的”。终于争得出版自由以后三个星期，柏林刑事法庭的检察官不得不对正直的市民关于他们无数次控告别人“侵犯出版事业”同样公开宣称：“谁想享有出版自由，谁就必须能够忍受滥用这种自由。新事物往往会使人过高估计危险性。”虽然

如此，市民自卫团还继续为受到威胁的财产叫嚷；一天晚上，一个对同僚的行为不满的正在执行巡逻任务的排长报道说，城里一片寂静，只有市民自卫团例外。从这个威武的部队自己选出的几个司令官的身上最能看出这支部队的精神：先是警察总监馮·米努托利，然后是城防司令官馮·阿朔夫，后来是反动透顶的布莱桑少校，最后，当资产阶级的英雄由于自己像天神而开始感到不安的时候，是庸人林普勒尔，血是资产阶级的血，肉是资产阶级的肉，这支军队在武装的反动派面前是胆小的兔子，在手无寸铁的无产阶级面前是怒吼的狮子。

到了3月23日，这种丑行已经令人不能容忍，以至一年前创刊的柏林唯一的政治日报《阅报室》针对那些宣扬安静的人发表了一篇文章。它说得很对，资产者在革命后第一天就竭尽全力后退，这是由于他们害怕工人，所以才采取这种自杀的行动。诚然，在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之间有一条鸿沟，但是为了在这鸿沟上搭桥，资产阶级必须前进，而不是后退。《阅报室》的编辑由于发表了这篇平心静气而又合情合理的文章而遭到愤怒的市民自卫团员的私人报复，这也是必然的。他的民主派的朋友拥到他家里来，同他绝交，交易所庄严宣布，谁要不帮忙夺走《阅报室》的订户和广告户，谁就是“无赖”。

市当局同市民自卫团当然是一丘之貉。市当局在声明中颠倒黑白地硬说，群众的政治运动是为了夺取资产阶级的财产。3月21日，市当局就同国王进行秘密商谈，达成协议，要叫刚被赶出城的近卫团再开进城来。为了迷惑人民，市政府印发的声明中说，“国王陛下已经下令，军队在进城以前要宣誓遵守宪法”，也就是要遵守根本不存在的宪法。可是到了最后关头，却没有实行这个漂亮计划的勇气，这份声明也就被扔到字纸篓里去了。这时候，有一份

一万四千人签名的請願书呈給了国王，請願书要求把不是被赶出的部队，而把“同市民友好的部队”开进城来。一个十分可疑的蠱惑者，兽医烏尔班在这方面出了不少力气，市民自卫团中的大多数人都表示贊成。在玩弄綬帶和肩章方面，市民自卫团比資历最深的近卫軍軍官还要高明，不过越小心越好，用真正的軍隊保护神圣的財產要比用他們的志願勇士可靠一些。于是，3月30日，一个步兵团和一个騎兵团，外加两个步兵营和一个騎兵連又开进了首都。

这对于与此同时进入內閣的資產階級并不是一个好兆头。如果說應該先由資產階級进行統治，那末，在它內部，萊茵資產階級又是最发展，最成熟的。阿尔宁伯爵立即邀請科倫和亞琛的商会会长康普豪森和汉澤曼进入內閣，可是这两个人却非常聰明地拒絕在一个大地主手下当傀儡，这个大地主可能現在戴着自由派的假面具，而实质上却坚持封建的等級观点。由于这个阻力，阿尔宁伯爵跌了交。3月29日，康普豪森被任命为首相，汉澤曼被任命为財政大臣。联合議会的两位反对派首脑，施韦林伯爵和奧尔斯瓦特由旧內閣轉入新內閣，担任文化大臣和內政大臣，曾任駐巴黎公使的阿尔宁—亨利希斯多夫則担任外交大臣。

这些人應該在資產階級的第一个內閣中取得一席之地，因为他們在阿尔宁伯爵为首的內閣中已經大力为資產階級做了准备工作。3月21日，他們安排了国王在柏林主要街道巡視的趣剧。胳膊上系着黑紅黃三色帶的將軍和大臣是前卫，一个市民自卫团員在国王前面打着黑紅黃的旗子，旁边是警官施梯伯，后面是兽医烏尔班拿着华盖，国王像一个逛年市的，在市政厅和大学前面声明，普魯士應該溶化于德意志，他願意拯救德国的統一和自由，他願意領導立宪的德意志。在柏林逛馬路的国王兴高采烈，不过这幕趣

剧也使他蒙上新的耻辱，他刚刚屈尊走到街头，就又得意洋洋地大吹大擂起来。对他这些庄严的许诺，全德国都报之以讥讽的笑声。

但是这次戏剧性的巡视的组织者清楚地知道，他们要想达到什么目的。国王在给奥格斯滕堡公爵的一封信中，就给自己确立了参加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公国对丹麦的斗争的使命。这是在德意志邦联的庇护下公开进行的，据说是为了挽救德意志民族免遭丹麦的异族统治。见不得人的目的却是，一方面恢复受到屈辱、被赶出柏林的近卫军的军事声誉，另一方面是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那里的事业受到德国人民的拥护）摧毁一个革命的发源地。在普鲁士军队越过边界以前，普鲁士使臣维登布鲁赫在4月8日向丹麦政府递交了一份秘密照会，照会中说，决不要把这一战争看作是一个悲剧，普鲁士政府首先希望丹麦国王保有这两个公国；它进行战争的唯一目的是阻止德国的激进分子和共和主义分子进行有害的干涉。

早在阿尔宁内阁时期，反革命力量就已经形成，可是没有资产阶级的帮助，内阁没有足够的力量阻止革命的猛烈进攻。3月22日，布勒斯劳和里格涅茨的一个代表团同3月18日的科伦代表团一样，坚决干涉国王的政策，而且用的是同一种威胁手段，如果下列要求不得实现，西里西亚就要脱离普鲁士，这些要求是：在初选的基础上成立人民代议机关以代替联合议会，充分保证人身安全，设立陪审法庭，特别是审理政治案件时要有陪审法庭，成立普遍的国民武装，并自选指挥官，规定不可罢免法官，废除一切封建的裁判权和警察，建立大臣责任制，以及军队要宣誓忠于宪法。阿尔宁伯爵极力反对这些要求，可是这个由从前的警察总监率领，主要由城市官员组成的代表团却坚持这些要求，加之从西里西亚传来一些骚乱的消息，因此国王不得不让步。

在答复西里西亞代表團的一道立即公布的內閣命令中，國王答應實行“基礎最廣泛的立憲制”，制定一個受到普遍歡迎的選舉法，根據這個選舉法可以成立以初選為基礎的、包括人民的一切利益的代議機構。這個機構對西里西亞代表團提出的各項要求（內閣命令又重複列舉了這些要求）作出決定。此外，國王還答應，常備軍要宣誓遵守將來頒布的憲法，只在一點上，國王有所保留，就是新選舉法應該交由聯合議會核定。阿爾寧伯爵不能接受這個綱領，他又抵抗了幾天。可是他的同僚，特別是他的本家<sup>①</sup>把他趕出了內閣。這些資產階級化的貴族，毫不遲疑地參加了資產階級的司令部。

在兩位新大臣中，康普豪森受過較多的教育，而漢澤曼則比較堅決果斷。漢澤曼企圖毫無顧忌地實現資產階級的物质利益，而康普豪森還常常同資產階級的良心進行鬥爭。但是他們首先在這一點上是一致的，即為了資產階級的利益必須取消無產階級的勝利。因此他們拒絕根據革命的历史事實，召開新的人民代表會議，而是堅持所謂“法制基礎”，他們要維護“法律状态的連續性”，還說了一些別的漂亮言詞。他們堅決主張由聯合議會討論選舉法，並擬定新憲法的大綱。這個漂亮的“法制基礎”骨子里有一種狡猾的打算：如果由一個封建幽靈確定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統治，那末資產階級消滅革命這一行動就可以得到一種可敬的聖光。

不能期望聯合議會是什麼別的東西，它只能是一個幽靈。封建政黨已經全綫崩潰。甚至封建頑固的俾斯麥也忧心忡忡地承認，任何力量都不能使被埋葬了的過去復活，同時帶着哭笑不得的神情補充了一句，他將支持康普豪森內閣，否則就沒有維持一種“合

<sup>①</sup> 指阿爾寧—亨利希斯多夫伯爵。——譯者

法的和有秩序的状态”的希望。联合議會好像是一个通了电的僵尸，恰恰还能够根据资产阶级的指示发布命令。在4月6日的法令中，新宪法的要領已經确定了：不交保证金的出版自由，审理政治案件也設立陪审法庭，确定司法独立，取消对它頒布的紀律法，人民有自由結社和集会的权利，不論宗教信仰如何都可享受国民权，最后国王保证，頒布一切法令，确定預算，征税都必須得到将来的人民代表的同意。此外，4月8日的法令又决定通过普遍、平等、秘密，但間接的选举，选出一个議會，同国王商定新的宪法。

在这些法令里，还非常明显地表露出对胜利的无产阶级的畏惧。它們实际上是国王对西里西亚代表团所做的諾言的翻版。特别是新的人民权利中那个应该首先发生作用的权利，正如洛貝尔图斯所证明，是由恐惧中产生的。在联合議會的所有議員中，洛貝尔图斯恐怕是唯一原則上贊成普选权的人，但是毫无疑问实际上他却又反对普选权，因为他认为群众还没有成熟到能够行使权力的程度，这个事实就是这种形势的特征。如果说內閣已經用間接选举在普选权上造成了一个有害的裂口，那末內閣又用下述規定把4月6日和8日的法令送入一个十分模糊的境界；这条規定是：新的宪法由国王同人民代議机关协商后制定。

这种“协商”是资产阶级的圈套，称得起是“法制基础”。正如后来一个左派的发言人在柏林議會中所說，这种“协商”是事后毫无道理地給偉大的运动加上的一個污点，是一个既不旧又不新，而且也不明确的名詞，是像一条臍带似的长在新东西上，却吸收旧东西的真正怪物。由于这种“协商”，基本上又回到了3月18日中午的状态。人民的胜利被破坏了，国王恢复了旧日的权力。洛貝尔图斯又在联合議會中簡單明了地提出問題：如果国王同議會不能取得一致意見，那末怎么办？汉澤曼用冷冷的譏諷口吻回答說，誰

還有最大的權力，誰的意見就起決定作用。洛貝爾圖斯嘆了口氣，由此作出結論說，在我看來，只有用第二次革命的辦法才能做到這一點。雖然如此，他也同意協商的原則。作為一個政治和社會問題上的空想主義者，他想拯救“普魯士在法律方面的純潔性”，而這個普魯士從十六世紀以來的官方歷史就是一連串的法律破壞；為了否定“第一次革命”，即人民革命，洛貝爾圖斯準備進行“第二次革命”，也就是擁護王朝的反革命。

假如資產階級在背叛無產階級以後，不利用財力加強自己的統治，那末它就不成其為資產階級了。內閣要求聯合議會批准撥款四千萬塔勒，其中一千五百萬用於裝備軍隊，二千五百萬用於制止國內的無政府狀態，其方法是：給工商業提供流動資金，在資金的流動中，可以使失業的和騷動的無產階級沉入水底。因為在金錢問題上不僅是王國的溫情，而且連資產階級的法制基礎也不發生作用，所以康普豪森和漢澤曼就向一年前主要由於他們的活動而宣布自己無權同意這種撥款的議會要求撥款，沒有經過很大周折，他們得到了一大筆零花錢。

他們企圖利用聯合議會進行的第三個陰謀沒有完全實現。在這個議會召開期間，由海德爾堡發起的名士議會在美因河畔的法蘭克福開會，這就是所謂站在革命立場上的預備議會，可是實際上它毫無革命氣息。儘管當時德國人的政治修養還很差，可是他們已經不可遏止地逐漸認識到，只應該用共和國的形式把兩個大國、六個中等國家和二三十個小國，總之把一個幾乎全是君主政體的大小國家的混亂的集合體建成一個唯一的、自由的德意志。因此，如果預備議會想做全部工作，它就不應該“結束”革命，而應該宣布永不停止革命。可是德國資產階級說不出這句話來。主要來自南德小資產階級的少數代表，要求成立德意志共和國，不過他們所提

出的却是一种在历史上早已过时的形式，即按照瑞士的榜样，成立一个联邦共和国。资产阶级的许多代表和主要来自北德小资产阶级的大多数代表宁愿放棄統一而不願放棄君主政体。他們的理想是一个被拔掉羽毛的德意志。在放棄德意志的奧地利的情況下（几十年来梅特涅的恶劣政策精神上通过书报檢查制度，物质上通过关税限制使奧地利同德意志的其他国家隔斷），他們热烈维护普魯士的世襲王权，这个王权应该給资产阶级去除过分沉重的封建主义的和各邦分立主义的枷鎖，但是其他一切則尽可能保持原样。这些人說起漂亮話来滔滔不絕，可就是害怕革命，而他們认为革命是“畏懼王权”的。只因为当时普魯士国王还受到普遍的蔑視，所以他們的理想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

在預备議會中，这些矛盾彼此間发生了剧烈的冲突，但是君主派一开始就取得了可靠的胜利。这一派有三百七十票，而共和派只有一百五十票，因而君主派占有极大优势。同时来自不发达的共和主义的老家的代表人数也不成比例，原定維尔騰堡派代表五十二人，巴登派代表七十二人，黑森派代表八十四人，但实际上只来了两名奧地利代表和一百四十一名普魯士代表。預备議會拒絕宣布自己，因而也拒絕宣布革命是永远存在的。它却成立了一个五十人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将同經過清理的邦联議會一道，在普选基础上召开德国国民議會，至于进行直接选举还是間接选举，則由各邦自己决定。未来的德国宪法应由国民議會“单独地”制定，不过它的自主权包含这样一个問題，即国民議會是否要同政府取得一致意見。同預备議会的这种曖昧性质作伴的是邦联議会的另一种曖昧性质，这就是：邦联議會将召开一个“制宪”国民議會，不过这个議会的目的是，“在德国人民和政府之間”完成制宪工作。它們对协商論都避而不談；預备議會并不是絕對拒絕协商，而邦联議

会沒有率直地提出协商；不过問題在于，到底誰的力量比較大。預备議会的力量暫時大些，因此，它否決用武装力量作決議后盾这一提案，就更加不合道理了。这样一来，它就把未来的国民議会的自主权放到烏有乡中去了。

黑森三月內閣的大臣加格恩在預备議会中扮演了普魯士三月內閣的大臣康普豪森和汉澤曼在联合議会中扮演的角色。崇拜加格恩的資產階級，因为他嗓門大，眉毛濃而称他朱彼特<sup>①</sup>，而讲究实际的容克俾斯麦同他談了五分钟話以后就說他是“一个大笨蛋”和一个“廢話噴壺”，他这个評价比那些資產階級分子要正确得多。北德小資產階級在預备議会中的代表主要是罗伯特·勃魯姆。他利用自己的魄力和灵活的手腕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这个迟鈍的議會，他使議會沒有因为听到一支人民武装已經逼近的謠言而解散，但是他經過一陣反对以后，最后还是同意了多数代表的決議。南德小資產階級的代表黑克尔和司徒卢威思想比較混乱，性情比較暴躁，由于他們不屈服，所以沒有被选入五十人委員會，他們就在巴登发动了一次共和派的暴动，結果慘敗。

不論預备議会之酒的味道怎样淡，对于柏林來說，还是太濃。普魯士国王已經以立宪制德国的領導者自居，萊茵資產階級決不打算把权力让給巴登和黑森的地方名士。因此康普豪森內閣根据邦联議会恰好在預备議会开会前通过的一个決議，由联合議会选举参加德意志国民議会的普魯士議員。可是革命的气焰很高，不会忍耐这种挑战，康普豪森认为接受五十人委員會的意見，收回成命是适当的。联合議会只得宣告剛剛完成的选举作廢，它在永远走入坟墓之前，也不得不忍受这种痛苦。

① 羅馬神話中最高之神。——譯者

### 三 議會

資產階級的背叛並不是沒有遭到革命人士的激烈反抗。聯合議會的召开，实行間接选举以及臭名昭彰的協商特別在柏林引起强烈的抗議。可是資產階級奇襲成功了，因为它有一个很有利的条件，即作为一个階級，它已經認識到自己的利益，而在小資產階級和无產階級群众中还存在着非常模糊的傾向。

情况只能是这样。因为他們是从一种政治上毫无生气的状况，突然被投入一个革命运动中的。几十年来他們都沒有任何处理社会事务的机会，現在他們有了沒有限制的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他們在使用新武器的时候，当然会显得笨手笨脚。

小資產階級是城市居民中最强大的階級，但是它的力量被它的分散性抵銷了。它还充滿着行会的偏見，在許多以官吏、軍人为主的城市中和首府中，小資產階級由于顾客关系，依存于宫廷和容克，官吏和軍人。这个階級的大部分人虽然有不滿情緒，但都是反动的，或者，一旦他們起来反抗，只要用几句最好的反动口号就能把他們抓住。但是要使他們之中的比較进步的分子就范也很困难。在經濟上还很落后的四分五裂的德国，他們的利益，从而它們的要求在国与国之間，甚至省与省之間，有时候甚至城市与城市之間都各不相同。使得最勇敢的小資產者也感到胆怯和不安全的正是革命本身，革命所开辟的不是手工业的黄金道路，而是現代階級斗争的戰場。

工人階級不怕这种意外的襲击；但是只有当大工业擦亮了它的眼睛的时候，它才認識到自己必須做的事情是，把自己組織成为現代資產階級社会的一个階級。无產階級的其他部分而且是絕大

部分还十分幼稚，他們的阶级意識刚刚觉醒，还没有脱离睡眠状态。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他們力图恢复已经失去的中世纪工人的地位。农村的无产阶级更是如此。大城市里的工人不可避免地对一些問題認識不清，他們在资产阶级的国家法律的阴谋詭計中找不到出路，他們的生活困苦不堪，这一切就给形形色色的可疑的蠱惑者，如兽医烏尔班，前少尉軍官海耳特，糖果糕点商人卡尔貝以及类似人物大开方便之門。在柏林，馬克思在《萊茵报》上已經严厉批評过的那种“自由人”的輕佻的卖弄才气，这时候产生了很坏的结果。首都的知識界已經把他們的彈药白白浪費掉了，而現在真正的战斗开始时，他們的枪膛里却没有一顆子彈。三月革命后，封建专制的反动派就立刻开始煽动流氓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担心财产受到威胁而大嚷大叫，封建反动派怎能不利用这个大好机会呢！

此外，德国議会和普魯士議会的选举引起了普遍的关怀。議會能够而且必須补做革命后的几个星期所沒有做的事情。当然两个議會同时召开說明资产阶级的背叛多么彻底地搞乱了整个局势。五十人委员会要求各邦政府，在法兰克福議會制定德国宪法以前，不要召开各邦的議會。假如德国人民代議机关願意接受一个革命議會的任务，那末这个要求就是正确的。可是，如果德国人民代議机关仍然停留在預备議會和五十人委员会的空中境界，那么德国革命的最后希望就寄托在普魯士議會身上，这个議會至少在同德意志的最强大的王朝进行斗争。約翰·雅科比在一份致普魯士議員的呼吁书中要求普魯士議會，在它开会以后立即任命它所信任的人为大臣，并赋予无条件的全权，同时自己把会期延长到德国的制宪工作結束时为止。他庄重地宣称，德意志的命运决不决定于一个城市，决不决定于这个城市的胆大妄为的人民

群众的自負；似乎把德意志从三月革命前的泥沼中拉出来的，不是柏林无产阶级的“自負”，而是雅科比所参加的预备议会和五十人委员会！事实的逻辑迫使这位可敬的人物在他响亮的話声还没有完全消失的时候，就在普鲁士议会中取得了一席之地。

5月初，为两个议会进行选举。在这次选举中普选权显示了它的本能，它把大学生协会的一切浪漫主义分子，一直到阿倫特和雅恩这些解放战争的化石，以及三月革命前的议会和大学里的知名之士都送到法兰克福那个表面上高贵，实际上软弱无力的议会中去。而给普鲁士议会选了一些新人，有一部分是很能干的人：农村无产阶级不仅是第一次，而且也是最后一次有五十个代表参加了议会。所有的容克却等于没有代表，在容克的天堂——西里西亚只有一个容克当选。甚至在后波美拉尼亚的旺代<sup>①</sup>也产生了反抗情绪。劳恩布克的代表是一个乡村小学教师，什拉勿的代表是个农村短工，吕根瓦尔德的代表是个法院文书，诺伊施泰廷的代表是一个小农，贝尔加德的代表是个肉店师傅，而容克的坚强堡垒什托尔普的代表是陪审员洛塔尔·布赫尔，他虽是容克地主的法官，却得到他们的臣民的喜爱和信任。

正因为还不存在什么政党，所以在选举中还谈不到党派之间的真正斗争。甚至在柏林也有这样的情况，即由相同的选举人在同一次选举中选出的两个议员，一个在新议会中属于极右派，另一个则属于极左派。柏林资产阶级由于感到《阅报室》太越轨，旧的庸人报纸又太狭隘而创立的新机关报《国民报》还在暗中摸索，因而把瓦尔德克在柏林当选说成是反动派的胜利。普选权只能利用

<sup>①</sup> 法国的一个省，在卢瓦尔河口之南；十八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期间，那里曾发生反动落后的农民反对革命的国民议会的反革命暴动。——德文《梅林文集》编者注（以下简注“原编者”）

現有的材料进行工作,它沒有很大的选择余地。假如新的人民代議机关要取消旧的国家,那末它就需要經受过鍛炼的力量。事实上,只要真正进行統治的阶级的成員,即教会、学校和国家中的官吏阶层得到选举人的特別支持,尤其是只要他們由于有表面的或真正的自由精神,而吃过浪漫主义反动派的苦头,那末事情就不会像从外表上看到的那样沒有希望。許多僧侶、教师和法官被选为議員。加之律师的行会限制产生了一种司法界的无产阶级,其中有一大批心怀不滿的陪审员被选入議會。大城市的资产阶级知道自己很缺乏教养,就优先把自己的受过司法教育的官吏选作自己在議會中的代表。

虽然官吏在柏林議會中占优势是可以理解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种优势对于議會也是大为不利的。法学的形式主义不止一次地把議會引入歧途,吃过艾希霍恩的苦头的僧侶和教师大多是很不可靠的人物,尤其是普魯士的官僚永远是普魯士的官僚,用他們中的一位佼佼者的話來說,这些人由于受了严格的訓練,他們的智慧和道德的肋骨已經折断了。这在紧要关头就会成为致命弱点。

在普魯士議會中,逐漸形成四个集团,它們沒有十分明确的界綫,它們的綱領也相当近似,不过根据它們的社会地位还是可以区别开来的。人数最多的,差不多占議員半数的右派純粹是政府派,他們虽然在原則上淋漓尽致地痛罵封建主义,可是实际上却尽一切可能准备同王权和容克阶级妥协。这一派的領袖是萊茵的法学家賴辛施佩格,西里西亚的工厂主米尔德,波美拉尼亚的教授鮑姆施塔克和普楞茨劳市市长格拉博夫。米尔德是議會第一任議長,格拉博夫是第二任議長。

中間派右翼同右派很接近,它們之間的差別就同法国的王朝

反对派同基佐的順从的多数派之間的差別相似。中間派右翼也想同国王和容克同吃一碗飯，不过它把匙子伸得比右派靠碗底一些。这一派的領袖是建筑顧問兼政府顧問馮·翁魯，他生于东普魯士，是一个將軍的儿子，本来是一个能干的官僚，后来铁路建筑事业把他深深卷入資產階級利益之中，他感到資產階級的筵席比官僚阶层的筵席更为丰盛，味道也較好。他随时都准备出卖群众，不过在出卖的价錢上，他却斤斤計較。潛在的虛榮心使他苦惱，而他却裝作一个重視公共事业，不計較个人得失的忠心耿耿的正直人。在他周圍的有柏林市議員敦克尔和施泰廷市法律顧問吉尔克以及施滕达尔的陪审官皮列特，皮列特的一向的工作是調整封建領主同資產階級的关系，在实际工作中学会对容克階級进行謾罵，但又不損伤它一根毫毛。

屬于中間派左翼的是一些資產階級思想家。我們可以把这个集团比做路易·菲力浦时期的共和主义反对派，所不同的是这个集团不願成立共和国。它所追求的是資產階級的共同利益。右派和中間派右翼在工商业者的實踐中代表資產階級的共同利益，而中間派左翼則从較高的、更有原則性的立場代表这种利益。布赫尔和洛貝尔图斯是中間派左翼的領袖，他們虽是議會中最聰明的人物，可是他們来自政治上最落后的省份波美拉尼亚，他們沒有絲毫革命精神。他們对于历史发展有一定程度的理解，不过不是混亂的市場中的斗士，而是幽齋中的学者所有的那种理解。洛貝尔图斯对于議會所討論的社会問題和經濟問題从来沒有发表意見，其实他能比其他任何議員更好地研究这些問題。相反地，他却特別喜欢接触德国問題，他那空想的癖好在这个問題上可以建造一座又一座的空中樓閣。布赫尔的邏輯比較謹严，可是他缺乏洛貝尔图斯所有的社会独立性。德国的悲慘状况对一位偉大人才所进

行的報復，很少像對布赫爾這樣徹底。他從小就被迫生活在一個狹小的圈子裏，直到他天生的決心在他身上消失為止。布赫爾和洛貝爾圖斯決不是通達世情，目光遠大的人物，可是一個道地的小市民，但也是一個干練的人才，薩克森德里奇領主法庭的法官舒爾采受了他們的影響。在會議的最後幾天，通過補選，勃蘭登堡市市長齊格勒也參加了中間派左翼。他是普魯士民主派的一個真正有才華的典型人物，這個黨派只敢拉着老弗里茨的拐杖走入資產階級自由的應許之地。在實際的組織才能方面，齊格勒遠遠勝過舒爾采，他同布赫爾和洛貝爾圖斯一樣，對社會問題有比較深刻的認識，當然，也同他們，特別是洛貝爾圖斯一樣，被普魯士國家思想麻醉了。

第四個集團是左派集團。這個左派甚至不能同賴德律一洛蘭和路易·勃朗所領導的民主主義—社會主義政黨相比。由於它的個別成員具有共和主義的，甚至共產主義的思想，它那狹隘的小資產階級性質就更加明顯地表露出來。這個集團以北德小資產階級的比較激進的分子為代表，它比中間派左翼堅決，但政治眼光並不如它遠大。它的領袖約翰·雅科比和高等法院顧問瓦爾德克也是如此。雅科比對於當前的階級鬥爭了解得很少。他是一個堅持原則的人，不過他所堅持的是小資產階級原則，如果要用這種原則衡量無產階級的革命行動，這種原則就像柳條似的彎曲了，它把無產階級的革命行動一會兒說成是“勞動階級的正当要求”，一會兒又說成是“不願工作的賤民的無政府行動”。雅科比過分拘泥於抽象的公式，而瓦爾德克則存在過多的幻想。瓦爾德克的崇拜者把這個土生土長的威斯特伐利亞人比做伊梅爾曼筆下的賀弗舒爾采<sup>①</sup>，

<sup>①</sup> 賀弗舒爾采是伊梅爾曼的小說《明希豪曾》（1838）中的一個人物，他是威斯特伐利亞的一個富農，是被反動的傳統主義所束縛的農村上层人物的代表。——原編者

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就他的本性来说，他是一个坚强的人，但却有许多怪想。他是一个热狂的普鲁士人和坚决的君主主义者，像贺弗舒尔采挥舞着查理大帝的剑一样，他挥舞着“弗里德里希大帝的剑”。作为“威斯特伐里亚的农民之王”，他喜爱和了解的是贺弗舒尔采那样的农民，而不是无产者的农民。他否认普选权是劳动阶级的社会武器。他是一个正统派的天主教徒，尤其也是一个自以为“高贵”而不在国民议会发言的自觉的官僚，他以议员的身分建立了一个脱离实际生活的教士集团。

这四个集团逐渐由议会中分化出来，右派和左派分化最早，关于协商原则的争论在它们之间划了一条明显的界线。两个中间派的人数也同它们的政策一样长期变化无常，在壮大起来的反革命势力把它们推回左派以前，它们都在很大程度上倾向右派。左派约有四五十个成员，两个中间派也各有四五十人。

康普豪森内阁继续执行其叛卖政策，并把被人民赶走的普鲁士亲王召回柏林，还编造了他在英国已经完成“外交使命”的种种骗人鬼话。康普豪森认为，他让王位继承人负责君主立宪国，可以保护自己，因此他就充当“王朝的挡箭牌”；由于召回亲王，他确实为还没有头的反革命势力安上了一个虽不高明，但却顽固的首脑。事情非这样不可，亲王本人也就不再装模作样了。他在科布伦茨接见军官团时，说了句心里话：我只信赖这些军官；波森的一个选区把他选进了议会，他在议会中虽然公开表示拥护新制度，但是态度冷淡而拘谨，人们几乎不怀疑他希望尽快地推翻新的制度。

康普豪森内阁对人民代议机关的轻视态度同它对王权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形成十分鲜明的对比。它丝毫也没有为了使议会在开始阶段便于工作和消除混乱状况而尽自己的力量，当四百人组成一个不平常的议会，正在寻找头绪的时候，这种混乱是不可避免的。

政府甚至沒有同暫時掌握着權力的右派發生必要的接觸。它僅僅拿出一個憲法草案，這是比利時憲法的一個不成功的翻版，終於沒有得到任何人的贊同。

柏林的人民群众對於議會並不怎麼關心，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們從議會得不到什麼好處。對於柏林議會和法蘭克福議會說來，在沒有偉大的人民生活的城市里開會，是一個嚴重的損失。它們缺乏英國革命和法國革命在倫敦和巴黎所有過的噴火的土地。柏林群眾也企圖時常施加壓力，督促議會，並使它走上正軌，可是群眾沒有組織，他們的憤慨先是給伺機而動的反動派以詐騙的機會，然後又給它一個破壞人民代議機關的借口。

群眾所施加的最大的壓力就是6月14日對軍械庫的襲擊。在議會費了很大力量終於開幕以後，左派提出一個議案：議會承認革命，宣布3月18日和19日的戰士對祖國有巨大的功勞。這個提案沒有得到特別有力和清晰的論證；心情混亂的舒爾采—德里奇希望得到承認的不是街壘戰士在戰鬥時的行動，而是他們在戰鬥後的行動，這就在一定程度上使提案具有相反的意义。群眾對於提案的意义有更多的了解，在討論這個提案的兩天中，他們怀着激動的心情在會議廳周圍徘徊。提案竟以一百七十七票對一百九十六票被否決。會議又轉入議程，據說是因為三月事件的崇高意义是無可爭辯的，目前的國家法制就是在得到國王同意的情況下在這些事件的基礎上確立起來的，可是人民代議機關的任務不是對這些事件發表意見，而是同國王協商制定憲法。這樣一來，妥協就得到承認，群眾的憤怒情緒也就沸騰起來。馮·阿爾寧大臣在離開會議廳的時候本想再說幾句諷刺話刺激刺激群眾，結果却儘快地溜走了。同他一起溜走的還有傳教士濟多夫，他曾在陣亡的街壘戰士的葬禮上以教士的身分頌揚革命，現在却以議員的身分詆毀革命。

人民群众的非常温和的行动在6月14日的会议中为右派所利用，说是人民代议机关受到威胁，要求采取保护措施。左派打退了这一进攻，但是群众的愤怒终于化为袭击军械库的行动。这也说明群众对于左派的不信任，几天以后的事实表明，这种不信任是有道理的。当陆军部的一个委员胡说什么一群窃盗洗劫了军械库的时候，左派也一起听着，没有表示任何抗议，只敢发出轻微的嗤嗤声。可能当时反革命集团已经派了一些坏蛋混入军械库的攻击者之中；王室和教会的这些先锋战士也很可能施展了三只手的伎俩。就其实质来说，攻击军械库乃是对资产阶级背叛的本能的革命反击。议会中的大多数否定了街垒战士的功绩，这就确凿地证实了资产阶级的背叛。起初攻击成功了，军械库的守卫部队投了降。可是起义的群众还没有来得及武装自己，增援部队就把他们赶走了。市民自卫团这一次也像往常一样可耻。

尽管如此，对军械库的袭击在一定程度上使议会直起腰来。当时已经计划把议会迁到一个偏僻的小城中去的右派在6月15日的会议中，大多数人由于害怕没有出席。左派则通过了两个决议，一个决议说，议会不采取任何保卫措施，它把自己交给柏林居民来保护。另一个决议说，政府的宪法草案是一个“有价值的材料”，议会把这个草案交给一个委员会，由这个委员会对草案进行修改，或者另拟一个草案。左派和中间派左翼看到，一纸具文不起多大作用。瓦尔德克说：“我们必须由下而上地建设，首先必须建设市镇，肃清封建国家的可怜残余。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即将一事无成；我们就是在砂子里耕地，在空中造房子。”布赫尔的看法也与此类似；我们应该一天也不停地粉碎已被战胜的旧时代的残余；洛貝尔图斯早先已经提出一个议案，要求议会对工业条例、市镇法规和税制，教育法和兵役法以及其他等等作为宪法的一个有机部分作

出决定。

这是第一个有力的步骤，这个步骤可能远远越过大资产阶级所喜欢的范围。于是它就急忙通过更大的背叛来对付这一迫切的危机。

#### 四 汉泽曼内阁

普鲁士亲王几乎公开地，议会则完全公开地反对康普豪森内阁。特别是汉泽曼迫不及待地把他那还常常同种种良心谴责作斗争的“尊敬的朋友”推到一边。

汉泽曼认为，对革命的消极抵抗已经尽到了它的本分，现在应该对革命进行积极攻击了；资产阶级应该由王朝的挡箭牌变为反对人民的剑；继“中介内阁”之后的应该是一个“行动内阁”，以便在任何情况下都解除革命的武装，只要有一点可能也解除反革命的武装。他的计划既简单又有独创性。资产阶级为了王权而牺牲人民，王权为了资产阶级而牺牲贵族。议会中的三个资产阶级集团各得一个大臣的职位，议会被战胜了。汉泽曼是个老奸巨猾的资本家，他执行路易·菲利浦的已经可耻地破产的机会政策，他根本没有考虑这个附带的小问题，即在资产阶级制服人民群众以前，旧普鲁士的历史力量——王权和容克阶级是否就已经驾驭了新兴的资产阶级。

国王出于自己的打算暂时让汉泽曼便宜行事，议会也吞下了诱惑者扔给它的钓饵。汉泽曼使人数众多的奥尔斯瓦特家族中的某一个奥尔斯瓦特当上了首相兼外交大臣，他本人仍然担任一切恩典的源泉的财政大臣，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屈韦特尔和梅尔克尔分任内政大臣和司法大臣，商业大臣是右派的米尔德，农业大臣是

中間派右翼的吉尔克，教育大臣是中間派左翼的洛貝尔图斯。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勇敢的社会拯救者汉澤曼对于投票买卖多么关心，而对于哪怕是资产阶级的改革又是如何轻视。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有一定修养的农场主洛貝尔图斯负责教育行政工作，而他从来也没有显出对这一行有什么专长或兴趣。市法律顾问吉尔克却进了应该扫除一切封建垃圾的新成立的农业部，他自己也担心，连大麦和燕麦，黑麦和小麦也分不清。资产阶级只是没有能够挤进陆军部；在这里高踞首位的是罗特·馮·施萊根施坦將軍，不管他是昨天的幽灵，还是明天的恐怖<sup>①</sup>。

6月26日，新內閣出席了議會。在最广泛的民主基础上制定的宪法随着康普豪森的垮台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代替它的是有充分基础的君主立宪国，是两院制，不回到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也反对陷入无政府状态的自由，恢复受到破坏的信任，巩固信誉，在牢固地建立资产阶级统治以后，乐观地进行广泛的工作，为人民中的所有劳动阶级造福。

可是这种好日子只持续了两三天。6月28日，法兰克福的德国国民議会对它的虚无缥缈的自主权作了几个星期的幻想以后，被它的議長，高貴的加格恩引上采取“大胆行动”的道路，它利用自己的全权任命一个王侯作不負責任的帝国摄政。奥地利的約翰大公当选，这样一来，德国的运动就为各邦政府所掌握。可能有人要問，加格恩是直接为了各邦政府的利益而进行背叛的呢，还是他真正以为哈布斯堡王室由于一个奥地利大公接受了临时的中央政权而束縛住自己的手脚，以致后来不能阻止霍亨索倫王室接受世襲皇冠呢？不管怎么說，当他大言不慚地硬說，他采取“大胆行动”并

<sup>①</sup> 俏皮話，德文中施萊根施坦(Schreckenstein)这个姓中的“Schrecken”这一部分原是“恐怖”的意思。——譯者

沒有牺牲民族主权时，他欺騙了自己或者欺騙了別人。

一群羊对一群狼說，只要你們不参加选举，我們想选你們做我們的保护人；我們要以至上的全权規定，你們可以把我們吃光。各邦政府当然欣然同意这种“民族的自主权”，但是它們认为沒有必要再对人民的勇敢的蹂躪者隐瞒，羊終归是羊这一事实了。邦联議會宣称，早在德国国民議會选举約翰大公以前，各邦政府就一致承认这个帝国摄政，汉澤曼內閣也在普魯士議會宣布了这一点，对德国事业的叛卖也是汉澤曼內閣同普魯士国王締結的协定中的一項內容。汉澤曼內閣虽然同意选举帝国摄政，但是它反对根据“这种特殊情况为未来作出結論”。

普魯士政府通过这种抗議，公开反对德国議会的自主权，于是雅科比急忙提議对汉澤曼內閣进行不信任投票。雅科比的決議案清楚地表明，德国处在无可救药的分崩离析状态。他要求普魯士議會不同意选举帝国摄政，但承认德国議会有权无需事先得到各邦政府的同意就可以进行选举。这个提案从邏輯上看是无可指摘的，不过实际上它只是对德国議會說：你做了一件大蠢事，但是你做这种蠢事的权利却是不能限制的。經過一場十分混乱的辯論以后，雅科比的決議案以五十多票之差遭到否决。可是这个意外事件与其說是內閣的一个胜利，还不如說是內閣的一次失敗。不仅是多数人受到各种不同的动机支配，而且洛貝爾图斯也辞去大臣的职务。他对于德国的統一是有誠意的，不想用一种阴谋手段扼杀德国的統一，而汉澤曼同普魯士王室和容克阶级却一致采取这种手段。中間派左翼随着領袖下台而开始轉向左派。

法国的悲剧比法兰克福的悲喜剧更有效地摧毀了剛剛开張的汉澤曼內閣。巴黎无产阶级在可怕的六月战斗中受到殘酷镇压这一事实，最初似乎滿足了欧洲资产阶级的一切秘密心願。鲍姆施

塔克厚顏无耻地在普魯士国民議會中祝賀，“这个問題在法国得到这样出色的解决，是全欧洲最幸运的事件之一”。可是事实上资产阶级杀害了巴黎无产阶级，也就破坏了自己的政治統治。法兰克福的九月、維也納的十月和柏林的十一月只不过是巴黎的六月的回声。

在这种贊助下，“行动內閣”的行动不外乎是給旧普魯士的官僚、警察和軍人国家开路。汉澤曼沒有征求議会的意見就扩大了首都警察机构，增加了一千六百名特別警察，这些警察进行大量的非法逮捕，不断地向街头的和平群众挑衅，采取种种粗暴行动，甚至稳重高雅的洛貝尔图斯也受过他們的害，在这些方面他們比三月革命前的警察有过之无不及。当舒尔采—德里奇申訴，这些“新的人民春天的蝴蝶”比“旧的冬天的鳥儿——警察”坏得多的时候，內政大臣屈韦特尔好像不知道有个3月18日似的回答說：“一个真正想要自由的国家，必須有相当数量的警察人員作为执行权力。”洛貝尔图斯提議，政府應該补拟一个关于警察职权的法令，右派和中間派右翼也支持他这个提案，但是沒有有什么結果。議會滿足于一种不起作用的抗議。它根据瓦尔德克的提案，批准了保护个人自由的法案，这个法案确实得到国王的同意。从字面上看，这个法令是很漂亮的，但它只是一紙具文。在非法逮捕的同时，根据一般的国家法令对报刊案件进行了无数审讯。当被一系列事件激怒了群众做出向首相的窗戶扔石头这一稍稍过激的行动时，內閣就頒布了一个旨在取消集会自由的防止騷动法令。

汉澤曼一上台就頒布的一些“有机的法令”完全是在法国资产阶级在路易·菲力浦統治下的十八年活动的基础上頒布的，不过这些法令在国王和容克阶级面前，甚至沒有得到一个巴黎油盐店老板的资产阶级的自尊。汉澤曼关于市鎮法規和市民自卫团組織

的議案是想保证资产阶级享受三月革命的一切成果，而使无产阶级完全不能享受。这种制造法律的典型例子是市民自卫团法案，在汉澤曼內閣倒台以后，这个法案确实被通过了。在这以后，市民自卫团虽然应该保卫“宪法规定的自由和法令秩序”，但是它的組織細則使它成为半是无用的軍事玩具，半是武装的警察部队。从二十四岁到五十岁的男子有服这种兵役的义务；在市民自卫团服务的人应该自己装备自己；如果他们无力购置装备，市鎮应该把自己的武器给他们，但是市鎮有权只召集二十分之一的居民，这样就可以把三分之二乃至四分之三的有服役义务的人，首先是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排除出去，而且实际上也排除出去了。此外还有许多官僚主义的卑鄙的規章，其中之一是，国王可以“根据在解散令中詳細列举的重要理由”解散各市鎮或各县的市民自卫团，这一条就使整个法案成为廢物，并把在三月革命中爭得的人民武装交给国王任意支配。尽管如此，最后只有左派和中間派左翼的一部分人反对这种自杀行动。

国王和容克地主听任“行动內閣”这样行动。可是当正直的汉澤曼在背信棄义地剥夺了无产阶级的权利并对它进行鎮压以后，也想把资产阶级的一套加在封建社会身上的时候，他们就拚命反抗了。这个冷酷的实业家妄想国王心甘情愿地为了他而牺牲貴族，就像他为了国王牺牲人民那样，这只是一种美妙的幻想。

国王很欢迎资产阶级为他从曾經燙伤过他的尊手的火中取栗，而他只想吃栗子。朝臣們用一套关于三月革命的起因和过程的不可信的謊言，蒙蔽輕信的国王。国王在給本生的密信中異想天开地把自由主义称做“脊椎結核”，是一种“被上帝詛咒的罪恶的狂妄”，他罵那些自由派的大臣是“鬪羊”和“阴謀家”。汉澤曼对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提出要求时十分客气，而在鎮压群众时却毫无

心肝。在取消例外的审判籍方面，他得到議會中的法学形式主义者的支持，让这种审判籍在軍隊和高等学校中繼續存在。他不敢触犯封建徭役和庄园劳役，几十年来，容克地主对农民进行了无耻的掠夺，現在仍然保留原状。农业大臣吉尔克提出的廢除各种封建賦稅和义务的法令草案只不过是想像地取消封建賦稅和义务中对容克最沒有价值的、最小的部分。这个草案是想尽可能地少刺痛容克，多欺騙农民。

只是汉澤曼认为毫无溫情可言的部門即財政部門，使他感到有点不愉快。財政状况相当困难。国家的收入减少了，賦稅增加了，公債耗尽了。汉澤曼是在发行强制公債的情况下开始他的統治的。为了从經濟上巩固资产阶级的統治，为了尽可能地降低它的生产成本，汉澤曼打算在一定程度上改革旧普魯士的財政制度。他这个真正的资产者憎恨一切国营企业，他想把国有地分成小块土地，把国家銀行变为私人銀行，解散海外貿易公司，把国营工厂卖给私人资本家，“虽然蒙受重大損失也在所不惜”。他开始用极低的价格把海外貿易公司在西里西亚山区投資的大紡織厂卖出去。他反对由于必需的生活資料的价格上漲而提高工資的間接稅。應該让大地主出点儿血。汉澤曼提出的法令草案，其目的是要提高燒酒稅和甜菜糖稅，特别是取消土地稅和等級稅免納权。

他自吹自擂說，这样一来就打中了“反动派的要害”，当然封建財主同国王和祖国的上帝一起发出可怕的声音。但是汉澤曼决不能从另一方面得到他在这一方面失去的东西。他的政策的反动一面使得群众对他的政策的可以說是革命的一面发生怀疑。一个內閣用它的警棍尽力粉碎人民的正当要求，人民还應該充实这个內閣的金庫嗎？一个政权迫不及待地取消三月革命的成果，人民还應該加强这个政权嗎？这种想法使得議會中的左派甚至对汉澤

曼所计划的最有效的措施——取消土地税免纳权也不感到高兴。同时提高烧酒税就提高了广大群众的一种不可缺少的享受品的价格，并且使莱茵省开烧酒厂的资本家在同易北河东的大地主的竞争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行动内阁”用一切狡猾手段锯断了它唯一可以依靠的支柱，于是封建专制的反动派就急忙一脚把它踢开。

由于资产阶级政策不得人心，封建专制的反动派从春天所受的打击中逐渐复原了。一开始，它就组织了忠诚的各省对叛逆的首都的斗争，这个斗争是大吵大嚷地进行的，不过除此而外并没有多大意义。重要得多的一着是：它也赶紧作出决定，用它的方式站到革命的这一边来。它制造了一个议会和一份报纸。7月里，一个“保护所有权”协会（人民以正确的本能称它为“容克议会”）同柏林议会同时举行会议。从7月初起，《十字报》也出版了，封建党派的残兵败将都集中到这面旗帜的周围。这个报纸的创办人是海尔曼·瓦盖纳，他主持这家报纸虽然是够恶毒和够可恨的，但是他既不傻也不怯懦。

《十字报》并不在充当“王朝的挡箭牌”方面虚度宝贵的时间。它在一份试刊中就“最坚决地”否定“任何人的、任何王侯的专制主义”。它完全了解，不能再用三月革命前的方式进行统治了。它声称，它是属于立宪派的，至少也是一种集权的官僚政治的爱好者。只要形势使然，瓦盖纳就想把大地主组织成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容克们为了阻止乘胜前进的资产阶级推翻王室，必须学习在立宪制的战场上建筑工事。瓦盖纳对内阁发动了最猛烈的进攻。他指责汉泽曼的“没收计划”，这个计划大量挥霍国家资财和私人资财，但不是把这些钱扔到穷人怀里，而是扔到富人怀里，这个计划将要剥夺大地主的地产，使他们背离国王；瓦盖纳用威胁的

口气說，国王由于承认这种掠夺，将比一个外国侵略者更凶地虐待大地主。“汉澤曼揮舞着紅旗，大踏步地走在革命的前头。”这些夸張的言詞令人发笑，但是瓦盖納不用这种說法就不能使头脑頑固的容克認識到一个需要一种新策略的新时代已經开始了。

这种教育过程延續了一个較长的時間。瓦盖納从沒有完全达到自己的目的。在这期間資產階級的政策容許采取一种簡略的办法。容克地主作为一个統治了几百年的階級，清楚地知道在階級斗争中有組織的力量起决定作用，而軍隊就是他們反对革命的大王牌。只有軍隊才能打敗民主主义者，这句簡短的話就是他們的整个綱領。

国家的可怕的崩潰也暴露了普魯士軍隊的严重弱点。在三月革命的那几天里，許多將軍由于怯懦和慌亂而大失体面。而許多年輕軍官則傾向革命；在襲击軍械庫事件中，泰霍夫少尉为了站到人民一边而牺牲了自己的光輝前程。总的說来，团体精神在軍隊里比在官僚集团中更快地战胜了这一切反对派的活动。康普豪森和汉澤曼通过鎮压波兰的起义和用武力对付丹麦，热心地恢复三月革命前的軍国主义。这两位英明的政治家仅仅为了磨快刺向自己胸膛的宝剑而宁可出卖民族利益，也不把波兰革命导向反对死敌俄国的方向，也沒有进行一次正式的战争解放什列斯維希—霍尔斯坦。

当法国軍隊在一次殘酷的巷战中战胜了巴黎无产階級的时候，容克的劍就不願再待在劍鞘里了。軍官們的那种狂妄的嘲弄态度日益明显。正如瓦尔德克所說：“在三月革命那天一度中斷的旧軍事制度，現在仍然完整无缺地保存着。”汉澤曼由于担心資產階級利益受到損害，也完全同意这种說法，可是当織工起义时期慣于让人民流血的施魏德涅茨的駐軍，对市民自卫团挑起一場

可怕的血战的时候，議會中始終追随汉澤曼的多数派却吓了一大跳。

施魏德涅茨的指揮官由于某种情緒禁止市民自卫团敲鼓，并用一种难听的音乐来酬答这种英勇行为。市民自卫团为了驅散不請自至的乐师就向前推进，可是在指揮官住宅前面受到一連步兵的迎接，这一連士兵不問情由給了他們一个齐放，射出一百零二顆子彈。十四名市民自卫团员被打死，三十二人受了重伤。这一流血事件使得柏林議會睜开了眼睛，看清了实际情况。議會根据左派議員施泰因 8 月 9 日的提案要求陆军大臣向軍隊发布一道命令，警告軍官不要从事反动活动，不要同老百姓发生任何冲突，劝他們靠攏市民，为实现立宪制度正直而热情地工作，最后是让那些政治信仰与此不合的軍官退出軍隊，这是他們的光荣义务。这仍然是一个很溫和的措施，光荣义务的提案恰恰以一票的多数通过了。目前汉澤曼內閣认为，它不再重視決議就尽到它的职责了。

普魯士軍国主义用另一种方式，但也同样有力地使德国国民議會从它的自主权的迷梦中惊醒。自从选举了帝国摄政以来，德国国民議會就用关于有名无实的基本权利的永无休止的閑談来消磨时间。它又一次受到高貴的加格恩愚弄，加格恩在私下也毫不隱諱地說，必須尽一切力量贏得时间，直到普魯士国王摆脱受到普遍輕視的状态，那时就可以宣布由他当德国皇帝。占少数的小資产阶级民主派的一个議員說，共和主义者黑克尔也应该像反动的普魯士亲王那样得到赦免，这种說法妨碍了普魯士国王道义上的养息过程，加格恩的多数派由于这个精采节目而活跃起来。“有自主权的”人民代表因为这种毫无恶意的而且也不是过分討好黑克尔的言論，差一点儿大打出手。但是普魯士国王决不願意报答（哪怕是最輕微地）这样热情的崇敬。他不考虑帝国的权力，8 月 26

日在馬尔摩同丹麦政府締結了为期七个月的停火协定，停火条件使德国蒙受极大的耻辱，使普魯士在什列斯維希—霍尔斯坦进行的可耻战争得到体面的桂冠。

这个战争是普魯士国王为了宣告他的德意志使命，为了执行德意志邦联的決議而发动的。而德国国民議會就是邦联議会的继承人。早在6月9日，德国国民議會就庄严地作出决定說，它决不批准任何牺牲两个公国的权利和德意志荣誉的和約。現在普魯士国王在馬尔摩的停火协定中牺牲了两者：两个公国的权利和德意志的荣誉。在做了种种空洞的決議，发表了許多空洞的言論以后，現在德国国民議會必須第一次实际考驗自己是不是一个能起一点作用的力量了。它在9月5日表示反对馬尔摩协定，并以十七票的多数决定，实现停火的措施应该停止。

于是所谓的帝国内閣馬上辞职。在帝国摄政（勃魯姆常叫他帝国敗坏者）約翰的那个假想的內閣中，奥地利的施梅林和普魯士的波伊克尔虽有种种齟齬，但却一致努力使德国議會成为受到普遍嘲笑的对象。后来帝国摄政仿照立宪的慣例委托9月5日的多数派的領袖組織一个新內閣。这位領袖是达尔曼，他是三月革命前的空談理論的教授自由主义的典型人物。从他本人不能采取有魄力的行动这一点，忠实地反映了德国議会的軟弱无能。他没有完成組閣任务，几天以后就把組閣权退还給微露笑容的帝国摄政。9月16日，国民議會撕毀了自己从前的決議，以二十一票的多数批准了停战协定。

这样一来，它就从道义上和政治上自己毁灭了自己。它可耻地蕩尽了落到它怀里的三月革命的成果，現在只有一条活路：一个新的革命。从法兰克福周围一二百公里的地方有几千名有准备的战士涌到法兰克福，要求左派集团以法国国民公会的面貌出現，并担

任一个新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但是左派集团除去像勇敢的施路费尔这样的少数几个人以外，全都不起作用。它决定服从议会的多数。当时左派集团最有影响的成员罗伯特·勃鲁姆应该对此负责，两个月后他惨遭杀害正是这个过错造成的。失望的武装群众离开了法兰克福。得不到人民选出的议员的任何支持，起义必然失败，而这种起义只会加强封建君主的反革命。司徒卢威在巴登举行的一次新暴动立即崩溃了。

在法兰克福当地发生了一起小规模暴动。重新上台的大臣波伊克尔和施梅林虽然没有发动这次暴动，但却有意地让这次暴动得以发生，以便从邦联的要塞美因兹调来优势的兵力，把议会置于军队的控制之下。用这种办法对付这种议会实在是多余的。议会的两个议员——老将军奥尔斯瓦特和容克阶级的吹牛家利希诺夫斯基忘记人民代表的尊严竟到这种程度，他们在9月18日骑马出去侦察人民战士，在执行这个侦察勤务中被打死。国民议会本身更忘记了自己的尊严，9月19日它在生存得到充分保障的情况下，感谢军队“在镇压叛乱时表现的献身精神”，并且根据左派的一个提案，还给“献身”这个词补充了“克制”一词。左派中差不多只有八至十个议员反对这种自我衰败的行为。从此以后德国议会不可更改地成了一个清谈的场所。

在9月的这几天里，普鲁士议会的命运也决定了。它知道国王为什么缔结马尔摩停战协定。自从欧洲反革命的大国，德国统一的不共戴天的敌人英国和俄国，站在丹麦一边从外交上进行干涉以后，为了反革命目的进行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战争就有可能带有革命性质。按照国王和容克地主的愿望，普鲁士军队不应“为革命服务”。按照他们的秘密意图，普军应被用来反对革命的代表普鲁士议会。弗兰格尔率领近卫军从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

坦边疆回到勃兰登堡馬尔克，反革命就糾集它的力量进行一次决定性战斗。这样一来，外国得到滿足，德国議会在道义上破产，普魯士議会受到军队的包圍。可以理解，对柏林的人民代表說来，衬衣比外衣更貼身。他們接受了馬尔摩的停战协定，虽不是兴高采烈，但也不为德意志荣誉的丧失而悲叹，相反地，他們又回到8月9日的決議上去。施泰因提出一个決議案，认为內閣最迫切的任务就是立即根据議会8月9日的決議給军队发布命令。

这个命令本身仅仅是一个背景。在各个民政部門也发布了类似的禁止官吏进行反动阴谋的命令，所起的作用就同在实际力量面前紙上談兵所起的作用相似。可以設想，反动官吏中的死硬派以什么态度对待自由派大臣的警告，可是大臣們也沒有敢把他們之中的任何人撤职。国王可以对军队发布一項使議会滿意的命令，而絲毫也不損害他的利益，几个星期以后他也确实这样做了。但是有的事情国王允許軍事內閣做，却不允許平民內閣做。汉澤曼不能执行議会8月9日的決議，狐狸掉到自己的陷阱里了。

議会只得更有力地坚持执行自己的決議。既然对議会來說，军队是不可触犯的，既然內閣把議会的決議当作一張廢紙，那么議会就已經不起作用了。实际上，正如6月間討論左派关于承认革命的提案时一样，这又牵涉到协商原則。柏林居民也同当时一样感到十分憤慨。甚至死气沉沉的市民自卫团也通过它的指揮官和司令部向議会递交了一分致意书，答应尽其所能支持議会的決議。

9月7日，議会討論施泰因的提案。汉澤曼肆无忌惮地威胁說，假如議会坚持它的決議，就可能发生反革命事件、內战和流血事件。右派的发言人利用种种法律上的詭辯和条款把決議說成是破坏立宪制的行动。相反地，左派发言人中肯地指出，問題不在于決議的內容，而在于內閣是否应当执行这个決議。布赫尔在有决

定意义的发言中说，这关系到一个权力问题，而不是关系到一个法律问题。在暴风雨即将来临的时候，还在推敲查考纸上的法令，实在是太天真了；新时代所需要的基础决不是法令汇编中的一页；议会应该以政治家的风度，而不是以偏狭的法律观点来完成自己的使命，这个也许是史无前例的使命就是用立法的和平办法把还没有完成的革命进行到底。革命所反对的各种权力、原则和制度已经受到谴责，但还没有被消灭，专制政权的一切官署还照常工作，专制法令几乎全部存在。议会不能容许专制主义把军队变成毁灭人民自由的工具；它必须使军官的容克阶级的骄横受到挫折，必须劝告士兵，叫他们为自己和自己的受难同胞争取人权。

问题决定于中间派右翼的态度。这次它转向左派和中间派左翼。翁鲁不像汉泽曼那样一心想做国王和容克的玩物。他同布赫尔的政治观点相距很远，作为一个严肃的政治家，他说，如果议会由于破坏自己的决议而造成“道义上的破产”，那么剩下的只有反革命同第二次革命之间的“危险的两难局面”。促使他作出这个决断的可能还有这样一个原因：如果他决定赞成施泰因的提案，那么他就最有可能接受他所支持的内阁的遗产。翁鲁抱着一个甜蜜的幻想，以为他能够把资产阶级的事业办得比汉泽曼还好。

施泰因的提案以二百十九票对一百四十三票通过。于是议会的重心移向左边。但是在5月本来可以使议会获得胜利的东西，在9月却只能给它带来垂死挣扎。

## 五 牺牲农民

国王用任命普富尔将军为首相兼陆军大臣来回答施泰因提案；首相之下有两三个（不是全部）大臣是由三月革命前的官僚和

外交官中的无关紧要的人物担任的。同时，弗兰格尔将军担任了集結在勃兰登堡省的部队的司令官。这是政变的准备，还不是政变本身。反革命沒有明确的作战計劃；由于种种原因，它对于干脆用武力解散議會还有顾虑。特别是国王害怕3月18日和19日的事件重演。

起初，反动派的主要策略是用“七条牛”的力量向着宪法叫喊。同現在一切反动分子在那張像第二天命一样插到我們的上帝和这个国家之間来的字紙上所消耗的神圣热情相比，三月革命前自由主义的感伤的宪法痛苦只不过是一种儿戏。議會受到許多猛烈責难，說議會輕率地忽略了协商制定宪法的任务，在无益的問題上浪費了時間。

这种可恶的欺騙冒充應該受到尊重的人民的声音，成了革命年代的爱国史話，反动派利用它要想达到两个目的。一个目的是：威吓議會使它不再摧毀三月革命前的国家制度，并使議會集中力量做书面文章，将来反动派根据情况可以用手边的一把刺刀戳破这張字紙。第二个目的是：在新宪法里訂上容克地主和他們的娄罗感到兴趣的一条，同資产階級宪法相适应，这个条文宣布所有权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它容許限制所有权，但必須賠償全部損失。这一条作为一个新的基本法公布得越早，容克地主們就越高兴；利用这一条文，他們要想彻底保卫他們的一切封建所有权，不管这种所有权是如何腐朽。

議會看穿了这种反动陰謀，它的領袖，如布赫尔和瓦尔德克揭露了这一陰謀。議会的委員會制定了一个从資产階級角度說来可以差强人意的宪法；其不足之处都是由于政府办事不力所造成的，特别是政府不知是出于恶意，还是由于可悲的无能沒有做出行政区和县的組織章程草案。議會确实浪費了許多人力和時間，因而

受到責难，这笔賬也記在政府的名下。一开始就受到內閣百般阻撓的新議會必然常常跌交。尽管困难重重，但是柏林議會已經证明，在革命的巨大影响下，利用普选权选出的人民代議机关在实际見識方面远远超过最有經驗的官僚。它所做的事情比普魯士官僚在其全盛时期所做的还要多得多，格奈斯特（他决不是柏林議会的頌揚者）甚至提出证据說，柏林議會五个月所做的事情比十八世紀英国議會一年所做的事情还要多。不管从革命的立場出发对議会有多少責难，可是在五十年来已經披上“客观的历史著述”这一美丽外衣的反动誹謗面前，議會还是不可取消地站立在那里。

議會所缺少的正是革命的行动力量。对議會說来，普富尔內閣一方面是一个明显的危險，但另一方面又給它一个苟延殘喘的机会。普富尔本人是格奈澤瑙和沙恩霍斯特培养出来的一个有教养的軍官，青年时期是亨利希·克来斯特的朋友，垂暮之年是拉薩尔的友人。如果反革命以为可以用他做它的秘密計劃的馴服工具，那么它的算盘就打錯了。但是反革命也可能只把他看做这样一个人，由于好心的疏忽，他可以使事态一直拖延到发生政变为止。普富尔內閣只是一种过渡状态，議會决不應該对此有所怀疑。如果它想在一定程度上重获已經失去的东西，那么它就應該在施泰因提案給它开辟的道路上繼續前进。

随着汉澤曼內閣的垮台，这个提案本身已經失去了它的意义。翁魯給新內閣秘密提出一个向軍队发布的命令，这个命令同施泰因的提案大致符合，普富尔馬上就发布了。誰都了解这种鎮靜剂的实际作用；封建专制反动派在軍队中占有的堡垒用善意的劝告是决不能夺得的。馬尔克的总司令弗兰格尔將軍和西里西亚的指揮官勃兰登堡伯爵发布的日日命令打破了对于这一事实的任何怀疑。如果說，柏林議會已經失去了掌握軍队的有利时机，那么从它

自己的資產階級立場來看，現在還有一個成功的大好機會；這就是把農民階級的利益同議會的命運結合起來。這樣一來，王權和容克階級就會在政治、社會，最後也在軍事方面陷於癱瘓狀態。

整個夏季，農村群眾的憤激情緒不是下降了而是上升了。這種憤激情緒像一隻貪食的禿鷲在撕裂國王和容克的心臟。他們用軟硬兩種辦法企圖使農民相信至今壓迫他們的這些人的善良意圖。但是農民仍然堅強不屈，並且繼續用他們的鐵拳粉碎封建的捐稅、勤務和負擔。3月27日，阿爾寧內閣曾發布了一項命令，宣布一切利用威脅和暴力迫使地主所做的讓步一概無效，對於這個命令，農民干脆報之以嘲笑。

國王和容克想用一種惡作劇來達到這一目的。沙弗果奇伯爵也同無數西里西亞容克地主一樣被他的隸農逼迫放棄了產權變動稅，各種勤務，放棄了手續費、鹽捐、礼金和紡織捐，放棄了實物地租。瓦爾姆布隆鎮的居民不知被用什麼辦法說服，在5月5日沙弗果奇伯爵過生日那一天，把“棄權文書”退還給他，並請他永遠忘記這件事。國王在5月25日的一道莊嚴的內閣命令中公布了這一“崇高的行為”。這是“忠誠、尊重法紀和真正返回到必需的良好秩序軌道上去的光輝范例”，國王對此表示了“最大的愉快”，並要求西里西亞農民以“類似的令人興奮的方式”再像牲口似的被捆在容克地主的屠宰凳上。可是農民又一次對國王報之以嘲笑。

一切都無濟於事。舊的封建經濟已經過時了。一部分資產階級化的鄉村貴族自覺地看清這一點，頑固的容克地主也不得不看清這一點。要想繼續欺騙農民，那就不能再用封建方式，而必須用資產階級方式。換句話說，封建義務必須用金錢或土地贖免的辦法永久保持下去。但是這一點目前不能像滑鐵盧戰役後幾十年那樣

用毫不顾忌的粗暴方式实现了。没有减免的封建负担激起多数农民的反抗，同样，贖免法规和调整法规也激起少数农民的反抗。比过去更加隐蔽地压榨农民的法令不是顷刻之间就能制定出来的，可是农村群众的慢性的反抗却加快了它的步伐。康普豪森内阁利用一份关于调整地主和农民关系的建议书来摆脱这种两难局面。这个建议书是由商业大臣帕托夫签署的，帕托夫是同施韦林和奥尔斯瓦特同一类型的资产阶级化的贵族。

帕托夫的建议书以下述原则为依据。一切已由判决或契约调整过的封建义务的贖免仍然有效。今后在原则上仍然是：用补偿的办法取消封建义务和“一切阻碍自由处理人事和财产的限制”，不过将来可以根据比至今更为合理的原则贖免上述封建义务。有些封建义务应该无偿地废除，这些封建义务可以看做是世袭依附关系、从前的税制和领主裁判权的产物，或者它们本身只是部分已经过时的地主的累赘，对权利者没有真正的持久的价值，因而并不影响经济关系。建议书说这通常就是：领主权、租地继承税（多付最好的家畜）、治疗税、狩猎勤务和远征勤务、屠宰什一税、保护金、窝尔普尔吉士税、放牧税、养蜂税、蜡租、水渠捐、牧场使用权等等。

上面列举的这些名目好像不少，可是没有什么意义或者意义不大。在“世界上管理得最好的国家”中，保存着这样多的封建垃圾，以致运走其中的一小部分，也不能影响大局。规定无偿废除的捐税和义务都是已经完全失效的，或者只在个别地区存在的，或者正如建议书本身坦白承认的，只给容克带来微不足道的利益。这纯粹是一种障眼法，正因为如此，汉泽曼内阁只把帕托夫建议书的这一部分用法律形式规定下来。

柏林议会没有理解它在这一方面的历史任务，这是它的一切

錯誤中最严重的錯誤，是它历史上的最大污点。它用来医治工业无产阶级的病痛的除去廉价的花言巧语和临时的缓和剂而外别无他物，因此它是一个资产阶级议会。但是作为这样一个议会，它应该懂得把农民从封建压迫下解放出来。由于有五、六十名农民议员，它就有了一个可以组成一支不可战胜的军队的参谋部。诚然，这些农民代表中的一部分人已经知道他们应该站到哪一边，而成了极左派，可是其余的一部分还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而被狡猾的汉泽曼用作投票机器，在财政部里大吃大喝，按照一个英国记者的说法，他们在那里像一群奥捷普威—印地安人出现在德文郡<sup>①</sup>公爵的沙龙里。资产阶级反对派本来应该更多地使这些可怜人物了解自己的利益所在，但是，中间派左翼的一个议员甚至使右派得到了廉价的胜利，他提议把所谓不懂德语的议员，打谷者<sup>②</sup>基奥尔巴萨开除出议会，由于这个无理的提案，属于右派的议长阻止他继续发言。《十字报》尽到了它的本分，它胡说什么基奥尔巴萨在会议厅里常常把靴子脱下来，因为他习惯于赤脚走路，又说出纳员用闪亮的银洋付给他薪俸，他高兴得吻出纳员的衣角。有些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也兴致勃勃地来开这种无聊的玩笑，比如古斯塔夫·弗赖塔克就同《十字报》竞赛，在《边境使者》报上讥笑他的西里西亚同乡姆罗斯和基奥尔巴萨是“可笑的怪物”，对于这样一些自由主义者，人们又该说什么呢？

诚然，左派和中间派左翼对封建义务、婢仆制度、在别人土地上的狩猎权以及其他等等进行了一些攻击，可是这并没有起很大

① 英格兰西南部的一个郡。——译者

② 在德国某些地方，特别是在西里西亚，人们把处于依附地位的农民称为打谷者，他们必须为地主劳动（主要是打谷），而得到的是微不足道的一点钱或实物。——译者

作用，其中只有布赫尔提出的剥夺封建县等级会议决定课税的权利的议案被通过成为法令。9月1日议会还认为废除徭役的提案并不是刻不容缓的。甚至中间派左翼在6月里提出的一个议案——停止关于地主和农民的纠纷的没有结束的谈判，直到更为合理的赎免法案和调整法案颁布为止——到9月底还没有得到议会的批准。3月18日以后六个月，议会还没有采取这个简单的临时措施，而1789年的法国国民大会在攻占巴士底狱后三个星期就清除了全部封建垃圾。

尽管如此，当议会随着普富尔内阁的成立面临着生死攸关的严重危机的时候，还是有很多生路的。农民的情绪仍然很高，他们写了几千封致意书，要求人民代议机关的保护；9月1日进行的狩猎引起农民和容克之间的血战，农民有理由认为封建的狩猎权已被三月革命废除了，可是容克地主却不愿放弃在农民地里打猎的高尚嗜好。事实上议会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并且取得了可以鼓励自己的成果。议会主动决定，无偿地废除作为物权的在他人土地上的狩猎权；甚至它所采取的行动，从资产阶级立场看来是太激进了。尽管如此，国王却不敢不批准这个法令。现在议会只要把无偿地废除各种捐税和义务的法令由一个虚幻的东西变成一个真实的东西就行了，这样就可以取消农民阶级的沉重负担，哪怕只取消最沉重的负担。议会还有一块阵地，可以同国王和容克阶级进行政治斗争。

可惜议会又是只跨出第一步，即颁布了狩猎法，它的精力就枯竭了。此外，他终于通过了拖延很久的、关于停止地主和农民谈判的法令，可是却否决了一切对争论中的农民一方有利的修正案。国王也批准了这个法令。但是在讨论废除封建义务法案时，发生了无可救药的混乱。9月7日使左派集团获得了胜利的中間派右

翼又轉向右派一边。翁魯是所有权的狂热的拥护者，在他看来，帕托夫建議书的原則已經太冒进了。他的同党皮列特以法案报告人的身分宣称，无偿地廢除封建义务——除去少数无关紧要的例外——是不公正的也是不明智的；不公正是因为，封建义务通过几百年来受法律保护占有变成了既得财产的对象，不明智是因为，这样就使人数众多的、由于占有大量物质資料而有巨大势力的合法的地主阶级同国家的新制度疏远。右派集团并不想打击那些等着給議會以新的力量的农民，但是它更不想得罪那些待机給議會以致命一击的容克地主。它对农民使眼色說：宁願要手里拿到的麻雀，不要屋頂上抓不到的鸽子，既然我們廢除了你們的負担的百分之三十或者只有百分之二十，你們就應該十分滿足了。它又对容克使眼色說：既然你們可以把受到威胁的财产由封建性的变成资产阶级性的，那么一点点定錢，你們是可以付的。

布赫尔在他光輝的演說中多次反对这些恶丐和奸商。和皮列特不同，他从另一个方面看到了公正和明智。要么地主要求贖金是正当的，那就應該給地主贖金，要么无偿地廢除封建义务的立法是正确的，那么立法就沒有权利牺牲农民的利益給容克地主送礼。据以決定問題的法律基础不是历史学派的已經腐朽的法律基础，而是革命的法律基础。“革命是最神圣的权利受到損害的人民的必要自卫。这种自卫是一种权利，不仅习惯法承认它，而且一切时代和各族人民的法律都承认它。如果一国人民进行革命，进行这种意义上的、即为了自卫的真正革命，他們的代表站到这个立場上，在这个意义上制定法律，使革命的思想具体化，那么他們就是站在法律基础上。”离开这个基础，是不明智和不公正的。9月7日，布赫尔还提醒人們警惕法学形式主义的钻牛角尖的举动。“法学家應該熟悉社会科学，以免社会問題吞沒他們……如果我們以

法律上的精確性一点一点地討論這個草案并提出許許多多的修正案，那麼我們的情況就很容易同專心研究圓周的阿基米德相似。”同時布赫爾也充分認識到，他所指的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他所擁護的就是這個革命的法律基礎。根據這個精神，他要求議會應該像法國大革命的議會那樣行動，即根據下述原則：領主的權利，只要它們帶有封建領主性質，是以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統治為基礎的，就應該立即無償地廢除。可是，只要這些權利是以在資產階級社會中繼續有效的契約權利名義，以服務和報酬的原則為基礎的，那麼就應該贖免這些權利。

當時國民議會中的票數比例是，右派集團和左派集團勢均力敵。10月末，格拉博夫辭去議長職務以後，翁魯被右派集團以一百七十七票選為議長，而這時左派集團共得一百七十票。這個票數比例就使得徹底貫徹布赫爾和他的朋友提出的原則十分困難。可是，這是一個明確的原則，可以成為封建迷宮中的阿里德里涅引路綫<sup>①</sup>，因此還有實現的最後希望。但是這個最後希望卻被左派毀滅了。這個集團由於自己過去懈怠而感到羞愧，於是想儘可能把領主的所有權利一筆勾銷，也不考慮這些權利是以封建的還是以資產階級的權利名義為依據的。這樣一來，決不打算離開資產階級法律基礎的左派不僅不能堅決行動，反而鑽進右派陰險地布置好的圈套里。這個勇敢的黨派只要有力量，就反對無償地廢除封建義務，儘其所能地使法令成為對農民毫無價值的東西，當它不能實現它的崇高目的的時候，它就幫助左派的盲目冒進取得勝利，使有產階級對議會作出不好的評價，說議會是共產主義的，對資產階級的所有權也像對封建的所有權那樣不重視。

<sup>①</sup> 阿里德里涅（克瑞特國王弥諾斯的女兒）救其情人西修斯出迷宮所用之引路綫，見希臘神話。——譯者

这种不老实的两面手法在狩猎权问题上取得了第一个成就。议会一决定无偿地废除封建狩猎权，右派就同左派共同反对舒尔采—德里奇提出的中间派左翼的修正案。这个修正案主张，如果土地所有者或者他的先人在最近三十年中已经由于取得报酬而放弃了当时归他所有的狩猎权，那么为了取消在别人土地上的狩猎权就应该付贖金。

但是右派的阴险策略同左派的可怕的短视在讨论废除封建义务的法案时才发挥得淋漓尽致。比如表现在关于产权变动税的争论上。所谓产权变动税、集市税、坚信礼费、计算金、排斥金、规章金、监工费、搬运费、领主购物费、统治法金以及类似的捐税都属于农民最沉重的负担之列。这些捐税每当统治的一方或服役的一方所有权发生变动时就从有关的土地上征收，并根据情况增加，最多可增加百分之十。这些捐税纯粹是掠夺，是没收财产的最好形式。农民死后，他的继承人要向容克地主缴纳其地产价值的百分之十，不管这个农民负债不负债。如果一个农民的地产值一万塔勒，但有六千塔勒的抵押负债和三千塔勒的私人负债，这个农民死后，地产归其妻所有时，国家根据实际遗产的价值一千塔勒收十塔勒的遗产税，但容克地主却收总值的百分之十，即全部遗产一千塔勒的产权变动税。他可以立即命令拍卖这块地产。比如以七千塔勒卖出，那么债权人的私人借款就得不到偿还，而落到继承人的身上，但是除去抵押借款而外，容克地主不仅得到了产权变动税，而且他还有权向新产主收七百塔勒新的产权变动税。

中间派左翼通过布赫尔和舒尔采—德里奇提出无偿地废除产权变动税的提案，除非“义务是明确地根据权利人和义务人或先前的占有者所订关于土地的转让契约确定的”。正如关于狩猎权的相应提案一样，这种限制在原则上是重要的，实际上却是没有意义

的；产权变动税大多来自纯粹的封建关系，是以时效的权利为依据的。议案以一百七十八票对一百六十票通过，这时两个反对这个提案的右派成员，司法顾问盖勒恩和高级地方法院顾问土伊斯豪斯提出一个修正案，即在保留的情况下，产权变动税税率不得超过百分之二。他们的意图十分明显，就是要议会干涉它自己刚刚承认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所有权。尽管如此，左派仍然上了这个拙劣的圈套。这个修正案未用记名投票的方式通过以后，以地方法院顾问赖辛施佩格和最高法院枢密顾问林泰伦为首的其他右派成员立即提出强烈抗议，反对根据他们的同党的提案作出的决议，因为这个决议毫无理由地侵犯契约的权利，从而使任何权利的存在都成为问题。

只要从这个可悲的喜剧中举出这一场，恐怕就足以说明问题了。为了上演这出悲喜剧，右派日益分裂成为各种各样的集团。这出戏没有演完，还算是右派的大幸。议会学会了一种少有的技艺，把这个支离破碎的法案拼凑起来。这个法案伤害了有产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化的贵族的最神圣的所有权威，但同时又使得农民日益对议会产生怀疑和不信任。有时竟有四十个杂乱无章的限制的或者扩大的修正案，就是最老练的法学家在这堆乱麻中恐怕也找不到头绪，农民们又怎能把它归纳成一个条文呢？对于一个只懂得把他们当牺牲品而不懂得解放他们的议会，农民们又怎能全力支持呢？

在普富尔内閣时期，议会在讨论废除封建义务的法案的同时也讨论了新宪法的头几个部分，可是这也不能改善议会的状况。它取消了国王的“禀承天命”称号，废除了贵族，废止了勋章和封号。可是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当它执行一只手解散军队，另一只手向敌人提出强烈挑战的政策时，它的失败就更加不可避免了。

## 六 国王和容克地主

反革命比較善于利用普富尔内閣这一过渡时期。它用上百門大炮，四五万人的軍隊日益牢固地把柏林握在自己手里。它想方设法地在首都群众中挑起暴动，这样就可以进行軍事干涉。

它最希望重演一次小規模的巴黎六月屠杀事件。10月中旬，反革命势力向这个方向迈出了最初的一步。那时由国家雇用在柯本涅克—費尔德开凿运河的一些失业的手工业工人，砸毀了一台在即将来临的冬季可能夺走他們最后一块面包的机器。这些穷人大多惯于做精細活（像金匠、銀匠等等），由于干这种笨重的土方工作，他們的双手就越来越不能适应本来的职业了，他們的絕望情緒是不难理解的。市民自卫团的尷尬的笨拙的干涉引起了一場冲突，有几个工人和市民自卫团员被打死。但是左派議員在軍隊調来以前就平息了这一冲突。于是反动派另想办法挑撥工人鬧事。在柯本涅克—費尔德领导运河工程的建筑工程师根据“上面的命令”撒謊說，不仅是破坏机器的人要被解雇，而且上百个根本没有参加的工人也要受这种处分。这一无耻的煽动也沒有发生作用。有一定觉悟并在一定程度上組織起来的工人群众清楚地知道，在这种时刻进行一場血战对誰有利。

反革命不得不满足于規模較小的救国活动了。10月里，騷动的群众包圍了議會在那里开会的话剧院。他們不听左派議員的話，却听像布雷斯勒伯爵这样的可疑的煽动分子的話，布雷斯勒一会儿靠攏左派，一会儿靠攏容克議會，后来容克議会在一次审讯中确定，布雷斯勒在10月的危急的日子里曾企图資助工人建筑街垒。反动派越来越愁眉苦臉地申訴，这些群众威胁着議会的辯論，这种

說法是毫無根據的。在襲擊軍械庫的日子里，當真正的無產階級企圖推動議會前進時，呆在家里不出來的那些右派議員現在以愉快的心情在會議廳里踱進踱出。他們自己不敢硬說，由於害怕騷動者，他們的投票受到妨害，而只是嘆息議會的“尊嚴受到損害”，其實恰恰是他們自己天天用他們高貴的陰謀破壞這個議會的尊嚴。但是，即使完全撇開反动派的煽動在話劇院前街頭騷動事件中所起的作用不談，不僅所有公正的評判人，而且像格奈斯特和翁魯這些已經用尖銳的眼光看到財產和人身受不到什麼威脅的人都會證明，這種騷動在自由的國家里是很難引起人們注意的。

接着維也納發生了決定性的戰鬥。柏林的革命從奧地利的首都接受指示，柏林的反革命也是這樣。拉德茨基在意大利獲勝以後，奧地利政府就糾集半野蠻的斯拉夫人攻擊革命的德意志和馬扎爾文明民族。10月31日文迪施格雷茨公爵襲擊了經過勇敢抵抗後失敗的維也納。同一天晚上，普魯士議會經過熱烈辯論以後通過了洛貝爾圖斯的一個溫和的提案，要求政府對帝國攝政採取迅速而有力的措施，以使在奧地利的德國各邦受到危害的民族自由和受到威脅的國會的存在得到切實而有效的保護，並締造和平。11月1日，維也納陷落的消息傳到柏林。普富爾立即被免職，勃蘭登堡伯爵受命組織新內閣。勃蘭登堡是容克、軍官和霍亨索倫王族的三位一體，是當今國王的伯父，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的重婚生子，這位國王常常用這種重婚表現自己尊敬上帝和遵守虔誠的習俗。

勃蘭登堡伯爵的上台意味着一次最露骨的政變，甚至右派也覺得太過分了。現在議會要么公開向國王宣戰，自己形成一個獨立的力量，可是大多數議員却認為雅科比熱烈擁護的這種策略太革命了，要么議會就設法通過議會的途徑削弱新內閣的力量，可是

大多数議員又认为这个办法太沒有成功的希望了。他們一致同意中間派左翼的提案，派一个代表团对国王說明“国家的形势”。这是一个不彻底的步驟，它向国王透露議會虽有反抗性但也有其軟弱性。这一点从将由代表团呈給国王的奏折的外部形式上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来。議會委托雅科比、布赫尔和賴辛施佩格起草奏折。布赫尔文体优美的草案以严肃的口吻向国王指出他的行为的“无限悲哀的、使人想到一个邻国的命运的后果”，而賴辛施佩格却在这个草案中加进种种关于“国王陛下的心”的美丽詞藻，說国王的心經常是为人民的福利而跳动的。

11月2日，代表团在桑苏西宮同侍从武官（后来当了陸軍元帅）曼托伊費尔經過較長時間商談以后，确实見到了国王。当翁魯朗讀奏章的时候，国王先敲敲他的佩劍然后轉过身去把背朝着代表，这种引人注目的姿态，在柏林街头的頑童中为了表示最大的不敬是常見的，而在国王同人民代表之間的政治交往中却还没有人看到过。張皇失措的代表起先是一言不发，当讀完奏章后国王要离开会客室时，雅科比发問說，国王想不想听代表們的意見，回答說：不！雅科比对走到旁边房間里去的国王大声說，国王們不願听真理，这是他們的不幸。

人們可能认为，雅科比会受到他的同伴的祝賀，因为国王的奇特的态度使代表們陷入窘境，而雅科比用并非他第一个說的但却完全适合这种情况的話，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使代表們脫离了这种窘境。可是国王一离开房間，大多数代表却严厉責备雅科比。侍从武官剛跨进房間，洛貝尔图斯（第二天在公开的會議上洛貝尔图斯还称贊侍从武官）就跑到侍从武官面前，“恳求他到国王陛下的房間里去对国王說，我們深信国王陛下的明見一定会把国民議会的奏折同一个代表最后所說的几句话区别开来”。这些人民代表，

甚至是他們之中較好的人物就是這樣。當國王為了用武力粉碎人民代議機關，而叫人磨劍、備馬、裝炮彈的時候，議會的領袖們却由於沒有盡到做臣子的禮節而在國王的侍從武官面前自我檢討。這種可憐的政策必然鼓起反革命的勇氣。

反革命很需要這種勇氣。勃蘭登堡和弗蘭格爾不過是兩個老丘八，他們用“槍膛里的子彈和磨得飛快的刀劍”這種豪言壯語只能博得謹小慎微的反動分子的很少信任。當時有人戲謔說，侍從武官曼托伊費爾手拿一把左輪槍強征大臣，把柏林街頭弄得惶惶不安。六天以後，勃蘭登堡還沒有湊足半個內閣；某個軍人被任命為陸軍大臣，三月革命前的兩個官僚拉登堡和曼托伊費爾<sup>①</sup>當了教育大臣和內政大臣。外交、商業、農業、司法和財政各部大臣還沒有適當人選。最簡單地恢復三月革命前的封建主義和專制制度是不可能的，最多只有最狹隘的容克地主還抱這種幻想。瓦蓋納干脆把這叫做反動的空想，雖然立憲政體在勃蘭登堡還是一個難解的謎，但是連他都不斷肯定地說，他是徹頭徹尾主張立憲的。

反革命企圖在對議會進行決定性打擊以前，至少同右派聯合起來。可是這裡也有一個困難，因為右派也屢次宣稱國王不能解散議會。協商原則已經毫無意義，因為兩種主權不能在一國并存，正如一個天上不能有两个太陽一樣。但是資產階級已經陷入這個泥潭里，一時不能自拔。根據這個原則，國王不能解散議會，議會也不能廢除國王。這種懸而不決的苦痛不安的時刻繼續了整整一個星期。在這個星期里，議會在又一次否決了左派成立安全委員會的提案以後，進行了無關痛癢的辯論。這個時期柏林城里十分平靜。自從反革命已經掌握政權，但是還不知道以後該怎麼辦的

<sup>①</sup> 侍從武官曼托伊費爾的堂兄。——譯者

时候，10月的騷动者好像钻到地下去了。

这时候勃兰登堡伯爵同右派的一些名人勾結起来。他們是怎么干的？在哪里干的？这些細节別人不得而知，不过他們的密謀的結果立即暴露出来了。国王不能解散議會，但他可以让議會搬家，为了搬家而让議會休会。以“威胁”議會为目的的首都的“并不罕見的无政府运动”和“罪恶的示威游行”給这个举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口。为議会的独立自主所作的周密考虑怎么会成为暗害議会的行动呢？这是个老方案，在襲击軍械庫的那几天，右派就曾經提出过。如果議會这样做，那么就开了一个先例，根据这个先例，在不得已时可以证明国王也有权解散議會；如果議會不这样做，那么它就違抗了国王的正式命令，这个命令的目的是要使議會免遭賤民的暴力威胁。右派很有理由怀疑勃兰登堡伯爵的才能，为了防患于未然它推荐它的成員，久經考驗的法律歪曲者林泰倫为司法大臣。不錯，11月2日林泰倫也一起到桑苏西宮去表示反对勃兰登堡內閣，可是对这位普魯士高等法院顧問說来，今天在他昨天所咒罵的暴行上打上合法的戳記，又有什么了不起呢？为了探探翁魯的口气，勃兰登堡揣着一个漂亮計劃去見翁魯。翁魯立即声明，議會的多數，中間派和左派以及担任議长的他本人都不同意迁移和休会。如果勃兰登堡能够看透資產階級的靈魂，他听了翁魯这种声明也会感到真正高兴的。

翁魯把封建专制的反动派看作一种非常討厭的东西，他决不会像右派那样輕易同它妥协。但是他更厌恶人民的第二次革命，正如翁魯本人公开宣称，用各种办法阻止这个革命，就是他反对国王命令的真正原因。如果議會迁移和休会，那么它在人民中早已动搖的威望就会完全破产。这样一来，正如翁魯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說，“政治团体就会掌握运动”，于是“街垒战就是不可避免的”。

相反地，如果議會反對國王的命令，那麼它在群眾中的威望就會增高，它就可以安穩穩穩地把車子推到任何力量也不能再使它走上正軌的地方。翁魯有理由相信自己能夠很好地完成這個任務。

但是，勃蘭登堡對這種情況了解也罷，不了解也罷，反正他現在手里掌握了自己可以任意行使的政權。11月9日他在議會宣布了國王的通知。根據這個通知，議會應該遷到哈費耳河畔的勃蘭登堡去，並休會到11月27日為止。翁魯聲明，不得議會的同意他不能中止會議，這個問題應該由議會決定。勃蘭登堡“鄭重其事地”對“非法地”繼續舉行會議表示抗議，接着就離開了會場。他在陸軍部構築工事，弗蘭格爾把大批軍隊調到柏林。不到三天，這兩個老丘八就把一切國法，如4月6日和8日的法令，市民自衛團法案，保護人身自由的法律全都踩在腳下。他們想用戒嚴令這個新法令來代替它們，可是他們並沒有任何法律根據和事實上的理由宣布戒嚴。他們建立了赤裸裸的刺刀統治。

## 七 十一月的悲喜劇

由於反革命的前進，議會得到了一個法制基礎，像這樣堅固的法制基礎，普魯士資產階級過去和後來都從未有過。

議會反對國王的命令，不管協商論是否有效，它這樣做無論在形式上或是在實質上都是十分正確的。甚至把這種理論奉為圭臬的一些人，如極右派的法學家格奈斯特也不得不以柏林市議員的身分作出這樣的結論：“召集國民議會是為了到柏林來商定憲法。它根據法律集會，並奉召來到柏林。它當時和後來都實際上批准了這個會址。因此會址和會期的片面變更是不合法的，不管對國王或是对議會來說都是這樣，因為它們兩者都是作為獨立的力量并

存的。誰要承认把議會迁往勃兰登堡的权利，誰也就必須承认把它迁往梯尔西特、薩尔卢伊或者其他邻近地区的权利。誰要答应休会十四天，也就要允許休会十四年。一方要想单独决定时间和地点时，自由的协商就結束了。然而一方单独做出的判断，即使变动是重要的，这样做的理由是充分的，也是一种片面的决定。因此現在的問題不是‘命令和服从’，而在于保卫我們的权利。”这个法律問題是这样明显，甚至最保守的法学家，只要他們不想故意歪曲法律，都会以格奈斯特的精神回答這個問題，比如康普豪森內閣的司法大臣博奈曼就是这样。

議會中的多数也相信議會这样做是正确的。11月9日，当勃兰登堡提出“郑重共事的抗議”以后离开會場时，甚至右派也沒有完全跟他走。有几个右派成員不知是由于良心譴責还是由于其他不良动机留在中間派和左派里。大約有二百五十名議員不向政变屈服，大大保障了議会的決議能力。从前的农业大臣吉尔克提出的一个議案差不多以全票通过，这个議案否认国王有权違背議会的意志，命令議會休会，迁移会址和解散議會，并且指責負責的大臣对国王、国家和議會严重失职。对于法律問題做出这个确当的决定以后，就要看議會怎样保卫自己的权利和反抗国王的不法行为了。

其实行动問題也同法律問題一样十分明显，而且是直接由法律問題产生的。国王用暴力攻击，議會就必須用暴力防禦。这里并不涉及“守法的”資產階級可能怀疑的革命权利的問題。簡單地說，这就是对不合法的进攻的合法的抵抗，防禦者不管願意不願意都必須順应攻击者所选择的武器。一个边境遭到外敌侵犯的民族也是用武器保卫自己的家乡，叛国者勃兰登堡和弗兰格尔比外国侵略者还可怕、还可恨。如果議会在国王破坏法律以后把自己看做

是国内唯一合法的力量（实际上它也是这样），那么它就應該喚起人民不惜一切代价进行反抗，要用武装的抵抗对付武装的入侵者。当国王企图利用暴力破坏議會时，这就是議会的义务，同时也是它的权利。

如果議會害怕由于自己犯了严重錯誤失去人民的信任，如果它担心自己不能召集胜过国王的军队的武装力量，那么这种局势就不会有丝毫改变。因为斗争可能失败就放棄斗争，这是胆小鬼的行为，不是大丈夫的举动。倘若列奥尼达<sup>①</sup>在德摩比利隘口率所部三百人退回（因为他必为波斯軍所敗），那么他在历史上就不是一个英雄而是一个卑鄙的家伙或是一个愚人。战争是这样，革命也是这样。后来馬克思评价普魯士議会在十一月危机时的策略时说：“頑强奋战后的失败是和輕易获得的胜利具有同样的革命意义的。”<sup>②</sup>假如議會虽知必敗但仍敢于进行斗争，那么它就能弥补过去的过错，拯救自己的未来。在以后的五十年中，普魯士議會决不会被指定扮演墙上的影子的角色。何况只要議會善于坚毅、明确而迅速地行动，斗争并不是毫无胜利希望的。

在这一天，議會还有进行斗争的机会。內政大臣以真正的普魯士的輕佻精神，通过警察总监命令市民自卫团司令部封鎖話剧院不准議員到那里开会。司令部用确当的理由拒絕这样做。理由是，根据市民自卫团法案，市民自卫团的任务是保卫而不是侵犯“宪法規定的自由和法定秩序”，根据这个法案，市民自卫团不归內政大臣也不归警察总监指揮，而只归市鎮当局指揮。林普勒尔叫

① 列奥尼达(Leonidas ? 一前480)，古斯巴达国王，在希波战争中，公元前480年率希腊军队扼守德摩比利隘口。因內奸通敌，队伍被圍逃散，偕斯巴达三百战士奋勇抵抗，全部牺牲。——譯者

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82頁。

人把来往信件送给翁鲁，翁鲁急忙通知议会在11月10日早晨五时开会，因为警察总监已经宣布，如果市民自卫团在早晨六时以前不表示愿意执行命令，王国官厅就要亲自采取“适当的决定性措施”。

在这次决定性的会议上，提出了三种可以决定议会行动的意见。市政府的一个代表团自愿做国王同议会之间的调解人，它要求议会采取“和解的步骤”，尤其是要防止流血事件。市民自卫团拿出它的司令部同警察署之间来往的文件，但是没有提出特别的要求，这就是暗示它虽然不愿被用来破坏议会，但是也希望议会看到它的勇气已经枯竭了。最后，组织起来的柏林工人，“德国工人结义会柏林区域委员会”——翁鲁在宣读时说：“根据签名，当地有许多工会属于这个组织。”——要求议会进行武装反抗。这个简短的致意书中写道：“只要有人胆敢由于侵犯人民代表而侵犯了人民的权利，柏林工人随时准备着听从你们的召唤；他们向你们伸出手，献出血以反抗一切要想出卖你们，出卖人民的自由的敌人。”对这三种意见没有进行辩论，翁鲁就说，议会不能再采取“和解的步骤”，可是当然要避免发生流血事件。一定不给内阁任何采取暴力手段和强迫措施，宣布戒严等等的借口。应该进行消极抵抗，如果“只有用武力”才能把议会赶走，进行消极抵抗就够了。真正的决定权掌握在国家手里。只要言论，只要结社权没有重新受到压制，国家不用流血也能战胜反动派。如果国家没有提出充分的抗议，以致刚刚取得的自由重又失去，那么这就是国家本身的罪过。

翁鲁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知道，本来是尽人皆知的事情，即不管有没有理由，反革命正准备“重新压制”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并宣布戒严，所以翁鲁的原则性声明的智和勇也就不言而喻了。事实上他是把对市民自卫团的要求同这一点结合起来，这个要求是，假

如議會受到武装力量威胁，不要积极保护議會而只进行消极抵抗。对于工人的致意书，他說：“先生們，如果我对你們的意見理解得正确的話，我們决不促使而且也不能听任那些把力量和鮮血贡献給祖国的人們，在不适当的時間和不适当的地点牺牲献給祖国的力量。”翁魯是一个老奸巨滑的資產者，他不想在不适当的地点和不适当的時間看到哪怕只是为了資產阶级的利益粉碎专制暴行的工人的拳头；按照他的見解无产阶级的鮮血和力量只屬於“祖国”，而他所謂的“祖国”就是指資本的利潤。

議会对議長的說明报以“同声叫好”。沒有任何反对意見。在这个會議上，議會还向人民发出了一个号召，“在人民合法的代議机关被暴力摧毁的严重时刻，一刻也不要离开法制基础”。議會为了通过在沒有大臣出席的情况下討論有机的法令以证明自己对政府的独立性，就繼續进行关于廢除封建义务法案的辯論，其条件是要像翁魯的声明給城市无产阶级潑了冷水那样，給农村无产阶级潑冷水。留在議會中的两三个右派議員要求，关于这个法案的扩大的修正案，只要有一个議員反对就应该退給委员会，議會同意了这个要求。它为了不損害那些忘記了义务曾經把背脊朝着它的議員的权利，而牺牲了农民的利益。

这一回，这个所謂的国民議會才真把六十年前法国国民議會已經懂得作为历史剧上演的东西，改編成滑稽戏演出。

政府的提案要想无偿地廢除过分的負担，这些負担純粹由封建关系产生，沒有契約根据，甚至三月革命前的立法就已經承认它們是世襲依附关系的产物，不过这种負担只存在于薩克森省和威斯特伐里亚省的一些偏僻地区，而在西部各地，法国的異族統治早就把基督教德意志統治的这些残余彻底清除了。可是在这种过分的負担非常盛行的东部諸省无偿地全部廢除这种負担的提案却遭

到否决，因为有一个右派議員反对討論。此外政府的提案还要求无偿地廢除狩猎勤务、驅兽人勤务、領狗勤务、狩猎通信勤务，以及用喂狗的面包、喂狗的谷子、喂狗的燕麦、地里的喂狗谷、地里的喂狗燕麦、养狗地租等名义征收的捐稅。許多修正案提議，在必須廢除的中世紀的苛捐杂稅中还應該包括：狩猎粮、狩猎金、紡紗捐、織布捐、劈柴捐、交亚麻、交羽毛莖、大麻捐、灯芯捐、沼澤捐、住宿金、刈干草金、切飼料工資、盖屋頂工資、勤务燕麦、放牧燕麦、胡椒金等等。可是这些修正案没有一个得到討論，因为每次都有一个右派議員反对。这样就过去了几个小时。

正在进行这种不体面的游戏时，傳來由市民自卫团警卫着的話剧院也被軍隊包圍起来的消息，这是对命运的一个尖銳諷刺，也是一个应有的諷刺。两支队伍的长官林普勒尔和弗兰格尔进行了英勇的舌战，結果弗兰格尔坚决表示，他要在廣場上露营一周，在議員离开話剧院以前他不离开这儿，議員离开后，他准备封閉話剧院。市民自卫团則表示，議會不撤退它也不撤退。于是議長肯定地說，武装干涉开始了。在这几天十分常見的“同声叫好”的情况下，議會宣布它只在“武力”面前退让，就帶着市民自卫团撤走了。随后軍隊就占領了話剧院，把攪乱議会的档案当作救国的消遣。

11月11日，內閣解散了市民自卫团。从表面上看，国王是根据“在解散令中明文規定的重要理由”这样做的。載在解散令中的唯一理由更有力地证明这种措施的实质上的不合法性：市民自卫团所以被解散，是因为它拒絕执行警察总监的形式上和实质上都不合法的命令——封鎖話剧院。这一天議会在靶場开会，宣布解散市民自卫团是非法的，宣布任何参与这一行动的官吏或市民是祖國的叛徒，但是又謹慎地补充了一条說，議會要求內閣收回成

命，市民自卫团和柏林居民以冷静的态度期待内阁采取这一行动。林普勒尔立即辞去司令官职务。市民自卫团的少校们还做了另一件事，他们在11月11日到12日的夜间开会讨论，要不要进行积极的或消极的反抗。工人结义会的一个代表团敦促他们进行积极反抗，并保证坚决支持他们。瓦尔德克同几个左派议员也出席了会议，他说，他到这儿来并不是为了给少校们出主意，他对军事是个门外汉，毫无军事知识，每个人都应该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以及什么东西比煽动性言论更为重要。在这个出席人数不多的会议上，谈了许多乱七八糟的废话，而解除市民自卫团武装的活动，仍“以冷静的态度”进行着。

这时候几个老丘八又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他们必须而且也打算宣布戒严以扼杀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但是市民自卫团却乖乖地交了枪，议会的书面抗议损伤不了任何人一根毫毛。在这个紧要关头，资产阶级的愚勇给军事上的无计可施帮了大忙。11月12日，市政机关的一个代表团出现在正在开会的内阁阁员们的面前，要求内阁辞职。勃兰登堡捺住性子“冷静而庄严地”（目击者格奈斯特这样报道说）拒绝了 this 无理要求，甚至勃兰登堡也能理解这种要求的优美的幽默性。于是市政机关的发言人就冒出这样几句话，“我们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市民自卫团的几千枝枪落到了民主主义俱乐部和工人手里，所以我们为了防止可怕的流血事件必须反对解散市民自卫团，抗议宣布戒严”。开会的大臣们听到这几句纯粹是捏造事实的话，脸上都露出满意的笑容——客气的格奈斯特把这种笑容称作“一种惊喜的眼神”——，他们立即回答说，正是考虑到这种十分紧急的情况，才要宣布戒严的，于是在同一天就宣布戒严了。

所有俱乐部立即被封闭起来，二十人以上的集会受到禁止，不

經警察当局批准，不得張貼招貼<sup>①</sup>，出版报纸和其他书刊。警察当局取締了一切不受欢迎的报纸，并且警告旧的庸人报纸，假如它们发表有利于议会，不利于政府的文章，它们就会遭到停刊的命运。此外还进行大规模的非法的住宅搜查、逮捕和其他阴险手段，比如馬上对洛貝尔图斯行使了警察职权，把一切“不能充分证明他居留本地的目的是合法的”外乡人，在二十四小时内驅逐出境，成立軍事法庭，凡通过“叛卖活动”使军队受到危害或損失的人都由这个法庭审判。

議會一听到这些消息，馬上就到靶場开会。議員們发现靶場以及它所在的市区聚集了許多武装人員，不是市民自卫团，而是由年輕的商人、技术員、艺术工作者、大学生組成的別动队，这些別动队显得比市民自卫团有力量，它們坚决要求保卫人民代議机关。翁魯也同样坚决地回答，議會不要求它們保护，副議長瓦尔德克同意翁魯的意見。翁魯說，別动队不撤走，議會就不开会，这样他就赶走了这些武装人員。在會議上宣布已經发布的戒严令为非法，不过这一次沒有照例附上这样一条：居民不要对它进行实际反抗。左派的荣克坚决宣称，人們不能經常像教师似的教訓人民，由于这种教訓产生了一种假象，仿佛人民沒有权利对非法暴行进行实际反抗似的。如果議會不願号召人民拿起武器，那么它也不應該劝告人民不这样做。議會中漸漸产生了一种羞愧的感觉。从全国各地送来几百封令人鼓舞的信件，可是議會却在水中撈月，它要想保卫自由，却又不願流一滴血。

11月11日，左派提議拒絕納稅。当然不会有結果。在翁魯声称，不用这个“最后的和平手段”，“全国人民的声音”也会压倒“反

<sup>①</sup> 在十九世紀前半叶，凡是貼在街头上供大众观看的号召、声明和告示，統称为招貼。这种招貼是政治斗争中的銳利武器之一。——譯者

动派的叫嚣”以后，議案被推給一个委员会。可是，“全国人民的聲音”虽然越来越高，反动派却并不“叫嚣”，而是采取一件又一件日益非法的暴力措施。11月12日，左派又提出一个提案，宣布叛国的內閣无权使用国款和征收賦稅。为此布赫尔提出了一个決議案，宣布如果軍隊被用来进行非法活动，如实施戒严，在軍旗前的宣誓就沒有拘束力。左派的几个成員根据相似的精神，希望发表一个宣言，要求“軍隊里的弟兄們”承认議会的“合法地位”。可是，在几个右派議員看来，这一切都太冒进了，他們用威胁的口吻說，如果不放棄这种計劃，在这次會議中还有決議能力的議會就会由于他們退出而失去決議能力。同軍隊有关的几个提案遭到否决。甚至被普魯士国家热狂所征服，不久就尝到这种热狂的苦头的齐格勒也用咒罵給这几个提案送行，因为他把紀律奉为胜利之母。委员会的大多数已經表示反对拒絕納稅，等到委员会作出书面报告以后，議會再作決議。决定議會的形式上的生存权利的很少几个右派議員，同时也就取消了这种生存权利的实际內容。

宣布戒严以后，內閣把議會当作一个二十多人的私人俱乐部严厉对待。可是議会在11月13、14和16日还开了三次会。这几次會議的速記报告給人一种极为可耻的印象。又一次宣布大臣們为叛国者，并在檢察署檢举了他們，在暴風雨般的掌声中宣讀了致意书。13日的會議以后留在靶場的大厅里等待并接見代表的一个副議長和两三个秘书插进来談到軍隊对待他們意想不到的客气。副議長感动地說，軍隊对他虽然粗魯，但是並沒有使用殘酷的暴力。一位秘书动人地叙述，一个士兵，“一个高大結实的汉子，这样溫和地同他手挽着手”走下台阶，送他出去，“像这样溫和的人他还没有見過，与其說是敌人，不如說是朋友”，另一位秘书补充說，兵士們的“眼里掉下了眼泪”。一个左派議員反对当普魯士的暴政躡

手躡脚地走来的时候贊揚它，可是他却因为这种沒有价值的嘲笑，受到議会的“責难”。这样一来，某个少尉对某个議員所說的每一句粗野的話，当然也都慎重地記在記錄本上。从这些善恶不辨的好心人的举动上看，好像他們不是在审理国王同人民之間的一个历史案件，而是在处理一件破坏名誉案，必須有证据才能确定是非。

只有拒絕納稅这个隆重的行动使得議會很不好受。既然它屢次宣布勃兰登堡和他的某某同党为叛国者，那么它就能够而且必須剝夺他們征收賦稅，使用国款的权利。可是在这个前提下，拒絕納稅就不是消极反抗的最后一步，而是积极反抗的最初一步。如果拒絕納稅仍然是一項“和平手段”，就会在种种宪法問題上糾纏不清，比如4月6日的法令規定未来的人民代表有批准征稅的权利，但是議會是否可以不同意已經列入今年預算中的稅收呢？

这个急待解決的問題摆在議會面前，不仅使右派議員而且也使許多其他議員感到很不舒服。再討論一次以后，委员会以五票对三票又否决了拒絕納稅的提案。可是請願书和代表团的要求越来越迫切，于是翁魯想到了一个十分狡猾的策略。11月14日，議会在市政厅开会时，傳來軍隊向市政厅开来的消息，翁魯宣布，如果議會再一次被驅逐，那么他在議會不能安穩地开会以前不召集會議，因为議會从这儿被赶到那儿，实在是一件不体面的事。可是軍隊沒有来，当瓦尔德克在右派强烈反对下要求決定拒絕納稅时，議長請他忍耐到第二天，以免由于某种分歧破坏了議会的“光荣的地位”。翁魯答应，第二天早晨还在市政厅召开議會，因为它並沒有被驅散。由于这个諾言，瓦尔德克就沒有再坚持，同意等到第二天。可是會議结束后，軍隊占領了市政厅，这时翁魯认为埋葬了人民代議机关本身，也就埋葬了拒絕納稅議案。

可是議會的想法还不像它那体面的議長所想的那样不体面。

有超过可决人数二百零二以上的議員签名的书面要求迫使議長在11月15日傍晚又在米連茨旅館召开了議會。拒絕納稅案的贊成者和反对者都到了那里。現在一方面委员会有了这样的看法：政府的行动和措施已經发展成为极端的暴行、詭計和无理行为，議會已被用暴力和阴谋之网裹住，它除了采取这一极端措施外沒有其他办法，甚至在它可能使国内造成混乱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另一方面反对者要想在这个可燃性的問題成为大火以前把它踩灭，或者在最不利的情况下給決議加上許多限制条件，使決議成为有名无实的東西。他們准备了一个提案，說捐稅仍然繼續征收，規定用稅款支付的款項仍由稅款支付，但是剩余之款不由勃兰登堡內閣处理，而由征收机关自己負責保管。把对政变的反抗推給所有階級中最沒有反抗性的階級，即彻头彻尾依賴內閣的官僚階級，这就是对于消极抵抗的最好說明。

由于軍隊及时开到，議會才沒有做出这个最后的不体面的决定。正当一个議員发表反对拒絕納稅的演說时，后来当了元帅的海尔瓦特少校率領一队兵士占領了旅館。翁魯一看见救苦救难的鋼盔出現在大厅之中，立即宣布，在刺刀面前他不进行投票。当議会在群情激憤的情况下提出抗議并要求投票时，翁魯同海尔瓦特商談后又引用了这个神圣的公式：“我們又一次在武力面前退让”。洛貝尔图斯很客气地請少校先出去一会儿，然后議會一致通过了拒絕納稅的決議，用的是迄今所提出的形式中最沒有力量的形式，決議說，只要議會不能自由地在柏林繼續开会，勃兰登堡內閣就无权动用国款和征税。議長宣布決議是“依法通过”的，接着就散会。

可是小心謹慎的議長立即召集議会的官員开会，并确认这个決議还不成其为決議，因为已經通过的提案还只是一个手写的東西，而議會規則某条規定，已經通过的沒有印好的提案在印好后还

要不經討論再投票表決一次。議長在頭一天還說過，不遵守這種形式上的規定，決不損害決議的實際效力，但是過了一夜他卻又想到了一個好主意。于是他要么再召開一次議會以完成這個形式，要么（如果他不願這樣做）就至少要公開通知納稅人，他曾經公開宣布為“依法通過”的決議是沒有法律效力的。哪怕有一點點榮譽感和責任感，他也不會故意欺騙那些當然不能把議會規則的一切討厭形式全部記住的選民。可是會議決定，議會沒有責任發表對議會規則的說明。當這些勇敢的資產者拯救了自己寶貴的身體以後，他們就不再把犧牲選民的利益，扮演不怕死的英雄當回事了。

在這種情況下，拒絕納稅的決議就成了空文。革命的幾個焦點，特別是萊茵省和西里西亞利用這個決議發動武裝反抗，可是這些分散的火把自行消滅了，因為議會沒有想到組織拒絕納稅運動，引起一場大火。後來幾十個拒絕納稅者由於所謂煽動他們的選民的罪名受到審訊，他們令人信服地證明自己毫無罪過。舒爾采—德里奇甚至可以感到自豪，當他的故鄉的市民正去襲擊國民軍的一個軍械庫時，他制止了他們。只有布赫爾一個人鼓動他的選民，特別是他出生的那一省的市政官廳沒收王朝的金庫，驅逐服從叛國內閣的官吏，對武裝謀殺進行武裝反抗，總之要做不願把拒絕納稅當做兒戲的議員所應該做的事情。

翁魯和他的同黨僥幸把事情辦壞以後，就想要在勃蘭登堡城繼續吹議會法螺。可是這個打算沒有得到勃蘭登堡內閣的同意。反革命一旦知道群眾不再支持議會，它就顯示了普魯士資產階級的政策所沒有，而為普魯士容克地主的政策所特有的實踐上和策略上的優越性。12月5日，內閣解散了議會，同時根據議會所擬草案公布了一個憲法，將來根據普選權選出的議會對這個憲法再做修正。當然這個憲法中的一些最主要的條款都是殘缺不全的，當然

除了新議會以外還要設立一個嚴格根據資格選出的第一議院，來修正憲法，可是欽定憲法中放射的自由原則的眩目光輝，容易使人看不到其中的限制，而這些限制就足以掩沒一切光彩。

同時政府還答應給下一屆人民代議機關提出許多已經指出名字的法案，這些法案將把普魯士國家放到資產階級基礎上。作為它的善良願望的樣本，它先通過取消報紙印花稅撫摸了一下資產階級最敏感的地方——報刊，它通過設立陪審法庭的命令使正直的市民充滿了當官的驕傲，最後它企圖通過發布在西里西亞省臨時調整領主和農民的關係的規定消滅農民起義的最可怕的策源地。使它獲得成功的，主要不是這一規定的比較溫和的條款，而是開到西里西亞去的別動縱隊，特別是議會使農民感到的絕望。反革命在這上面進行投機。它十分難過地對農民表示歉意，因為它在新議會召開以前不能幫助他們，但是這個罪過全在已被解散的議會，它不關心國王十分關懷的農民的福利，却“不斷地對那些同它的真正使命相距甚遠的問題進行質問”。這是一種非常無恥的欺騙，因為正是議會對廢除封建義務法案進行的比較熱烈的討論最有力地驅使國王和容克進行政變，不過這種欺騙所以能夠進行，並且還帶有某種真理的假象，都應該由議會自己負責。

事實表明，議會不僅懂得腳踩兩只船，甚至懂得腳踩三只船。它被自己的階級遺棄了。內閣幾乎慷慨地施舍了議會要想賦與的一切東西，如果還缺一點什麼，那麼對於保證剝削機器順利運轉的信用和安寧的恢復所抱的希望可以充分彌補這些缺陷。反革命認為立即應允某些事情是適宜的，而善良的市民以為事情就到此為止了。

城市貴族、大學，尤其是法庭，這樣一些特別給資產階級提供議會的先鋒戰士的有教養的階層，表現得比資產階級更為可憐。

除去少数例外，大城市的市政当局都发表諂媚的声明，柏林大学的八十名教授，其中有格林兄弟、雪恩来因、埃林堡、伯克等人在給国王的一个奏折中誹謗已被解散的議會，說議會“損害了德意志民族的荣誉”。法庭怎样为了在一定程度上贖回自己叛逆之罪，屈服于刺刀之下，它們又怎样公开地、有意識地嘲弄法律，給一切暴行披上庄严的合法外衣，这一切都不可磨滅地写在普魯士司法史上，当然在这个公正的殿堂中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有那种不可改变的奴隶耐性的德国人接近这个殿堂时是十分恐惧的。可是在11月的悲喜剧中态度最可怜的恐怕要算法兰克福議會了。它派了几个委員到柏林去給国王和議會进行和解，可是無論是装模作样，其实一文不值的西姆桑，或者是拙劣地虚构事实，把柏林描繪成可怕的索多瑪和哥摩拉<sup>①</sup>的巴塞爾曼都沒有能够做到这一点。然后法兰克福議會細声細气地要求勃兰登堡內閣辞职，而却大声宣布拒絕納稅的決議毫无效力。这个明白的議會甚至都不理解，它这样做正是宣布自己毫无效力，因为解散柏林議會以后就要解散它自己，正如閃电后面接着就是打雷那样。

## 八 叛逆的小資產階級

德国資產階級由于害怕工人階級而向封建专制的反动派屈服。每当国王和容克箝制无产階級的时候，資產階級不管願意不願意也就跟着这样做。它在苦难中至少有了一种安慰，因为就它的不良条件來說，它已經前进了一大步。虽然它又受到了束縛，可是它仍然是一个上升的階級。

<sup>①</sup> 索多瑪和哥摩拉是两座古代城市的名称，据聖經上說，这两座城市由于居民罪孽深重而被地震和“火雨”所毀灭。——譯者

德国的小资产阶级却不是这样。这个阶级在德国革命中遭到决定性的失败，决不会再恢复原先的样子了。它从十八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中叶进行了种种发动，用自己的方式为争取资产阶级的自由而斗争。但是它从来也没有能够彻底摆脱从十六世纪中叶就深入它的骨髓的陈旧的小市民作风和庸俗习气。三月革命以后，推翻了三月革命前的国家，大家都过好日子的幻想已经破灭，同时事实表明，资产阶级的自由首先创造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巨大阶级斗争可以赖以发展的基础，于是德国的小资产阶级就在这个可怕的前景面前吓得后退了。它希望过安静日子，即使它的道德、经济、政治趋于没落也在所不惜。

在英法两国，在英国的宪章运动和法国的社会民主派中，小资产阶级的最坚强的分子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资产阶级。这对无产阶级并不是一件幸事，因为这样一来就大大拉长了它发展成为一个阶级的过程，但这对小资产阶级却很有利，因为它从这个联盟中可以获得革命的动力。德国小资产阶级从来也没有能够产生这种联盟的思想；它总是认为幼稚地要求工人阶级盲目信任它的领导是一件大事。这种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性大大促进德国无产阶级的发展；它首先是那些给德国无产阶级政治组织以比英法两国更有力的推动的原因之一。相反地，德国小资产阶级即使受过最沉痛的教训也决不能理解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对它来说，这是一个不幸。半世纪以来，每一个十年中都有个别的思想家企图组织为了更巩固地向右集合自己的队伍，而先向左集结队伍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像瓦列斯罗德和古伊多·魏斯这样光辉的政论家在这种尝试中度过了一生。但是通常只有很少几个思想家集合在刚刚展开就又坠落到地上的旗帜周围。德国小资产阶级的广大群众仍然听不见对一种英明而勇敢的阶级政策的一切呼声。

这些群众在 1848 年分为三个部分，它们的残余以排犹主义的、自由思想的南德“人民党”的名义出现在今天的国会中。这种排犹主义的行会方针的支柱主要是还没有取消行会的北德中小邦：汉撒城市、汉诺威、不伦瑞克、梅克伦堡和萨克森的一部分。早在 1848 年 4 月 22 日，莱比锡同业公会二十二个会长就已经发表了致“德国同业公会全体会员”的公开信，信中要求他们把同业公会当作宝物牢牢握住，没有同业公会，劳动问题决得不到解决，没有同业公会，德国就没有美好前途。在颂扬行会的同时，对犹太人激烈宣战，说犹太人的心就是钱包，他们的解放是一种时新货；在德国很大一部分地方，正在发展的无产阶级应该感谢犹太人的活动，因为犹太演说家和作家煽动无产阶级反对现存制度。这个号召的反动性质还表现在用各邦分立的妒嫉眼光来看德意志的其他各邦，大力反对宣布僕役和帮工有选举权，因为这样就压抑了手工业行东的普选权。

不来梅和汉堡的手工业行东也发表了类似的文告。6 月 2 日在汉堡举行了有二百名代表参加的“北德手工业者和工业家大会”，人们在这个会议上用各种各样的声调唱着唯一造福的行会和破坏一切的营业自由的老歌。一个柏林代表甚至热情地赞同这样一种大胆的看法，即如果没有营业自由就决不可能使柏林人背离他们善良的国王。假如不是一个遭到长时间的反对才得参加大会的代表进行调解并把一种所谓现代的关系带到混乱的行会中的话，这次会议在这种不可救药的混乱中也許一事无成，尤其是当行东和帮工之间发生激烈争执的时候更是这样。这个代表是卡塞尔人民大会派来的文克尔布列希教授。

文克尔布列希在卡塞尔高等工业学校教化学。有一次他到挪威去旅行，在那里偶然碰到了—一个德国工人，那个工人给他讲到无

产阶级的贫困，于是文克尔布列希就奇妙地发现了自己的社会主义感情。由于这个动力，文克尔布列希决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不仅关心机器和技术，也要关心人和人的经济制度。他拟定了一个渊博的体系，后来还在一部冗长的著作中加以阐述。这种体系是用联邦主义调和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用兼容主义消灭垄断主义，总之是用好的主义代替坏的主义。实质上，这个体系是一种愚昧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它对资产阶级剥削倾向的可敬的憎恨只能表现在，它把基督教德意志行会制度、更加夸大的马尔萨斯人口论和傅立叶以及路易·勃朗的个别思想结合起来，打成一条辫子拖在背后。

这条辫子正适合要想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基础上复活行会的手工业行东的会议。汉堡会议根据文克尔布列希的建议宣布，只有一个包括所有工业部门的有效行会规章才能使德国免遭英法两国的命运，才能不受共产主义威胁，它决定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召开一个全德手工业者代表大会，讨论这个规章并把它交给德国国民议会。这个有来自德国二十四个省的一百十六名手工业行东参加的代表大会于7月中旬至8月中旬开会，根据文克尔布列希的指示制定了手工业和工业规章草案，并把它作为“有千百万不幸者为证的对营业自由的严重抗议”交给了国民议会。但是德国议会却不知道如何对待这个进步建议和反动建议的奇异的混合物，在德国议会的所有罪过中，恐怕这是最小的罪过了。

草案要求成立一种仿照教会组织的、以全德工业议会为领导的同业公会国家。同业公会全体行东通过直接初选选举“社会议会”，这个议会在德国议会的领导下每次都同它同时召开，以便给它提出建议。在同业公会内部还保留学徒、帮工、行东的旧等级，保留着劳动证、强迫教育、强迫流动、资格证明书等制度，并且限制

只做一种手工业。此外还要求一种结婚的财产资格，所有想结婚的人应提出结婚基金的证明。同这些反动空想并存的当然也有一些实际改革的要求：征收累进所得税和财产税，依法调整劳动时间，彻底改革学校，实行免费教育，把国民学校变成资产阶级社会所有成员的普遍教育机构，使得艺术和科学成为人民的公共财产，不再是一种财富的垄断。

尽管如此，手工业者代表大会的重心仍然在于反动的行会制度方面。这一点特别表现在大会对参加大会的十个帮工代表的可恶态度上。这十个代表起先根本没有发言权，后来也只有发言权而没有表决权。于是帮工们号召从7月底到9月底也在法兰克福召开一个有许多代表参加的帮工代表大会。这个大会同行东代表大会处于尖锐对立的地位。它在给国民议会的一份请愿书中写道：“行东们的自私自利使他们忘记了一切智慧，以至他们竟敢宣布我们是未成年的，我们青年人有力量的维持自己的生活，我们是劳动者，是真正的生产者，因此是德意志的核心，我们是大多数，同时我们也知道我们是大多数。”可是这个代表大会也陷入行会制度的泥沼里。

想把大资本的一切反对者纠缠在一起的文克尔布列希忧心忡忡地看到行东和帮工之间的冲突威胁着他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通过不倦的活动，他争取到一些帮工，接受行东的最基本的要求，接受强制同业公会甚至也同意对工人的结婚限制。当然帮工们不希望按照老行会规章的模子制定同业公会的规章。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要求“劳动组织”，要求“实行新的同业公会规章，这个规章应该同过去的规章大不相同，它适合于我们高度发展了的工业状况，承认所有生产者的同等权利并遍及各行各业”。他们也反对行东们在草案中拟定的监督条例的一些重要细节。他们骂劳动证是

“讨厌的警察措施”，他们不愿被迫到外地劳动，他们认为累进税只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一种缓和手段，而决不是一种充分的调整手段。但是就帮工代表大会的主要意向来看，它只代表德国社会中还保有行会手工业的严重偏见的一部分人。

因此这个代表大会也尽可能拙劣地开始建立一个全德工人协会，这个协会要把德国的许多工人协会在工人除了自己不为其他任何人服务，他们只追求自己的目的这一口号下团结起来。这个明智的原则立刻被这一主张所破坏，即工人协会只有在它们的阶级利益直接受到侵害时，才同政治发生关系。在帮工代表大会看来，一个共同的徽章和一面共同旗帜比政治还重要，它在夸大其词的号召中要求工人采用这种徽章和旗帜。帮工代表大会结束前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它的任务是组织德国全体工人，出版一份全德的工人报纸，文克尔布列希也当选为这个委员会的委员。这份报纸于1849年1月1日在法兰克福出版，它的创刊号就使它在所有没有充分发展的工人中丢了脸，因为它竭力用普鲁士国王的浪漫主义的言词嘲笑立宪制度。

同反动行会派的小资产阶级并存的还有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组成这一派的有手工业中还没有受到大工业的威胁，或者已经懂得同大工业相适应的一些人，有小商人，有农民中在政治上已经觉醒的阶层，也有知识阶级中还在反对资本主义用以威胁他们的雇佣制度那一部分人。他们通过代表大会、协会和报纸在政治上组织起来。可是这个民主派的小资产阶级并不是一个团结一致的整体，而是分为北德和南德两派，它们虽有許多相似之处但也有許多不同之点。

北德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普鲁士议会的左派身上得到典型的表现。如果说它摆脱了中世纪行会的怪习气，那么它就已经被

資產階級更加牢固地綁在牽引繩上，綁在一根往往很长，但却不会扯断的牽引繩上。它不敢長時間地采取彻底的、独立的政策，当它在資產階級和无产階級之間进行抉擇时，通常它都失去这样做的兴趣。在这种場合，它就不加考虑地依附于資產階級的最进步的集团。誠然，在普魯士国民議会的左派中也有一些人，如布勒斯劳的奈斯·馮·埃森貝克老人这样的感情社会主义者，或科倫的青年医生德斯特尔这样的果斷的干練人物，不怕同工人階級結成联盟，甚至还要求这样做，可是这只是极少数，而在議會发生严重危机时，民主派小資產階級却完全随着自由派資產階級的乐声跳舞。

民主派小資產階級在柏林表现出它最坏的一面，它用一种无限悔恨的心情代替了三月之夜的片刻陶醉。它在自己的市鎮組織和軍事組織中，在城市的官厅中和市民自卫团中怕得发抖以至跌倒。它甚至受到实际上也沒有过多的勇气的柏林資產階級報紙的严厉譴責，因为它“由于任何小事，都会惊惶失措”。它在《福斯报》上給自己建立典型的紀念碑。总的說来，这个机关报胆小得像兔子，可是在三月革命后的头几天却发表了一些过激的、自相矛盾的言論，小市民一旦认为有一个可靠的后台，可以冒充英雄的时候，就喜欢說这些話。照《福斯报》3月20日出版的《喜悅的号外》的說法，是“最值得尊敬的市区官吏”保卫了街垒。可是这种“喜悅”的确只是“号外”，革命年代的一位民主派的历史学家說得很对：任何反动言論都沒有像《福斯报》这样長時間地为在街垒上战斗的是流浪汉和罪犯这样一种神話辯护。这个報紙发明了有利可图的“文稿”工业。只要給它現款，它就变成容克地主的反动对資產階級的革命、資產階級对无产階級发出的一切誹謗言詞的喇叭筒。在柏林出版的第一个工人報紙的第一期驕傲地对这种“可以收买的報紙”提出抗議。工人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人民报》在5月25日写

道：“《福斯报》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它不但不用给投稿的人付稿费，反而从投稿人那里拿钱。有时也有例外，比如它发表了柏林印刷厂厂主的一篇较长的文章，并没有付给作者稿费，但它却让印刷厂的帮工，那些穷苦的工人付十六塔勒二十二银格罗申作报酬。”当时甚至资产阶级报纸都不像这样唯利是图。

北德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萨克森王国表现了它最好的一面。小国的高度经济发展不断地反抗它仍然十分落后的国家形式，而这种国家形式的家庭手工业基础延缓了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分离。在萨克森邦议会中，有十四名议员组成社会民主派集团——法国式的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社会民主派——，在被选进德国国民议会的二十四名萨克森议员中有二十名属于左派。他们的领袖是1848年的两个议员，勃鲁姆和特吕茨施勒尔，他们都被复仇心切的反动派甚至利用军法加以杀害，一个死在奥地利帝国的枪弹之下，另一个死在普鲁士王国的枪弹之下。特吕茨施勒尔是一个温文尔雅的贵族，一个光明磊落而意志果断的人，勃鲁姆是莱茵区一个无产者的儿子，他干练、顽强，在丑陋的外形中装着一颗勇敢的心。勃鲁姆是德国小资产阶级给资产阶级革命提供的最优秀的人物。但是这个阶级的命运也在他身上得到表现，只是这种命运在他那里发展成为悲剧性的顶点。如果说，勃鲁姆在群众要进行选举时，在预备议会中防止了资产阶级同小资产阶级的分裂是正确的，那么在9月有决定意义的日子里，当德国议会已经无可救药，德国革命只有用第二次革命才能挽救的时候，他做出同样的决定就是很不正确的了。此后，他就失去了可靠的指南针，他力图在维也纳街垒战中拯救他在法兰克福街垒战中贻误的东西，结果没有成功。他用勇敢的死弥补了他的政治过错，他的名字不是永远活在他为之牺牲的那个阶级之中，而是永远活在产生了

他，但是他并没有为它斗争的那个阶级之中。很遗憾，二十年后俾斯麦因为这个布里吉滕瑙<sup>①</sup>的死者不愿参加任何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表示的赞许，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在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中，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最为接近，可是不久就又分道扬镳了。第一次民主主义代表大会是6月中旬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举行的。参加大会的有代表八十八个民主团体的二百多名代表。莫尔和沙佩尔同其他一些人代表共产主义者同盟出席了大会。大会一致宣布，民主共和国是在德国可行的唯一的国家制度，大会要竭力建立一个宣传民主共和国的组织。民主团体应该在区域委员会的领导下以行政区或省为单位集中起来。各区域委员会的所在地点是：曼海姆、斯图加特、班堡、维也纳、柏林、科伦、法兰克福、马尔堡、哈雷、布勒斯劳、施泰廷、科尼斯堡。区域委员会之上设一个由五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在南德分立主义分子激烈反抗的情况下，中央委员会迁到柏林。其中有两个委员由柏林协会选举，在代表大会选举的三个委员中，有两个倾向于一种很成问题的社会主义，这两个人是尤利乌斯·弗吕贝尔和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尖锐批评过他的“爱的呓语”的来自纽约的克利盖。除了南德的最激进报纸《曼海姆晚报》以外，还有科伦的《新莱茵报》和柏林的《阅报室》报被选为代表大会的机关报。

在科伦区域委员会中，有两个委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有三个委员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即马克思、莫尔和沙佩尔，第六个委员是后来当了科伦市市长的海尔曼·贝克尔，他虽然不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但他却靠攏这个同盟。除了科伦以外，其他各地的组织都没有能够发展成为有生气、有力量的组织。中央委

---

<sup>①</sup> 维也纳的郊区名。——译者

員会里一片混乱，这种混乱状况的一个最好的说明就是弗吕贝尔的維也納之行。据克利盖解释“在我们看来，同斯拉夫民族一起組成联邦共和国的理想甚至比建立德意志共和国的理想还要崇高”。10月底在柏林召开的第二届代表大会已經表明这个組織处于分崩离析的阶段。这次大会有二百四十名代表参加，其中大部分来自北德。出席大会的共产主义者有来自巴黎的艾韦貝克，他不久就脱离了共产主义者同盟，还有魏特林，由于空想主义的自命不凡，他早就同共产主义者同盟分道揚鑣了。根据克利盖的建議，格奥尔格·法因当选为大会主席，他是浪漫主义大学生协会的早已沉淪的时期的一个政治木乃伊。中央委员会报告人克利盖用充滿希望的話致了开会詞：“我們的主要支柱必然是市民，我們不能依靠无产阶级，它太粗野，沒有文化，不能参加我們的事业。”克利盖补充說，代表大会应当作为民主—社会的共和国的政府全副武装地站在这里，沒有这样一个組織而进行革命，是不正确的，但是这个发言以及其他代表的类似发言只起了使許多代表退出代表大会的作用，他們宣称，他們的委托人不知道，“这次大会的代表应该拥护共和国制度，并为实现这种国家制度而行动”。

接着大会就討論有关协会的种种問題，反复研究中央委员会的委員是不是不設五人，而設三人或七人，辯論罗伯斯庇尔的人权（建議各民主团体对此进行彻底討論），由卢格起草了一份支持被圍的維也納的号召，代表大会主要在这些方面浪費了時間。《新萊茵报》对这个号召作了中肯的評論，它說，这个号召缺乏革命的毅力，而充滿了抱怨派說教的热情，这种热情后面所隱藏的是极其貧乏的思想和感情。这一切正是在普魯士政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发生的！代表大会的失敗給那几个老丘八鼓起不少勇气，而个别代表发表的一些粗野言詞沒有别的成果，只有被普魯士国家檢察官

所利用，以便在政变胜利以后，把最温和的反对者当作可怕的阴谋家加以控告。对可怜的瓦尔德克尤其是这样，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及其共和主义倾向对他的普鲁士王国的爱国主义说来是一种恐怖。

自从在第一届代表大会上选定柏林作为共和主义宣传的中心以后，南德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一般说来同这个民主组织并不接近。在南德对普鲁士的憎恨中，不仅隐藏着对普鲁士专制主义的极大厌恶，而且有一种极其反动的因素，即：舒舒服服的三家村的居民对现代社会的大冲突在其中开始发展的大邦的憎恨。南德小市民比北德小市民更不想过问这些冲突。他们害怕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因为他们本能地意识到，他们的阶级将在这两片坚硬的磨石之间被磨得粉碎。他们在南德大谈共和主义，尤其是在法兰克福议会的左派中有许多人拥护共和主义，可是这种可怜的共和主义并不是在革命运动的先锋队中行进，而是在它的后卫部队中行进。

几十年来，德国西南部的小邦受到专制暴政的统治，这时从外国吹来比较自由的空气，这些小邦里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尤其是小农群众被煽动起来。他们比普鲁士小市民容易从墙上取下武器，他们也很少感到“君主思想”的教化力量，但是在其他方面他们的眼界却狭窄得多。他们的眼光几乎超不出地方的边界，他们的国家理想也越不过扩大的市镇。因此这些群众很容易成为比他们看得稍远的人，如律师、书商、教师、报纸撰稿人等的玩物，这些人装成忠实可靠的样子引诱他们，以便一有机会便把他们出卖给自己有时幼稚，有时狡猾的野心。

在南德民主派的中心巴登，三月革命前的反对派的领袖曾经获得响彻全德国的声望。可是，革命的阴云刚聚集起来，这些模范

愛國主義者中的一部分人，如巴塞爾曼、馬提、左伊隆就立即轉變了。勃魯姆一到法蘭克福，就無盡無休地抱怨那些“幾十年來被看作是堅決果斷、思想開明，現在卻成為後退分子的流氓”。假如他活得長一些，他就會看到在法蘭克福的左派里，也遠沒有把所有麥糠都從小麥里簸出來。緊挨着他坐着的是左派的議會領袖來自吉森的卡爾·福格特，他在1849年擔任過德意志帝國攝政，1859年同樣光榮地成了波拿巴的僱傭文人。

## 九 革命的無產階級

在德國革命中，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只能在貴族和資產階級之間的決定性鬥爭的重大影響下得到發展。假如資產階級有一點勇氣，它是可以得到整個工人階級的支持的。但是它由於害怕無產階級，而在王權和容克面前降下旗幟，就恰恰引起它想避免的事件，它大大提高了工人的階級覺悟，使這種覺悟超過它接着當時的歷史情況已經從天生的根源中得到發展的水平。

農村無產階級當然還沒有建立有階級覺悟的組織，只有西里西亞例外，那里的所謂農家協會使反革命大傷腦筋。除此而外，農村無產階級就把它綱領寫在呈給柏林國民議會和法蘭克福國民議會的幾千封請願書中，可是他們的要求不外是廢除封建義務，希望占有一小塊土地（哪怕只是牧鵝用的巴掌大的一塊土地），提高短工工資，降低賦稅。這個綱領也只能是這樣，因為它正適合封建農奴農的观点，他們希望由資產階級革命中得到解放，因此不可能採取遠遠超過這個革命的立場。

工業無產階級卻不一樣，它早就同資本處於秘密戰爭狀態。它支持資產階級革命只是為了取得同資產階級進行公開戰爭的戰

場。它一旦看到，資產階級開始犧牲自己的利益封鎖了這個戰場，它也就必然看到，不應該再讓資產階級領導自己，而應當撇開資產階級自己組織起來。資產階級革命越是停滯不前，工人階級就越革命。它的力量還很弱，不能把資產階級所背叛的旗幟導向勝利，可是它為這面旗幟勇敢地戰鬥。與資產階級不同，它的失敗不是它的解放鬥爭終止的開始，却是它的解放鬥爭的開始階段的結束。它在三月革命中拋棄了現代無產階級在其革命發展的最初階段所抱的最后幻想，它被推下歷史舞台，只是為了療養重傷，十年以後，更堅決、更幹練、更有見識地登上歷史舞台。

1848年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中心當然是大城市，首先是柏林和科倫。柏林工人取得了3月18日的勝利，而在勝利後的那一天就被人搶走了勝利果實。這種事情之所以發生只是因為柏林工人還沒有明確認識到自己的利益，缺乏有組織的力量以保衛勝利成果。事實上，他們在政治上還很不成熟，他們為了討論擺脫苦難的辦法，在3月26日召開的第一個大會就立即證明了這一點。參加大會的有兩萬人，提出了形形色色的建議。大會以一場延續數小時之久的騷動結束，因為《福斯報》的一個狡猾的撰稿人用一個含混的發問造成一種假象，仿佛大會認為聯合議會比現代的人民代議機關還要優越。

不言而喻，統治階級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盡一切可能在工人階級中製造混亂。市民自衛團的瘋狂襲擊，反革命粗暴地抓捕農民，一切在王國當舖中當了五塔勒以下款項的抵押品可以無償贖回，減免一切租賃稅剩餘和一切在學費和罰金上積累的欠款，建立一種國家工場，國家雇用三千五百個，城市雇用二千五百個失業者做土方工作和開鑿運河，成立所謂的勞動部，工商業和社會勞動部（當然這個部很快就露出了有產階級的一個新堡壘的原形），蠱惑

家海耳特及其同党的空洞无物的豪言壮语，高尚的工人朋友的好心劝告（用动人的声调对工人说，过去你们为了社会的幸福在街垒上战斗，牺牲，现在你们应该为社会的幸福而工作、生活，自由主义庸人的三月革命前的小丑，文人格拉斯布伦勒和科萨克带着真正的报丧人的愁容说过这番话）——这一切就像一个震耳欲聋、使人心乱的乐队闯入柏林工人之中。更加值得赞扬的是，柏林工人并没有被迫离开他们的历史任务给他们指出的政治道路。他们既没有被自由主义的怯懦所打倒，也没有被反动的济伦之歌<sup>①</sup>所迷惑，直到发生政变为止，他们都为资产阶级革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和心血。

他们从自己的失败中学习。在那次不成功的群众大会之后没有几天，就有一百五十个工人组成了一个特殊的工人俱乐部，他们公开宣称，在举行大规模的群众大会以前，他们必须先较小的范围内熟悉一下议会的形式和问题的逻辑次序，因为在大规模的群众大会中，他们可能被形形色色的投机分子和装模作样的人物所欺骗。这个俱乐部决定要求所有工人团体、作坊、工厂选举代表，组成工人中央委员会。

这个要求实现了，经过一阵筹备，计划中的中央委员会于4月19日成立了，其中虽然也有一些不可靠的人物，但是它的主席排字工人波尔恩和金匠比斯基却是很有自知之明的人。

除了他们以外，大学生古斯达夫·阿道夫·施略费尔出席了头几次会议。他是一个十九岁的爱幻想的青年，他的父亲是西里西亚的地主，曾经受过施梯伯的迫害，后来成了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左派中的优秀人物。年轻的施略费尔由于在奥登瓦尔特传播所谓

---

<sup>①</sup> 据希腊神话，济伦是海中女妖，她能以美妙歌声引诱舟子投入海中。——译者

煽动性著作被海德尔堡大学开除，他想到柏林大学继续求学，柏林大学又驳回了他的入学申请。这时他完全投身于无产阶级的鼓动工作，以不受拘束的传单形式出版《人民之友》报，用激烈而勇敢的言词宣告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白刃战。他的同情态度使他很快就在工人中得到许多拥护者。他筹划4月20日在王宫前面举行一个大规模的群众大会，争取直接选举权，这时他同波尔恩和比斯基发生了明显的分歧。

波尔恩是一个聪明伶俐，但又冷静沉着的人物。他在布鲁塞尔和巴黎参加过共产主义者同盟，从他的文章和演说中可以看出，他对《共产党宣言》的精神有很好的理解。作为大会的领导人，作为一个有力量的动人的演说家，他胜过当时柏林的所有人民领袖，甚至资产阶级的机关报也为他证明这一点。他以及同他相似但才能不如他的比斯基不愿召开争取直接选举权的群众大会，可能是担心手无寸铁的群众被武装的市民自卫团驱散，这样市民和工人之间就会发生冲突，在国民议会还没有选举，更谈不到召开以前，这种冲突必然为反革命开辟道路。当争取直接选举权的人民选举委员会中的大多数人决定采取施略费尔计划时，波尔恩和比斯基以及几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退出了这个委员会。可是施略费尔的计画并没有实现，因为被邀的群众没有到会。施略费尔事后被捕，5月11日柏林高等法院以企图煽动叛乱的罪名判他六个月要塞监禁，在马格德堡执行。还在康普豪森内阁时期，他就成了革命的第一个牺牲者。群众举行了极其生动的大会对这个高尚的青年表示同情，但是他的活动并没有在柏林革命中留下长久的痕迹。

波尔恩和施略费尔之间的分歧有一个比较深刻的根源，对于事态的发展有某种示范意义。波尔恩曾经十分坦率地说出自己的见解，他说，在德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本和劳动还没有像英

法兩國那樣處於尖銳對立的地位，在英法兩國，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組成截然分開的黨派，作好戰鬥準備，冷酷地怒目相視。在德國，工人還沒有組織起來，他們還沒有組成政黨。個別工人破壞機器，或者向個別工廠主要求他們不能給的東西，這些都沒有意義。如果工人階級要想在國家中作為一種力量存在，那麼組織工人就是它的首要任務。“我們占全民族的絕大部分，屬於我們的不僅有雇傭工人，幫工，而且還有受大資本的競爭壓榨的許多小行賄，土地不足以養活自己和家庭的農民，給我們的孩子講課的教師，坐在綉花架子或機器后面的姑娘，凡是他的勤勞和努力被資本的力量所戰勝，並且必然在自由競爭中走向滅亡的人都屬於我們。”波爾恩根據這個綱領給工人中央委員會制定了組織無產階級的章程。

幾年以後，恩格斯說，在波爾恩所建立的組織的正式文告中，《共產黨宣言》的觀點同對行會的追憶和渴望、同路易·勃朗和蒲魯東的片斷的觀點，同擁護保護關稅者的立場等等混為一談。這是對的，但是恩格斯又附帶說，波爾恩是一個很有才能的青年人，但他太急于要成為政治上的大人物，只是為了糾集一伙人，他竟同各色各樣的壞分子聯合起來，他完全不是一個能統一各種矛盾傾向、澄清混亂狀況的人物<sup>①</sup>，那麼這種評論至少需要補充。根據現有資料來看，1848年德國商業城市和工業城市的工人運動除了萊茵區和威斯特伐里亞的部分地區以外只發展到這樣一種程度，即它差不多達到當時法國社會民主派的水平，還不能超出勞動組織、勞動權、勞動部等問題的範圍。它已經遠遠超過了漫無目的的飢餓鬥爭的階段，雖然有些地方還時常發生破壞機器的事件。它也基本上戰勝了空想的手工業工人共產主義；7月間到柏林來的魏

<sup>①</sup>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48—349頁。

特林在工人中找不到支持者，他办的一份报纸《初选人》出了两三期就因为沒有讀者而停刊了。但是工人运动还没有成熟到能够适合《共产党宣言》的立場。为了能够成为群众运动的旗帜，《共产党宣言》把大工业当作典型的企业形式，其规模比当时东德的大工业所具有的要大得多。如果波尔恩想把工人作为阶级組織起来，他就要考虑工人目前能在其中活动的思想范围，他至少不缺乏引导工人超过这个水平的热情。

一个自由派官僚，列特主席出席了为成立工人中央委员会而召开的几次筹备会议，为的是想說服工人同企业家組織一个共同的組織，据说企业家能够以远大的眼光調整国家生产对世界市場的关系，这时波尔恩反駁說，这种关系同工人毫无关系。对外关系和产品銷售对工人是无关紧要的。扩大工业不是促进工人阶级的手段，反而引起无产阶级人数的增长，工人的利益同企业家的利益恰恰相反。波尔恩也同样坚决地反对一切行会观点；他說，一个国家一旦采用了現代大工业，就不可能再退回到已經沒落的生产方式中去，要是这样做，那它只有自取灭亡，或者在欧洲国家中屈居完全从屬的地位。

当蒲魯东想通过建立人民銀行实现共劳动货币的空想，但却遭到失败时，波尔恩完全根据《共产党宣言》的精神，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写道：“我們决不贊同这个事业，虽然它的失败也使我们不快，但并不使我们惊異，因为我们几乎十拿九稳地等待这种結局，理由很简单，因为一种思想不管怎样偉大、正确，在沒有充分的实现条件的地方，是决不会实现的。比如，共和国肯定是比君主国合理的国家形式；但是它是否对于所有民族，对于克罗地亚人和法国人都同样适合呢，这又是另一个問題了……我們总是把工人組織放在劳动組織之上，我們始終认为只有先建立工人阶级的政权，

然后才有可能较大规模地，在一切社会阶层中实现社会理想……虽然我们更有理由属于社会主义党派，但是我们从一开始就不赞成这种社会主义的尝试……人类社会，这个永远生动活泼并有创造力的有机体不会让人硬塞进一种制度的紧身衣之中，正如人们不能利用人民银行对付日益增长的贫困一样，而这种人民银行必然要从穷人的口袋里掏钱做它的基金……我们有理由发问：如果人民银行由于蒲鲁东先生的一场关于出版方面的官司就必然倒闭，那么人民银行还有什么前途，还有什么生命力呢？蒲鲁东想用人民银行建设新的世界，人民银行就是他解决社会问题的仗恃，可是，公民蒲鲁东要是被判处六个月监禁，或是几千法郎的罚款，世界就又被人把它的救世主抢走了。我们不禁苦笑，我们想到一些平庸的浮夸人物，他们要想给伟大的人民运动照亮道路，穿着先知的服装，作为新时代的救世主走在前面，但是并不是为了自己也参加斗争，挥动锋利的宝剑，而是为了让别人敬佩自己。于是一位第二流的先知，孔西得朗先生来了，他想同蒲鲁东先生争夺人民银行的发明权——在这个时代里，整个世界孕育着许多方案，怀着极大的战斗热情互相接近、不久就要发生接触的两支大军的脚步声震得地动山摇，在这个时代里，邓宾斯基或贝姆在匈牙利所取得的胜利比公民蒲鲁东和孔西得朗的已经出版的和尚未出版的所有著作还要有价值，在这个时代，一天之间就可以磨炼出最著名的人物。这时，那两位名人之间的这种小战又是多么可怜啊！”波尔恩在他所领导的组织的机关报《人民报》和《结义报》上就是这样写的。可是在这个组织原来的纲领中，路易·勃朗的思想还占重要地位，而且还掺杂着种种保护关税、空想主义和行会的理论，这是因为德国产业工人（除去西部某些地区而外）只能接近当时法国社会民主派的立场，而且易北河以东的无产阶级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向前迈

进一大步。

工人中央委员会在报纸上、大会上，而且也为民国议会的选举开展了热烈的鼓动工作。在这次选举中，中央委员会使比斯基当上了柏林一个选区的候补议员。6月1日以后，《人民报》，每周出版三次，它是一个“社会政治性期刊”，它的纲领是“一方面支持资产阶级反对贵族、反对中世纪、反对禀承天命的权力的斗争，另一方面帮助小工业经营者和工人反对资本和自由竞争的力量，需要为人民争得某种政治权利时，永远走在前面，使得人民更快地取得社会自由和独立生存”。这个报纸在第三期上祝贺也是从6月1日起出版的《新莱茵报》的诞生，并说“我们的朋友”马克思、恩格斯、沃尔弗的名字保证了《新莱茵报》的“坚定方向”。在政治上，《人民报》热烈支持柏林议会的左派，它勇敢地拥护巴黎的六月战士，赞美英国的宪章运动，同时竭力同西欧的革命的工人党派保持紧密的精神接触。另一方面它也毫无顾忌地严厉批判海耳特之流的蛊惑者对人民所进行的政治—社会欺骗。这个报纸的大部分内容是讨论中央委员会所考虑的一些社会问题，从出口奖励和手工业工人团体一直到国家设法使失业者就业的问题。

此外，中央委员会还派代表参加了汉堡手工业者代表大会，并宣称它当然不能同意这个代表大会“热狂地卫护中世纪的行会制度”。中央委员会对于6月18日在柏林举行的一个较小的手工业者和工人团体代表大会也感到不满，这个大会虽然不像汉堡代表大会那样带有严重的行会习气，可是只停留在关于工人福利的一般的好心的空洞言词上。这个代表大会的六个代表，波尔恩代表中央委员会，卢赫特和克劳泽代表柏林机器制造工人，毕林和施泰因豪尔代表汉堡工人，克吕格尔代表科尼斯堡工人，于6月27日向“德国所有工人团体、手工业者团体和教育协会，向瑞士、巴黎、布

魯塞尔和倫敦的德国各团体”发出号召，叫它們派代表参加在柏林召开的工人議會，“所有城市、工业区和农业区的劳动階級”都应该派出代表，大会要討論的問題有：国家对劳动的保证、国家对产业工人組織的支持；国家对所有穷困和殘廢工人的照顾；調整和限制过多的劳动時間；为劳动階級的利益改革稅制：实行高額累进所得稅，限制继承权，廢除一切生活必需品稅以及一切封建捐稅和負担；实行免費的国民教育，訴訟免費，在德国各邦設立劳动部，由劳动階級自由选举产生。

工人代表大会在8月23日举行。参加大会的代表共四十人，其中五人只有发言权；柏林、布勒斯劳、汉堡、萊比錫、科尼斯堡、慕尼黑和其他大城市的三十五个工人团体派出了自己的代表。法兰克福帮工代表大会也派一个代表出席了大会。开始討論以后，魏特林立即同这个代表一起提議給法兰克福国民議會呈递一份关于召开一个特殊的工人議會的請願书，当大会並沒有否決这个提案，但又把它推到第二次會議的議程上去时，魏特林就气冲冲地离开了会场。大会选奈斯·馮·埃森貝克和波尔恩担任主席，比斯基和哈姆的測量員施文尼格尔为大会秘书，經過十天討論以后，解决了許多大致在大会发起人所划定的范围之內的提案。总的說来，这些提案是一个五花八門的混合体。代表大会对独立营业权作出詳細的規定，并为这种权利要求資格证明；还有从工資中扣錢买地，然后进行分配的計劃也占了重要地位。大会在一份宣言中要求德国国民議會把大会的決議納入德国人民的基本权利之中，并用国家經費在法兰克福召开工人議會，这个議會将以它的建議协助德国国民議會的国民經济委员会。

比这些理論上的決議更重要的是代表大会为德国工人組織拟定的章程。这个新的同盟定名为“工人結义会”，它設有地方委員

会和行政区委员会，最高組織是中央委员会。在地方委员会中应该有一个地方的各行各业根据会员人数比例选出的代表。这些委员会的任务是定期举行工人集会，代表该地区的工人利益。一个行政区内有或多或少的地方委员会，受行政区委员会领导，行政区委员会由地方委员会代表在每年至少举行一次的行政区大会上选举产生。行政区委员会有责任关怀该行政区工人的利益，并成为中央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之间的桥梁；在行政区委员会中应该设一个特别的部负责女工工作。代表大会暂时确定但澤、科尼斯堡、施泰廷、科倫、比雷菲尔德、法兰克福、汉堡、斯图加特、奥格斯堡、慕尼黑、林茨、維也納、布仁<sup>①</sup>、布拉格、紐倫堡、班堡、耶拿、科堡、馬尔堡、汉諾威、奧斯納布呂克、不倫瑞克、馬格德堡、柏林、布勒斯劳、德累斯頓等为設置行政区委员会的城市，但是地方委员会仍然有权选出其他行政区委员会。行政区委员会之上是中央委员会，会址設萊比錫。中央委员会負責出版同盟的机关报。它受每年至少举行一次的德国工人总会监督，并根据情况改选。代表大会暂时指定波尔恩、基克和施文尼格尔为中央委员会委员，他們三人从10月起就在萊比錫出版同盟的机关报《結义报》。

新的中央委员会以不倦的热情为实现自己的任务而努力，它主要通过阿尔滕堡、萊比錫、汉堡、海德尔堡、紐倫堡和其他地方举行的行政区代表大会，使同盟組織遍布德国很大一部分地区。波尔恩和文克尔布列希在海德尔堡发生了冲突，这个排字工人把这位渊博的教授批駁得这样彻底，以致文克尔布列希在討論了一天以后就动身走了。法兰克福帮工大会所建立的工人协会有的被新同盟吸收了，有的被它排挤了。工人結义会在政治上表現得很

<sup>①</sup> 現名布尔諾，是捷克斯洛伐克第二大城。——譯者

有胆量。由比斯基领导的柏林行政区委员会听候国民议会驱策，以便不仅用言词，而且也用武器反对政变，在柏林市民自卫团少校开会的那天晚上，比斯基本人竭力推动资产阶级的庸人走上街垒。11月，莱比锡的中央委员会也迫切要求行政区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进行武装工人的工作。

工人结义会的社会工作并不是毫无缺点的。它把所有能做到的和不能做到的事情全收在自己的社会纲领里，它要想投入力量的地方越多，它的力量就越分散。它想从工资中扣钱买地，成立工人信贷机构和各种生产联合，此外还采取了一些本末倒置的行动，在无阶级取得政权以前，就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斗争，这一切都产生了失望和损失。可是同盟的机关报在唤醒和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方面起了很大作用。这个报纸编得很好，它用确当的讽刺粉碎了关于资本给大家谋利，关于任何时候都有穷人和富人的名言，以及属于这种资本主义海市蜃楼的话题中的其他东西。它也有效地支持工人的工资斗争，它证明工人有权这样做，并提醒注意移入人口的增加。

在1848年，这种工资斗争是很多的。仅在柏林一地，三月革命后就有几十起。罢工工人得到了许多暂时的成果，但是没有得到持久的成果，这是问题的性质所决定的。他们依靠革命的恐怖所取得的東西，又在反动派扬扬得意的时候被夺走了。某些行业中，由许多临时性罢工产生了一些持久的全国性的组织，而以排字工人和雪茄烟工人中的组织最早也最有力量。排字工人和雪茄烟工人分别创办了工会机关报《古滕堡》<sup>①</sup>和《孔柯迪娅》<sup>②</sup>。资产阶级对于直接威胁利润的工人的工会组织比他们的政治—社会组织更

① 古滕堡(约1400—1468)，德国印刷术的发明人。——译者

② 罗马神话中和谐的女神。——译者

加敌視，它在司法和警察方面找到了自願的助手，这些人如此积极地执行三月革命前的禁止結社令，仿佛4月6日的法令中从来没有保证无限制的結社自由似的。

还没有一个工会組織能够在这种粗暴和非法压迫的力量面前长期坚持下去，但是精神上的胜利永远完整无缺地在工人一边。当工作劳累，工資很低的柏林排字工人要求减少劳动时间和提高工資而罢工时，柏林印刷厂主們宣称，如果工人的要求被接受，价格就要上漲百分之五十，消費量就要减少百分之百。因为这是一个已为百年来无数事实的統計材料所证明的无庸置辯的绝对真理，如果一件劳动产品的价格按算术級数上漲，消費量就按几何級数下降。这些“有学問”的资产者除了发表这种无可名状的謬論以外，还怒气冲冲地提出問題：“我們这些人所从事的行业，实际上是知識的养育者，难道我們应该而且可以拒絕首要的和最高的知識财富嗎？”但是《国民报》說，只有得到政府的許可才可以举行罢工，否則国家就会变成許多不守法律互相斗争的联合，《福斯报》則指控罢工的排字工人是被外国收买的雇佣分子，他們从法国和瑞士拿到了一万四千法郎。因为这家报纸的排字工人每周拿四个到六个塔勒的工資，每天劳动十四到十六小时（包括星期日在內），所以柏林的市民先生很容易认为，只有用骯髒的金錢才能制造出对这样恬靜的劳动环境的不滿。

无产階級工資斗争的領袖，排字工人波尔恩和弗呂利希，雪茄烟工人科尔韦克和施泰祥出色地駁斥了资产階級的愚蠢和利欲所产生的謊言，今天讀到这些还是感到非常愉快。这些工人大多是或者全部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受过鍛炼的无产者。

## 第二章

# 《新萊茵報》

### 一 德国的政策

随着革命的爆发，共产主义者同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目的，从而它本身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它的力量太弱，不能指挥投入革命运动的群众，即使不是这样，它也是多余的，因为现在工人阶级已经有了公开宣传的手段和可能性了。

巴黎革命爆发后，伦敦中央委员会就把它的职权转交给布鲁塞尔总区部。但是总区部的寿命也不长，因为它的盟员有的被比利时政府驱逐出境或逮捕，有的随时随刻有被驱逐和被捕的危险。在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任职的弗洛孔3月1日写信给马克思，请他光荣地回到巴黎去，于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准备去巴黎。布鲁塞尔中央委员会在决定解散时，把“目前一切盟务的中央指导权”转交给马克思，并委托他在巴黎建立一个新的中央委员会。

新中央委员会成立了，马克思、恩格斯、威廉·沃尔弗、鲍威尔、莫尔和沙佩尔当了中央委员。根据《共产党宣言》的精神，新中央委员会把主要注意力集中于德国。在德国，资产阶级革命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胜利的，而是随着已经带有明显的无产阶级

印記的法国革命而胜利的，当然它的性质也就改变了。因此一开始，德国资产阶级的革命热情就受到挫折，于是就更需要推动这个阶级前进，以保障无产阶级建立政治组织所需要的权利，保障结社自由、出版自由以及其他权利，争取这些权利本来是德国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可是它由于害怕无产阶级就暗中想放弃它们。如果共产主义者同盟要想干预群众的革命运动，如果它不想再玩它刚刚停止的宗派主义游戏，那么它就只能作为民主派的激进的一翼走上德国革命的道路，这决不是说它需要设法掩盖自己的最终目标。

所以新中央委员会在一个号召中所提出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sup>①</sup>只限于既符合小农和小资产阶级利益，也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各点。其中最重要的是德国统一为唯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武装人民，发给人民代表薪金，限制继承权、征收高额累进税，取消消费品税，建立国家工场，实行普遍的免费的国民教育，为了穷苦阶级的利益，国家掌握一切运输工具，如铁路、运河、轮船、道路、邮局等。此外还要求把一切矿山、矿井，各邦君主的领地和一切封建地产全部归国家所有，并且还补充了一句说，在这些土地上用最新的科学方法大规模地经营农业，以利于全社会。同样，农民的抵押地也应宣布为国家所有。这些抵押地的利息由农民缴纳给国家。在盛行租佃制的地区，地租和租金也缴纳给国家。

这些要求决不等于共产主义者的纲领，它们还远远落后于《共产党宣言》根据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要求，建议“最先进的国家”采取的措施；它们决没有忽略德国经济的落后性。但是事态的历史发展表明，按当时德国已经达到的经济发展水平来说，这个纲

<sup>①</sup>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5页。

領還提得過早。可是我們也不能說，它是不切實際的、空想的。它不是不切實際的，因為它把有革命熱情的群眾的注意力引上了正確的方向；它也不是空想的，因為它的起草人清楚地知道而且也毫不隱諱，必須經過一系列的革命鬥爭和變革，才能實現這個綱領。他們的錯誤只有一點，就是他們估計在一個雖然很長，但並不間斷的革命過程中就可以實現這個綱領。方向和目標都是正確的，只是把路程估計錯了。

共產主義者同盟毫無顧忌地反對一切宗派遊戲，同樣也毫無顧忌地反對一切革命遊戲。它反對當時在巴黎流亡者中流行的革命義勇軍的躁狂症，這些義勇軍要想從奴役的桎梏中解放自己的祖國。法蘭西共和國臨時政府中的大多數資產者暗中助長這種熱狂；為了擺脫外國工人，他們答應供給這些工人行軍營舍和行軍軍餉，直到法國邊界為止。能言善辯的外交部長拉馬丁還願意做一件別的事情，那就是把義勇軍出賣給他們本國的政府。海爾維格被騙，當了德國義勇軍的領導，要渡過萊茵河向前推進，使德國革命化，可是馬克思在公共集會上不怕激動的群眾的不滿，指出整個冒險行動毫無成功希望。用暴力向德國輸入革命必然給政府充當受到歡迎的稻草人，并把義勇軍本身交給政府軍隊。特別是在維也納和柏林爆發革命以後，這種愚蠢的遊戲甚至失去了前此可能還起一點作用的表面意義。可惜這種兒戲仍然繼續下去，直到遭到馬克思所預言的悲慘結局為止。

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建立德國義勇軍而是建立了一個德國共產主義者聯合會，他們勸告這個聯合會的會員個別地回到德國去，在革命運動中起酵母的作用。弗洛孔給這些工人創造了和義勇軍同樣的有利條件，於是他們有三四百人回到德國，其中有許多是同盟盟員。當他們分布在德國各地的時候，共產主義者同盟也就解

散了，但是在這次解散中，共產主義者同盟表明自己是無產階級解放鬥爭優秀的預備學校。在革命的年代中，凡是工人階級比較明顯地開始發展的地方，都有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盟員起着推動作用，在他們自願地或被迫地適應地方情況，不遵守《共產黨宣言》的原則高度的地方，他們也遠比資產階級人民領袖見多識廣、堅決果斷。他們活動於黑森和拿騷，漢堡、不來梅和漢諾威，柏林、萊比錫和布勒斯勞等地。威廉·沃尔弗在布勒斯勞的鼓動工作取得很大成果，甚至被選為法蘭克福議會的候補議員。但是，共產主義者同盟只能在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前提條件已經具備的地方，開展大規模的革命鼓動，這是事情的性質決定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偕同他們比較親密的幾個朋友啟程赴科倫。民主派（也有一部分共產主義者）準備在科倫出版一個大型報紙。起初這個報紙的創辦人嫉視他們，想把他們趕到柏林去，但是他們決不聽這一套。他們了解柏林的情況，也知道普魯士首都的資產階級是多麼落後。尤其是不用年輕的施略費爾的命運為他們證明，他們也知道在柏林還沒有可靠的出版自由。在柏林進行統治的還是普魯士的國法，政治案件由職業法官審理；在萊茵地區用的是拿破侖法典，政治案件由陪審員審理。一個在某種程度上作為燈塔照亮波濤洶湧的革命海洋的大報只能在萊茵省的首府出版。馬克思和他的朋友們由於有這種正確看法而確立了堅決意志，很快就克服了一切障礙。他們把新報紙掌握到自己手中，唯一的條件是要讓亨利希·畢爾格爾斯參加編輯部。按照股東們的意圖，是想使畢爾格爾斯成為車子上的制動器，但是實際上只成了車子上的第五個輪子。

《新萊茵報》的創刊號於1848年6月1日出版。卡爾·馬克思是該報的總編輯，亨利希·畢爾格爾斯、恩斯特·德朗克、弗里

德里希·恩格斯、格奧爾格·維爾特、斐迪南·沃尔弗和威廉·沃尔弗任編輯。報紙開始出版時只有很少的股金，其中又只有很小一部分是繳付了的，第一篇批評法蘭克福議會只顧空談、而讓自己的權力一個接着一個地失去的論文就使報紙失去了一半股東。

《新萊茵報》自稱是“民主派機關報”，但是它也毫不諱言，它只是為了無產階級的利益推動革命運動前進，才站在運動的實際存在的最先進的一翼上參加運動的。報紙並不追求成為議會中某個左派的機關報的榮譽；它公開宣稱，相反地鑒於組成德國民主派的分子十分複雜，它認為對民主主義者比任何人更加嚴厲地監督，是絕對必需的。報紙的理想不是黑紅黃的共和國，而是在這個共和國中，它才成為真正的反對派。還在它誕生的那個月里，它在一篇充滿火一般的热情的有力的論文<sup>①</sup>中公開了自己的目標，那時對被戰勝的巴黎六月戰士的誹謗像潮水一樣涌來，其中也可以聽到自由派資產階級和民主派小資產階級的聲音。

巴黎工人被擊潰了，但是他們的敵人戰勝了，《新萊茵報》這樣說；暴力取得暫時勝利的代價是：二月革命的一切幻想和空想的破產，法蘭西民族分裂為兩個民族即有產民族和工人民族。這個深淵不能把民主主義者引入迷途，使他們認為爭取國家形式的鬥爭是幻想的、空洞的。資產階級社會條件本身所產生的衝突，必須在鬥爭中加以解決，靠空想是消滅不了的。不掩蓋社會矛盾，不用強制的因而是人為的辦法從表面上制止社會矛盾的國家形式才是最好的國家形式。能使這些矛盾進行自由鬥爭，從而獲得解決的國家形式才是最好的國家形式。但是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中，民主派應該何去何從呢？這篇論文極有力量地說

<sup>①</sup> 指馬克思寫的《六月革命》一文，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3—157頁。——譯者

道：“有人問，难道我們对那些在人民的憤怒面前牺牲的人，对国民自卫軍，对別动队，对共和国近卫軍，对現役軍人不流一滴眼泪，不叹一口气，不发一言嗎？国家将关怀他們的孤儿寡妇，法令将頌揚他們，隆重的殯仪将送他們的遗体入土，官方的报刊将宣布他們永垂不朽，欧洲的反动派将从东方到西方到处贊揚他們。但是平民則受尽飢餓的折磨，遭到报刊的誣蔑，得不到医生的帮助，被‘正直的人’叫做小偷、纵火者和流刑犯；他們的妻子儿女更是貧困不堪，他們的那些幸免于难的优秀代表被放逐海外。給这些臉色严峻阴沉的人戴上桂冠，是一种特权，是民主报刊的权利。”<sup>①</sup>馬克思写的这篇論文，真正革命热情的不朽的紀念碑，使《新萊茵报》失去了最后剩下的一部分股东。

这时《新萊茵报》已經在群众中站稳了脚跟。它具有两个特点，是德国其他报纸望尘莫及的，这两个特点都很少見，而它們的协调一致却更少見。它把对事物的历史联系的深刻了解（但是这种了解从沒有变成无益的靜观）同大胆的行动欲望（但是这种欲望从沒有分化为幻想）結合在一起。它不奉承君主，也不奉承民族。它无情地鞭撻还存在于德国人身上的旧的奴隶习性，但是它也煽起任何能够成为清除德国貧困的腐烂垃圾的火焰的革命火花。对于那种“温情”，它除了譏諷就是嘲笑，因为这种“温情”只是粉飾軟弱无力的小市民的怠惰的一个名詞。它把德国人当作賤民（用維尔特的話來說）对待，但是在任何地方也沒有像在它的各栏中，这样坚定而明确地卫护德国未来的偉大利益，甚至資產階級从自己的立場出发，除了听从这个报纸的劝諭和警告而外，也沒有更好的办法。

<sup>①</sup>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7頁。

《新萊茵報》及時地對康普豪森內閣說，內閣根據大資產階級的精神播種了反動的種子，而根據封建政黨的精神收穫了反動的果實。報紙認為，如果漢澤曼內閣同舊的封建—警察國家妥協，要想建立資產階級的統治，是決不會達到目的的。資產階級如不暫時同全體人民結成同盟，如不或多或少地表示民主的態度，它就不可能建立自己的統治；如果還同專制制度、封建主義、容克階級、軍隊和官僚統治進行鬥爭的資產階級已經想排斥、壓迫和拋棄人民，行動內閣就一定要垮台。報紙對柏林議會的辯論進行了尖銳的批判。它力圖使左派放棄兩面政策，使左派了解，只要左派能夠掌握一切重要權位，舊勢力就願意交給它一個小小的議會勝利和龐大的憲法草案。左派將來就會知道，它的議會勝利同它的真正失敗是一回事。這個預言絕大部分都實現了。

《新萊茵報》最尖銳地諷刺了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議會新貴自鳴得意的雄辯。它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在法蘭克福議會比在柏林議會中更為嚴重的“議會迷”的病症。當然它也不會喜歡加格恩派的普魯士化計劃；好日子已經過去了，在這些日子裡，邦聯議會的四分五裂的德國把普遍使用普魯士官僚政治的緊身衣看作是最後的團結手段。總的說來，普魯士神話受到極大的輕蔑。襲擊柏林軍械庫事件中，當舊旗幟和尖頂盔這些破爛道具已被毀壞，愛國者大為悲痛的時候，報紙贊揚柏林人民的十分正確的行動，柏林人民首次不僅以革命的姿態反對他們的壓迫者，而且也反對他們自己過去的美麗幻想；德國人在革命中必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同他們不光彩的過去斷絕一切關係。

但是《新萊茵報》也尖銳批評法蘭克福左派所主張的聯邦共和主義。以共和政府為首的君主立憲國、小公國和小共和國的聯邦不能成為德國的最終國家組織。“我們並不提出空想的要求，要

a priori〔預先〕宣布統一的、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国，但是我們要求所謂的激进民主党不要把斗争和革命运动的出发点同它們的最終目的混淆起来。德国的統一以及德国的宪法只能通过这样一种运动来实现，这种运动的决定因素将是国内的冲突或对东方〔梅林的引文是“俄国”〕的战争。国家制度的最終确立不能依靠頒布命令的办法，而要在我們即将进行的运动中实现。因此，問題不在于实现这个或那个意見，这种或那种政治思想；問題在于理解发展的进程。国民議會只應該采取一些在最近期間切实可行的步驟。”<sup>①</sup>想把北美联邦国家作为德国宪法的藍本是再糊塗不过的了。“北美合众国所占的面积等于整个文明的欧洲，更不必說它的各个州都具有同样的政治結構。只有欧洲联邦才会同合众国相似。但是，为了使德国和其他国家結成联邦，它自己首先就應該成为統一的国家。在德国，中央集权制和联邦制的斗争就是近代文明和封建主义的斗争。正当一些大的君主国家在西方形成的时候，德国陷入到資產階級化的封建主义里去了，而正当世界市場为西欧开放的时候，德国又被排挤出世界市場了。这些国家富裕起来了，德国却貧穷下去。这些国家出現了許多大城市，德国却变成了农民国家。即使俄罗斯不来敲德国的大門，經濟关系本身也会迫使德国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制。即使从純資產階級的观点看来，德国牢不可破的統一也是摆脱它目前的貧困和創造国家財富的首要条件。在这种分裂为三十九个小邦的領土上，究竟怎样解决現代的社会任务呢？”<sup>②</sup>从这段文章中，我們立即可以看到，馬克思和恩格斯是怎样理解“持續革命”的，有人却說他們用这种“持續革命”造成普遍的混乱。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7頁。

② 同上书第47—48頁。

《新萊茵報》反對愛國主義的“結束革命”，這既符合資產階級利益也符合無產階級利益。

## 二 歐洲的政策

民主派從來就沒有很好地研究外交政策。而《新萊茵報》的一個優點（並非最後一個優點）卻是對外交政策有明確而深刻的了解。它一時一刻也沒有忽略德國狀況同歐洲狀況的關聯。它不用自由、平等、博愛、正義這些空洞的詞藻來評論德國的黨派鬥爭和歐洲的民族鬥爭。

在它看來，主要着眼點永遠是各個民族所達到的文化水平和文明階段以及它們在當代革命鬥爭中所採取的立場。它向德國人民展現了一幅可恥的圖畫，七十多年來，也就是從美國獨立戰爭和法國革命戰爭到對意大利和波蘭最近起義的鎮壓，德國人民的兒子都充當了屠殺革命人民的劊子手。報紙宣稱：“現在，當德國人在拋棄自己身上的羈絆的時候，也應當改變一下他們對其他民族的全部政策。不然的話，我們的年輕的、几乎是剛剛預感到的自由就會被束縛在我們用來束縛別國民族的鎖鏈上。德國將來自由的程度要看它給予毗鄰民族的自由的多少而定。”<sup>①</sup>但是報紙把用自主的力量爭取獨立的有生命力的大民族同為了實際上阻礙或者被人用來阻礙最進步國家的革命發展，而用民主口號進行反抗的落后的小民族嚴格區分開來。

它要求意大利歸意大利人，波蘭歸波蘭人，匈牙利歸匈牙利人，但是它反對泛斯拉夫運動，因為這種運動不是空洞的幻想就是

---

<sup>①</sup>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78頁。

俄国的皮鞭。它譴責用殘酷暴力鎮壓意大利和波蘭起義的奧地利和普魯士政府的馬基雅弗利主義者的政策，“它在德國國內的基礎已經動搖，就力圖麻痺民主力量，轉移人們的視線，把革命的狂濤巨浪引向另一方面，製造對國內進行壓迫的武器；為了這種目的，它挑起了自私自利的、與德國人的世界主義性格相反的对其他民族的仇恨……”<sup>①</sup>但是報紙也維護德國為了什列斯維希—霍爾斯坦同丹麥進行戰爭的歷史權利。

報紙首先要求對俄國進行革命戰爭。“只有反對俄國的戰爭才是革命的德國的戰爭，只有在這個戰爭中它才能消除以往的罪過，才能鞏固起來並戰勝自己的專制君主，只有在這個戰爭中它才能像那些要擺脫長期的奴隸枷鎖的人民所應該做的那樣，用自己子弟的鮮血來換取宣傳文明的權利，並且在解放國外各民族的同時使自己在國內獲得解放。”<sup>②</sup>報紙不厭其煩地指出沙皇專制政權對德國革命的威脅。它預見到維拉戈什<sup>③</sup>和華沙的日子，它在1848年6月就大聲疾呼：沙皇站在托恩<sup>④</sup>的門口，仿佛它這時就讀過了三十年後才發表的回憶錄，這個回憶錄中說到，當時尼古拉皇帝建議普魯士親王借俄國軍隊之助，用暴力恢復三月革命前的專制政權。

同對俄戰爭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的是波蘭復國的問題。從歐洲革命的利益來看，這是一個必須解決的問題。不削弱俄國巨人，歐洲革命就不能發生作用，而歐洲革命只有用波蘭起義為動力才能削弱這個巨人。由此可以說明，為什麼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和四十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35頁。

② 同上書第235—236頁。

③ 匈牙利的一個大鎮。1849年8月13日匈牙利軍隊在此向鎮壓匈牙利革命的俄軍投降。——譯者

④ 波蘭稱作托龍尼，維斯拉河右岸城市，重要鐵道樞紐、港口。——譯者

年代在西歐，大家都非常重視波蘭問題。在德國，人們對波蘭問題的重視，決不像俾斯麥和時髦的帝國愛國主義者所嘲笑的那樣，是浪漫主義的情緒和媚外的熱情；這種情況是由一種非常冷靜的實際政策產生的。只要沙皇可以扮演德國王侯的監護人的角色，這種政策的正當性和正確性就是無庸置疑的。用另一種方式要求德國的統一和自由的人，也就需要有一個獨立自主的波蘭。甚至在其他一切問題上表現得軟弱無力的預備議會也沒有能夠迴避這個必然的邏輯。它宣稱瓜分波蘭是“可恥的不正當行為”，恢復波蘭是德國人民的“神聖義務”。

“只要我們……幫助壓迫波蘭，只要我們還把波蘭的一部分拴在德國身上，我們自己就仍然要受俄國和俄國政策的束縛，我們在國內就不能……擺脫宗法封建的專制政體。”<sup>①</sup> 在短短的這幾句話里，《新萊茵報》總括了德國革命在波蘭問題上應該採取的政策。反革命的政策，即普魯士國王和容克地主的政策最有力地證明了這種見解的正確性。反革命最害怕同俄國決裂，因此它盡一切力量把普魯士分到的波蘭領土拴在已經由3月18日宣告但還沒有建立的新德國的身上。誠然，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三月革命中第一次受驚的時候，曾經答應波森省進行“民族改組”，這個省的波蘭居民用各種方式表明，他們已經準備同革命的德國並肩對俄國作戰。但是事實不久表明，那種諾言只是在恐懼的壓力下才說出來的。波森省的普魯士文武官僚煽動德國人和猶太人反對波蘭人；他們發動了一個內戰，雖然他們沒有以軍人的英勇、但卻用汪達爾人<sup>②</sup>的破壞進行了這一內戰。普魯士軍隊在公開的戰場上一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91頁。

② 居于波羅的海的一個民族。公元455年曾侵入和洗劫羅馬，破壞文物。——譯者

次又一次地遭到可耻的失败，但是它终于依靠兵力上的优势和较好的装备取得了胜利。波兰的镰刀敌不过普鲁士的榴霰弹。但是康普豪森内阁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力量和勇气维护资产阶级革命的权利；它在4月和5月，通过快要咽气的邦联议会把波森省的大片领土（共占总面积的三分之二以上）并入德意志邦联，据说，因为那里居住的主要是德国人。

现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必须决定，波森省这一部分地区所选的十二名议员是否有议员资格呢？经过三天辩论之后，国民议会在7月27日作出肯定的决定，这样一来，从德国革命的意义上说，波兰问题就不容易解决了。预备议会曾经宣称瓜分波兰是一种“可耻的不正当行为”，现在它自己又认可这一行为。《新莱茵报》对这次辩论比对法兰克福议会的其他任何辩论都更详细地进行了批判，这是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反对俄国的革命战争的极大重视相适应的。他们关于这一方面的论文虽然还不免有历史错误，但仍然是论述当时波兰问题的最好的德文论文。他们基本上是按照像列列韦尔和梅洛斯拉夫斯基那样的波兰历史家和政治家的看法来看波兰历史的，这些人认为波兰民族对外的独立只有同国内的土地—民主革命最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才能实现。这个观点本身是正确的，而在持这种观点的波兰爱国者那里，愿望乃是思想之父。他们承认波兰贵族地主为了拯救自己的国家免于灭亡的改革尝试，尤其是1791年波兰宪法的价值，主要是从它们的意图考虑，而不是从它们的作用考虑。1848年8月，《新莱茵报》说，贵族民主制的波兰早已死亡了并被埋葬了，但是它生了一个强壮的儿子——这个儿子就是农民民主制的波兰<sup>①</sup>，这是那些阶层的骗人的回声。

<sup>①</sup>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08页。

毫無疑問，報紙認為德國向波蘭移民會產生有害的後果。事實上這種後果沒有產生，因為移民不是不斷進行的。《新萊茵報》論波蘭問題的文章中說：“在中世紀帝國城市的小市民中、在蕭條的商隊的國內貿易中、在有限的海上貿易中以及在十四世紀和十五世紀的行會手工業中達到空前繁榮的德國人，表現了自己有成為世界歷史上的小市民的才幹，而且直到今天在整個東歐和北歐，甚至美洲，他們仍然是小資產階級的核心。在彼得堡、莫斯科、華沙和克拉柯夫，在斯德哥爾摩和哥本哈根，在佩斯、敖德薩和雅西，在紐約和費拉得爾菲亞，手工業者、小商人和小搨客大部分（往往是極大部分）是由德國人或祖籍是德國的人組成的。在所有這些城市里，都有純粹講德語的街區，而其中有些城市（如佩斯），差不多全是德國人。”<sup>①</sup> 這段文章顯示出馬克思經常用來理解偉大歷史關聯的敏銳眼光。不過正是在波蘭，雖然在十二世紀和十三世紀，王侯、貴族和僧侶迫使德國移民遷回國內，但是後來從十五世紀起事情就變得完全相反了；波蘭貴族地主為了被他們壟斷的糧食貿易的利益，用暴力破壞了城市發展的開端，以致德國移民只好回到祖國去。德國移民並沒有像《新萊茵報》責難他們的那樣，妨礙波蘭城市的建立；他們沒有以自己獨特的語言，以自己和波蘭居民的疏遠，以自己成千上萬種特權和城市法規，妨礙了中央集權這個使一切國家迅速發展的最有力的政治手段的實現。同時指責他們沒有掌握大資本，不善于從事大工業，沒有控制廣泛的貿易關係，也是不確當的。如果說，《新萊茵報》有理由把缺乏任何城市發展看做波蘭衰亡的真正原因，那麼這個責任只應該由波蘭的貴族地主階級來負。

<sup>①</sup>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73頁。

該报对普魯士历史学家施滕策尔在法兰克福議會关于普魯士王室和容克階級瓜分波兰以后，給波兰带去的所謂文化和文明所发表的一套謬論进行的批判却公正得多。在这种对于每个普魯士历史学家都應該知道的历史事实的有意歪曲面前，《新萊茵报》断言，瓜分波兰不仅在国家法的意义上，而且在私法的意义上也是一种搶劫。它十分确切地叙述了普魯士王室和容克地主在1796年第三次瓜分波兰以后，对波兰官方的領地和教会的領地进行的大規模掠夺，这种掠夺在1830年和1846年的波兰起义以后仍以稍稍不同的形式重复进行。报纸也一針見血地指出，对波兰的非法掠夺是神圣同盟的真正結合剂，虽然报纸也把波兰的压迫者对土地革命的恐惧，說得比在柏林、維也納和彼得堡所有的和需要有的恐惧大了一些。

《新萊茵报》也合情合理地嘲笑了施滕策尔对德意志—犹太居民的粉飾，这些居民在普魯士鷹的庇护下聚居波森省，而現在却被人煽动反对波兰人，他們想当現代文明的开路先鋒，不过与其說是怀着英勇的热情，不如說是怀着內疚的恐惧。尤其是报纸用辛辣的語言，駁斥了施滕策尔妄想把波兰的犹太人看做是热爱德意志祖国的人。“波兰的犹太人最近在德国所博得的出乎意料的同情和承认，在这里被正式表达出来了。凡是萊比錫市場的势力（投机、吝啬和腐敗的最充分的体现）所及的地方，那里被侮辱的人突然成了德国同胞；正直的米歇尔<sup>①</sup>含着喜悅的眼泪紧紧拥抱他們，而施滕策尔先生則代表德意志民族妄想把他們看做今后願意成为德国人的德国人。为什么波兰的犹太人不能成为真正的德国人呢？难道他們‘和他們的孩子在家里’不是‘从小’就讲德語的嗎？还要讲什

① 德国人的綽号，有“蠢直人”的意思。——譯者

么样的德語呵！但是，我們要請施滕策尔先生注意，他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取得整个欧洲和半个美洲，甚至一部分亚洲。大家都知道，德語是全世界犹太人的語言。在紐約和君士坦丁堡，在彼得堡和巴黎，‘犹太人和他們的孩子在家里从小就讲德語’，其中一部分人讲的德語要比‘涅茨同胞’的‘同种族的’同盟者——波茲南<sup>①</sup>犹太人所讲的更为正确。”<sup>②</sup>

正如1848年的事态表明，波兰問題的核心始終是，波兰民族的存在对其他任何民族都沒有对德意志民族这样必要。革命的德国和波兰共同对俄国作战，是粉碎德国和波兰的封建主义的最可靠的手段。不过报纸由于革命的胆量，由于过高估計了农民民主制的波兰而低估了德波同盟所面临的困难，比如它写道：“不言而喻，問題不是要建立一个虛幻的波兰，而是要建立一个有生命力基础的国家。波兰至少應該拥有1772年时代的領土，它不仅應該管轄本国各大河流經過的地区，而且應該管轄各大河流的出口地带以及广大的沿海地带，至少是波罗的海沿岸地带。如果德国在革命以后，为了自己的利益，有勇气拿起武器去要求俄国放弃波兰，它就可以保证波兰实现上述一切，同时也就保卫了自己的利益和荣誉。至于德国居民和波兰居民在边境地区特别是沿海一带杂居的問題，双方應該互相作某种让步；某些德国人会成为波兰人，而某些波兰人也会成为德国人，这是不言而喻的，也是不会有什么困难的。”<sup>③</sup>但是这个可能同时产生的高尚錯誤使得报纸有更大理山嘲笑沒有勇气采取这样坚决行动的不彻底的德国革命。“发表一些关于解放波兰的华而不实的演說，在火車站上欢迎来往的波

① 普魯士称为“波森”。——譯者

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76—377頁。

③ 同上书第391—392頁。

兰人并对他们表示德国人民最热烈的同情（有谁没有被这种同情纠缠过呢？），——这就是我们能够做的事情；至于同俄国开战，使整个欧洲的均势受到威胁，最后，退还掠夺来的某一小块土地，——如果期望做这些事情，那就是太不了解我们德国人了！”<sup>①</sup>《新莱茵报》再一次宣称，对俄国作战就是真正同德国过去可耻的一切进行彻底的公开的决裂，就是真正解放和统一德国，也是在斯拉夫邻邦特别是对波兰的关系上挽救德国的荣誉和利益的唯一可能的办法。

正如对波兰人作了公正的评价那样，《新莱茵报》对匈牙利人也作了公正的评价，甚至还做得有点过分。它把在整个奥地利发生混乱冲突的各民族分成两大阵营：德国人、波兰人和马扎尔人站在革命方面，罗马尼亚人、西本彪根<sup>②</sup>的萨克森人和除了波兰人以外的一切斯拉夫人则站在反革命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划分呢？《新莱茵报》对这个问题回答说：根据这些民族过去的全部历史。撇开不属于本来的旧奥地利的波兰人不谈，从中世纪起德国人和马扎尔人在多瑙河地区掌握了历史的主动性。没有德国人和马扎尔人的帮助，一切——同波兰人和俄罗斯人相反——所谓南方斯拉夫人就会像在一部分斯拉夫人中确实已经发生的情况那样变成土耳其人。对奥地利的南方斯拉夫人说来，这是一个伟大的功绩，值得为此把自己的族别改成德意志民族或马扎尔民族以资酬劳。

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土耳其人的入侵，是八世纪阿拉伯人入侵的再版。在维也纳城下和匈牙利平原上，不止一次地重演了查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92页。

② 罗马尼亚西部地区名，罗马尼亚称为“特兰西瓦尼亚”。——译者

理·馬特的勝利<sup>①</sup>。就像當年在普瓦提埃附近一樣，現在危險又威脅着整個歐洲的發展。當問題涉及拯救歐洲發展的時候，像奧地利的斯拉夫人這樣幾個早就分崩離析和衰弱了的民族能起什麼作用呢？內部情況是和外部情況相適應的。推動的階級，歷史運動的代表者，即資產階級到處都是德國的或馬扎爾的資產階級。南方斯拉夫人只在某些地方形成民族資產階級。由於有了資產階級，德國人或馬扎爾人便掌握了工業，掌握了資本，德國的文化也發展起來了；在精神方面，斯拉夫人也首先受德國人支配，其次受馬扎爾人支配。所以說德國人和馬扎爾人在奧地利國家中是革命的，因為他們是文化和文明的代表者。奧地利的斯拉夫人為了反對他們就在一個特殊的聯盟中，在泛斯拉夫主義中聯合起來。泛斯拉夫主義不是產生在波蘭和俄國，而是產生在布拉格和阿格拉姆，它有意識地反對革命前進的德國人和馬扎爾人，因此一開始就是反動的。

《新萊茵報》把馬扎爾人爭取自由的戰爭同革命的法國反對反動的歐洲的鬥爭相比。“敵人的優勢的確大得驚人。整個奧地利，首先是一千六百萬狂熱的斯拉夫人，反對四百萬馬扎爾人。群眾性的起義，全國都來製造武器，發行紙幣，迅速鎮壓一切阻礙革命運動的人，不斷革命——總而言之，在被科蘇特所武裝、組織和鼓舞的匈牙利，我們重新看到了光榮的1793年的一切基本特徵。”<sup>②</sup>與此相反，報紙也指出了泛斯拉夫主義的不可救藥的反動性。“泛斯拉夫主義的直接目的，是要建立一個由俄國統治的從厄爾士山脈和喀爾巴阡山脈直到黑海、愛琴海和亞得利亞海的斯拉夫國家。

① 指公元732年，法蘭克王國的宮相查理·馬特在普瓦提埃（法國西部的城市）附近對阿拉伯人的勝利。——譯者

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93—194頁。

在这个国家里，除了德語、意大利語、馬扎尔語、瓦拉几亞語、土耳其語、希臘語和阿尔巴尼亞語以外，还要包括将近一打斯拉夫語和主要方言。这一切不是用直到現在把奥地利联合在一起并促进了它的发展的那些因素联合起来的，而是用斯拉夫民族特征的抽象性质和所謂的斯拉夫語（当然这是大多数居民的共同語）联合起来的。但是，要不是在某些思想家的头脑里，哪里会存在这种斯拉夫的民族特征呢？要不是在帕拉茨基先生、盖伊先生及其同僚的幻想中以及部分地在已經沒有任何一个斯拉夫人能够了解的俄国教堂的古斯拉夫祈禱仪式中，哪里会存在什么‘斯拉夫語’呢？事实上，所有这些民族都处在文明发展的极不相同的阶段上，从波希米亚的相当发达的（多亏德国人）现代工业和文化，直到克罗地亚人和保加利亚人的几乎是游牧性质的野蛮状态；所以，事实上所有这些民族的利益是极为对立的。事实上，这十个至十二个民族的斯拉夫語，是由同样数目的方言組成的，这些方言大部分互不相通，甚至可以归为不同的几大类（捷克語、伊利里亞語和塞爾維亞-保加利亞語）。由于这些民族十分輕視文学……这些方言已变成了真正的民間土話，除了少数例外情形，这些方言都以某种異族的，即非斯拉夫的語言作为自己的标准語。”<sup>①</sup>《新萊茵報》正是根据这些得出結論說，泛斯拉夫主义的統一，不是純粹的幻想，就是俄国的皮鞭。

它进一步研究了泛斯拉夫主义的民主变种，这种民主变种1848年6月在布拉格斯拉夫人代表大会上喧嚣一时。巴枯宁在一篇对斯拉夫人的号召中提出了这种漂亮主張。《新萊茵報》首先认为对斯拉夫人代表大会的民主主义者來說，政治上的幻想和溫情是可以原諒的。“除了波兰人以外（由于很明显的原由，波兰人不

<sup>①</sup>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01頁。

是泛斯拉夫主義者)，這些人全都屬於這樣的民族，這些民族或者像南方斯拉夫人一樣，由於其全部歷史狀況必然是反革命的民族，或者像俄羅斯人一樣，距離革命還很遠，因此它們至少在目前還是反革命的。這些由於在國外所受的教育而具有民主主義情緒的派別，企圖把自己的民主主義觀點同自己的民族感情調和起來，大家知道，這種感情在斯拉夫人身上表現得非常強烈；因為現實世界，他們本國的实际狀況不能為這種調和提供任何根據，或者只能提供一些假想的根據，所以除了彼岸的‘夢想的空中王國’、美好願望的世界，幻想的政治以外，他們就一無所有了。如果克羅地亞人、潘都爾兵和哥薩克人是歐洲民主的先鋒隊，如果西伯利亞共和國大使在巴黎呈遞國書，那該多好啊！當然，這是美妙的前景；但是，就連最激烈的泛斯拉夫主義者也不要求歐洲民主必須等待這種前景的實現，目前恰好正是宣言專門為其要求獨立的那些民族，是民主的特別凶惡的敵人。我們重復一遍，除了波蘭人、俄羅斯人——尤其量還有土耳其的斯拉夫人——以外，沒有一個斯拉夫民族是有前途的，原因很簡單：其他一切斯拉夫人都沒有具備為獨立和維持生命力所必需的历史、地理、政治和工業的條件。”<sup>①</sup>

《新萊茵報》利用廣泛的歷史事實論證了這一見解。它進一步強調指出，斯拉夫人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沒有認真地參加 1848 年的革命運動。“只要大胆地進行一次民主革命的嘗試，縱然遭到失敗，也可以使各族人民忘却他們許多世紀的耻辱和怯懦，也可以使一個即使是深受鄙視的民族的名譽馬上得到恢復。德國人……已經有過這種體驗。但是當法國人、德國人、意大利人、波蘭人和馬扎

<sup>①</sup>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327—328 頁。毫無疑問，歷史發展和恩格斯本人已經糾正了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南方斯拉夫人沒有政治前途的這一觀點。參考梅林在本章第四節發表的意見。——原編者

尔人举起革命旗帜的时候，斯拉夫人却像一个人一样全都站到反革命的旗帜下面了。走在前面的是很久以来一直对马扎尔人坚持其反革命的分离主义打算的南方斯拉夫人，其次是捷克人，他们后面是武装起来的、准备在决定关头投入战斗的俄国人。”<sup>①</sup>

报纸用下面的话结束了这两篇雄辩的论文：“我们现在知道，革命的敌人集中在什么地方：他们集中在俄国和奥地利的斯拉夫地区；无论什么花言巧语或关于这些国家的渺茫的民主未来的指示，都不能阻止我们把我们的敌人当作敌人亲对待。如果巴枯宁最后还要叫喊：‘的确，斯拉夫人不应该丧失任何东西，而应该得胜！的确，他应该生存下去！而且我们将会生存下去。只要有人对我们的哪怕是最小一部分权利提出异议，只要我们共同机体上的一个器官还同我们分开或者同我们脱离，我们就将斗争到底，我们将无情地进行殊死的斗争，直到斯拉夫民族终于成为伟大的、自由的和独立的民族为止’，——如果革命的泛斯拉夫主义认真地接受这些话，并在凡是涉及虚构的斯拉夫民族特性的地方都放棄革命，那末我们也就知道我们该怎么办了。那时候就要斗争，对出卖革命的斯拉夫民族‘无情地进行殊死的斗争’，进行歼灭战，实行无情的恐怖主义——而这样做不是为了德国的利益，而是为了革命的利益！”<sup>②</sup> 有一位热心的教授就根据这几句话指控《新莱茵报》要求消灭俄罗斯、捷克和克罗地亚民族。

在什列斯維希—霍尔斯坦爭端上，报纸主張坚决和丹麦作战，但这和举杯歌頌被海洋环绕的什列斯維希—霍尔斯坦的资产阶级热情毫无共同之处。德国对丹麦作战的权利是文明对于野蛮的权利，进步对于停滞的权利。即使（很值得怀疑）协定对丹麦有利，但

<sup>①</sup>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36頁。

<sup>②</sup> 同上书第342頁。

是这个权利超过了一切协定，因为这是历史发展的权利。“丹麦人民無論在貿易、工业、政治和文学等方面都处于絕對依賴德国的地位。大家知道，丹麦的京城实际上不是哥本哈根，而是汉堡……丹麦从德国获得全部文学資料，正如获得物质資料一样，因此丹麦文学(除了霍尔堡以外)实际上是德国文学拙劣的翻版。尽管德国从来軟弱无力，但是它能感到滿意的是：斯堪的那維亞的各个民族(包括丹麦在內)毕竟要仰它的鼻息，它和这些民族比較起来甚至还算是革命的和先进的国家哩。”<sup>①</sup> 斯堪的那維亞主义是丹麦人向挪威人和瑞典人求援反对德国的形式。“斯堪的那維亞主义的含义是：歌頌殘酷、粗暴和海盜式的古諾曼人的性格，即极端的閉关自守状态，在这种閉关自守的状态下，表达丰富的思想和感情的不是語言而是行动，即粗暴地对待妇女、經常酗酒和瘋狂好战，而又多愁善感。”<sup>②</sup> 德国对丹麦的战争是一次真正的革命战争，对德国來說，够悲慘的是，它的第一次革命战争乃是历来战争中最滑稽的战争！

欧洲三个最反动的强国：俄国、英国和普魯士政府一开始就站在丹麦一边。这三个强国最害怕德国的革命和革命的最直接的结果——德国的統一。“普魯士怕德国統一以后自己不能再存在，英国怕因此不能再剝削德国的市場，俄国怕因此民主制不仅会推广到維斯拉河，甚至会推广到德維納和德涅泊河。所以普魯士、英国和俄国共同密謀反对什列斯維希—霍尔斯坦，反对德国和反对革命。”<sup>③</sup> 在馬尔摩停战的日子里，《新萊茵報》要求法兰克福議會决定进行战争。“这将是反对三个反动强国的战争，无精打采的德国运动正需要这种战争，这场战争将真正使普魯士和德国溶为一体，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64頁。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467頁。

将使德国绝对需要和波兰结成联盟，将立刻使意大利获得解放，这场战争将要反对的恰恰是德国在1792—1815年的旧的反革命同盟者，它将使‘祖国遭到危险’并从而拯救祖国，因为德国在这场战争中的胜利将以民主制的胜利为转移。”<sup>①</sup>当然报纸也毫不隐讳，进行这一战争，德国国民议会就要垮台。“让法兰克福的资产者和容克地主对此不要抱任何幻想：如果他们决定反对休战协定，他们就注定要垮台，就像在第一次革命时期吉伦特派参加了8月10日事件并赞成把以前的国王处以死刑从而使自己在5月31日垮台一模一样。相反地，如果他们同意所提出的休战协定，他们也注定要垮台，因为他们将受普鲁士的控制，他们的下场将是如此。何去何从，让他们自己选择吧……过些时候就会见分晓！但是我们再重复一遍：德国的荣誉操在坏人的手中！”<sup>②</sup>它是操在坏人手中。

《新莱茵报》正确地预言，巴黎的六月战斗，法国资产阶级对法国无产阶级的血腥镇压，一方面意味着对那些用英勇的解放斗争回答高卢雄鸡叫声的民族的新的压制，另一方面意味着欧洲各国曾经一度同人民联合起来，用反对封建主义的武装起义回答高卢雄鸡的叫声的中等阶级的失败。《新莱茵报》在1848年底说：沙皇目前在欧洲处处出头露面。匈牙利虽然还没有屈服，但是《新莱茵报》知道，欧洲革命不是由东向西，而是由西向东移动。不管匈牙利革命取得多少次胜利，但是报纸说，如果这次起义得不到法国革命起义的支持，它也必然失败。《新莱茵报》在瞻望1849年这新的一年年的时候，只是提出了一个欧洲解放的口号：打倒法国资产阶级，争取法国工人阶级的胜利，争取整个工人阶级的解放。

报纸一刻也没有忽略，英国——按照通俗的理解是“自由的避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67—468页。

② 同上书第468页。

难所”——在革命斗争中采取什么态度。“……英国这个把许多民族变成自己的雇佣工人，并用自己的巨手来扼制整个世界，并且一度担负欧洲复辟费用的国家，这个在自己内部阶级矛盾发展得最尖锐最明显的国家，好像是一座使革命巨浪撞得浪花四溅的岩石，它想用饥饿来扼杀还在母腹中的新社会。英国统治着世界市场。欧洲大陆的任何一个国家甚至整个欧洲大陆在经济方面的变革，如果没有英国参与，都不过是杯水风浪。”<sup>①</sup> 欧洲的解放——不管是各被压迫民族争得独立，还是封建专制政体被推翻，都取决于法国工人阶级胜利的起义，但是法国的任何一种社会变革都必然遭到大不列颠在工业和贸易上的世界霸权的破坏。

不过法国胜利的工人革命的第一个后果是世界大战。“而旧英国只有世界大战才能摧毁，只有世界大战才能给宪章派这个英国工人的有组织的政党提供条件，来进行胜利起义以反对它的强大的压迫者。只有当宪章派成了英国政府的首脑的时候，社会革命才会由空想的领域进入现实的领域。”<sup>②</sup> 法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起义，世界大战——《新莱茵报》就这样总括了 1849 年的主要内容。

它过高估计了法国无产阶级在严重的六月流血事件以后所剩下的力量。经过几年乃至几十年，这个阶级才能重新站立起来。因此更加肯定，欧洲的解放暂时是不可能的。俄国熊用它没有折断的爪镇压了匈牙利革命，沙皇在欧洲处处出头露面。

### 三 莱茵省的鼓动

法兰克福和柏林的九月危机——在法兰克福批准了马尔摩停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6 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174—175 页。

② 同上书第 175 页。

战协定，在柏林推翻了汉澤曼內閣——引起科倫的一場災難。

对柏林的反革命說來，萊茵省的举止行动是压在它心上的最沉重的石头。三月革命前，政府就派了大多从东部地区征来的大批軍隊駐扎在西部各省。在萊茵省及其五个要塞，在威斯特伐里亚、美因茲、卢森堡，駐扎的軍隊約占全部普魯士軍隊的三分之一，即四十五个步兵团中的十四个步兵团以及相应的騎兵和炮兵。这些部队布置成一个大的弧形，从科倫和波恩經科布伦茨和特利尔直到法国和卢森堡边境。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对付科倫。6月間炮台被装备起来，軍隊从市內开入炮台，帶了一星期的粮食和实彈药筒。这种装备进行得越热烈，人們就越注意到，这些炮台斜堤上的树木原封未动，如果这种軍备是用来对付外敌的，那么这种做法就无法解釋。但是，如果軍备是用来对付科倫本身的，沒有砍伐的树木就使得架設在城牆上的大炮无法轰击炮台，而炮台却可以毫无阻碍地用炸彈和榴彈越过树木轰击城市。

由于这种奇怪的軍备，6月28日德斯特尔在柏林議會会質問汉澤曼內閣，可是从陸軍大臣罗特·馮·施萊根施坦那里只得到了傲慢的回答：为了使祖国不致瀕于危險，所有边境要塞都要加强戒备，至于應該如何做，只有軍事当局了解。西里西亚来的一个左派議員立即肯定这种說法不符合实际情况。他指出，西里西亚对东方的最重要的要塞和大武器庫（有步槍制造厂、大炮鑄造厂和炮兵工厂以及两个国家彈药厂中的一个厂）尼斯，就根本沒有加强对付外来侵略的戒备；这个边境要塞只有六門馬拉火炮，炮兵缺一千一百五十四馬，架桥輜重缺少二百四十四馬等等。內閣也不能反駁这一点；奥尔斯瓦特首相甚至承认了这个事实，因为他在爱国主义的启发下抱怨說，公开这些詳情細节会使国家利益受到損害。

虽然沙皇的战争威胁既可信又明显，可是政府在东部边境却

不加防禦，相反地，雖然法國資產階級的和平保證既可信又明顯，政府卻把西部邊境武裝到牙齒，於是《新萊茵報》就懂得正確地解釋政府的愛國心，警察當局和司法當局越是不顧三月革命的成果不斷地企圖激怒民主反對派，《新萊茵報》對這一點解釋得就越正確。它不厭其煩地警告萊茵省工人不要進行暴動，因為根據當時情況，暴動只會給工人帶來不幸。但是慎重並不排斥勇敢，而是包括勇敢在內。如果受到軍事壓力的萊茵省不能用自己的力量把反革命趕出去，那麼它就應該更慎重地集中自己的力量，等待不徹底的革命能夠變成徹底革命的那一天到來。《新萊茵報》越迫切地警告不要進行沒有希望的暴動，它就越有力地要求進行革命宣傳。

科倫的民主派組成了三個大團體，每個團體都有幾千會員：馬克思和律師施奈德爾領導的民主協會，以莫爾和沙佩爾為首的工人聯合會和主要由候補法官海爾曼·貝克爾領導的業主和工人聯合會。在美因河畔的法蘭克福舉行的民主主義者代表大會把科倫定為萊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亞的中心以後，這三個團體就聯合組成一個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會的成員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些人，並定於8月中在科倫召開萊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亞民主派團體代表大會。這個代表大會由十七個團體派來的四十名代表參加。它確認科倫的三個團體的中央委員會為萊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亞區域委員會，此外只討論了一些外部的組織問題。大會主席是施奈德爾和同大學生叔爾茨一起代表波恩民主協會的金克爾教授；秘書是特利爾的席利律師和克雷費爾特的教師伊曼特，這兩個人是馬克思的擁護者，在各個時期始終忠實於他。萊茵省民主派的機關報除了《新萊茵報》以外，還有《新科倫報》、《萊茵守護者》和工人聯合會每周出版兩次的報紙。萊茵省的民主派充分利用了結社自由和出版自由。

民主派在市民自卫团中也有很大势力，但是还没有掌握其中的大多数，以至行政区长官馮·維特根施坦被选为指挥官。維特根施坦的不可靠性在9月11日发生的一件军事暴行中暴露出来。民主派的各連队設法將維特根施坦撤职，并把肇事的那个团調离科倫城。此外，在法兰克尼亚广场上举行的民众大会决定选举一个安全委员会，它是“科倫城在目前的合法政权机关中没有代表的那一部分居民的組織”；同时根据恩格斯的提議，向柏林議會递交了一封呼吁书，要求議員們即使在刺刀威胁下也不要擅离职守。9月17日，在沃林根萊茵河畔的一片草地上举行了一次規模更大的、至少有八千至一万人参加的民众大会，这个大会一致贊成上次大会通过的致柏林議會书，并且主張成立社会民主的紅色共和国。在这次大会上讲话的，除了恩格斯、沙佩尔和威廉·沃尔弗以外，还有来自杜塞尔多夫的斐迪南·拉薩尔和民主社会主义的《紐約論壇报》的記者亨利·布里茲倍恩。<sup>①</sup>

对于德国革命具有决定意义的9月的这些重要日子，在法兰克福和柏林起初就这么白白地过去了。法兰克福議會不敢发动革命，普富尔內閣也不敢发动反革命。科倫政府机关就更热心地采取引誘工人暴动的旧方針，它們給民主派区域委员会的委員和《新萊茵报》的編輯加上捏造的、后来被它們自己所戳穿的罪名，利用司法和警察对他們进行迫害。但是萊茵省民主派的領袖也更加努力地劝告工人，不要受人引誘进行暴动。当沒有任何重大的問題推动全体人民起来斗争，因而任何起义都必然遭到失败的时候，举行这种起义是卤莽的，这特别是因为最近几天就可能发生重大的事件，决不能恰恰在决定关头的前夕丧失战斗力。如果柏林內閣

<sup>①</sup>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95—596頁。

敢于发动反革命，那末人民决定进行革命的日子就到来了。可是在9月25日，要逮捕貝克尔、沙佩尔、威廉·沃尔弗和莫尔的时候，发生了一场骚动。貝克尔和沙佩尔被抓起来了，沃尔弗没有被找到，莫尔被人民解救出来。于是警察厅长命令市民自卫团逮捕莫尔，并制止立即在老市場上举行的民众大会。可是这两个任务市民自卫团都不执行；它虽然占领了老市場，却宣称它开到那里是为了保护老百姓的。这个民众大会由沃尔弗担任主席，莫尔在会上讲了話，大会进行中沒有受到阻碍。除去警察当局的暴行而外，沒有发生所謂的或实际的越軌行为。可是已經准备散会时，傳来了軍队向会场开来的消息，于是参加大会的民众就开始构筑街垒，而对自己的安宁比对保卫人民权利更为关心的市民自卫团却开回家去了。

事实证明，軍队开来的消息只是庸人自扰。甚至街垒也沒有受到攻击；大多数的街垒上彻夜飄揚着紅旗。由于沒有人来进行攻击，而且已經知道柏林沒有傳来任何重要的消息，因此街垒的防御者就离开了街垒。他們还粉碎了軍事当局逮捕莫尔的企图，莫尔幸运地逃到国外去了。

自动恢复平靜以后，司令官就有了宣布城市戒严的勇气。这种勇气的根据是三月革命前給要塞司令官的一个指示，不过这个指示被下列事实現代化了：它取消了結社自由，禁止《新萊茵報》和其他三种民主派报纸出版，解散市民自卫团，用軍事法庭威胁公开用暴力反抗官方法令的人。因为市民自卫团中的资产阶级分子乐意抓住机会，把危险的武器交出去，所以其他成員的任何分散的反抗也就不起作用。不过这次非法的襲击一星期以后就停止了。这个事件在柏林議會中引起热烈的辯論，普富尔內閣有理由认为否定这种做法是合宜的。

《新萊茵報》由于这一暴行受到沉重的打击。为了逃避逮捕，它的大多数編輯都离开了科倫，德朗克和恩格斯到了比利时，沃尔弗到了普法尔茨；被搞散了的編輯部又渐渐聚攏起来。該报从来没有好轉过的財政状况，已經遭到彻底的破坏。虽然如此，报纸还是战胜了一切困难于10月12日复刊，并宣告財政困难已經克服，編輯委员会原有成員不变。不久前斐迪南·弗萊里格拉特参加了編委会。

《新萊茵報》复刊后，正好碰上維也納发生了革命，經過英勇斗争后，革命悲惨地失败了。但是《新萊茵報》不是像議會中的左派那样用感伤的哀叹、无用的同情和对无能的帝国摄政的呼救，而是用热情的号召，使人民从漠不关心的状态中觉醒过来，向战斗着的維也納人提供他們还能提供的唯一帮助，即战胜自己家里的反革命。弗萊里格拉特把馬克思的这个思想写在他致維也納的壮丽詩歌中：

“清理家务吧！要經得住考驗，  
赶走耶拉契奇，扔掉你的耶拉契奇！  
北方的痛击在南方也是一次打击；  
攻克我們的奧里繆茨<sup>①</sup>，奧里繆茨也隨着陷落！”

維也納陷落了，《新萊茵報》为維也納的革命写了結束語：“第二幕戏在維也納剛剛結束，这出戏的第一幕是在巴黎演出的，叫做‘六月的日子’。在巴黎有別动队，在維也納有‘克罗地亚人’，他們都是意大利南部的流浪者——被武裝起来的和被收买的流氓无产

<sup>①</sup> 捷克称为“沃洛謀次”，是捷克中部的要塞。1848年10月，維也納爆发人民起义后，奧皇曾逃到那里。——譯者

階級——他們反對從事勞動的、有思想的無產階級。我們在柏林很快就會看到第三幕。”<sup>①</sup> 這第三幕也開演了。

報紙在它遭到壓制以前，就同往常一樣堅決地揭露了所謂柏林議會受到忿怒群眾威脅的謊言的真實內容。“民主的人民群眾的這種權利——出席制憲議會，從而在精神上影響制憲議會的立場——是人民舊時的革命權利，這種權利自從英法革命以來，就被運用於一切暴風雨的年代。歷史幾乎把這些議會的所有堅決的措施都歸功於這個權利。如果死抓住‘法律根據’的人們，如果怯懦的、具有庸俗情緒的‘辯論自由’的朋友們發出吶叫來反對這個權利，那只是因為他們本來就不想要任何堅決的決議。”<sup>②</sup> 沒有比“辯論自由”這個套語更空洞的了。“從一方面說，‘辯論自由’不過是出版自由、集會自由和言論自由，是人民武裝的權利。從另一方面說，它不過是掌握在國王及其大臣們手中的現存的国家權力：軍隊、警察和所謂獨立的、但是事實上要依職務的升降和政治的變革為轉移的法官。辯論自由這句話向來只有一個意思：不依法律所不承認的一切影響為轉移，而公認的影響——賄賂，職務的升降，私人的利益，解散議會的恐懼等——却使討論成為真正‘自由的’討論。但是在革命時期，這句話就完全沒有意義了。在兩種力量、兩個黨派陳兵對峙的地方，在隨時都可能爆發鬥爭的地方，議員們只能作這樣的抉擇：或者他們接受人民的保護，那末，他們就得同意隨時接受有益的教訓；或者他們接受國王的保護，把議會遷到某一個小城市去，在刺刀和大炮的保護下，或者甚至在戒嚴的保護下開會。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國王和刺刀命令他們作出決定，他們也不能反對。受手無寸鐵的人民的威脅還是受全副武裝的軍閥的威脅，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42頁。

② 同上書第480頁。

让議會来选择吧。”<sup>①</sup>《新萊茵报》一再试图使柏林議会的腰板硬起来，可是这个“怨天尤人、自作聪明和犹豫不决的”<sup>②</sup>議會却无力采取坚决的立場。它不願受刺刀保护，但更不敢置身于人民的保护之下。

不用說，在十一月危机中，萊茵省的民主派尽了它的責任。現在决定性的时刻来到了，必須用第二次革命来对付反革命，《新萊茵报》每天都号召群众以一切暴力手段来还击暴力。消极抵抗必須有积极抵抗为后盾，否則这种反抗就像被屠夫拉去屠宰的牛犢的反抗一样。协商論的一切法律上的詭辯都被无情地清除了，资产阶级的怯懦很喜欢隐藏在这种詭辯后面。“普魯士国王从自己的观点出发，理直气壮地以专制国王的身分与議會相对抗。但是議會却没有理直气壮地进行活动，沒有以专制議會的身分来与国王相对抗……但是旧官僚不甘淪为资产阶级的奴僕，因为到目前为止，它一直是资产阶级的专横导师。封建党派不願为资产阶级牺牲自己的特权和利益。最后，国王把旧的封建社会（他作为这个社会的畸形产物而高踞于这个社会之上）的因素看作是自己的真正的、和他有血緣关系的社会基础，而把资产阶级看作是異己的、人为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它只能雕萎。资产阶级把‘受命于天’的非凡的权利变成以文件作根据的平凡的权利，把貴族血統的統治变成一紙公文的統治，把王国的太阳变成资产阶级的星灯。因此，王权沒有接受资产阶级的花言巧語的劝說。国王用彻底的反革命回答了资产阶级的不彻底的革命。他把资产阶级推回革命的怀抱，推回人民的怀抱，因为他宣布說：勃兰登堡在議會，議会在勃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80—481頁。

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9頁。

兰登堡。”<sup>①</sup>《新萊茵報》确切地翻譯了反革命的这个口号：警备部在議會，議会在警备部。它希望人民利用这个口号取得胜利，它把这口号看做是勃兰登堡家族的墓志銘。

当柏林議會终于通过拒絕納稅的決議以后，民主主义者区域委员会在一份由馬克思、沙佩尔和施奈德尔签署的11月18日的呼吁书中号召各民主团体实施下列措施：各地都应当用一切手段反对强行征稅；各地都必须組織民团，抗击敌人。給貧民供应的武器和彈药，应由市鎮出錢或靠募捐来购置；如果地方当局拒絕承认和执行国民議会的决定，就应该成立安全委员会，并尽可能同市鎮委员会取得協議。市鎮委员会如果反对立法會議，則应由該地全民投票重新选举。民主主义者萊茵区域委员会做了柏林議会有义务做的事情，如果議會严肃对待拒絕納稅的決議的話。这个呼吁书的签署人清楚地知道，問題最后取决于議會，他們向国内散布的火种，如果得不到全民起义的煽燃和傳播，这些火种就必然熄灭。但是他們卫护萊茵地区的革命荣誉，他們的呼吁书的效果充分表明，假如議會采取同一步驟，会取得多么巨大的成果。由于議會丧失了勇气，选择了退却的道路，所以占有优势的軍隊就得以鎮压萊茵省的反抗。

萊茵省呼吁书的签署人由于号召对軍隊和官吏进行武装反抗而被控告，并于1849年2月9日由科倫陪審法庭审判。当然他們并不否认，所謂国内敌人就是指政府的武装力量。国家檢察官恬不知耻地根据被政府用政变，用欽定宪法和新选举法撕毀了的4月6日和8日的法令，指責柏林議會，并且在更大程度上指責被告人。馬克思在他的辯护发言中反駁說，政府不能訴諸被它自己可

<sup>①</sup>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6—17頁。

耻地蹂躏了的法律。当顺利进行革命的时候，可以绞死自己的敌人，但不能对他们作出法庭判决。可以把他们作为战败了的敌人清除掉，但不能把他们当作罪犯来审判。在实行了革命或反革命以后，不能用已被推翻了的法律去反对这种法律本身的维护者。这是一种怯懦的法制伪善。究竟谁有理，是国王有理还是国民议会有理，——这是一个历史问题，只有历史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任何陪审法庭都解决不了。

馬克思繼續說下去，并且宣称4月6日和8日的法律根本没有得到承认。它们是联合议会任意制造出来的，公布这些纯形式的法律，国王就可以不必公开承认在三月革命中遭到了失败。法制基础的这种论调不是有意地欺騙别人，就是无意地欺騙自己。联合议会代表旧的封建社会，不能根据它的法律来审判代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议会。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而不是单个的个人的恣意横行。“现在我手里拿着的这本Code Napoléon〔拿破仑法典〕并没有创立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相反地，产生于十八世纪并在十九世纪继续发展的资产阶级社会，只是在这本法典中找到了它的法律的表现。这一法典一旦不再适应社会关系，它就会变成一叠不值钱的废纸。你们不能使旧法律成为新社会发展的基础；正像这些旧法律不能创立旧社会〔梅林的引文中是“旧法律”〕关系一样。”<sup>①</sup>馬克思宣称不顾社会发展的新的要求和需要而保存旧法律，著名的“法制基础”不是别的，只是用冠冕堂皇的詞句作掩护，维护那些与时代不相适应的私人利益，反对成熟了的共同

<sup>①</sup>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92頁。

利益。

國家檢察官當然會用過去翁魯及其同黨企圖用來保護他們的尊體不受拒絕納稅可能產生的危害的漂亮遁辭。國家檢察官說，柏林議會關於拒絕納稅的決議根本是沒有法律效力的，因為沒有進行會議規則所要求的第二次投票。馬克思用絕妙的諷刺反駁說：“一方面，對待國民議會不遵守必須履行的極重要的形式，另一方面，却要求國民議會遵守無關緊要的手續。……政府接二連三地採取暴力行動。它肆無忌憚地違犯極重要的法律，……它在戒嚴的幌子下任意實行無限制的軍事專制。它甚至把人民代表本身都給趕跑了。而當一方蠻橫無禮地違犯一切法律的時候，却要求另一方甚至最嚴格地遵守會議規則！”<sup>①</sup>馬克思同樣巧妙地諷刺了國家檢察官的企圖，國家檢察官希望肯定被告人是罪犯，所以有時指責柏林議會的行動是非法的，有時又贊揚它是合法的。

國家檢察官說，國民議會不願意協商，馬克思說這種說法同事實恰恰相反，這是故意歪曲或是不了解情況。倒不如說，這種協商熱狂正是議會的錯誤和不幸，這種熱狂使它從一個革命的國民議會墮落為一個模稜兩可的協商派團體。它沒有認清自己的歷史地位，這種地位是三月革命形成的。“這裡所發生的不是在一个社会基础上的两个派別之間的政治冲突——这是两个社会之間的冲突，具有政治形式的社会冲突，——这是旧的封建官僚社会和現代資產階級社会之間的斗争，是自由竞争的社会和行会制度的社会之間的斗争，是土地占有的社会和工业的社会之間的斗争，是信仰的社会和知識的社会之間的斗争。”<sup>②</sup>在這兩個社會之間沒有和平，它們的物質利益和需要使得它們進行你死我活的斗争。拒絕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98—299頁。

② 同上書第301頁。

納稅并不像國家檢察官所說的那樣動搖社會基礎，而是社會對於威脅其基礎的政府所採取的自衛手段。它並不引起衝突，只是證明衝突的存在。

如果說，議會作出拒絕納稅的權利不是非法的，那末它進行消極反抗就不是合法的。“如果徵稅被宣布為非法的，難道我不應用暴力來反抗用暴力實行的非法行為嗎？”<sup>①</sup> 拒絕納稅的先生們沒有走革命道路，以免拿自己的腦袋去冒險，但是，人民在拒絕納稅時必須站到革命的立場上來。“國民議會的行為並沒有預先決定人民的行為。國民議會本身沒有任何權利——人民委託給它的只是維護人民自己的權利。如果它不根據交給它的委託來行動——這一委託就失去效力。到那時，人民就親自出臺，並且根據自己的自主的權力來行動。……當國王實行反革命的時候，人民完全有權利利用革命來回答它。這一點人民不需要征得任何國民議會的同意。”<sup>②</sup> 最後，馬克思說，只是戲劇的第一幕結束了。必然的結果只能是：不是反革命的完全勝利，就是新的勝利的革命！也許，革命的勝利只有在反革命完成之後才有可能。

這篇發言是值得重視的，因為這裡一個共產主義者用確鑿無疑的事實同資產階級的陪審員展開辯論。他所以被控告，是因為他在封建社會同資產階級社會的鬥爭中擁護資產階級的事業，因為他做了法官們所屬的那個階級有義務也有權利做的事情。陪審員沒有執行政府要求他們執行的捕吏的任務。他們宣判被告無罪，並且還通過他們的陪審長對馬克思的很有教益的辯護發言表示感謝。

但是，應該由資產階級完成的任務落到無產階級肩上越多，就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05頁。

② 同上。

越有必要更巩固地組織工人階級，使它更明显地脫离經過一年的革命斗争不是巩固了而是分散了的民主派。4月14日，馬克思、沙佩尔、貝克尔和安內克（他是《新科倫報》的編輯，同莫尔和沙佩尔一起領導工人联合会，被选入民主主义者区域委员会代替莫尔），退出了这个团体。他們宣称，各民主团体的現行組織成分过分龐杂，使得有利于事业目的的活动不能开展。他們认为最好是建立一个由单一成分組成的工人联合会的更为严密的組織。同时科倫工人联合会脫离了萊茵区民主联合会，并邀請一切坚决拥护社会主义原則的工人联合会和其他联合会，于5月6日举行一个省代表大会，討論組織萊茵—威斯特伐里亚工人联合会的問題以及派代表参加工人結义会召集的、6月間在萊比錫举行的德国工人联合会全体代表大会的問題。

事先馬克思已經在《新萊茵報》上，通过一篇論普魯士从3月到11月的发展的观察敏銳的文章，論述了资产階級的政治破产；这时他通过出版他在布魯塞尔工人联合会发表的关于雇佣劳动与資本的演讲，促成一个新的轉变，而威廉·沃尔弗則通过他那关于西里西亚的十亿的激动人心的論文鼓动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村无产阶级。

这是把全德国的革命工人运动汇合成为一个团結一致、原則明确的行动的很有希望的开端。但是在这个开端还没有得到发展以前，它就在资产階級革命的垂死掙扎中被窒息死了。

#### 四 历史地位

关于《新萊茵報》的編輯部，恩格斯說过它的組織簡直是由馬克思一人独裁；他的洞察力和坚定立場使这个日报成了革命年代

德国最著名的报纸。

事实上，人们只需仔细阅读一下共三百期的报纸，就会得出相同的结论。马克思在他一生中只有这一年是在有相当大的出版自由的情况下领导一个大型日报的，但是在他的荣誉称号之中，德国空前绝后的伟大新闻工作者这个称号并不是最微不足道的。今天，《新莱茵报》还给每个希望不只是当一个雇佣劳动者的政治日报的记者提供了一个永不枯竭的启发和教导的源泉。

《新莱茵报》同1842年的《莱茵报》一样，没有政治说教的倾向，如果按照规则，每天早晨必须发表论述某些“永恒原则”的社论，就必然会产生这种现象。关于这方面的唯一例子出现在第二号毕尔格尔斯为该报所写的唯一一篇文章里。除此而外，《新莱茵报》都是以事实为根据的，它对这些事实进行了整理、选择，按照它们的历史联系进行说明，考查它们的历史后果。过去对它说明了现在，现在也对它揭示了未来。

马克思能够用惊人的判断力指出，在革命年代出现的“一大堆杂乱的、看来是偶然的、互不连贯而又矛盾的事实”中，哪一部分将构成“世界历史的组成部分”<sup>①</sup>。今天，一年的《新莱茵报》所包含的革命运动的史料，比从那以后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关于这个时期所写的一切著作还要详细和深刻。如果一个医生因为母亲生孩子要受痛苦，就说生孩子是违反自然的，那么他就有一切权利要求进疯人院；但是，把任何革命都说成是违反自然的、说成是切断事态的正常发展的荒谬和错误行为的博学的历史学家，却有要求资产阶级文明国家的职位和勋章的权利。因为马克思懂得把革命当作一个按照历史规律进行的历史过程来评价，所以他在最巨大事件的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7页。

風暴中寫下的論文今天還比論述德國革命的資產階級的拙劣歷史著作的歷史價值高得多。

當然從馬克思在好幾個月里寫的各种各樣的論文中，這裡摘一句，那裡摘一句，並找出它們之間的所謂“矛盾”，是很容易的。人們只要知道用這種被叔本華稱做一切愚蠢和惡劣的手法中最愚蠢最惡劣的手法想要證明什麼就行了！要肯定馬克思在《新萊茵報》上所做的“錯誤的預言”也是不費力氣的。在為偉大事業進行的一場堂堂正正的鬥爭中，戰士們在某些情況下不產生超過可以達到的目標的勝利希望是不可想像的！馬克思對於德國革命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比其他任何革命戰士知道得都更清楚，可是，難道他因此就應該在可以推動革命的時分，卻不熱心地把革命向前推進嗎？有一些學者譏笑馬克思根據最初的消息，說十一月的柏林政變是徹底革命的準備，而事實上這次政變卻是徹底反動的準備。這些學者本來應該公正地判斷這一事實，即他們自己的父親和祖父實際上是一些完全不可救藥的人，可是馬克思卻沒有這樣看待他們。假如資產階級，特別是有教養的階級血管里只有一種血，骨頭里只有一種骨髓，那麼柏林政變當然可以成為徹底革命的準備。

可是為了反駁這種攻擊而耽誤時間是不值得的。誰能合乎邏輯地思考，誰就自然而然地看出，《新萊茵報》是一個戰鬥性報紙，是在革命的火熱氣氛中出版的，它的任務就是干預革命，同時也可以看出，因此《新萊茵報》不是根據向後看的歷史認識，而是從事物的发展，可以說是從事物的生育過程（報紙本身在這方面起了助產士的作用）對事物作出評價的，也可以看到，往往有些事情對於行為者說來是正確的，可是後來觀察者卻覺得不正確，甚至是有理由這樣認為的。有光就有影子，由於對革命決不能實現的事情抱有

希望而登上街垒的最严重的幻想者，也比那种由于在革命中不会出现事变的历史进程似乎已经给他充分证实了事情，因而一开始就袖手旁观的胆怯庸人不知要高明多少倍。

巴黎无产阶级在六月中的一月斗争使得《新莱茵报》比实际可能性为高地估计了被打倒的巨人的力量，比实际可能性为早地期待巴黎无产阶级的重新觉醒。德国资产者口头上颂扬波兰的英勇斗争，实际上却出卖它，这种可耻的做法诱使《新莱茵报》过高估计了波兰向革命方面的发展。奥地利的斯拉夫人充当欧洲反动派的奴僕，使得《新莱茵报》否定了这些民族的存在权利，这同下述事实似乎是“矛盾”的，这个事实是，1848年在布拉格爆发捷克人起义时，《新莱茵报》像支持波森的波兰人和意大利的意大利人一样也支持波希米亚的捷克人。这个“矛盾”很快就解决了，因为该报在这个起义爆发后立即宣称，德国人对捷克人的四百年压迫，迫使捷克人投入了俄国人的怀抱，把他们从革命方面推到专制制度方面去。德国革命的不彻底性造成了那种充满实际矛盾的局势，目光最敏锐的人在解决这些实际矛盾时也不能不带有表面矛盾。

要批评别人的缺点，也就应该赞扬别人的优点，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毫不犹豫地支持巴黎的六月战士是一件既具有伟大的政治勇气，又具有伟大的政治眼光的行为。毫无保留地支持波兰起义，令人信服地证明，波兰的复国对于欧洲的文化和德国的国家统一都是绝对必要的，也属于上述行为。几年以后，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叙述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sup>①</sup>时，更加公正地论述了波兰问题的困难；他在这里说，德意志民族和波兰民族的分界问题是很复杂的，不能简单地根据1772年旧波兰共和国的疆界加以划

<sup>①</sup>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得知，后来以《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为题出版的这组论文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其中大部分是恩格斯的作品。——原编者

分。唯一可能的解決方法是同俄國開戰；波蘭人在東方得到廣大的領土，他們在西方的要求便會比較溫和而合理；對他們來說，里加和米塔瓦<sup>①</sup>也會同但澤和埃爾賓一樣重要的。但是，當愛國的時髦口號占了上風，波蘭問題得不到實際解決的時候，《新萊茵報》專門提出這個問題是完全正確的。同法國對亞爾薩斯—洛林相比，普魯士對波森省做的好事少得多，做的壞事却多得多。扯掉蒙在這些罪惡行為上的面紗，把新的罪行加在舊的罪行上，乃是一種既愛國又革命的行為。最後，在任何地方也沒有像在《新萊茵報》上這樣尖銳而中肯地對泛斯拉夫主義的反動性的最內在的本質進行批判，不管在批判時對每個集合在泛斯拉夫主義旗幟下的民族的評論是否都是正確的。革命戰士的標志是劍而不是秤。

今天，《新萊茵報》的內容，有一些已被風雨侵蝕了，有許多仍然傲然挺立在那裡。但是它的一切缺點最終都歸於一個錯誤，當時這個錯誤像一根紅綫貫穿着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行動，就是他們對歐洲階級鬥爭的發展水平估計得比它實際上已經達到的高得多。不過這個錯誤也正是他們用來徹底觀察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階級鬥爭的深刻洞察力這個光明面的陰暗面。因此這個錯誤從沒有使他們氣餒，反而給他們增加了勇氣，他們的鬥爭從來沒有鬆懈，而是不斷加強；在每次新的失敗中，這個錯誤只給他們以勝利更加接近的保證。因此《新萊茵報》的戰鬥的一年並不是一無所獲，而是取得豐富的成果。群眾一旦受過這個報紙的教育，就決不會完全喪失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當德國工人階級從反革命的打擊中恢復過來，能夠重新不斷地勝利前進的時候，萊茵工人成了德國工人階級的骨幹。

① 拉脫維亞稱作叶爾加瓦。——譯者

如果說，《新萊茵報》有馬克思這樣一位無與倫比的領導者是一件幸事，那末馬克思有一個無與倫比的撰稿者集團也是一件幸事。這些人都有很高的修養，他們都在報紙的榮譽中占有或大或小的一份。最大的一份應該歸于恩格斯，他和別的一些人一起，對巴枯寧的泛斯拉夫主義傾向進行了光輝的清算，其次是威廉·沃爾弗，他嚴厲地鞭撻了封建的掠奪欲，而且也巧妙地諷刺了小國的狹隘性。先是德朗克，後來是年輕的施路費爾報道了法蘭克福帝國蛙池的雷雨。弗萊里格拉特用他的優美的革命詩歌給文藝欄增添了光彩；《新萊茵報》出版不久就刊登了他的變化多端的《不管這一切》，這首詩的最重要部分在他的詩集中成了新德意志帝國的出版自由的犧牲品：

“儘管親王已經回來，  
人們向他高聲歡呼，  
他的劍卻是一把彎劍，  
一把不體面的寶劍！  
不管這一切的一切，  
輿論的驅逐力量  
在上帝和世界面前  
把他的劍折成兩截！”

文藝欄的真正主人是格奧爾格·維爾特，他是快活王國的快活國王。他不是資產階級類型的滑稽家和談諧家，却是天才國的一位王子，穿着發光的鎧甲，手執閃亮的寶劍輕快地大踏步前進。自從德國市民把全副精力都放到求財上以後，他們在失去理論感的同时，也失去了從前他們所特有的文學嗜好。高級國民經濟學

的許多候補者約卜西<sup>①</sup>對於《新萊茵報》藝術欄中的所謂“猥褻言論”發出了哀號。

要是維爾特還能聽到這些話，這些道德衛士的報喪人的嚴肅態度也許會引起他出自內心的微笑。他在《新萊茵報》上发表的主要作品是《著名的騎士史納卜漢斯基的生平事迹》，他根據實事，描寫了海涅稱為利希諾夫斯基侯爵的那個人的冒險故事。這篇作品是那種天才的大膽作品的瑰寶，自古以來，在所有文學中，這種題材就應當寫得這樣大膽，至少在真正的男子和真正的婦女所喜愛的一切文學中應該這樣，儘管大家閨秀認為這種大膽似乎是可惡的，或者迂腐的學究認為它是真正可惡的。

---

① 候補者約卜西是卡爾·阿諾爾德·科爾圖姆所作諷刺史詩《約卜西之歌》（1784年出版）中的主人公，是個典型的毫無才能的人物。——原編者

### 第三章

## 斐迪南·拉薩尔

在《新莱茵报》上，时常提到一个出色地参加莱茵省的革命运动、后来更出色得多地参加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的年轻人。那时他只有二十三岁，但是已经得到了在当时的斗争中像战斗口号一样响亮的名声。

1825年4月11日，斐迪南·拉薩尔生于布勒斯劳。父亲是一个绸缎商人。他的家庭是东欧那些利用寄生的商业才使自己摆脱封建桎梏的犹太人家庭之一。1812年3月11日的敕令赋与旧普鲁士犹太人的所谓平权只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老国王，这位仁慈的君主对于欺骗自己的犹太臣民也同欺骗自己的基督教德意志臣民一样感到兴趣。有一个商人因为名字叫斐迪南，所以老国王以为他是基督徒并任命他为宫中承办商，后来才弄清他是一个犹太人，于是就开始严格追究犹太人取“基督徒名字”。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也继续干这种蠢事，因此不免受到世界主义守夜人<sup>①</sup>的嘲笑。

---

<sup>①</sup> 指弗兰茨·丁盖尔施泰特（1814—1881），他在1841年匿名发表了一本题为《世界主义守夜人之歌》的诗集。——原编者

“如果他不像一个学問关心犹太人的名字，  
究竟是誰对犹太佬殘酷而严厉呢？”

在犹太人最多的德国和波兰的边界綫上，犹太人实际上是在中世紀特权的基礎上而不是在資產階級平等的基礎上生活。在犹太人“有大权”的克罗托辛地区，犹太人可以向庄园买閹羊，但是他們只能买前腿而必須把后腿留給基督徒，必須按照科毕林城的价格計算羊皮、羊毛和肉的价格。克罗托辛的磚厂卖給他們磚的價錢比卖給基督徒的高。当犹太人被人杀害而凶手應該受到懲罰时，为了这种安慰，犹太人必須向領主納稅，定居的一人交一个金币，不定居的一人交半个金币。克罗托辛是这样，波兰—西里西亞地区也全是这样，拉薩尔就出生于这个地区，他的家庭在这里有許多社会关系。

拉薩尔不得不忍受“千年的家庭痛苦、从尼罗河谷带来的災害以及古埃及的不健康的信仰”，其程度比馬克思所經受的要严重得多。拉薩尔在馬克思已經登上当时的資產階級社会的精神高峰那样的年齡，在举行萊比錫博覽会时期，却住在沼澤地带，在一群俄国和波兰犹太商人中間。即使以最有利的偏袒的眼光，也不能把这些商人算做人类的精华。当然拉薩尔的父亲已經熬过了最困苦的日子。他成了一个富人，他的資產階級的品格是无可非难的，在犹太教堂里，他屬於改革的犹太人集团。可是主張改革的犹太人毕竟还是犹太人。在每个十分激动的时刻，斐迪南·拉薩尔父母的資產階級教育表現出只是一层敷在表面上的薄薄的油漆。这个十五岁的男孩在他的日記中描写的家庭瑣事决不是高雅的。他以显然的滿足描繪他为了一点小事咒罵他姊姊的憤怒的叫声；然后他又以一个有經驗的媒人的平靜心情評論了她們的精神上和身体

上的优点，以便考虑她们的求婚人可以索取多少嫁妆；他既做大买卖，也做小交易，他把从家里人和同学那里骗来的每一个钱都仔细地记在账上；甚至他说话也带着很重的犹太人语调。

他的犹太人习气还是很地道的。尽管他不把犹太人的礼法放在眼里，可是他相信耶和华，而且想做一个优秀的犹太人。他不害怕断头台，他希望使犹太人再成为一个受到重视的民族。他写道：“哦，当我醉心于我那些幼稚的梦想时，我心爱的理想始终是手执武器领导犹太人，使他们独立自主。”这的确是“幼稚的梦想”，这种戏剧式的马卡比家族<sup>①</sup>的作风实际上不过是容克阶级的懒散和轻浮的一种表现，由于有了这种表现，这个好幻想的孟浪的男孩无法再在布勒斯劳文科中学待下去了。他的父母想让他上大学，可是他克服了父母的阻力，在1840年春，他还只有十五岁的那年转学到莱比锡商业学校去。

这个决定是轻率的，但是它的结果却是可喜的。商业学校按照技术的各种规律教给年轻的拉萨尔基督教的经商法，于是残留在拉萨尔身上的犹太商人的气质也随着消失了。一年之后，拉萨尔干脆离开了这个学校，那时校长席贝在学校的记录簿上写道，对于拉萨尔退学，教师和学生都没有注意。忿怒的学校暴君认为这个评语是恰如其分的。拉萨尔认识到，当他了解到赚钱的秘密以后，他就会因赚钱而毁灭；他对于“在悲惨的布勒斯劳，把白洋布卖给波兰的小犹太人”感到畏惧，8月3日他就在日记中写道：“我坚信，命运，或者更确切些说，神会把我从账房里拉出来，扔到我能够发挥作用的场所。我信赖运气，信赖我的坚强意志，我要多同缪

---

① 拯救叙利亚犹太人脱离希腊王暴政（公元前175—164）的犹太人家族。——译者

斯<sup>①</sup>，少同总賬和流水賬打交道，多同希腊和东方諸国，少同靛藍和甜菜打交道，多同塔里阿<sup>②</sup>和她的教士，少同小商人和他們的伙計打交道，多关心自由，少关心貨价，比咒罵使价格下降的競争者更厉害地咒罵夺去人們首要財富的貴族的狗。但是不應該以咒罵为滿足。”

拉薩尔在脫离商业的同时，也就摆脱了犹太人习气。当时犹太人在大馬士革遭到的殘酷迫害使他数次大发雷霆，但是他对被压迫者的怯懦的譴責已經比对压迫者的殘酷的譴責更为猛烈了。想把神的选民导向胜利的幼稚的馬卡比变为現代的革命者，这个革命者把受压迫的犹太人只看做是受压迫的人，把解放犹太人只看做是使他們摆脱犹太习气。勤勉地研究歌德、席勒和莱辛，伏尔泰和拜倫，白尔尼和海涅的作品，使年輕的拉薩尔睜开了眼睛，看到了現代文化的精神財富。他的文学趣味还不稳定，他由于一些有偏向的語句而用夸大的言詞贊揚像亨利希·勞貝这样的、甚至比他更不足道的淺薄的作家。可是，正因为他需要从深谷中向上爬，所以才更加促使他登上古典文学修养的高峰。

同馬克思和恩格斯不同，拉薩尔是由于个人的环境所迫而成长为革命者的。他感觉到这一点，有一次看席勒的《斐阿斯柯》的演出时，他罵自己是“利己主义者”，那时他清楚地感到，他虽然有革命的、民主的共和主义倾向，可是假如他处于拉瓦格那伯爵<sup>③</sup>的地位也会这样做，并要攫取王位，而不满足于做热那亚的第一个公民。“假如我生为王侯，我就要尽心尽力做一个貴族。可是，因为我只是一个普通市民的儿子，所以在他的时代，我将成为民主主义

① 希腊神話中司文艺和学术的女神。——譯者

② 希腊神話中司喜劇的女神。——譯者

③ 即斐阿斯柯。——譯者

者。”在拉薩尔的辞典上，絲毫也沒有記載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青年时代不断追求的“对于当代的斗争和願望的独立說明”。他的自我意識一旦觉醒，对他說来，他該做什么不該做什么也就确定了。他不是事物中寻找它們的目的，而是使事物为他的目的服务。他从竞争和商品价格逃入一般的自由思想之中，而馬克思和恩格斯則放棄一般的自由思想，因为他們从竞争和商品价格中認識了它的模糊性。

年輕的拉薩尔在他十六岁誕辰的那一天看清了自己的前途，看清了为爭取人类最崇高的利益而斗争，即使自己毀灭也在所不惜的宣傳家、演說家和作家的前途。1841年5月，他向他的父亲提出了最后通牒。他想研究历史；他拒絕了父亲让他学医或学法律的調和的建議，因为医生和律师也是拿他們的知識做生意。老拉薩尔引以为荣的是，他体会到儿子的高尚意志，因而順从了他。1841年秋天，斐迪南·拉薩尔开始走上新的生活道路。

关于他这以后几年的情况，我們除了若干无价值的日期而外什么也不知道。他用巨大的努力弥补过去在学校中沒有学到的东西。不久他就取得了入大学就讀的資格，他在布勒斯劳大学和柏林大学主要是研究古代文化和黑格尔哲学。1846年1月3日，亨利希·海涅給万哈根·馮·恩賽写了一封信，介紹拉薩尔，从这封信里我們才又清晰地看到拉薩尔的面貌。信中說：“拿这封信来見您的、我的朋友拉薩尔先生是一位有卓越天賦的年輕人，他有深奧的學問，广博的知識，我所見到的最敏銳的洞察力以及丰富的著述才能，同这些結合在一起的是一种意志力，一种使我惊異的行动能力。……拉薩尔先生正是新时代的这样一个杰出的儿子，我們在我們的时代里用一种克制和謙让的态度或多或少伪善地虛度光阴和胡言乱語，而新时代却否定这种态度。新的一代要在看得見的东

西中享受和得势；我們这些上了年紀的人在看不見的东西面前卑屈地弯腰，追求虛幻的亲吻和兰花的香气，灰心和哭泣，但也許比那些驕傲地战死的坚决的斗士要幸运一些。”这封仓促写成的信字迹潦草，但是它既包含着整个海涅也包含着整个拉萨尔。它在每一个詞上都打上了真实的印章，它在指出拉萨尔是个有才能的人的同时，也把一种半明半暗的光投在孤寂的凹凸不平的路上，拉萨尔为了成为一个成熟的人在短短的三年之中必須走这条道路。<sup>①</sup>

在所有思想史上还没有第二个这样的例子：一个天才人物在十五岁时还很不成熟而到二十岁上却这样成熟了。对于拉萨尔一生中的这个时期了解得越少，就越不能低估自我解放的这几年对他的性格发生的影响。使他鼓舞的难以置信的自信心和使他痛苦的不倦的事业欲可以用下述事实来解释，那就是这个“愚蠢的犹太青年”、这个“布店伙計”、这个“店員”一旦認識到自己有才能而且也注定要做比求財更好的事情，他就知道自己应当成为什么样的人。从沒有受过伤的人嘲笑別人的伤疤，拉萨尔的缺点就是伤疤，它們证明他在作为革命战士出现在公开的比武場上以前，就必須在多么激烈的战斗中取得胜利。

拉萨尔始終沒有对犹太习气采取公正的态度。尽管他沒有形成反犹太主义力量的那种庸俗性，可是一直到晚年，犹太习气仍然是他的不幸。任何人也不能从他一生中把最初的十五年截断，就好像这十五年根本沒有存在过似的。伤可能已經治好了，可是疤还存在。伤疤还抽动、难受、疼痛，尤其是暴風雨将要求临时更是这样。后来，拉萨尔“作为一个按年龄來說只有三十五岁，按經驗來說已經有九十岁的成熟的人”，向他一个心爱的姑娘坦白时一口

<sup>①</sup> 亨利希·海涅后来对拉萨尔的评价很不好，他在1851年1月31日致古斯塔夫·海涅的信中特別表明了这一点。——編者

气写道，他也許会同一个有三四百万塔勒嫁妆的女人結婚，不考虑她这个人如何，而只是为了这笔可以促使他的偉大目标实现的财产，但是他决不願意利用他的精神劳动賺錢，也許他永远碰不到这种出卖灵魂的不幸。在这里，內在的不稳定的感情使他由一个极端跑到另一个相反的极端：在这个革命者看来，自己出卖自己比穷人能为人类的精神进步而工作的希望还差强人意。萊辛和馬克思在談到“一种謀生劳动的强制的必要性”时，态度是多么公正啊！当然，在拉薩尔那里也只是感情的不稳定性作祟，事实上他从沒有想到为了财产而結婚，并且斤斤計較他的主要科学著作的稿費的多寡。

另一方面，那种像呵气留在他革命自觉性的鏡子上的內在的不稳定性表現在他的虛荣心和他接受奉承的程度上。在这一方面拉薩尔所能做出的事情多得令人惊異，但是这些弱点与其說是他性格上的缺陷，不如說是斗争中得到的伤疤，他在这个斗争中克服了一个几百年来受迫害、受虐待的民族的世代相傳的負担。他的虛荣心同妒嫉心毫无关系；任何人也沒有拉薩尔这样願意承认別人的功績，只要这是一种真正的功績。他的功名欲从来也沒有指向微不足道的目标，什么时候一种大功名欲是沒有巨大的要求的呢？拉薩尔用一种天真的坦率态度接受别人对他的恭維，而不深究这种恭維的原因以及它的价值，这种坦率态度使他受到許多严厉的批評，但是这种态度并不是加重了这个缺点，而是減輕了这个缺点。

总的說来，拉薩尔虽然有高深的修养，他的一切行动都經過思考，但他仍然保留着天真的本性。他有許多孩子气，有孩子的慷慨，也有孩子的自私。当他談到他的力量的恶习，談到他粗野的本能、可怕的憤怒、无限的激情、殘酷无情的严酷性的时候有些夸大，在

胡安先生<sup>①</sup>这个角色上也有些夸大，他只是扮演了这个角色，而不是体验这个角色。当他在柏林的沙龙里作为戴着蛋黄色的手套的豪华的富家子弟、在弱不禁风的资产阶级小姐面前周旋的时候，他却显得很不耐烦。可是当海尔维格夫人有一次顺便对他发表自己的看法时，他善意地笑着说：“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是这样。”他从来不想不顾死活地迷恋一个女人。对他来说，友谊高于爱情，这是一种古代的性格。他是良友的典范，忠实、可靠、有不怕牺牲的精神，经常准备帮助别人，给人出主意，毫不吝惜地接济别人。谁要得到他的诺言，就可以像信赖岩石那样信赖他，他喜欢提到西蒙·达赫老人的朴实可信的格言：人的最大特点，最惬意的事，就是他能够表示忠诚，坚持友谊。

拉薩尔想写一部论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著作，为了在巴黎图书馆里为这部著作做准备工作，他到了巴黎。由于常常把他称做“神童”的亚历山大·冯·洪堡的介绍，他结识了许多法国学者，就是这个洪堡那时正阴谋把马克思赶出巴黎。那一次马克思和拉薩尔没有能够亲自会见；他们两个人都同海涅有紧密的联系，可能他们早就彼此听说过了。但是，即使他们当时见了面，他们也很难接近。在那个时候，他们走着恰恰相反的道路。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进行毁灭性的批判，以便从黑格尔哲学中找到走向现实世界的道路，而拉薩尔却认为他从黑格尔哲学中得到了在实际生活中成为他的最高力量的最高认识。正如拉薩尔后来在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所说，他从1843年起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是这并不排斥下述说法，即他在滞留巴黎期间才更密切地接近社会主义，也就是接近作为一个团结一致的党派开始集中在赖德律-洛兰和

<sup>①</sup> 西班牙封建时代传说的人物，1600年以来在世界文学中成为诱骗妇女者的化身 —— 译者

路易·勃朗周圍的社会民主派。当拉薩尔通曉《共产党宣言》的时候，社会民主派思想界里的許多东西还牢固地附着在他的思想上，这种牢固性极容易用最初印象的新鮮的和深刻的作用来解釋。

拉薩尔回到祖国以后，就开始写他論赫拉克利特的著作，可是在他还没有把这本书写完的时候，同一个聪明、美丽而又不幸的妇女的偶然会見，把他投入实际斗争的激流之中，这股激流吞噬了他将近十年的宝贵光阴。拉薩尔本人滿意地回顾“他一生中的这一胜利”，但是公正的旁观者很难同样滿意地回顾拉薩尔为哈茨費尔特伯爵夫人进行的斗争。不言而喻，关于这件事所散布的恶意的謠言只应受到极大的輕視，而老头儿和老太太似乎最感兴趣的問題——拉薩尔同比他大二十岁的伯爵夫人有没有发生过亲密的性的关系——同从道义上和政治上对这一事件进行评价也毫无关系。拉薩尔在去世前不久有理由写信給胡貝尔說，同他为哈茨費尔特伯爵夫人尽力最不沾边的就是輕佻行为，他在办理这一案件中政治的感情漸漸变成了宗教的感情，他在他最后一次辯护发言中更确切地把一种实际的侠义热情称做推动他干預哈茨費尔特案件的动因。

毫无疑问，拉薩尔的动机是純洁的、无可指責的。在三月革命前的平靜时代，他充滿了火热的行动欲望，挺身卫护一个无力自卫的妇女，这个妇女受到应该保护她的人們——她的丈夫、她的兄弟、她的阶级的迫害和出卖，基督教的专制王室最多不过对这个妇女說几句毫无帮助的安慰的話，却又对那种最卑鄙的侵害行为进行庇护。当然哈茨費尔特伯爵夫人的命运是統治三月革命前的普魯士的阶级在其中进行种种卑劣行为的縮图。拉薩尔这样一个没有权力的犹太青年，在挺身反对国王、貴族和法庭都在其驕橫的抗拒面前却步的罪人的同时，他就独力进行着一件叛逆活动。可能有人

責备說，在他的革命的斗爭热情中毕竟掺杂着一些浪漫主义騎士作風，那么他自己就用一种十分亲切的方式給这种責难解除了武装，他在科倫陪审法庭面前說过，在任何时代，青年人都是而且永远是不怕牺牲的、热情的、大公无私的。

拉薩尔和哈茨費尔特伯爵夫人的道路既然交叉在一起，假如拉薩尔知道这个受虐待的妇女身受痛苦，却聳聳肩膀毫不关心地走开，那么他就不成其为拉薩尔了。他认为哈茨費尔特伯爵夫人的事件体现了一般的原則和观点；他心想，哈茨費尔特伯爵只是倚仗貴族和百万富翁的优越地位才敢几十年来对他的妻子做出这样的坏事。从这一点可以证明拉薩尔比《德意志—布魯塞尔报》的編輯部对革命联系有更为細致而深刻的認識，这个編輯部公开斥責它駐萊茵省的記者說，如果他想报道关于拉薩尔同哈茨費尔特伯爵斗爭的消息，那么他可以去找卑劣的报纸。《新萊茵报》的看法却公正得多。它对这个案件并不感到很大兴趣，但是它还是詳細地报道了1848年8月科倫陪审法庭为教唆盗窃文件匪事对拉薩尔进行的审訊，同时它也把自己的各栏向他开放，作为他同哈茨費尔特伯爵进行斗爭中的攻守陣地。可是，如果人們研究《新萊茵报》，在它的第一版上讀一讀馬克思的偉大論文，然后在第四版上看到拉薩尔同受贿的宮廷侍从和叛卖的宮女，同娼妓和妓院老板以及其他各种下賤人进行斗爭，那么仍然存在一个令人不快的疙瘩。拉薩尔越是卓越地处理这一案件，他越是无情地进行攻击，越是坚强地进行辯护，人們也就越难对于这一事实置之不顾，那就是恰恰在德国也終于为人类的事业进行斗爭的时期，他卷入了这场糾紛之中。

看来，这个責任当然不能由拉薩尔来負。当他1846年承办哈茨費尔特伯爵夫人案件时，他不可能知道1848年在德国将爆发一次革命。假如他能知道这一点，那他一定估計，到那时候他早就帮

助伯爵夫人爭得她的权利了。事实上，倘若在这堂而皇之的普魯士国家还有一点正义和公正的話，拉薩尔同哈茨費尔特伯爵的斗争就只需要花不多几个星期的時間，而不会持續好几年。譴責拉薩尔是不公正的，因为普魯士的腐朽力量經常給他制造新的障碍，直到他能将一种不可忍受的非法状态变成一种可以忍受的合法状态为止，責备他没有在得到圓滿的結果以前放棄已經开始的斗争，也是不公正的。

这个斗争一直进行到这种程度，以致大家都看到用合法的武器制約一个普魯士封建主的无法无天的专横行为是不可能的，一直进行到普魯士国家的无可救药的腐敗在这一案件如此明显地暴露出来，以致人民由此普遍地得到推翻这个国家的有力的动力，难道这还不能說是圓滿的結果嗎？对拉薩尔說来，这样的問題根本不是什么问题；羅馬詩人的只要想做大事就行了的話不是对他說的。对他來說只有一个圓滿的結果，就是使得有权势的罪人屈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不惜采取过分的手段，这些手段超过了爭取一般原則的斗争为了自己的利益应当保持的限度。

拉薩尔在选择武器方面始終胜过他的敌人一筹。他也只有利用一个有无穷的聪明手段的人的力量求得这种力量所能得到的东西。但是，如果他想打败哈茨費尔特伯爵本人，那么他有时就必须越过这个界限，他就一定会做人們（不对庸俗的判断作任何让步）希望他没有做的許多事情。但是，假如拉薩尔在伯爵完全失敗以前脱离这一斗争，他决不会原諒自己。他就是这样，根据他的发展条件，他不可能是別的样子。他必須完成超乎常人的事情，然后在十分合乎人情的事情上走向灭亡。人們可能把下述事实称做悲剧性冲突的戏弄人的前兆，即当拉薩尔經過八九年的斗争給哈茨費尔特伯爵夫人爭得一笔很大的独立财产以后，这笔财产的很大一

部分在 1857 年的商业危机中化为乌有了。

无论如何拉萨尔决没有忘记他的生命是属于革命的。他被毫无根据地控告教唆盗窃文件匣，在科伦陪审法庭宣判他无罪以后，他马上就以全副精力投身到革命运动中去。在革命运动相当高涨的杜塞尔多夫，他是革命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因此他同民主主义者区域委员会和《新莱茵报》发生了密切的联系。1848 年，拉萨尔和马克思初次接近，显然，当时马克思对拉萨尔发生了很大影响。当然，拉萨尔没有盲目相信这位大师的话，甚至马克思的见解也没有使他的思想发展走上一条新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拉萨尔决不是马克思的学生。拉萨尔的思想已经形成，不会再接受这种影响了。拉萨尔同马克思之间的谅解不可能越过一条一定的界线，虽然我们不能用原则的明确性划出这条界线，因为它是由两个人个人的根本不同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恰恰相反的发展过程形成的。马克思从自我阐明的过程中明确而完整地得出革命的结果，而拉萨尔却以革命的行动力抓住这个结果，但是他没有注意这个过程本身。《共产党宣言》和《新莱茵报》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巩固、澄清和扩大了他的革命观点。但是，我们在拉萨尔的著作中找不到他所熟悉的、马克思从办《莱茵报》到写反对蒲鲁东的著作这一时期所发表的一系列的文章的痕迹，最多只能找到很不明显的痕迹。

在 1848 年的十一月危机中，拉萨尔热烈响应民主主义者区域委员会的号召。他受杜塞尔多夫市民自卫团和杜塞尔多夫区后备军的委托，拟了一份致柏林议会的建议书，其中说：“消极抵抗已经到了尽头。我们恳求国民议会：请您号召人们拿起武器，请您号召人们履行义务。”拉萨尔是康塔多尔的最得力的助手，康塔多尔是杜塞尔多夫市民自卫团的指挥官，他命令日夜制造枪弹，准备进行

武装抵抗。拉薩尔也在杜塞尔多夫郊区积极进行鼓动，这时工人韦耶尔斯又是他的助手。拉薩尔鼓动农村居民做好兵員准备，并筹办彈药和武器。

可是議會沒有发出人們所希望的号召。11月22日康塔多尔、拉薩尔和韦耶尔斯被捕了。从此就开始了一场訴訟，十一月的英雄們在这个案件中的种种違法行为是十分恶劣的。莱茵司法当局以不可遏止的憎恨对拉薩尔进行迫害，这当然表明，拉薩尔在哈茨費尔特伯爵夫人一案中代表了一般的原則，尤其是代表了把完全感染了瘟疫的司法赶出它在其中自得其乐的泥沼的卓越原則。馬克思、沙佩尔和施奈德尔由于完全相同的行动被控唆使反抗軍隊和官員，根据法典，这不过是一項輕罪，不一定要审前羈押，最多也只会判处两三个月徒刑，可是拉薩尔却被控犯了唆使武装反对王权的重大罪行，需要审前羈押，在判决时拉薩尔的全部資產階級生活受到威胁。为了使資產階級的陪審員便于进行判决，同拉薩尔采取了同样的行动、而且影响更大的資產者康塔多尔被开脫了。可是，因为宣判无罪是可能的，所以这个可敬的法院却在它的拱門上挂着两根特殊的絞索。一根是，延长拉薩尔的审前羈押，其办法是国家檢察官扣留所謂罪证的文件不給偵查法官，直到把案件交給即将开庭的陪審法庭已經太迟为止。第二根絞索是，如果陪審团宣判拉薩尔无罪，那么就控告他唆使武装反抗軍隊和官員，这种做法首先蔑視旧的法律原則，即不得因同一違法行为对一个人进行两次控告，其次这种做法是故意胡說八道：号召拒絕納稅和进行武装反抗根本不是政治罪行而是一般罪行，因此不由陪審法庭审理而由違警法庭审理。这是破坏法律的混乱状态，当时甚至在普魯士司法界也很少見。

1849年5月3日，終於公开审理拉薩尔和韦耶尔斯的案件了。

拉薩尔事先就准备了自己的辯护发言，并且把它付印。有几張印好的辯护发言傳到了公众手里，拉薩尔对这件事并没有責任，可是清楚地知道自己会遭遇到什么事情的法院利用这种情况进行新的迫害。它用社会秩序由于拉薩尔的辯护发言似乎受到威胁为借口禁止旁听。在这种情况下，拉薩尔放棄了发言，并要求陪審員在他得到辯护权以前不要进行判决。少数几个陪審員想答应他的要求，可是大多数陪審員决定立即宣判拉薩尔和韦耶尔斯无罪。

拉薩尔的辯护发言是印好的。这个发言同馬克思在几个月前为反对类似的控告所做的发言有很大的不同。馬克思是对自己和陪審員說明历史情况，向陪審員分析德国革命的阶级斗争，在某种程度上让他们自己推論，政府在这个斗争中，叫他们扮演了多么可怜的角色，可是拉薩尔却投身于一个敌人的阵营，用鋒利的宝剑在敌人最密集的地方砍杀。他承认自己是革命者，是社会民主共和国的坚决拥护者，但是他不願在国家檢察机关面前把自己置身于这个立場上。他不想从革命者的立場駁斥檢察机关，而想站在它自己的立場上羞辱它，证实它叛卖了自己的原則。拉薩尔的辯护发言同馬克思的辯护发言不同，它不是历史研究而是被破坏的法律对它的破坏者的憤怒控訴。

拉薩尔对普魯士政变的原則性看法同馬克思基本相同。拉薩尔的发言中有許多点好像是《新萊茵报》的回声。但是在拉薩尔似乎同馬克思完全趋于一致的时候，又产生了使他们一再分离的矛盾。拉薩尔用不同的話表达了同馬克思相同的或差不多相同的意思，他說：“在各族人民的生活中，法制基础是一种不好的立場，因为法律只是社会的表現和书面意志而不是社会的老师。社会意志和社会需要变了，旧法典就应该进历史博物館，現实的新的模写，新的肖像代替它的位置。”但是拉薩尔立即轉而证明，政府通过反

革命本身粉碎了它的法制基础，然后补充說：“現在法制基础屬于我和我的朋友！从11月以来，我們就把它扣押下来了。革命从法制基础的立場出发变成了法律上的必然性。被杀害的法制基础的复仇女神現在与各族人民的需要竞相掌握武器。”就其内容和文体而言，这些句子都是馬克思很少写过的。

但是这个不成功的比喻在拉薩尔的有許多确当比喻的发言中是相当少見的。拉薩尔的发言决不是空洞的。如果拉薩尔的观点的內在邏輯开始破裂，它的发言的庸俗之处往往也就显露出来，这与其說是一件坏事，还不如說是一件好事。它恰恰证明了形式和內容間的紧密联系，內容不妥当，形式也就不妥当。当拉薩尔站在坚固基础上的时候，他的发言也就很有味道，处处充滿了革命力量。

的确，馬克思是用劍对敌人作致命的一击，而拉薩尔在用劍斬下敌人的首級以前，先在太阳光下把劍揮舞一番。馬克思說，消极反抗就像被屠夫拉去屠宰的牛犢的反抗一样，拒絕納稅派不願拿自己的脑袋去冒險，而沒有走革命的道路，这样馬克思已經說出了所有必要的話。但是，拉薩尔让同样的思想在眩目的光輝中嬉戏，也不是多余的。他說：“消极反抗是自我矛盾，是忍耐的反抗，是不反抗的反抗，这根本不是反抗……消极反抗只是內在的恶意而沒有外表的行动。国王取消人民的自由，国民議會为了保护人民而表示恶意。最普通的邏輯怎么容許一个立法議會做出这种无比滑稽的事情，怎么容許这个議會不干脆公开屈服于国王的命令，假如这件事不是太可以理解的話，它会是不可理解的！消极反抗是下述两个因素的产物：明确意識到有責任进行反抗，以及个人胆怯，不願冒生命的危險进行反抗，这两个动力可恶地結合在一起，在11月10日之夜生产了一个有病的孩子，即消极反抗这个患結核症的孩

子。”这种風格与另一种風格同样是好的，两者各用其独特的方式有效地推动了革命无产阶级的斗争。

陪审法庭宣判拉薩尔无罪以后，法院就执行它那漂亮的计划，又一次把他因同样的行为送到拿薪俸的法官面前。違警法庭也确实沾上了强迫它接受的污点，判处拉薩尔六个月徒刑。等到拉薩尔终于离开监狱时，德国革命已经结束了。

## 第四章

### 德国革命的尾声

#### 一 法兰克福和柏林

反革命派在維也納和柏林取得胜利以后，就力图解散德国国民議會。这个議會虽然是革命的十分堕落的产儿，但它毕竟还是革命的产儿。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民中一切还有反抗力量的分子都聚集在它周圍。法兰克福議會终于起了一种无功績和尊严可言的历史作用，假使它能起与此相反的作用就好了。

奥地利和普魯士的当权者对法兰克福采取的政策并不相同。維也納內閣希望实际上恢复旧日的邦联制度，这个制度保证它在德国占有統治地位，而却不使它对德国負有任何义务。奥地利的反革命派用最严格的形式把整个奥地利国家集中起来，同时宣称，它将在新組成的德意志国家中坚持自己旧日的地位。这不是别的，而是要使德国統一成为不可能。德意志—奥地利領土不能既屬於德意志邦联国家又屬於奥地利邦联国家。因此奥地利反革命派的德意志綱領就是恢复德国邦联議會。它决心大力执行这个綱領，它之所以暂时沒有这样做，只是因为匈牙利的胜利的反抗斗争阻碍了它。

相反地，普魯士政府想在革命的船沉沒的時候混水摸魚。《十字報》暴露了這個綱領，它說，國王堅決地但友好地同法蘭克福斷絕關係，用這種辦法消滅法蘭克福議會。當一位奧地利將軍把勃魯姆的首級輕蔑地扔到法蘭克福議會腳下的時候，普魯士國王流着同情的眼淚擁抱他的“朋友”加格恩。演喜劇受嘲弄，一向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命運，這一次他却有幸碰到了一個甚至他也可以嘲弄而且已經真正嘲弄了的喜劇演員。

加格恩和他的追隨者可以摘取他們早就以貪婪眼光睨視的果實的日子，似乎已經來到了。奧地利頑固地拒絕干預哪怕同德國的統一只有很少關係的事情，這就使得把普魯士皇權的美妙公之于世成為可能。奧地利人施梅林把假想的帝國內閣的假想的首相職位讓給了高貴的加格恩。在議會中開始了一連串的混亂的黨派鬥爭。1849年3月28日的帝國憲法就是從這些黨派鬥爭中產生的。

雖然這個憲法同邦聯議會的德國憲法相比存在一些重大的優點，但是它並不像自由派的神話中所說的那樣具有自由思想。即使像它的頌揚者所說的那樣，它的眼睛十分漂亮，可是它卻缺少能夠走進現實生活的兩條腿。這個憲法是以一部分左派人士同加格恩的保皇派所締結的、受到奧地利的惡毒詛咒的協議為基礎的。奧地利的大德意志派同普魯士的小德意志派之間的爭執，使左派的民主主義者得到的權力大於他們根據人數和才能所能要求的權力。他們首先反對普魯士尖頂盔下的德國統一，並在這個範圍內支持大德意志派，而這一派及其各邦分立主義的、反動的、教皇主義的組成部分，是一個至少同小德意志派同樣混亂的集團。可是，當奧地利反革命派以其強烈的中央集權傾向頒布3月4日的憲法的時候，一部分左派就轉向加格恩及共同黨方面去了。這一部分人表示，如果普選權和擱置否決權這兩點得到承認，他們就願意接

受世襲皇帝。

根据新宪法，帝国議會由一个邦联院和一个人民院組成，帝国決議必須得到两院的同意。邦联院由各邦政府和議院以相等的名額选举产生，而人民院則像左派所要求的那样，通过普遍、平等、秘密和直接的选举选出。左派的背叛分子对擱置否決权更为重視，根据擱置否決权，帝国議会在連續三次开会期間沒有更改地作出的決議随着第三次帝国議會休会应当成为法律，即使皇帝不同意这个決議，他也不能否決它。以最大的頑强性为这种幻想进行斗争这一事实，說明了当时的混乱。今天的帝国宪法既沒有規定皇帝的絕對否決权也沒有規定皇帝的擱置否決权；邦联議會大力扶植不可缺少的反动派，假如帝国宪法当时付諸实行的話，邦联院就会扶植这个反动派。

保皇派同参加它这一派的左派成員之間的協議之所以达成，只是因为奥地利代表的投票可以决定世襲皇权和擱置否決权能否得到承认。根据加格恩的綱領，新德意志和新奥地利之間的关系特別應該得到調整，法兰克福的奥地利議員开了一个玩笑，他們給普魯士国王端上一碗事先放了很多盐的湯。普魯士早就反对过擱置否決权。达成協議的两派用书面的格留特利的誓言<sup>①</sup>使自己暫時克服了一切恐惧的預感，即宪法一旦最終决定，他們就反对对宪法作任何重大修改或任何其他重大让步，不管这些要求是哪一方面提出来的。

制宪工作的告竣石是选举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为德国皇帝。在选举中有二百九十名議員投票贊成，有二百四十八名議員

① 格留特利的誓言是关于建立瑞士联盟的一种傳說，相傳这三个州的代表于1307年在格留特利(或留特利)会合，宣誓忠于联盟，共同反对奥地利的統治。

——譯者

棄權。奉命拿着虛假皇冠到柏林朝聖的莊嚴的代表團在德國漂泊了幾天，以免恰恰在4月1日愚人節這天到達目的地。代表團在避免完成偉業的日子不當而受到批評的同時，却不得不忍受許多讚美詩學的批評；在科倫，人們用嘲笑歡迎它。可是最大的失望在柏林王宮里等着它，在王宮的前室里侍臣就把代表團的團長“史詩吟誦者”西姆桑當作一個麻煩的請願人看待。

浪漫主義的國王本人在舊普魯士的對革命的恐懼和舊普魯士的并吞野心之間動搖不定。一方面，他厭惡法蘭克福的皇冠，正如他用優雅的方式所說，這個皇冠以其1848年革命的可惡氣味使他受到極大的污辱，這個革命是本世紀最愚、最笨、最壞（感謝上帝，雖不是最惡）的革命。他說，一個受上帝保佑的正統的國王不能接受這樣一個用污泥和粘土制成的假想的頭箍，而普魯士國王尤其不能接受，普魯士國王蒙天之恩，承受雖不是最古老的，但卻是最高貴的王冠。王冠決不是竊取來的，關於這個問題，大家知道，有一些人，如羅馬教廷過去和現在都有不同的看法。另一方面，國王看到，如果法蘭克福議會垮台，大事由王侯處理，侵吞鄰人財物的舊普魯士欲望就必然成為泡影。不可否認，這次在國王的浪漫主義氣質中忠实地反映了普魯士國家理性的兩難局面。普魯士的國家理性首先試圖“友好地”同法蘭克福決裂。

國王回答虔敬地靜候着的國民議會代表團的話是莊嚴而傲慢的。他自己在給本生的一封信中對這番話作了說明：“我不能答應你們，也不能拒絕你們。人們只接受或拒絕能被提供的東西，而你們不能提供任何東西；我和我的同儕都有這種看法。臨別時我告訴你們一個真理：只有軍隊能夠對付民主主義者。Adieu<sup>①</sup>！”事實

① 法語：再見。——譯者

上，这就是国王的答复的真正意义。国王的回答以一种威胁言詞結束，那就是对付外来的和内部的敌人从来也少不了普魯士的盾和劍。这就是公开宣布普魯士要掠奪德国革命的遺物，因为当时外部敌人在普魯士的盾和劍面前是平安无事的。

同柏林議會一样，法兰克福議會也在协商原則上栽了筋斗。浪漫主义的国王拒絕了皇冠，因为皇冠不應該由人民代表而應該由君主授与，他十分明确地提出問題：在德国誰是当权者，是君主还是人民？法兰克福議会被强力推回它不幸脫离了的革命立場上去。因此帝国宪法（尽管它有許多缺点）成了革命的标志，成了一切不願墮入三月革命前的专制政权之手的人們的旗帜。在爭取帝国宪法的斗争中演出了德国革命的最后一幕。

所謂最后一幕，并不是因为它碰巧以革命的失敗而結束，而是因为它必然以失敗結束。恩格斯在对事件保持着新鮮印象的情况下写道：“……認真对待运动的人并不認真对待帝国宪法，而認真对待帝国宪法的人却不認真对待运动。”<sup>①</sup>封建专制反动派在奥地利和普魯士取得胜利以后，帝国宪法对资产阶级有了更高的价值，但是这个阶级在1849年春天比在1848年春天还要軟弱和胆怯得多。它对帝国宪法最滿意的一点是，全面接受帝国宪法就可以最終於“結束革命”。为了这个目的它甚至像不久就表現出来的那样不擇任何手段。

与此相反，霍亨索倫的世襲皇权对无产阶级毫无好处，甚至帝国宪法中最进步的条文也只有它們能給无产阶级在某种程度上开拓通向坚决斗争（不是通向胜利）的道路时才对无产阶级有利。对于工人來說，更为重要的是，革命运动不能无声无臭地过去，人

<sup>①</sup>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33頁。

民主權的原則不能成為普魯士軍人的玩物。波爾恩在《結義報》上寫道：“最沒有道理的事情莫過於，要想為了世襲皇帝搞革命，要想強迫國王接受皇冠。”但是他補充說，人民代表可否成為君主的弄臣是一個迥然不同的問題。“我們人民有權向我們派往法蘭克福的代表宣告我們堅決不同意他們至今的態度；我們選民有權召回他們，如果他們不肯走就把他們趕散，但是王侯們沒有這個權利。我們支持法蘭克福議會，我們不願同時支持世襲皇帝；我們支持人民的自主權而不支持其他任何東西。”有了階級覺悟的無產階級，就從這個立場出發有力地干預了維護帝國憲法的運動。無產階級給這個運動提供了最勇敢、最不知疲倦的戰士。

比資產階級，而且也比無產階級強大得多的是小資產階級。爭取帝國憲法的鬥爭的聲勢及其成果決定於小資產階級的行動。帝國憲法最合這個階級，尤其是南德小資產階級的口味。新的統一容許各邦繼續存在，不過要稍稍限制各邦的自主權，絕妙的擱置否決權慨然允許隨時廢除皇帝和王侯，馬上成立可愛的偏狹共和國。當然對於民主派的小資產者說來，拿起武器維護帝國憲法也是一種過分的要求。可是他們曾經不止一次地宣誓，要為祖國犧牲生命財產，尤其是小資產階級中的農民階層對三月革命前的封建主義復活感到真正的而且也是應有的恐懼。只要有人為資產階級赴湯蹈火，資產階級也願意參加這個運動，它引誘小資產階級進行鬥爭，當然有一個條件，那就是在戰鬥開始以後就背叛他們，而無產階級也推動小資產階級進行鬥爭，當然有一個條件，那就是在戰鬥結束以後，實現它自己的要求。小資產階級本身在戰鬥開始以後認識到鬥爭的結果，因此在戰鬥結束以前就畏縮後退，於是維護帝國憲法的運動就進行得散漫無力。

這個運動的前景本來是不錯的。在法國，社會主義民主派正

对保皇反动派发动一次新的攻势；在匈牙利，起义的馬扎尔人在一系列的胜利中赶走了奥地利军队；在意大利，羅馬共和国抵抗着法国的干涉。在德国国内，一个强大的运动正在群众中展开；反革命越来越僭妄，它破坏了自己的誓約和諾言，三月內閣閣員又胆小怕事，这一切終于使得最迟鈍的爱国者也起来反抗。运动有足够的力量迫使德国二十八个邦政府承认帝国宪法；除去奥地利和普魯士，只有巴伐利亚、汉諾威、薩克森和維尔騰堡四个中等邦进行反抗，其中維尔騰堡也不得不投降。在普魯士和薩克森，議院要求承认帝国宪法。巴伐利亚政府和汉諾威政府为了防止提出这样的要求，只得用这种办法：前者不召集議院，后者解散了議院。在这个問題上，普魯士同深知霍亨索倫的秘密野心的中等邦之間存在着互不信任。4月3日，当普魯士政府敦促它們以及其他邦政府派全权代表到法兰克福为达成共同協議同国民議會进行談判的时候，这些邦保持极度的沉默。

現在就要看法兰克福議會能不能采取坚定的立場了。它在4月11日庄严宣布坚持帝国宪法和普选权，組成了一个三十人委员会，討論如何实行这种政策。委员会由同等名額的保皇派和左派的成員組成；一个有見識的人提倡这样一种策略：民主派分子不能前进得太猛，溫和派分子也不能过分落后。可惜他沒有說明，議會把一半挽馬駕在車前，一半挽馬駕在車后，它怎样能够前进，因此委员会的建議就让車子停在原来的地点。根据这些建議，首先是要劝告那些反抗的政府承认帝国宪法，其次是禁止这些政府压制人民合法地、根据宪法表达自己的意志，特別是在这决定性的时刻，这些政府不应使用解散邦議會或使它休会的权力。第三，自从帝国宪法通过以来，就为了奥地利的利益进行公开背叛的帝国摄政應該用他可以使用的一切手段为实现宪法而努力。經過三天辯

論以后，議會于4月26日費了很大的力气才放了这三声空炮。

与此同时普魯士政府也抛掉了假面具。它起先試圖同法蘭克福“友好地决裂”，后来这个計劃就由于中等邦的国王不願上当，由于日益增长的群众运动不是为了普魯士皇权的利益而是为了反抗普魯士皇权集結在帝国宪法周圍而失败了。加之普魯士的修改宪法的議院在2月底开会，第二議院表現得不肯順从，使政府大为不快。第二議院由反对政府的左派，即从前的拒絕納稅派，和康普豪森之流的資產者同俾斯麦之流的容克地主共处一堂的亲政府的右派組成，左派和右派的人数差不多相等。右派只是因为想在回答御前演說的奏折中承认1848年12月5日欽定宪法的合法性，才暂时集合在一起的；当他們以微小的多数达到这个目的以后，他們就分道揚鑣了。在修改宪法方面，容克地主的願望是沒有实现的希望的。此外，第二議院要求承认帝国宪法，解除非法对柏林宣布的戒严。在德国問題上支持政府的只是一小撮容克地主。俾斯麦由于对統一德国的斗争，对什列斯維希—霍尔斯坦人对他們的“合法的君主”的反抗进行嘲諷，由于发表了与“太古的”（連旧普魯士爱国者都这么說）奇談相似的言論而成为这些容克地主中的杰出人物。

但是，同十一月危机时的情况一样，現在进行行政变的容克地主也表明，他們懂得坚决行动，而資產階級却只善于无尽无休地空談。4月26日，国民議會放了几声空炮，4月27日普魯士政府解散了第二議院，命令威武的战斗部队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射击，同法蘭克福議會公开决裂。它在4月28日的一个照会中給帝国宪法写了休书，在同一天它号召願意同它一起建立德国的統一的各邦政府在柏林举行代表會議。它补充說，它已經采取了一些必要措施，以便在“可怕的危机”中对各友好的政府进行它們所希望和需要的援

助。普魯士政府自願为德意志各邦充当革命的劊子手，它希望德意志各邦因此而承认它的霸权。可能有人怀疑，这种政策是不是更沒有远見，更背信棄义；但是人們完全可以放心，普魯士在奧里繆茨受到哈布斯堡木棍，在华沙受到沙皇皮鞭的严惩是罪有应得的。

法兰克福議会还做了一次无力的反抗嘗試。5月4日，它根据帝国宪法規定8月22日召开新帝国議会，并定于7月15日进行人民院选举。由于大邦政府以及几乎所有中等邦政府的反对，选举只能在德国不到六分之一的地区进行，因此这个決議就又带有相当虛幻的性质，但是这种所謂离开“法制基础”的行动却成了保皇派潰散的第一个动因，人民运动开始爆发，保皇派也就随着潰散了。德累斯頓、萊茵普魯士、巴登和普法尔茨的起义使加格恩集团土崩瓦解，把法兰克福議会的权力交給了左派。

可惜这时左派也表现出可悲的无能。它沒有廢除背叛的帝国摄政，却通过一个由議会中的一些可笑人物組成的內閣受帝国摄政指使，它沒有集中和組織革命起义，却在号召和決議上浪費了寶貴的时间，这些号召和決議的响亮言詞同它們的內在力量成反比例。这些小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的典型人物是卡尔·福格特，他因为个人的安全沒有必要的保证，在紐倫堡扼杀了法兰克尼亚的革命。5月26日，代替逃走了的历史学家施滕策尔出席議会的威廉·沃尔弗在議会上說，議会應該停止向人民发布語汇丰富但不起作用的号召，如果議会想干点什么，就應該把帝国摄政当作人民的第一个叛徒宣布他不受法律保护，并用組織良好的突击纵队迎击日漸逼近的王朝反动派的軍隊。这时候福格特这个“帝国的酒鬼”扮演了道义上被激怒了的爱国者。两三天以后，議会就比它可爱的帝国摄政更早地逃出了法兰克福，可是它这时候也沒有投入巴登起义的陣营，而是到了斯图加特，在那里选举卡尔·福格特和其他四

个議員为帝国摄政。演过这出滑稽剧以后，議會至少还有幸被維尔騰堡政府用武力解散，就这样不光彩地消逝了。

普魯士政府懂得更好地利用这个五月。它召集了大部分后备軍，鎮压了德累斯頓起义，加强了柏林的戒严状态，逮捕了議會反对派的領袖瓦尔德克，以叛国罪对他进行凶恶的控訴，并在国境西部集中了强大的軍隊，以便鎮压莱茵省的騷动和德国西南部的革命。它的如意算盘只有一个大缺陷，那就是德国其他各邦政府虽然願意它担任劊子手的角色，可是却不想迷恋它那漂亮的眼睛。它費了九牛二虎之力迫使汉諾威和薩克森同普魯士締結了所謂三国王联盟，这个联盟存在期間也就是这两个中等邦处于困境的期間。这个新同盟的宪法是模仿帝国宪法制定的，它閹割了一切在帝国宪法中代表历史进步的东西，此外也稍稍限制了普魯士的霸权。这样做的目的是要使各邦分立主义感到滿意。这件事当然办不到，不过利用这个宪法扼杀普魯士的选举权的阴谋却实现了。这个宪法虽然表面上承认普遍的間接选举权，可是这种选举权既不是秘密的也不是平等的，这个宪法就这样拔掉了选举权的銳利的牙齿。为了这个虛幻的同盟文件，发明了公开的三級选举，在普魯士国家立即成为欽定的制度，作为普魯士对同盟忠誠的报酬。正如勃兰登堡—曼托伊費尔內閣在一个呈給国王的官方报告中用卑劣的嘲弄口吻所說，为的是不使人民在选举方面得不到公开性。

高貴的政变发动者現在已經积累了足够的經驗，知道他們可以向資產階級提出一切要求。以高貴的加格恩为首的保皇派的大人先生們不顾他們对帝国宪法所做的格留特利的誓言，6月底他們在哥达集会，以便庄严地否定三个月前他們同样庄严地宣布的宪法。因此他們宣称他們对普魯士政变准备同意的、包括三級选举在內的那种德国統一和自由感到滿意。此后在哥达集会的这些人

被人按照他們集会的地名称为哥达派，他們是政治上沒有节操的典型，他們十分高尚地认为，普魯士国王拒絕从人民手中接受皇冠是錯誤的，人們不願从君主手里接受統一和自由也同样是錯誤的。

資产階級的民主派墮落得不如立宪自由派这样厉害。可是6月中旬在克滕集会的以翁魯为首的从前普魯士的拒絕納稅派也仅仅决定，在三級选举成为欽定制度以后就干脆放下武器。当然像舒尔采—德里奇这样的小資产階級中比較坚决的分子和新創刊的柏林《初选人》报反对这样做。虽然三級选举制使小資产階級选民受到的損失比大資产階級选民大得多，可是他們本能地感到，絕對无為的決議（不管它是由受到損伤的正义感作出的，或者是由最高尚的动机作出的），是一个政党所能作出的最穩妥的決議。但是他們沒有达到目的；甚至像洛貝尔图斯这样的人也站到翁魯一边幼稚地希望，如果危險的拒絕納稅派从舞台上消失，資产階級会对专制君主和容克地主的反动集团进行比較有力的抵抗。

德国革命同死亡作悲慘斗争时唯一的希望之光就是为爭取帝国宪法而进行的起义。这些起义之所以不能胜利，一方面是因为法兰克福議會不起作用，另一方面也因为欧洲局势由于法国社会主义民主派的失敗，由于俄国侵入胜利的匈牙利而发生了彻底的变化。这些起义也完全沒有摆脱那些断送了整个德国革命的可悲的缺点、模糊看法和背叛行为。但是它們是挽救德国革命的唯一严肃认真的尝试，尤其是在无产階級参加起义的情况下，这些起义就成为无产階級历史中的光荣插曲。

## 二 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

在德累斯頓爆发了第一次起义。薩克森国王受柏林的教唆在

任何情况下都不承认帝国宪法。虽然资产阶级做了种种说服工作，指出籠罩全国的憤慨情緒，希望国王让步，可是国王仍然頑抗。5月3日，市民自卫团的示威和无产阶级利用軍械庫武装自己的尝试导致同军队发生了流血冲突，国王逃往科尼斯坦。但是流过鮮血以后，市民自卫团也小心翼翼地撤退了。5月4日成立的临时政府仅仅在极有限的范围内可以算做一个革命的政权机关。这个政府的三个成员来自薩克森邦議会的资产阶级反对派分成的三个小集团，他們的意見有很大的分歧。托特是三月革命前的一个自由主义化的官僚。霍伊勃納属于法兰克福議会的左派，他认真对待帝国宪法，而只有契尔奈尔一个人认真对待革命。可惜他也犯了錯誤，任命陆军中校海因澤为軍事指揮官。海因澤曾在希腊军队中服务，虽不是一个叛徒，却是一个毫无能耐的家伙。

挽救起义的首先是德累斯頓周圍地区的产业工人和农业工人的援軍。他們是街垒战士的核心，拥有巴枯宁和波尔恩这两个坚决而有能力的領袖。巴枯宁使临时政府摆脱了窘境，波尔恩善于帮助无能的指揮官。波尔恩在王宮大街上几个最重要的街垒上指揮战斗。他及时下令打通了前面是王宮后面是市政府的那些房屋的內墙，使得那些最重要的街垒成为不可攻占的。5月7日，当海因澤把自己交给政府军队的时候，波尔恩也实际上得到了軍事指揮权，他善于老练而冷静地指揮战斗。

既然外来的无产阶级的援助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德累斯頓市民自卫团的逃跑，那么起义的其他希望就在于全国奋起援助首都。但是这一点沒有做到，主要是因为萊比錫的资产阶级不肯支援起义。在大商业城市里，商业資本起着决定性作用。它不願参預像德累斯頓起义这样沒有成功希望的鹵莽举动。萊比錫是小王国的經濟中心，比德累斯頓的地位高得多，它的态度决定了其他城市的态

度。来自农村的孤立的援军不能支持起义；这支援军几乎不能弥补非凡的劳累在街垒战士队伍中造成的缺口。街垒战士不超过三千人，只有十分杂乱的武器，炮兵只有两三門小白炮，而政府却得到普鲁士军队的援助，最后有各兵种的部队一万五千人。起义者最好的来复枪的射程也远不及军队的圆锥弹枪，他們的四磅炮实际上只起发出响声的作用，而真正的霰弹之雨不断地倾泻在街垒上。

在这种情况下，起义从5月5日早晨到5月9日早晨一共进行了四天，这就更值得钦佩了。本来起义还可以再坚持一天，不过这样一来就可能遭到城市被完全包围，起义者准备好的一切退路都被切断的危险。因为外来援助的一切希望都成泡影，所以波尔恩认为（正如他自己所说），把两三千名勇敢的自由战士从专制政权的魔爪下撤走，比让他们受到无谓牺牲要明智一些。5月9日早晨，从十字塔上发出了向夫赖堡总退却的信号（每次三枪共放三次）。波尔恩正确地看到，萨克森的起义已经失败了，他要求撤退到山区，在那里起义者可以为德国西南部的起义保存力量。可是巴枯宁和霍伊勃纳不顾波尔恩的反对，向开姆尼茨<sup>①</sup>作没有指望的进军，这一进军使他們两人都落到政府军队之手。波尔恩好不容易逃脱萨克森近卫骑兵的追击，经过波希米亚到了普法尔茨。他在普法尔茨患了重病，进了斯特拉斯堡的一个医院。萨克森的其他战士积极参加了巴登—普法尔茨起义；他們在办公室里勤勤恳恳地工作，在战场上奋不顾身地战斗，这是他們与众不同的地方。

既然德累斯顿战斗的军事荣誉属于失败者，于是胜利者就用无比残忍的手段为此进行报复。以浮夸的侏儒外交家博伊斯特为

<sup>①</sup> 現名卡尔·馬克思城。——譯者

首的薩克森政府发布了与其說是曖昧不如說是明确的命令，說它不願出于俘虏太多而感到苦惱。薩克森的兵士对这个命令还不十分了解，普魯士的祖国拯救者帮了他們的忙。普魯士軍隊把手无寸铁的俘虏用刺刀刺死，或者把他們推下易北河。普魯士懲罰者的指揮官瓦尔德尔赛伯爵本人也承认这一事实，不过他还力图为这个事实辯解，他說薩克森的皈依者的坏話，說他們的行為比他們的普魯士老师还要凶狠。此外，在战斗期間用煎小牛肉喂养軍隊的德累斯頓庸人不得不忍受他們所供养的这些士兵對他們进行掠夺。萊比錫資產階級報紙事后也为此发出叫声。甚至卢格也为这件事比較明确地表示道德上的憤慨并发表了确當的言論，社会拯救者在被占領的德累斯頓所犯的罪行給他一个可怕的印象，在这种情况下他說，在革命使野兽变成人以后，反革命又使人变成了野兽。

可耻的法庭对侥幸生还的俘虏进行了迫害。从此以后，这个小邦的外交的幼稚姿态就带有費茨利普茨利<sup>①</sup>的特征。在博伊斯特的外交上的陰謀和趣剧早已被人忘記以后，瓦尔特海姆監獄墓地上的坟墓还会談論他。骯髒的食物、劳累的强迫劳动、囚徒服上都編有号碼，进行体罰时不許說話，不許給哪怕一点点鼻烟——这就是受到拯救的帝王神权对勇敢五月战士的报复。許多人就被这样慢慢折磨至死。有的人（如霍伊勃納）受了十年可怕的懲罰，有的人（如乐队指揮奧古斯特·勒克尔）甚至被折磨了十一年。勒克尔同其他一些著名的艺术家，如他的同事理查·瓦格納和建筑师哥德弗利德·澤姆佩尔一起参加了起义。巴枯宁被从薩克森監獄交給奧地利監獄，后来又被交給俄国監獄，以便把他放逐到冰天

① 古代墨西哥人和阿茨蒂克人尊奉的太阳神和战神，用人作牺牲祭祀他。——譯者

雪地的西伯利亚去。

同薩克森一样，西里西亚也发生了骚动，不过普魯士政府对于这个危险地区早就存有戒心。由于宣布戒严，在布勒斯劳建筑街垒的第一个尝试立即被扑灭了。别动纵队仍然控制着农村。政府在西部各省做了更多的戒备，莱茵地区的分散的起义一开始就没有成功希望。虽然如此，这里仍然发生了个别的武装冲突。

甚至资产阶级也开始采取敌对行动。5月8日，莱茵省的许多市镇参议会的代表在科伦开会，在法兰克福议会同普魯士政府的争执中，他们表示支持法兰克福议会。他们号召“莱茵省全体居民”坚决捍卫帝国宪法，要求法兰克福议会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使人民在对有良好组织的反革命势力进行反抗时能够团结一致和坚强有力。会议认为对后备军的征召是没有必要的、极端危害国内和平的措施，会议对勃兰登堡—曼托伊费尔内关表示了坚决不信任，最后率直地警告说，如果会议的意志不得实现，“甚至可能使普魯士不能保全现今的版图”。倘若这些话是既豪迈而又真实的，那么莱茵起义虽然在军事上处于劣势也会搞出一点名堂，可是会议的召集人执行的是同半年前柏林拒绝纳税派所执行的同样的政策：他们想引诱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赴汤蹈火，但以不危及他们自己的安全为限，他们的确善于巧妙地保护自己。

首先，贝尔格—马尔克工业区的后备军不肯穿上军装。爱北斐特和伊塞隆是这一反抗的中心。政府企图用武力把这个反抗镇压下去，但是暂时没有做到。一个步兵营，一个枪骑兵连和两门大炮在爱北斐特碰得头破血流后撤退了，开赴伊塞隆的步兵营根本没有敢对筑起街垒的城市进攻。听到军队从爱北斐特撤退的消息以后，杜塞尔多夫的工人也起事了，但是他们没有武器或者武器不好，因此经过一场激烈的街垒战斗以后，他们就被强大的驻防军打

敗了。佐林根的工人比較幸運，他們襲擊了格萊弗拉特軍械庫，用那里的武器武装了自己。在愛北斐特、伊塞隆、佐林根和哈根，區政權和地方政權被取消了，安全委員會代替了它們。

這次起義的命運決定於萊茵河左岸是否能夠援助萊茵河右岸，由於駐防軍占有壓倒的優勢，因此這是不可能的。同杜塞爾多夫一樣，科倫、科布倫茨、亞琛、特利爾的任何起義嘗試都必然以政府的勝利告終，而且也必然消滅貝爾格—馬爾克起義的最後希望。萊茵河左岸革命運動只能在小城市和鄉村里進行。這裡也不是完全沒有發生革命運動；紐斯和克姆彭發生了騷動，在伊曼特和席利的領導下，工人和居民襲擊了卜留姆軍械庫，金克爾和波恩的民主主義者對濟克布克軍械庫進行了攻擊。當然這些分散的衝擊不足以使貝爾格—馬爾克工業區感到輕鬆。在萊茵普魯士起義的這個真正的戰場上，由於資產階級的背叛和小資產階級的昏亂，一切都歸於失敗。資產階級在戰鬥開始以後不是逃跑，就是因為害怕神聖的財產受到損失而心勞神疲，小資產階級則寧願受背叛的資產階級籠絡，而不願受無產階級革命推動。愛北斐特安全委員會中的戰戰兢兢的小資產階級分子不斷為資產階級效勞，卻把從科倫趕來組織武裝反抗的恩格斯排擠出去。他們十分贊揚恩格斯的活動，可是又懇請他離開這個城市，因為他在城裡使得資產階級惶惶不安，資產階級時刻擔心他會宣布成立紅色共和國。一開始就聲明不願干涉運動的政治性質的恩格斯回答說，他不想勉強人家接受他的效勞，不過沒有安全委員會和指揮官的明確命令他不能離開已經接受的崗位。而安全委員會也就立即下了這個命令，指揮官在資產階級胆小鬼多次逼迫以後也下了命令。

不過普魯士將軍們的膽量也決沒有勝過這些胆小鬼的膽量。為了征服四個不設防的城市，這些謹慎的將領們組成了一支兩萬

人的完整的军队，并命令军队在鲁尔河后面占领了一个正规的战略阵地。这时爱北斐特的武装革命者认识到，资产阶级不过是在等待时机，把他们出卖给反革命，于是就杀开一条血路向起义的普法尔茨冲去，他们曾经遭到被煽动的农民和普鲁士枪骑兵的不断追击。舒了一口气的资产阶级立即命人拆除街垒，并搭起凯旋门以便迎接即将到来的军队。哈根和佐林根也由于资产阶级的背叛而落入普鲁士军队之手，只有伊塞隆在进行了两小时的战斗以后才被占领。

这时政府终于鼓起勇气对《新莱茵报》进行致命打击。这个报纸现有六千订户，比它在9月间受到迫害以前的订户还多；它已经成了一个革命力量，越是接近最后关头，它对反革命的打击就越频繁。当时，《十字报》给它提供了光荣的证明，说同它的粗鲁无礼的泰波拉索峰比较起来，就连1793年的《通报》也要黯然失色。<sup>①</sup>政变的英雄们不可能有同样的胆量，于是他们就求助于把马克思当作所谓的外国人逐出普鲁士的警察措施。正如警察当局宣称，其他编辑也有被驱逐出境的危险，如果驱逐不可能，那么就逮捕他们。他们遭到二三十次的控告。于是《新莱茵报》不得不于1849年5月19日停刊。

《新莱茵报》在用红色油墨印刷的最后一号中警告科伦工人不要在科伦进行任何变乱。“在科伦军事管制状态下，你们会遭到悲惨失败的。从爱北斐特的例子中你们已经看到了，资产阶级怎样要工人去赴汤蹈火，然后又极其卑鄙地出卖他们。科伦宣布戒严会使整个莱茵省精神沮丧，而目前你们只要一起义，戒严就会成为必然结果。你们的平静会使普鲁士人感到绝望。《新莱茵报》的编

<sup>①</sup>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十字报》一文。——译者

輯們在向你們告別的時候，對你們給予他們的同情表示衷心的感謝。無論何時何地，他們的最后一句話始終將是：工人階級的解放！”<sup>①</sup>馬克思用激烈的言詞譴責加給他的暴行：“那末你們干嗎要玩弄虛偽的詞句，製造荒唐的借口呢？我們鐵面無情，但也不向你們要求任何寬恕。當輪到我們動手的時候，我們不會用虛偽的詞句來掩飾恐怖手段。但是保皇恐怖主義者，上帝和法律所寵愛的恐怖主義者，在實踐上是殘酷的、卑鄙的、下流的，在理論上是胆怯的、隱諱的、虛偽的，而在这兩方面都是無恥的。普魯士政府的命令荒唐到如此地步，竟說……卡尔·馬克思‘粗暴地破壞了外人待遇法’。外人待遇法是厚顏無恥的侵略者 Vorder-Russen（博魯士）在我們自己的國土上給我們萊茵省居民欽定的，《新萊茵報》的確‘粗暴地’破壞了这个外人待遇法。我們覺得，我們應該因此受到萊茵省的感激。我們拯救了我們祖國的革命榮譽。”<sup>②</sup>弗萊里格拉特給遭到迫害的無產階級的先鋒戰士唱了令人難忘的告別之歌：

“不是公開戰鬥中的公開打——  
而是一種陰謀和奸計，  
這是齷齪的西方卡尔梅克人  
對我進行的卑鄙偷襲！  
從黑暗里飛來致命的悶棍，  
從冷不防的地方送來冷拳——  
我這驕傲的叛逆者的屍體，  
就這樣躺下命喪黃泉！”<sup>③</sup>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19頁。

② 同上書第603頁。

③ 參閱《德國詩選》，上海文藝出版社1960年版第342—343頁。——譯者

《新莱茵报》的編輯中，馬克思到了巴黎，当时那里的一場斗争勝負未分，到了6月13日，才以社会主义民主派的失敗而結束。威廉·沃尔弗到法兰克福議會去了，他力图促使法兰克福議會采取坚决有力的行动，結果沒有成功。恩格斯拿起了武器，参加了巴登—普法尔茨的起义，担任維利希的副官。参加过莱茵普魯士起义，由那里夺路而来的革命战士加入了維利希的志願軍团。

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同莱茵和薩克森的斗争的不同之处在于，这里是小資產階級独攬大权。事实上，北德革命在普魯士的十一月危机中已經决定了。在普魯士，資產階級上了反革命的圈套，北德小資產階級共同实行这种自杀政策以后，在普魯士权力范围内进行胜利的革命暂时是不可能的。德累斯頓和貝尔格—馬尔克工业区的起义过程消除了关于这一点的一切怀疑。而德国南部，尤其是德国西南部的情况却与此不同，那里資產階級和无產階級之間的对立还很不明显。

在巴登，几乎全部居民一致痛恨騎墙的、背信棄义的政府。甚至当大公答应承认帝国宪法的时候，人民也不肯罢休。遭到容克軍官虐待的軍队置身于革命运动的前列，帮助运动进行胜利的突破。邻近的莱茵普法尔茨不像巴登这样完全一致，因为那里有几个反动的行政区。可是莱茵普法尔茨也掙脫了巴伐利亚的枷鎖，这里也有一部分軍队轉向人民。除了老巴伐利亚軍队以外，南德的所有軍队都流露出昂然激奋之情。維尔騰堡、黑森、拿騷、法兰克尼亚的居民只在等待普遍起事的信号。如果巴登軍队向法兰克福推进，把德国国民議會置于自己的恐怖威力之下，那么整个德国西南部就成为革命的軍营，于是甚至在莱茵省也可能取得一个重大的胜利。

这一切希望和可能性都被在卡尔斯卢厄作为革命政权机关进

行統治的小資產階級的邦委員會毀滅了，尤其是被領導邦委員會的法蘭克福議會的一個左派議員布倫坦諾律師毀滅了。他堅決反對採取措施使這個小邦投入遠遠超過小資產階級視界的戰鬥。正如福格特之流在法蘭克福拒絕擔任德國西南部起義的領導一樣，布倫坦諾之流也拒絕向法蘭克福進軍。布倫坦諾本想通過革命運動當上大公的大臣，而現在他竟然坐在他逃走了的君主的座位上，却是大大違背他的願望的。他在做一切事情的時候，似乎都在考慮，當他的合法的君主回來以後，他如何為這些事進行辯解，因此他就利用他那幾乎沒有限制的權力，徹底破壞巴登—普法爾茨革命。一些比較堅決的分子試圖迫使布倫坦諾接受革命政策，可是由於布倫坦諾具有幾乎無限的聲望，這個企圖失敗了。當然，當布倫坦諾在即將開到的普魯士軍隊面前逃之夭夭，使巴登小資產階級落入報復成性的敵人之手的時候，這種聲望就變成了同樣程度的輕蔑。但是，這種感覺與另一種感覺——正是使布倫坦諾成為巴登小市民的寵兒的小資產階級的狡猾性出賣了巴登革命——同樣是正確的或是不正確的，這要看各人的認識而定。

巴登革命只停留於地方性起義一事一旦成為定局，這個革命的最重要的意義就失去了。但是，即使在这种限制下，布倫坦諾也沒有設法挽救革命。普法爾茨派人向他要錢、要大炮和槍支，他用空話把他們打發走了。他甚至不敢廢除還使巴登農民痛苦呻吟的封建負擔。他也沒有採取任何措施組織軍隊，而從5月中旬到6月中旬，他是有充分時間這樣做的。除了在巴登和普法爾茨轉到起義者方面來的二萬一千名常備軍以外，參加起義的還有八千到一萬名人民自衛團和一万三千名到一万五千名市民自衛團。這樣一支值得重視的兵力，却喝酒消遣，無所事事。起義開始階段擔任巴登軍總司令的濟格爾少尉由於熱情、勇敢而高人一籌，但在他偉大

的青年时代沒有获得必要的威望。負責陸軍部的其他軍官則什么也不干，甚至还不可靠。

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布倫坦諾才下令把巴登—普法尔茨軍的指揮权交給了波兰人梅洛斯拉夫斯基。梅洛斯拉夫斯基十分热情和干练地执行自己的任务，可是过去貽誤的事情已經无法弥补了。他在6月13日的日令中提到巴登的萊茵軍和尼喀軍共有两万人，其中只有三分之二可以用于战斗，最多只有半数可以投入正規会战。此外还有普法尔茨的軍隊，这支軍隊在其全盛时期有五六千枝枪和一千至一千五百把大鐮刀。它是山常备軍和人民自卫团混合編成的，紀律很差。完成作战准备的差不多只有維利希所部七八百人和萊茵黑森的志願軍团，可惜这个軍团的优秀战士却隶属于齐茨和路德維希·班貝尔格尔这两位善于逃跑不善于打仗的指揮官。

撇开布倫坦諾和他的邦委员会不談，軍事領導和政治領導也是不能令人滿意的。参加起义的波兰軍官大多是庸碌之輩，因为波兰流亡者中的最优秀的人物正在匈牙利戰場上活动。普法尔茨軍的指揮官施奈德將軍原来是个毫无能耐的大享口福的人物，可是他却有一个能干的參謀长泰霍夫。泰霍夫因为参加襲击柏林軍械庫而被判处十五年要塞監禁，后来僥幸从馬格德堡的地牢<sup>①</sup>里逃出来。除了泰霍夫以外，从前的普魯士少尉維利希是一个能干而勇敢的志願軍团指揮官。其他軍官的表現有好有坏，有許多人也沒有什么表現。显得比他們都出色的是約翰·菲力浦·貝克尔。梅洛斯拉夫斯基委任他为巴登人民自卫团的指揮官。自从汉巴哈大会时期以来，貝克尔越来越向革命的方向发展，他在瑞士民

<sup>①</sup> 原来是要塞的炮兵掩蔽部，后来用做囚禁犯人的牢房。——譯者

兵的汉纳毕辛学校里学习了军制学、战略和战术。

在资产阶级的行政机关中形成一种严重的追逐职位的风气，美其名曰“集中德国的一切民主力量”。同布倫坦諾和齐茨一样，阿尔諾德·卢格也暴露了法兰克福左派的弱点，因为他虽然没有成功但却頑固地追求巴登駐巴黎公使的职位。其他几个議員确实表现出，他們对于无休止的饒舌已經厌倦，能够做出較好的成績。在普法尔茨，德斯特尔成了所有进行实际組織工作的人們的首脑。在曼海姆，特吕茨施勒尔担任了民政委員。在巴登军队中，老施路費尔是个活跃的軍事委員，他的儿子也参加了军队。可惜有才能的“外国人”和“北德人”受到巴登和普法尔茨的偏狭精神的嫉視。

这时由普魯士亲王統率的一支强大军队正为扑灭这个内部分裂的起义而日益逼近。通过一个迅速的冲击扑灭巴登—普法尔茨的革命本来是一件輕而易举的事情，可是反革命却采取了一种十分謹慎的举动，它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南德部队和莱茵后备軍的士气不振。包圍了德国西南部起义的策源地的有普魯士的格呂本軍团和希尔什菲尔德軍团，由中小邦派遣的部队組成的波伊克尔邦联軍团，巴伐利亚的托恩和塔克西斯预备軍团，維尔騰堡在海耳布朗，奥地利在伏拉尔堡布置的两个監視軍团还不計算在內。仅格呂本、希尔什菲尔德和波伊克尔这三个軍团就有六万經過严格訓練并有充分装备的士兵，同两三千武器缺乏、訓練不足，而且在指揮上往往也有缺点的起义者相比，占有絕大优势。

起义的军队在战斗中通过一些令人哭笑不得的混乱的实例，证明它們缺乏軍紀，但也通过一些无比英勇的实例，证明無論如何它們仍然具有革命精神。在这些部队中战斗的共产主义者和无产者始終表现为最勇敢的士兵。在瓦克豪伊塞尔附近的决战中起义者遭到光荣的失敗，年輕的营长施路費尔陣亡。貝克尔率領他那

沒有受过訓練的人民自卫团如此巧妙而成功地掩护了从海德尔堡經過山区向卡尔斯卢厄和拉施塔特的艰难退却，甚至普魯士軍事报纸也对这一軍事功績加以贊揚。在拉施塔特城下，巴登和普法尔茨軍隊最后还剩下一万三千人，他們在牟尔克河畔又坚持了两天战斗，而且表現得这样勇敢，以致兵力大六倍的敌人只有迂迴經過中立的維尔騰堡地区才能击败他們。莫尔在这里头部中彈牺牲。在科倫的九月騷动以后，他逃到倫敦，为了在无产階級中重新进行鼓动工作，他在同年冬天就又回到德国。他在巴登—普法尔茨起义中也同平常一样，随时准备接受最危險的任务；在战斗开始以前，他在普魯士軍隊中为普法尔茨的炮队爭取到几个炮手。牟尔克战綫丢失以后，革命軍的殘部只剩下逃往瑞士这一条路。

反革命胜利了，但是它並沒有得到荣誉。相反地它却靠它的旧行当——屠杀来振奋精神。同德累斯頓的情况一样，在巴登和普法尔茨經過几次战斗以后，兵士也枪杀了許多手无寸铁的俘虏。整个起义被鎮压下去以后，在曼海姆、拉施塔特和夫賴堡設立了軍事法庭。这个法庭对自己的野蛮任务并不完全了解，它沒有判处革命战士死刑，而判他們长期的徒刑。于是从普魯士亲王大本营傳來一道設立新軍事法庭的命令，这个新軍事法庭的确懂得正确估价普魯士反革命的文明。它判处二十八个革命者以死刑，其中有特吕茨施勒尔和小学教师霍弗尔这样一些根本沒有参加战斗的人。被判死刑的人全都英勇就义，壮丽地表現了高貴的人性，而普魯士亲王在三月十八日以后逃跑时是完全丧失了这种高貴的人性的。軍事法庭判处其他六十八名自由战士十年徒刑。詩人哥德弗利德·金克尔同莫尔一起在維利希的志願軍团里当一名普通战士，他在牟尔克河畔战斗中受伤被俘，軍事法庭判他要塞监禁終身，后来普魯士国王“开恩”改判普通监禁終身。这是一个刻毒的

恶作剧，浪漫主义的国王由于“向上看”而对这种恶作剧非常热心。在拉施塔特的地牢里，无数的牺牲者无声无臭地死于饥饿、虐待和在潮湿、霉臭的洞穴中孳生的伤寒症。

此后，“炮弹亲王”的大名就在南德居民中间流传，正如在英国西部经过“血腥陪审法庭”事件后，杰弗雷斯的名字永远流传民间一样。<sup>①</sup>

### 三 德国的流亡者

1849年中期，德国革命结束了，白色恐怖笼罩着从曼海姆到默麦尔这一大片地区。白色恐怖使它的牺牲者在军法的枪弹下送掉性命或者在监狱里和罪犯教养所里受尽折磨。同1848年以前一样，只有秘密组织能在德国国内进行革命宣传。公开宣传只能从国外向国内进行。

只要能够进行革命宣传，就还不能认为它是毫无希望的。在法国，大局还没有决定，因此欧洲革命的命运也还没有最终决定。所以集中在英国尤其是瑞士的几千名德国流亡者希望在他们的祖国不久再爆发革命，并为此积极工作，这是可以理解的。革命的希望越是渺茫，他们所处的各方面都得不到安慰的状况必然更使他们的努力带有垂死挣扎的性质，当然也使他们的政治眼光更为阴暗。加之，德国流亡者集团十分混乱。凶暴的反革命势力甚至把最温和的反抗者也逐出国境；在德国流亡者之中，各种各样的反对派——从最怯懦的议员到最坚决的共产主义者，都有自己的代表。

想把这一群人团结起来进行统一行动的任何尝试从来就没有

---

<sup>①</sup> 参阅本书《人名索引》杰弗雷斯条。——译者

成功希望。如果这样做，这种尝试就沦为华而不实的号召，在开始行动时就要发生最卑俗的争吵。在流亡者之中，决定革命进程的阶级斗争不是停止了，而是必然要进行。在逃亡的苦难为了不断消灭阶级斗争而不断制造的幻想中，阶级斗争常常采取这样一种形式，只要胜利的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不“在良心谴责的大镜子中看到自己恐怖的巨大阴影”，这种形式就会使反革命感到安慰而不是感到忧虑。

封建专制反动派继续迫害流亡者，它在瑞士也大获全胜。同这个世纪的过去和后来一切斗争中的情形一样，瑞士的避难权在需要它显示力量的场合就不起作用了。正如马克思常说的那样，瑞士处在一个有过伟大历史的小国的恶劣情况下。它的政治手段不足以实现它的历史要求。它只有把自己的避难权置于某个有关大国的控制之下，欧洲反动派才允许它国内的民主发展。1849年，这种情况有了一个具有特色的表现，那就是晋升为瑞士联邦司法和警察部长的激进党人德律埃必须担任神圣同盟的捕吏的职务。这位魏特林的朋友把共产主义工人赶出瑞士。他迫使日内瓦的流亡者说出这样的话：“那么，在土耳其的半月旗面前把瑞士联邦的十字旗藏起来吧。在土耳其，如果捕捉流亡者的人去敲门，人们就抵抗而不是屈服。”德律埃在暴力压制下无力动弹，他呻吟着说，在政治中是没有正义可言的，他自己掏腰包给被他驱逐出境的流亡者路费和饭钱。

瑞士迫害流亡者的无益行动并没有因此得到重大改变。一年之内，瑞士驱逐了一万一千名定居瑞士的德国流亡者。大部分被迫移居美国，而压迫他们的君主正希望他们这样做。同往常一样，除了暴行还有诽谤。瑞士激进党人说被驱逐的流亡者的革命思想超过了一切理性界限，或者怀疑他们是密探。卡尔·福格特之流

的德国議員甘心充當他們的帮手，痛罵比較正直和积极的难友来換取自己的避难权。

这种阴谋活动的最凶恶的一次是1850年2月警察以所謂“穆尔騰的革命日”为名演出的一出武戏。德国流亡者中的革命无产者成立了工人联合会或者把从青年德意志和共产主义鼓动时期保存下来的分散各处的德国工人联合会的殘余重新組織起来。在日内瓦、洛桑、伯尔尼、苏黎世、巴塞尔、温特图尔等地有二十四個这样的工人联合会；各联合会的會員人数不等，最少的六人，最多达一百十二人。显然，會員們彼此都有紧密联系。领导日内瓦工人联合会的威廉·李卜克内西特別积极地执行这个計劃。

威廉·李卜克内西当时是二十四岁。他出生于黑森的一个官吏兼学者的旧家庭，他以优异的成绩很快地讀完中学，进了大学，結果認識到自己既不适合当德国官吏，也不适合做德国学者。1847年，当他正打算到美国去的时候，偶然碰到了—个瑞士教师，这次遇見促使他到了共和主义的瑞士，等待当时聚集在欧洲上空的阴云发出雷电。二月革命的風暴召唤他到了巴黎，只是由于患了重病他才沒有参加海尔維格的义勇軍。后来他又到了瑞士，并在巴登参加了司徒卢威领导的九月暴动，被捕后进了巴登監獄，直到五月革命把他解救出来为止。他进了約翰·菲力浦·貝克尔指揮的人民自卫团当炮手，是企图使布倫坦諾变得坚强起来的革命分子之一。为此布倫坦諾就让人把他扔进了拉施塔特的地牢。又一次获釋后，李卜克内西参加了維护帝国宪法运动。在日内瓦作为一个流亡者，他尽力使德国工人联合会变成一个坚强的組織并在一个社会主义綱領的基础上团結起来。当他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時候，李卜克内西就貪婪地閱讀过圣西門的著作。革命的实际經驗使他对于资产階級社会的階級斗争很快就有了充分了解。

他完全公开地为建立比较严密的德国工人联合会进行活动，并公开发出通知邀请这些联合会派代表出席 1850 年 2 月 20 日在穆尔腾举行的代表大会。可是，当十六个联合会的代表来出席这个代表大会时，他就被瑞士官厅以捏造的“计划武装入侵巴登”的罪名逮捕了。然后进行了大规模的侦查，这次侦查的官方的“总结”充分说明了这场风波的原因和目的。其中谈到的“有充分证据”的第一点是，在瑞士的德国工人为了进行新的革命而组织起来，这个革命不仅要消灭王权，而且还要消灭首先是德国的社会制度。第二点是说，把瑞士称为德国革命的策源地“在历史上是不符合事实的因此也是不正确的”，因为根据侦查记载，革命宣传主要是外国人和异乡人搞的。但是第三点又说，工人联合会同流亡者有紧密联系，但愿这种现象将使那些认为把流亡者首领驱逐出境是不对的人们平静下来。瑞士联邦委员会一方面使自己成为神圣同盟的工具，一方面又在责备它助长革命宣传的人和责备它迫害革命宣传的人面前推卸罪责。此外，它又根据这个贤明而公正的侦查，把派代表到穆尔腾参加会议的十六个工人联合会的会员，“除有瑞士国籍者外”，剩下的二百九十六个德国工人全部驱逐出境，并且通过外交途径把他们的名单交给德国各邦政府，而把其余的德国工人联合会“暂时置于警察监视之下”。

由于在瑞士的工人联合会受到破坏，德国流亡者唯一的、本来可以期望长期起作用的组织也就被破坏了。其他组织由于成分非常复杂，所以存在的时间很短。其中唯一值得一提的是“革命的集中”，在这个组织里各种各样的倾向混杂在一起——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几个盟员到南德民主派的温和分子。它是一个没有士兵的司令部，事实上它的核心似乎是由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军事领导人约翰·菲利浦·贝克尔、济格尔、泰霍夫和其他一些人组成

的。它派了两个特使到德国去，一个是大学生叔尔茨，他回来說，他发现所有可以利用的力量已經都掌握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手里；另一个是什列斯維希人布龙，他是三十年代的一个老革命者，先参加过被逐者同盟，后来参加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現在又为了革命的集中想把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一些支部和盟員拉过来。因此他被 1850 年根据原則拒絕了革命的集中提出的协定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开除。一个月以后当泰霍夫为了同馬克思和恩格斯再一次进行商談而到倫敦的时候，革命的集中已經瓦解了。

要使德国流亡者作为一个起作用的力量干預德国命运的唯一认真的尝试，是馬克思、恩格斯和他們的亲密战友进行的。6月13日的失敗以后，法国政府叫馬克思采取抉择：要么退居布列塔尼<sup>①</sup>，要么就离开法国。于是馬克思就迁居倫敦，流亡的最大痛苦在那里等待着他。但是这些痛苦同历史发展的可怕失望一样都不能使这个偉大天才发生动摇。馬克思立即在他从 1850 年 1 月开始主編的月刊《新萊茵报。政治經濟評論》上，分析批判他以战斗者的身分經歷过的革命。他的忠实助手是不久就从瑞士到了倫敦的恩格斯。《評論》的头三期几乎全是馬克思写的关于法国革命的文章和恩格斯写的关于德国維護帝国宪法运动的文章。在这些文章里，他們彻底清除了一切幻想，而又不陷入无用的悲观主义或卖弄聪明的刻薄批判。他們有力地驅散了一切掩盖革命失敗的原因的迷雾，同时也密切注意能够燃起革命之火的每一个火星。他們还不相信革命的風暴已經完全平息。

在这几篇論文里，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试图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当代历史的范围广泛的部分，找出它們的內在联系。他

<sup>①</sup> 法国西北部的一个半島。——譯者

們揭示了民主派的和反动的只提一般口号的政治空談家所忽視的階級斗争的明显的剧烈性。恩格斯根据德国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的程度指出，维护帝国宪法运动为什么失敗，而且必然要失敗。他在无情的批判中使用了最尖銳的詞句，但是他沒有因为德国革命的可笑的缺陷而忘記了它的可悲的严酷性。他在結束这篇論文时写道：“巴登人民身上本来具有非常好的軍事素质，但是从起义一开始，这些素质就被人濫用和輕視，所以就造成了我們……描述过的那个悲惨局面。整个的‘革命’变成了一幕不折不扣的喜劇，而唯一能够借以自慰的是在人数上六倍于我們的敌人，其胆量却只有六分之一。然而，这幕喜劇由于反革命势力嗜血成性，却得到了悲劇性的結局。在行軍中，在戰場上不止一次地惊慌失措的战士們在拉施塔特監獄的牢房里就义时却很英勇从容。他們之中沒有一個人求饒，也沒有一個人发抖。德国人民不会忘記拉施塔特的执行枪決的刑場和監禁囚徒的牢房；他們不会忘記那些下达这些令人发指的命令的統治者，同时也不会忘記那些因自己的怯懦而导致这样恶果的叛徒——卡尔斯卢厄的和法蘭克福的所有布倫坦諾之流的人物。”<sup>①</sup>德国人民，至少那个喜欢以“德国人民”自居的資產階級决不能抱怨恩格斯對他們批評得太严厉了。資產階級一次又一次地推举“卡尔斯卢厄和法蘭克福的布倫坦諾之流的人物”为自己的領袖，它把那些枪杀資產階級解放的勇敢的先鋒战士的“大人先生”偶像化了。

馬克思在法国革命中处理一个更加复杂得多的历史題材。唯心主义的政治活动家把法国革命看做，他們也必然把它看做是一堆解不开的乱麻；如果人們把事物的名称看做是事物本身，那么剩

<sup>①</sup>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34—236頁。

下的就只能是一个十足的謎。馬克思闡明了这些混乱的階級斗争的图景,因为他是从这些斗争的内在出发点,即在这些斗争中互相冲突的經濟矛盾出发来闡明这些斗争的。他在这些論文中往往用几句簡洁的話就說明了当代最复杂的問題。法国資產階級的最聰明的人物,甚至空談理論的社会主义者在巴黎国民議會中用好几天的時間討論劳动权的問題,而馬克思只用几句话多么圓滿地概括了这个口号的历史意义和失去意义啊!馬克思說:“在六月事变以前制定的最初宪法草案中,还提到了……劳动权,还提到了这个初次概括无产階級各种革命要求的笨拙公式。現在这个公式却已轉化为……享受社会慈善救济权,——但試問有哪一个現代国家不是这样或那样飼养着自己的乞丐呢?劳动权在資產階級的意义說乃是一种胡說,乃是一种可怜的善良願望,其实劳动权是表示控制資本,而控制資本又表示占有生产資料,使其受联合的工人階級支配,从而消灭雇佣劳动、資本及其相互間的关系。”<sup>①</sup>三十年后,当俾斯麦为了蠱惑人民企图把資本主义的济貧权轉变为社会主义的劳动权的时候,德国的博学之士不顾馬克思的这个經典性說明,再一次重复了1848年法国国民議會的全部混乱。1850年春天,馬克思根据确实的理由,面对着巴黎无产階級—社会主义选举的胜利和資產階級策划的反对普选权的阴谋活动,期待再次爆发法国革命,因此那些德国的博学之士就異口同声叫嚷說唯物主义历史观是空洞淺薄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进行文字宣傳的同时,又恢复了实际宣傳。他們成立流亡者委员会,改組了共产主义者同盟,这个同盟的老盟員差不多全都聚集在倫敦。除了莫尔之外,只缺威廉·沃尔弗,那

<sup>①</sup>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7頁。

时他还住在瑞士，1851年才到了伦敦。新的力量——維利希、李卜克内西和康拉德·施拉姆弥补了这些缺口。关于施拉姆，馬克思写道：“施拉姆性如烈火，胆量过人，从不受瑣事束縛，而在这种性格中又融合着批判的能力、独特的思考力、諷刺的幽默和天真的温情。他是我們党內的烈性人佩西<sup>①</sup>。”<sup>②</sup> 他們同宪章运动的最革命的一派，同法国的运动党和匈牙利流亡者接上了新旧关系。

共产主义者同盟由于在大陆上受到殘酷迫害，在比利时几乎全被掐死，在法国也已經完全瓦解了。艾韦貝克宣称，他的著述活动比共产主义宣傳重要，因而脫离了实际鼓动工作。可是在德国还有一些盟員在活动，还没有被反革命用暴力消灭掉的工人联合会、农民联合会、雇农联合会和体育协会提供了吸收新盟員的极好的場所。亨利希·鮑威尔被中央委员会以特使的身分派到德国去，他运用巧妙的外交手腕把已經变得死气沉沉的或者只打自己的小算盘的盟員，尤其是也把工人結义会的最有影响的領袖拉到积极的組織里来。又在汉堡成立了什列斯維希—霍尔斯坦的总区部；在施韦临成立了梅克倫堡的总区部；在布勒斯劳成立了西里西亚的总区部；在萊比錫成立了薩克森和柏林的总区部；在紐倫堡成立了巴伐利亚的总区部；在科倫成立了萊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的总区部。在哥丁根和斯图加特建立了几个直接同中央委员会发生联系的支部。年輕的米凱尔在哥丁根由于热心爭取工人階級专政而嶄露头角，不过他并不經常三思而行，因为甚至耶穌会的錢他也來者不拒。

1850年3月中央委员会告德国盟員书是从下述观点出发的：

① 佩西指英国亨利·佩西爵士 (Percy, Sir Henry, 1364—1403)，他外号烈性人。——譯者

② 參閱卡尔·馬克思《福格特先生》，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70頁。

“不管将来是由法国无产阶级的独立起义引起的还是由神圣同盟对革命的巴比伦的侵犯引起的”<sup>①</sup> 一次新的革命已经迫近。正如三月革命引导资产阶级到胜利那样，新的革命将引导小资产阶级到胜利，而小资产阶级将又一次出卖工人阶级。告盟员书把革命的工人政党对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态度总结为：“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一起去反对工人政党所要推翻的派别；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想要巩固本身地位来谋私利的时候，就要加以反对。”<sup>②</sup> 告盟员书说，小资产者将利用一个对他来说已经胜利的革命来改革资本主义社会，以至使自己的阶级，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工人在这个社会里过得比较舒服一些，过得去一些。可是无产阶级决不满意这种做法。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希望实行了他们的有限要求后便赶快结束革命，而工人的任务和利益却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都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直到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里的时候为止。”<sup>③</sup>

告同盟书警告德国工人不要被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宣传团结和协调所迷惑，而降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附庸。相反地他们应该尽量坚强地组织起来，以便在他们像过去一样勇敢而坚定地以自我牺牲的精神争取到革命胜利以后，逼迫取得胜利的小资产阶级接受一些条件，使得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统治一开始就具有复灭的根苗，使他们的统治在以后很容易就为无产阶级的统治排挤掉。“工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90页。

② 同上书第291页。

③ 同上书第292页。

人在冲突发生时期和斗争刚结束以后，首先必须尽一切可能反对资产阶级制造和平局面的企图，迫使民主派实现他们现在所说的恐怖言论。”<sup>①</sup> 他们应该尽可能长期地支持直接革命的热潮。“工人不仅不应反对所谓过火行为，不应反对民众对于可恨的人物或对于那些与可恨的往事有关的官方机构进行报复，不但应该容忍这种举动，而且应该负责加以领导。”<sup>②</sup> 在革命中，工人在每一场合都应该提出他们本身的要求，要求和在必要时迫使小资产阶级给予无产阶级以各种保证。工人应当使新统治者负责作出一切可能的让步和诺言，用这种办法使他们丧失威信。总之，从胜利的最初一瞬间起，工人所表示的不信任态度就不是针对着已被打倒的反动政党，而是必须针对着自己从前的同盟者，即针对着那个想要独占共同胜利的政党。

革命的直接成果就是选举国民议会。无论在什么地方，工人都应当独立提出自己的候选人，甚至在工人候选人毫无当选希望的地方也不例外。工人应当不顾民主派的词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估计自己的力量，并向公众表明自己的革命的立场。引起资产阶级民主派同工人发生冲突的第一个问题，将是消灭封建制度的问题。工人不能容忍，像在第一次法国革命时期那样，把封建地产交给农民作为他们自由支配的财产，也就是继续保存农村无产阶级并造成一个农民小资产阶级，这个农民小资产阶级一定会像法国农民一样经受一贫如洗和债台高筑的痛苦。他们必须要求把没收下来的封建地产变为国家财产，变为工人农场，由联合起来的农村无产阶级利用大规模农业的一切手段来进行耕种。这样，在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发生动摇的情况下，公有制的原则立刻就会获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94页。

② 同上。

得巩固的基础。当然在运动的初期，工人还不可能提出纯粹共产主义的措施，但是他们可以迫使民主派尽可能多触动现存社会制度的各个方面，破坏现存社会制度的正常发展，使他们自己丧失威信，并尽量把生产力、交通工具、工厂、铁路等等由国家集中掌握。工人应当极力引伸那些当然不会采取革命手段而只会采取改良手段的民主派所提出的主张，并把这些主张变成对私有制度的直接攻击。

中央委员会 1850 年 6 月的第二个告同盟书报道了同盟的情况，并提醒人们注意，尽量牢固地保持同盟对农民联合会和体育协会的影响，必要时把那些对革命有用的和忠实的、但还不了解目前运动的共产主义结果的人组织起来，成立第二种更为广泛的盟员组织。但是，扩大同盟的工作实际上没有得到什么成果或者成果不大，因为引起同盟的新发展的时势给同盟内部带来一场灾难。

1850 年夏季，人们越来越明显地看到，革命再起的希望破灭了。在法国，普选权被废止，而无产阶级并没有起来反抗；现在只有僭位者路易·拿破仑和君主主义的反动国民议会一决胜负了。在德国，民主派的小资产阶级什么也不干，自由派的资产阶级受了普鲁士政府的欺骗，而普鲁士政府则受了奥地利政府的欺骗，两者一起随着沙皇专制政权的口哨跳舞。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更容易理解的了，革命的潮水越是不可遏止地退落，遭到压抑、迫害和在千百种苦难中生活的德国流亡者就越紧张地企图堵住革命的激流，真正的革命越衰退，他们就越想制造一种人为的革命。这种情绪甚至掌握了一些优秀人物，不过更甚的是它不仅给幻想家、空谈家、狂人，而且也给投机分子、政治冒险家和骗子、警察密探和其他流氓大开方便之门。

只有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老近卫军没有做这种情绪的俘虏。马

克思和恩格斯并不咒骂反革命的胜利前进，而是研究这个原因。他们发现了从经济上解决政治之谜的办法。早在他们编的《评论》的二月号上，他们就指出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是“其意义超过了二月革命的”事件，这一发现所带来的成果甚至将会比美洲大陆的发现所带来的还要大。“在纬度三十度上的漫长海岸是世界上最美丽最富饶的地区之一，以前它几乎是荒无人迹的地方，而现在它在我們眼前正变成一个富足的文明区域，聚集着一切种族和民族的代表：从美国佬到中国人，从黑人到印第安人和马来亚人，从克里奥洛<sup>①</sup>和美司代佐<sup>②</sup>到欧洲人。加利福尼亚的黄金源源流入美洲和亚洲的太平洋沿岸地区，甚至把最倔强的野蛮民族也拖进了世界贸易——文明世界。世界贸易第二次获得了新的方向……由于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开采和美国佬的不断努力，太平洋两岸很快就会像现在从波士顿到新奥尔良的海岸地区那样人口密集、贸易方便、工业发达。这样，太平洋就会像大西洋在现代，地中海在古代和中世纪一样，起着伟大的世界交通航线的作用；大西洋的作用将会降低，而像现在的地中海一样成为内海。欧洲的文明国家要不陷入像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目前那样在工商业上和政治上的依附地位，唯一的条件就是进行社会革命；这个革命现在还不算迟，还能够根据现代生产力所促成的生产本身的需要来改变生产和交换的方式，这样，就可以创造出新的生产力，保证欧洲工业的优势，从而使地理上的不利条件得以弥补。”<sup>③</sup>在这个伟大的历史展望中已经包含着马克思后来说过的一种认识：归根到底，二月革命失败在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金矿的发现上。马克思越是深入研究世界经

① 南美的欧洲血统的土著后裔。——译者

② 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儿。——译者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63—264页。

济状况，他就越清楚地认识到，正如1847年世界商业危机是革命的母亲一样，逐渐恢复的、在1850年达到全盛时期的工业繁荣就是反革命的母亲。

当然这种认识就给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的流亡者所喜欢的暴力革命的游戏下了判决。一开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流亡者之中的处境就相当困难。他们对于唯心的谰语所做的无情批判早就激怒了感到自己被这种批判所击中的“感伤的欺骗者和民主派的空谈家”。这个批判不仅针对着像卡莱尔和基佐这样的三月革命前的大灯，而且也吹灭了像路德维希·西蒙和哥德弗利德·金克尔这样的民主派的小灯；前一种人在他们的精神世界同革命的阶级斗争接触时，就赶紧用木板把他们的精神世界钉死，后一种人则想作为反革命沼泽上的鬼火继续发出亮光。

使问题发展到严重地步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由于认识到反革命已经暂时代替了革命而对流亡者的革命幻想采取的不可调和的反对态度。这种对立一直扩展到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同盟的老盟员鲍威尔、埃卡留斯、普芬德、戴勒尔、弗莱里格拉特、斐迪南·沃尔弗都站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边，只有沙佩尔一人例外；新盟员除李卜克内西和施拉姆外，全都被流亡者的一般潮流卷走，想把同盟卷入他们的没有希望的暴动之中。他们的领袖是维利希，其次是沙佩尔。维利希是当时为数甚多的、理智往往受感情支配的感情共产主义者中的一个；他是个老军人，为人正直，十分自觉，没有受过经济学和哲学的教育，总是喜欢拿着刀剑冲锋陷阵。恰恰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发生危机的那几天里，泰霍夫也证明了这些旧军官虽然勇敢、能干，但他们根本不能接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他在给革命的集中的朋友们写的一封信中报道了他同马克思、恩格斯和施拉姆举行的一次会谈。十年后，卡尔·福格特事先不让

写信人和收信人知道,而且也違背他們的意志发表了这封信。今天这封信有时还被人用来中伤馬克思的人格。事实上,这封信只证明泰霍夫一点也不知道馬克思和恩格斯到底想做什么,也证明——正如馬克思所說,——他把会談中的笑談当做真話,而把会談中的真話当做笑談。

在1850年9月15日的中央委员会會議上,对立公开爆发了。馬克思、恩格斯、施拉姆、鮑威尔、普芬德、埃卡留斯这六个委員反对維利希、沙佩尔、弗倫克尔和列曼这四个委員。馬克思用下面一段話确切地說明了这个分歧:“少数派用教条主义观点代替批判观点,用唯心主义观点代替唯物主义观点。少数派不是把现实关系、而仅仅把意志看做革命的动力。我們对工人說:不仅为了改变現存条件,而且为了改变自己本身,使自己具有进行政治統治的能力,你們或許不得不再經歷十五年、二十年、五十年的內战和国际冲突,而你們却相反地对工人們說:‘我們必須馬上夺取政权,要不然我們就躺下睡大觉。’我們特別向德国工人指出德国无产階級不够成熟,而你們却非常粗劣地向德国手工业者的民族感情和等級偏見阿諛逢迎,当然这样做是比較受欢迎的。正像民主派把人民这个詞变成圣物一样,你們則用无产階級这个詞来玩这套把戏。你們像民主派一样,用关于革命的空話代替革命的发展。”<sup>①</sup>在这种对立之間沒有調和可言。挽救同盟的唯一可能性就是多数派的決議:把中央委员会迁往科倫,委托科倫区部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撤銷以前的倫敦区部,設立两个各自独立的区部,两者直接同共同的中央委员会发生关系。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編的《評論》的第五、六两期上广泛地

<sup>①</sup>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65頁。

論证了他們的观点。这是《評論》的最后一期合刊,其中首先有恩格斯分析德国农民战争的階級斗争,給德国宗教改革史揭去唯心主义的面紗的論文。在這一期的政治展望<sup>①</sup>(写于1850年11月1日)中,把四十年代的經濟史当做革命和反革命的政治史的实际基础首先加以論述。文章证明,随着1847年的危机时期而来的将是一个繁荣时期,这个繁荣时期在1850年还没有达到頂点。“由于太平洋上即将开辟新航綫,由于不久前荷兰殖民地的开放……,以及由于1851年将举办大型工业博覽会,〔梅林在此加了“英国的”一詞〕工业将会更加繁荣。当整个大陆还醉心于革命的时候,英国資產階級在1849年就极其冷靜地宣布举办这个博覽会。它举办这个博覽会,就会使它从法国到中国的所有僕从面临一次严重的考驗,使他們在这次考驗中必須表明,他們如何利用了自己的時間;就連全俄罗斯的万能沙皇本人也不得不命令他的許多臣下参加这次重大的考驗。这次产品和生产者的全世界大会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不論是給我們大陆民主主义庸人添了不少麻煩的布勒琴士和华沙的君主會議,不論是形形色色的 *in partibus*〔在異国的〕临时政府为了拯救人类而一再策划的欧洲民主主义者大会,都是根本不能与之相比的。这个博覽会是集中力量的令人信服的证明,現代大工业以这种集中的力量到处破坏民族的藩籬,逐漸消除生产、社会关系、各个民族的民族性方面的地方性特点。正当現代資產階級关系已經各方面遭到破坏的时候,展覽会在一个不大的地方展出現代工业积累起来的全部生产力,这同时也就是展示在动蕩不定的社会的深层已經創造了的和正在一天天創造的建設新社会的物质。”<sup>②</sup>

① 这篇文章的标题是《評論》,在俄文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上改为《国际述評(一)》。——譯者

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02—503頁。

英国工业的繁荣又反过来影响了大陆。“还在1849年夏天，在德国，特别是莱茵省，工厂生产情况就不坏，而从1849年底起，工商业开始普遍地活跃起来。这种再度出现的繁荣，我们德国的市民天真地认为是恢复秩序和安宁的结果，其实这完全是英国恢复繁荣和在美洲市场、热带市场上工业品需要量增加的结果。”<sup>①</sup>后来在法国出现了这种繁荣的征兆，《评论》对此作了如下的概括：“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资产阶级关系〔梅林引文中为“资产阶级社会”〕范围内一般可能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还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发生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大陆的秩序党各派的代表目前所进行的无休止的争吵是彼此为了使对方丢丑，……相反的，这种争吵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目前社会关系的基础十分巩固——这一点反动派并不清楚——，十分资产阶级化。一切想阻止资本主义发展的反动企图都会像民主主义者的一切道义上的愤懑和热情的宣言一样，必然会被这个基础碰得粉碎。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来临像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sup>②</sup>1857年的大商业危机证实了这个预言，从这时起，欧洲的革命发展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

《评论》从经济基础出发判断了1850年秋季的政治形势。它谈到当时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似乎要爆发的战争：“……为了……以威胁手段迫使普鲁士重新参加联邦议会，奥地利和南德意志的军队现已屯驻在法兰克尼亚和波希米亚。普鲁士也武装了起来。报纸大肆刊载各种有关军队的进军和反进军的消息。所有这一切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10页。

② 同上书第513—514页。

喧嚷正像法国秩序党跟波拿巴的爭吵一样，是不会有任​​何結果的。無論普魯士国王和奧地利皇帝都作不了主，只有俄国沙皇才能作主。反叛的普魯士最后必定会向沙皇的命令屈服，斗争的双方就可以不流一滴血，和平地坐在联邦議會里，但是，它們互相之間的无謂的嫉妒，它們与自己臣民之間的分歧以及它們对俄国最高統治权的不滿都不会因此就有任何减少。”<sup>①</sup> 在很短時間內，除了布隆采耳的白馬失去了“一滴血”<sup>②</sup> 而外，这些預言全都应驗了，奇怪的是，这滴血还没有被人用来“反駁”馬克思。

这篇評論的最后一段話是針對一个空話連篇的宣言說的。这个宣言是由馬志尼、賴德律-洛兰、卢格和波兰人达拉什組成的一個欧洲中央委员会为了把全部流亡者集中在一面旗帜下而向他們发出的。它归根到底只不过是“最普通的庸人之見”，根据这种意見，似乎革命的失敗是由于个别領袖爭相沽名釣譽，由于若干人民导师抱有互相敌对的意見而造成的。关于这一点，《評論》說：“在我們的福音傳播者看来，各个階級和各个階級的各个派別之間的斗争（它的个别发展阶段也就是革命）不过是互相矛盾的体系的存在可悲結果，其实完全相反，不同体系的存在是階級斗争存在的結果。单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宣言的作者是否認階級斗争存在的。他們借口反对空談家，而取消任何明确的内容，任何明确的政党的观点，否認各个階級有权表达自己的利益，提出与其他階級相对立的要求。他們建議这些階級忘記利益的对立，在十分庸俗而又露骨的态度曖昧的旗帜下求得和解，其实这种曖昧态度是在調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34—535頁。

② 布隆采耳是卡塞尔的一个村庄，1850年11月8日普魯士軍隊同巴伐利亚—奧地利軍隊在此作战，据說这次战斗中只打死了一匹白馬。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注298。——譯者

和一切政党利益的幌子下掩盖着仅仅一个政党——资产阶级政党的利益的统治……这些先生不仅憎恶发展和斗争，而且憎恶思维，即冷酷的思维，——好像任何一个思想家，包括黑格尔和李嘉图在内，任何时候都可能走到像他们把这种稀薄的污水泼在群众头上那样冷酷无情的地步！人民毋须乎关心明天，可以从脑子里除去一切思想；当伟大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日子一来临，人民只要一触动就会激动起来，这样，他们就会奇妙地看穿关于未来的谜。这个放棄思维的号召是专门直接欺騙最受压迫的阶级的企图。”<sup>①</sup> 欧洲中央委员会在它的宣言里引用了馬志尼的战斗口号——神和人民。《評論》說，这个口号在神与教皇对立，人民与君主对立的意大利可能有些意义，可是把德国假启蒙的最浅薄的骯髒人物約翰奈斯·隆格这种抄襲来的东西当成必定解决时代之謎的口号，就未免太过分了。对卢格來說尤其是这样，这一次他为了使利奧大为高兴而成功地评价了神与人的区别<sup>②</sup>。

欧洲中央委员会的宣言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一切革命游戏一样沒有发生任何作用。德国革命的历史結束了，德国流亡者的历史也結束了。响亮的言詞不能掩飾他們的内部分裂，越想掩飾，这种分裂就越琐碎地在私人的口角和冲突中表现出来。他們在美国报纸上又继续爭吵了几年。

从 1850 年秋天起，馬克思和恩格斯就完全脫离了这一切爭論。他們所关心的只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革命宣傳工作。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537—538 頁。

② 这里是暗喻三十年代末利奧和卢格之間发生的爭論。利奧曾指責卢格和所有青年黑格尔派相信无神論，指責他們看不見神和人之間的區別。——譯者

## 第五章

### 科倫共产党人案件

把中央委员会迁往科倫，并没有能够挽救共产主义者同盟，使它成为一个统一的組織。現存的对立爆发为公开的斗争，还在9月15日那次决定性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施拉姆就向維利希提出用手枪进行决斗，决斗在安特卫普进行，結果施拉姆受了輕伤。馬克思和恩格斯当然坚决反对这种做法，可是他們沒有能够阻止。

在爭論中，中央委员会的多数站在他們一边，但是这个多数并不代表盟員的多数。革命的漩渦給同盟带来的新盟員中的大多数人現在还在这个漩渦中漂流，他們沒有受过像鮑威尔、埃卡留斯、普芬德这些工人受过的鍛炼。9月17日，馬克思、恩格斯、鮑威尔、埃卡留斯、普芬德、載勒尔、施拉姆、斐·沃尔弗、李卜克内西和其他几个人退出的倫敦工人教育协会拥护維利希和沙佩尔，倫敦区部也是这样，它利用自己的全权解除了現任的中央委員的职务，把馬克思和他的同志开除出盟，并且选举了一个以9月15日的少数派为核心的新的中央委员会。虽然科倫区部接受了多数派在这一天給它的委托，选举了一个新的中央委员会，貝克尔、毕尔格尔斯和制雪茄烟的工人勒澤尔当选为中央委員，科倫区部还委托埃卡留斯为一方，沙佩尔为另一方各成立一个新的倫敦区部。可是

維利希和沙佩尔以向科倫派出特使作为回答，特使的任务是先用和藹的态度劝說那里的区部投降，如果达不到目的，就把这个区部开除出盟。科倫区部沒有投降，当特使宣布将它开除出盟时，它回答说，这样一来，旧的倫敦区部及其中央委员会就把自己开除出盟了。于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就分裂为两个集团。

維利希—沙佩尔分裂派表面上取得了胜利。不过它的存在只是为了堵塞自己的生命泉源。分裂派之所以造成分裂是因为它想进行革命游戏，可是革命游戏給它送来的不可靠分子——从空談家到狡猾的密探——越多，就越使它解除武装。分裂派在巴黎建立了三个新支部，然而这个成果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在这几个支部里，占統治地位的是那种凶暴而浮夸的吉卜賽人的热情，这种热情在三十年代的革命者身上还可以解釋，而經過一次实际革命以后就成为十分幼稚的了。維利希和沙佩尔在对他們的分裂派发表的宣言中也没有大大超出这个范围。在同“毫无組織能力，不能做任何实际工作的馬克思—恩格斯集团”进行的激烈爭論中，他們自夸是和“文人”和“只会写文章的”盟員不同的“行动者”。維利希在1851年1月写信給科倫的貝克尔，叫貝克尔使科倫駐軍革命化；并說如果科倫革命完成了，他本人是不会拒絕担負下一步行动的領導責任的。貝克尔在給馬克思的一封信中正确地刻划了这种革命游戏：“維利希的这些愚蠢行为将使許許多多的人倒楣，因为光是这样一封信就足以保证成百个审判‘煽动者’的法官拿到三年的薪金。”維利希秘密地向普魯士軍官寄发的要求他們进行革命的一份夸張的号召，不出三天就刊載在《十字报》上了。

此外，維利希—沙佩尔分裂派还参加了資产階級民主派的流亡者的一切唐吉訶德式的行动。維利希甚至追随金克尔首先参加了把德国革命建立在股票基础上的愚蠢行为。金克尔在拉施塔特

軍事法庭上就已經暴露了严重的軟弱性，由于普魯士国王的报复欲望，他才又得到殉难者的荣誉，他逃出施潘道監獄以后在倫敦扮演着一个被弗萊里格拉特写詩諷刺的有趣的沙龙蠱惑家的可疑角色。他学习科苏特的榜样在美国作了一次革命的乞討旅行。可是，因为他毕竟不是科苏特，所以他甚至也沒有像科苏特那样帶一大笔錢回来，而只帶回一千五百英鎊，其中約三分之一作为旅費和其他費用报銷了，为此发生了种种丑惡的爭吵。剩下來的錢存在一家英国銀行里，作为德国第一屆临时政府的經費，維利希以极大的热情参加了这一切假面戏。

旧同盟的骨干却十分认真地执行自己的任务。科倫中央委员会 1850 年 12 月 1 日的告同盟书絲毫沒有反同盟派的大話。相反地它毫不隱諱，內部分裂使同盟陷入混乱状态。派往南德、萊茵省、薩克森王国和西里西亚四处去的四个特使带来令人不快的消息；只有萊茵省还有一个比較严密的組織，就是这个組織也不强大；科倫区部和法兰克福区部一共只有十一个支部。

四个特使之一的裁縫帮工諾特荣克于 1851 年 5 月 10 日偶然因缺乏身分证明书在萊比錫被捕。警察在他那里查获了《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央委员会 1850 年 3 月和 12 月的《告同盟书》、貝克尔和毕尔格尔斯的信和一些人名住址。这些綫索和在汉堡被捕的店員豪普特的供詞使警察当局发现了科倫中央委员会。同盟的十一个盟員被控图謀叛国遭到审前羈押，这十一个人是：諾特荣克、貝克尔、毕尔格尔斯、勒澤尔、店員埃尔哈特和賴夫、裁縫帮工列斯納、化学师奥托和三个医生即丹尼尔斯、雅科比和克萊因。遭到控告的弗萊里格拉特已在倫敦，普魯士司法的力量达不到那里。

普魯士政府力图使这次控告成为一个轰动全国的行动。虽然

它并不是不知道同盟在当时的情况下，实际上没有什么危害，可是反革命需要一个可怕的密謀的恶鬼，来消灭资产阶级反抗的最后残余。过去陪审法庭在这方面曾經表示出某种必須压制的独立性。最后，問題就在于把政治警察由使它在瓦尔德克叛国案中当众出丑的、三月革命前的拙劣状态提高到甚至容克地主也能理解的、工业时代不可缺少的老练的国家技术的水平。科倫共产党人案件为这些崇高的目的提供了一个最好的試驗品；本想用来伤害资产阶级的武器可以在工人身上試試它是否鋒利。于是人們大肆宣揚說，科倫的被告是一个叛国阴謀的领导人，这个阴謀像吸血鬼似的紧抓住文明世界。

当然在这条光輝道路的开头就存在着一个似乎不可克服的障碍。警察和司法当局所掌握的全部证明材料，只能证明共产主义者同盟不是一个秘密阴謀也不是一个可怕的阴謀，而是一个秘密的宣傳协会，在 Code〔法典〕里并没有規定要惩罚秘密的协会。《共产党宣言》中的每一行字都抗議所謂要想进行阴謀活动的誣告，在諾特荣克那里查获的中央委员会的两个《告同盟书》只談到共产党人对未来的民主派政府的态度，因而根本没有涉及浪漫主义国王的現政府。事实上 1851 年 10 月，科倫上訴法院的檢察院也作了决定，认为缺乏起訴所必需的客观犯罪构成，因此必須重新开始偵查。

可是，要扫除的障碍越大，目标就越显得誘人。既然缺乏证据，那么政治警察就必須制造证据；如果资产阶级的陪审員在沒有证据或者只有伪造的证据的情况下进行判决，那么他們的名誉就更坏。1851 年春天被派往倫敦工业展覽会以監視德国流亡者的警察顧問施梯伯在諾特荣克被捕以后就得到了必要的暗示。在革命年代里他以热情的自由战士和拒絕納稅派的保护人的姿态度过了

艰苦岁月，可是在革命过去以后，他又怀着后悔的心情回到警察的美好生活里，甚至柏林警察总监馮·辛克尔代对于重新使用这个卑劣的、到处挨罵的人也不是沒有反对。可是王室之驚向他鼓动着仁慈的翅膀。自己也想做一个艺术家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阴險狡猾地对詩人和艺术史家金克尔“施恩”，判他在監獄里紡羊毛；当金克尔侥幸逃脫了这个把人慢慢折磨至死的境地以后，这位虔誠的君主写信給曼托伊费尔說：“这件事使我产生了一个想法，我不想把这种想法直接归于純洁的思想之列，这就是：施梯伯也許是揭露这一解救阴謀的組織的有价值的人物，也許他能使普魯士公众看到一出正当地渴望已久的戏，即一个阴謀被破获并且（首先）受到惩办。請您馬上任用施梯伯并叫他开始試驗。我相信这个想法会得到很多收获，我对这个理想的立即实现非常重視。”<sup>①</sup> 施梯伯荣幸地从国王本人那里接受了密探的任务，于是他就急忙施展他全部的密探伎俩。

他在倫敦很快就发现了維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存在，他命令同那个集团的秘书住在同一所房子里的密探罗伊特盗窃这个集团的来往信件。施梯伯善于利用这个宝物。他派密探弗略里到巴黎去，为的是在維利希—沙佩尔秘密同盟的巴黎支部里制造一个真正的阴謀，这个弗略里本名克劳澤，是一个搶劫杀人犯的儿子，从小就靠当窃賊、警探和教养犯为生。施梯伯以道地的警察眼光从偷来的来往文件中看出，巴黎支部給密探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他可以肯定在大家都在期待的政变前夕，波拿巴警察当局是会用感激的心情接受并利用一个給它准备好的阴謀的。

事情也就这样发生了。弗略里在巴黎支部里除了发现了几个

<sup>①</sup> 这封信的手稿載在卡尔·毕特爾著《1852年科倫共产党人案件在同时代报纸上的反映》一书中（1955年柏林版第17—18頁）。——原編者

道地的狂人之外，已經发现了一个腐烂透頂的家伙——舍尔瓦尔，他曾給普魯士駐巴黎公使当过間諜，他并不是如他自己所說的爱尔兰人而是一个与其說是体面的，不如說是不体面的萊茵普魯士人，名叫克列美尔，1844年他曾因伪造汇票被捕，后来从亞琛的監獄里逃出来。同他認識以后，弗略里的事情就更好办了。領導維利希—沙佩尔分裂派斯特拉斯堡支部的吉佩里希也是同一类型的人物。1851年9月，弗略里就把他的任务完成到这种程度，以致施梯伯和警監格萊夫只要来到巴黎作为一个旨在推翻法国宪法的密謀的发现者在救国的藍色烟火中发光就行了。在这种情况下，陰謀的司法范疇已經实现，因此1852年2月几个可怜的德国工人被巴黎陪审法庭判处长短不等的徒刑。舍尔瓦尔和吉佩里希被判八年監禁，看起来对他們的判刑严得多，其实只是一种障眼法。他們在判刑以后不久就从監獄里逃走了，因为波拿巴和普魯士的救国者一致认为，不能让这么有用的人躺在監獄里睡大觉。

这次警察远征虽然战果輝煌，可是还没有达到它本来的目的：它沒有提供对付科倫被告的材料。警察机关逮捕这些被告以后就想制造一个陰謀，而它不能使他們对这个陰謀負責。在巴黎支部中发现的一切关系，也沒有一个同科倫中央委员会或馬克思—恩格斯集团有任何联系。在罗伊特盗窃的文件中，的确有一个由馬克思和他的朋友签署的文件，可是这个文件是一个只有一行半字的无关紧要的声明，說他們在1850年9月17日退出倫敦工人教育协会。施梯伯弄到的真正有价值的文件同科倫被告人毫无关系，这些文件之所以有价值，只是因为它們——比如舍尔瓦尔和吉佩里希之間的具有施因德汉斯<sup>①</sup>風格的通信——必然使資產階級

<sup>①</sup> 施因德汉斯(意为屠夫汉斯)是十八世紀末德国萊茵地区一个强盜集团的首領約翰·毕克列尔的綽号。——譯者

陪審員吓得面如土色。

普魯士警察把它的活動場所遷到倫敦。參加維利希—沙佩爾集團的亨策少尉在這裡做了密探專業的最初幾次練習，不久以後的拉登多夫和維格爾斯案件將要表明他是這一行里的重要人物。可是從維利希—沙佩爾集團里發掘不出更多的人材，至少找不出可以用來反對科倫被告的人。這時已經當了普魯士駐倫敦公使館隨員的格萊夫叫密探威廉·希爾施無論如何要編造關於馬克思派的同盟秘密會議的記錄，不過不要編得太不像樣；以一個正派商人的身分僑居英國首都的弗略里也對這個密探說明了普魯士警察機關的願望：“文件是主要的東西；人們即使不能製造，也必須懂得給自己想辦法。”希爾施是漢堡的一個店員，1850年12月他戴着共產主義流亡者的假面具混進了一個馬克思每周同朋友們在其中聚會一次的私人團體，可是1851年1月就被揭發并被開除出去。“馬克思派”真厲害，它沒有提供一點可以用來對付科倫被告的東西。於是弗略里和希爾施就盡量自己想辦法，他們每周都在弗略里家里偽造“馬克思派同盟秘密會議”記錄。在弗略里家的上面一層樓上住着精明強干的格萊夫。他們把這些記錄賣給普魯士政府，得了一大筆錢，而普魯士政府以為有了這兩個不學無術的流浪漢的胡言亂語就掌握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最秘密的學說。

儘管“客觀的犯罪構成”日漸增多，普魯士政府覺得還不十分舒服。對科倫被告的口頭審訊由一個陪審法庭推給另一個陪審法庭。科倫警察廳、柏林警察總局、司法部和內務部經常對偵查的過程進行干涉，結果始終是：無中不能生有。它們甚至倒了個大楣，他們的主要證人豪普特被因他叛變而感到羞耻的親戚在開庭以前趕到巴西去了。這時公眾已經越等越不耐煩了。一年半以後，人們終於不得不決定拉開遮住這個轰动一時的戲劇的幕布。事情是

在采取最严密的預防措施的情况下进行的。經過仔細物色的陪審員是从統治階級中挑出的一群胆小鬼；政府当局直接違反法律，甚至在起訴书送達以后还禁止辯护人同被告交談；在普魯士国家一向善于組織盜窃信件的邮局的“暗檢室”受到了鼓励，这次表现出从所未有的能耐，使得辯护人得不到任何来自外面的帮助，而施梯伯則准备尽力一个接着一个地作伪誓。

审判从1852年10月7日到11月12日一共进行了六个星期。警察机关常常制造一些小的意外事件，比如拿出一个荒唐絕倫的文件，說是馬克思写的，可是立即就被揭穿是伪造的，此外，施梯伯企图把被告卷入舍尔瓦尔的密謀之中，因此他把許多杂乱的日期和人名混在一起，只要一种謊話說出以后不致立即被揭穿，他就敢說。舍尔瓦尔給吉佩里希的一封信里那尔多<sup>①</sup>之信宣讀了不下三次，为的是使陪審員明了共产主义的恶毒罪行。可是施梯伯的一切伪誓还不能促使資產階級陪審員的有限的順民理智或对神圣私有财产的深切关怀越过这个簡單的邏輯：人們不能使被告对警探在他們偵查羈押期間，在他們明白反对的組織中制造的陰謀負責。

施梯伯看到，他不得不施展他最有力的伎倆了。10月23日，他承认只有維利希—沙佩尔分裂派同舍尔瓦尔的密謀有关。但是他說，他将提供馬克思—恩格斯派的原本記錄，这个原本記錄是一位倫敦来的特別信使給他帶來的，它揭露了在萊茵省、在科倫，甚至就在法庭里的最可怕的陰謀活动。这位特別信使就是他的朋友格萊夫。这个記錄本里面就是弗略里和希尔施伪造的記錄。据說这个本子里的記錄是馬克思—恩格斯派的秘书H.李卜克內西和林格斯亲自記的并且他們还签了字。施梯伯一口咬定这个記錄本

<sup>①</sup> 里那尔多是德国作家福尔庇烏斯（Vulpianus, 1762—1827）写的一部强盜小說《里那尔多·里那尔迪尼》里的主人公。——譯者

是真的，理由很明显，因为这个记录本的内容同他从他的密探那里了解到的馬克思派秘密會議的情况相吻合。起初被告和他們的辯护人沒有材料揭露警察机关的阴谋，警察和邮政当局急忙采取措施切断可怕的馬克思从倫敦寄来的一切辯护材料。

但是普魯士国家的一切权力都不能使伪造的罪证生效。在科倫当地找到了林格斯和李卜克內西（伪造者連李卜克內西的名字都写錯了）的真正笔迹，尽管邮政局偷信，馬克思还是通过迂迴曲折的道路使辯护人掌握了必要的材料。施梯伯还做了一个最后的絕望尝试，他派警监戈德海姆到倫敦去引誘密探希尔施（答应給他固定的国家津貼）来科倫，在法庭上以H. 李卜克內西的名义发誓证明记录本的真实性。但是希尔施完全正确地預感到，由于这一冒险，他可能沒有拿到普魯士国家津貼就先当了警察当局的替罪羊和伪誓犯。他拒絕了这个誘惑者，却在維利希面前打开了他美丽灵魂的秘密櫥柜，維利希驅使他于11月6日向英国官厅作了声明，他无异发誓作证說，他是在格萊夫和弗略里的指使下伪造了记录本。于是科倫的代理人不得不說这个漂亮的证据是“不可靠的”，这是一个“倒楣的本子”。

宣判科倫被告无罪看来是必然的。德国和英国资产階級报纸让輿論对案件的不利結局作好准备。可是11月12日，陪审法庭却宣判十一个被告中的七个人有罪：勒澤尔、毕尔格尔斯和諾特荣克被判六年要塞監禁，賴夫、奥托和貝克尔被判五年要塞監禁，列斯納被判三年要塞監禁。这是三月事变以来陪审法庭的第一次墮落；它面临着一項抉擇，是对几个共产主义者进行司法迫害呢，还是在公众面前把丑行的烙印打在普魯士政府的額前？它决定采取司法迫害。

随后，在倫敦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殘余組織瓦解了。在解散

決議中举出的理由是，自从科倫被判罪者被捕以来同大陆的一切联系都已断絕，这样一种宣傳团体已經根本不合时宜。两三个月后維利希—沙佩尔分裂集团也就寿終正寢了。沙佩尔認識到“流亡者的愚蠢行为”的失策，維利希到了美国，在六十年代的內战中他作了將軍，很有声名。

德国工人运动随着它的最坚强的組織的解散，也就結束了它的第一个阶段。十一月政变后被逐出柏林的魏特林还在汉堡和阿尔托那进行了几个月的共产主义宣傳，并非毫无收获，他建立了一个解放同盟，使得毛布織工雅科布·奧多尔夫成了忠誠的共产主义者。可是早在1849年8月警察就找到了魏特林鼓动工作的綫索。后来奧多尔夫还受同志們的秘密委托到了英国，为的是同那里的流亡者商談在北德进行武装起义，可是由于以馬克思为首的一些人的劝說，他認識到这种企图是毫无成功希望的。魏特林逃到美国，后来就沒有再回德国去。他还做了一件有功的事，就是在侨居美国的德国工人之中开展了一个有力的运动，可是由于他固执己見并抱有空想計劃不久就又失去了在这个运动中的領導地位。直到他1871年去世为止，他和他为数甚多的家屬都靠他在卡斯尔花园，紐約港的入口倉庫当一个小職員掙錢糊口。他写下的最后的书面证言表明，他終於完全陷入固定观念之中，并計劃一个天文学的彻底变革，在这个变革中他将使地球再成为世界的中心。他死在对他的功过應該作出公正評價的时代的开始阶段。

好像是由工人結义会轉来的几个盟員使共产主义者同盟繼續存在了一个时期。在他們的种种实际活动中，只有保健协会得到了发展，这个协会的會員每月交很少的会費，生病时可以得到免費医疗并領到药物。到1853年春天这些协会才被禁止，那时政治警察用半年前在科倫共产党人案件中曾向革命的无产阶级拋出的法

宝在拉登多夫案件中向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拋去。在這個案件中，施梯伯表現了一定的邏輯性，他沒有把保健協會算做無產階級的災難而算做資產階級的災難。這些協會當然可以不再算做無產階級的組織；它們已經完全資產階級化了，資產階級把它們看做是減少城市濟貧預算的措施。自由派的慈善家們反對解散保健協會，他們的理由是，保健協會經常願意在警察監視下舉行集會。

在這些協會的命運中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工人結義會本身的命運。這個組織沒有明確的原則，在革命期間，無產階級的革命本能彌補了這個缺陷；可是當革命在維護帝國憲法運動中遭到失敗，工業繁榮開始迅速發展的時候，這個缺點就明顯地暴露出來。加之，波爾恩流亡國外，該組織及其機關報的後任領導人測量員施文尼格爾和排字工人甘洛夫又無論如何代替不了他。1850年2月20日至26日在萊比錫舉行了工人結義會總會，有二十五名代表參加，其中也有幾個是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盟員，如比斯基和施泰祥。這次會議表現出最堅決的傾向，即放棄重大的政治改革，走迂迴曲折的道路向資本主義社會乞求自力更生，因而得不到任何成果。法國無產階級由於六月戰鬥的流血犧牲，由於它最有才能的領袖的去世和逃亡，由於資產階級革命的失敗和資本主義生產力的蓬勃發展而醉心於這樣一種運動，用馬克思的經典的話來說“即放棄利用舊世界本身內的一切強大手段來變革舊世界的思想，却企圖躲在社会背後，用私人的辦法，在自身生存的有限條件的範圍內實現自身的解放”<sup>①</sup>。憲章運動失敗以後在英國無產階級中也產生了完全相同的傾向。相似的原因在德國工人階級中也就產生了相似的結果。誠然德國工人階級既沒有經歷六月戰鬥也沒有參加憲章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29頁。

运动，但是从它的发展还很不够这一点来看，它在革命斗争中做了同英法两国的工人阶级同样伟大的工作，也经受了同它们相同的苦难。它需要一个休养和恢复元气的時間，以便了解革命的惨痛教训，认识工业发展的甜蜜诱惑。

现在还不能肯定，是不是如恩格斯所说，因为工人结义会处于次要地位所以反动派让它存在了很长时间，或者是不是如许多迹象表明，反革命打算先彻底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然后再插组织在这个同盟中的工人联合会的马蜂窝。总之，工人结义会在1850年中期才在普鲁士、巴伐利亚和萨克森同时遭到破坏。那些邦的禁止政治团体互相联系的新反动结社法的规定在这一方面首先提供了一个借口。随着组织的瓦解，机关报也就停刊了。施文尼格尔由于所谓参加德累斯顿的五月起义被侦查羁押了一个较长时期，后来就被作为普鲁士生人从萨克森驱逐出境。甘洛夫还出版了《普罗米修斯》以代替《结义报》。这个周刊没有明确的立场，最多只是卖弄一种不明确的社会主义。《结义报》尖锐地批判蒲鲁东，《普罗米修斯》却以同样程度热烈颂扬蒲鲁东，它转载了卡尔·格律恩的淡而无味的文学作品，自己加上了很有才气的意见，说共产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关系就如占星术对天文学，炼金术对化学的关系一样。当《普罗米修斯》在普鲁士禁止出版的时候，它抱怨对一个“无罪的工人报纸”的残酷行为，这个报纸的任务是“扩大思想的明确性，说明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至少在最近五百年内是不可能的。”尽管这样小心地适应恶劣的时代，这个杂志的寿命已经有限了。甘洛夫被捕，1852年因“准备叛国罪行和有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嫌疑”被莱比锡上诉法院判处四年劳役。为了起到“警告”作用，萨克森内阁还把把这个可耻的判决印出来公开传播。

工人结义会在德国西北部维持的时间最长，施泰祥在那里把

这个組織的剩余成員集合在由他出版的《德國工人大厅》的周圍，这个報紙虽然也适应反动时代，但是并没有因此而損害自己的事业。共产主义者同盟被發現以后，施泰祥被捕，他出版的報紙也就停刊。他本人在偵查羈押期間設法逃到英国去了。

德国邦联議会用 1854 年 7 月 13 日的決議在工人結义会的坟旁鳴炮致敬，“为了公共安全，各邦政府”有責任在两个月內取締在它們轄境內仍然存在的、追求政治、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目标的工人联合会和工人結义会，禁止建立这些組織，違者严惩。这个非常法的主要制定人是邦联議会中的普魯士代表馮·俾斯麦。

## 第六章

### 五十年代

#### 一 政治衰退

国内流行的历史著作把五十年代的反动时期說成是一个阴郁的插曲，在这个只有苦难的时代里，恶神阿里曼用狡猾的手段作恶多端，善神欧尔姆兹德<sup>①</sup>作为一个高尚的忍受者过着悲惨的生活。但是，在严酷的现实生活中，事态的发展却完全是另一种样子，事态根据其实际前提条件必然这样发展。

普魯士的統一企图遭到了应有的失敗。霍亨索倫之鷹剛剛把中小各邦从革命手里拯救出来，这些邦就为了躲避掠夺成性的鷹爪逃到奥地利的怀抱里去了。沙皇把奥地利和普魯士当做自己的藩臣召到华沙，在那里为他們进行仲裁，命令他們保持安靜，恢复旧日的邦联。可是沙皇并不按照相同的藩臣权利对待他們；普魯士因为曾向革命献媚，必須受到懲罰，作为下級藩臣屈从于奥地利。普魯士爱国主义身受双重屈辱，它痛苦地呻吟着，但同时也表明了它无穷的忍耐性，因为它現在还在繼續制造最卑下的傳奇。据

<sup>①</sup> 阿里曼和欧尔姆兹德——扎拉图什拉特(約公元前一千年)所創古波斯宗教哲学中善与恶的拟人化概念。——原編者

說“高貴的霍亨索倫王族”勃蘭登堡伯爵從華沙回到柏林的時候，受到國恥的壓力，心碎而死，臨死說胡話還喊叫盾牌和寶劍。事實上這個老丘八是得了極普通的傷風而死的，那時他正準備高興地向奧地利競爭者卑躬屈膝，就像他在俄國君主面前那樣。一個“高貴的霍亨索倫王族”曾經同情還很軟弱的人民運動的這種說法，是不合普魯士歷史學家的心意的，因此他們根據文件肯定了上述事實。

曼托伊費爾向這個人民運動作了讓步，召開了議會，動員了軍隊，但是他不想進行攻擊，而是到奧里穆茨去，心情十分平靜地用書面肯定了普魯士的恥辱。他表示要悔改，只懇求允許他作為第二流的皂隸進行迫害活動，當時奧地利和中等邦正想利用這些活動鎮壓黑森選帝侯國人民對王朝政變的合法反抗和什列斯維希—霍爾斯坦人民反對丹麥的異族統治的民族鬥爭。曼托伊費爾還敢用這種“讓步”自夸，俾斯麥則在議院的公開會議贊揚奧里穆茨會議。相反地正確地感到奧里穆茨勝過耶拿<sup>①</sup>的舊普魯士外交官普爾塔勒斯寫道：“在我們的历史上沒有一次失敗能同奧里穆茨的失敗相比。為了穿着禮服挨一記耳光，我們召開議會，征集軍隊，我們談論奧地利的讓步，因為我們可以給劊子手雷希貝克在黑森提供一個幫凶，以拉繯人和窩主的身分到霍爾斯坦去，得意洋洋地用議定書和文書把我們的恥辱確定下來——這些事情是這樣令人氣憤，以致我找不到確當的詞句來表達。”奧里穆茨的恥辱對於真正的容克地主就像繭草對貓那樣具有誘惑力，而更可恥的反動人物就低聲說，只有通過外交上的失敗才能避免軍事上的失敗。事實上，動員軍隊暴露了在波森、什列斯維希—霍爾斯坦和巴登的可悲

<sup>①</sup> 指1806年的耶拿戰役，在這次戰役中拿破侖一世曾給普魯士軍隊以致命打擊。——譯者

的作战中已经表明的普鲁士军事制度的腐朽性。

普鲁士屈服后，邦联议会就恢复了，黑森选帝侯国的政变被用军事力量巩固起来，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被交给了丹麦的异族统治。包括普鲁士和奥地利在内的大邦利用暴力行动废除了公国的古老法律，根据这条法律只有丹麦王室的男系可以在这两个公国进行统治，现任统治者不久就要去世，这就保证公国永久脱离丹麦。1852年5月8日的伦敦议定书中规定，格留克斯堡家族在包括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在内的整个丹麦王国拥有世袭权利，因而排斥了根据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法律有权执政的奥古斯滕堡家族，而这个家族的首脑用两三百万元的代价出卖了他天赐的权利。重新建立起来的邦联议会向中小各邦发出了消除三月革命成果的信号。在大多数邦里，在萨克森、汉诺威、维尔腾堡、拿骚、两个黑森和其他邦，这一工作是在君主公开背弃自己的誓言和诺言的情况下完成的；只有巴伐利亚和几个小邦，如不伦瑞克、科堡、梅林根、奥尔登堡和魏玛还在这块礁石周围徘徊，虽然它们大多数也在反动的河流里航行。

奥地利邦联国家的首相施瓦曾贝格曾提出一个口号：必须使普鲁士屈服并把它消灭掉（il faut avilir la Prusse et puis la démolir）。现在他好像达到自己的目的了。普鲁士确实脱离了大邦的行列，在德国，它的“民族使命”受到极大蔑视。甚至忍耐之父阿伦特也给普鲁士的霸权唱了离歌：“许多事情都得到原谅，被人遗忘，但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和黑森不在此列。”可是普鲁士霸权在这些日子却扎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牢固的根。奥地利和中等邦的政策没有能够对它进行决定性打击，即摧毁关税同盟。这种政策费了很大力量阻止重订1854年1月1日期满的关税同盟条约，可是经济发展的不可抗拒的否决使它栽了跟斗。关税同盟不

但沒有被摧毀，而且由于汉諾威、奥尔登堡和德国西北部的几个小邦的参加而扩大了，这几个小邦过去自己組織了一个“賦稅同盟”，它們有三千五百万<sup>①</sup>人口，九千零四十六平方哩的面积。

在普魯士国家内部，反革命派也得出一条經驗，它的政治全能由于經濟状况限制而产生了一定的界限。自从工人階級受到箝制，小資產階級以及比較坚决的資產階級不問政治以后，普魯士的反革命力量得到相当自由的发展。只受到最軟弱的資產階級分子支持的哥达派的对抗是无足輕重的。急性子的容克地主也花了十年左右的时间力图回到三月革命前的状况中去，但是沒有成功。哥达派感到自慰的是，人們也許还可以杀死自由这只小鸡，但是却不能把它放回破蛋壳里去，这时哥达派就暴露了道地的資產階級本能。

当然他們很需要安慰，因为官僚—容克老鷹已經把这只小鸡抓得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这老鷹根本不考虑什么良心和法律；人們可以容許資產階級殉难者在五十年代充分贖回他在革命年月所犯的罪惡。它又把权力交給了王室和容克地主，这个权力被充分用来压制它。可是，因为它甘心在这个痛苦之湖里游泳，甚至不用自己的力量游出来，所以为这件事情訴苦的工作就可能留給它那些痛哭流涕的女人。在我們这里，重要的只是从五十年代的历史中确定那些对德国无产階級的命运发生某种影响的事实。

1849年夏天，根据欽定的三級选举制进行的选举終于得到了符合勃兰登堡—曼托伊費尔內閣的心願的結果。1848年柏林議會中的极右派在新的議院里是极左派。它們的这种特性在1852年和1855年的选举中从反动的意义上來說尤为明显。頃刻之間，1848

<sup>①</sup> 疑为三百五十万之誤。——譯者

年12月5日的欽定宪法中的三月革命的成果被一扫而光。这个宪法由一张整洁的纸变成许多纸片落到地上，每个官僚都用它擦笔尖，每个容克都用它擦皮鞋。议院几乎时刻都准备破坏宪法，加之，只要政府认为破坏宪法是必要的，而不是就像不存在宪法似的不理它，卑鄙的最高法院就帮忙对不中意的条款作相反的解释，尽管它们的原意是十分清楚的。政府以“古代的坦率态度”（一个爱国的历史学家这样叹息说）用冷静的声明来对抗对宪法的任何引证：问题只在于，正式修改这个条文呢，还是在行政途径中迴避它。

在用暴力最后消灭三月革命的成果的时候，人们在市民自卫团法案上作出了一个十分特殊的例外。这个法案被停止实施，但是没有被廢止；人们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到角落里，像一件小家具那样预备将来需要时再用。对于迅速而尖锐地展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的设施必须宽大对待。可是保护个人安全的法令被廢止了。1848年4月8日的法令已经被欽定的三级选举制扯碎。官僚—容克反动派很希望使1848年4月6日的法令遭到同样的命运，但是在这方面它的权力达到了极限。

只要可能，反动派就彻底破坏这个法案。代替不交保证金的出版自由的是交保证金和印花税的出版法案，这个法案容许警察采取类似检查的预防措施，还容许其他种种阴谋诡计。政治犯罪和违犯出版法的罪行不由陪审法庭审理而由拿薪俸的法官审理，为了处理重大案件，设立一个作为特别法庭的国事法庭。不分宗教信仰都可以享受国民权利这一点在迫害成性的正統派的統治中得到实现，这种統治特别对学校施加暴力。新的纪律法破坏了法官的独立性，1850年的惩罚法给司法界野心家的功名欲开辟了无限的天地。新刑事法规惩罚教唆不服从法律或政府命令，惩罚反抗官吏（不管这些官吏的行为是否在他們合法的职权范围之内），

懲罰公开贊同被禁止的行為，破壞社會安寧，挑撥居民階級相互仇恨，所有這一切在普魯士法里都沒有規定。新刑事法規不僅保護擔任公職的人員不受侮辱和誹謗，而且也保護國家機關和政府法令不受歪曲、誹謗、挑撥仇恨和蔑視。事實上這就使得對政府行為的否定性批評以及證明這些行為違法成為不可能。1850年的命令扼殺了得到法律保證的結社和集會自由。結社法規頒布了，規定社團必須向警察當局提出會員名單，這件事本身就帶有明顯的告密性質，給警察的登記簿提供了合適的材料並且容許政府處罰和迫害那些參加不受欢迎的社團的人。禁止政治團體彼此發生聯系的命令削弱了現代政黨的發展。一切會議都要向警察當局提出申請並受警察監視，這就允許任何下級警官在任何時刻解散任何會議，在最壞的、最罕見的場合，他除了受到上級的鼓勵性的叱責以外不會受到更多的處罰。可是政府是紅着臉頒布這個漂亮法令的。它說不出頒布這個法令的理由，於是它的議院里的幫手只得結結巴巴地說，這純粹是一種臨時措施，對困難時期是有幫助的，將來情況好轉，這個法令還是要廢止的。可是大家知道，直到今天它的絕大部分條款仍然有效。

官僚一容克反動派做到了這一切。它所沒有做到的或者沒有完全做到的是取消1848年4月6日法案的真正精華，即確定國家預算和批准稅收的權利。批准稅收的權利已經被簡化到聯合議會曾經有過的權力範圍，即批准新公債和新稅收，同樣確定國家預算的權利也被人懷疑，因為人們問道，假如不通過預算法案，那麼怎麼辦。認真說來，這個問題當然不是什麼問題，因為確定國家預算的權利就其歷史意義和實際意義而言就是，政府不可徵收議會沒有批准的賦稅。1848年的議會也是這樣看的，可是，為了盡量牢固地抓住這個權利，議會在康普豪森內閣的憲法草案第九十九條中

保留了这个权利，规定每年必须预先做出所有国家收入和支出的概算，然后列入每年由一个法案确定的国家预算。议会以为庄严的法律形式使得人民代议机关确定的预算成为更加不可侵犯的，可是康普豪森—汉泽曼内阁也许已经想到宪法第六十条，而勃兰登堡—曼托伊费尔内阁肯定想到这一条，它规定任何法案须经国王和两院一致同意。官僚—容克反动派由第九十九条和第六十条得出结论，人民代议机关对政府拟定的预算只能作政府好歹可以同意的修改。1849年的第二议院在向反动方面修改宪法时，断然否决了哥达派宣告第九十九条的真正意义的提案，当然也不回答它自己提出的问题，即如果国王和议院不能对预算法案取得一致意见怎么办。它让这个“缺口”存在下去，必要时再根据它自己的喜好填补它。不过暂时还没有这个必要。相反地，既然反动派对批准税收和国家预算的权利这样裁剪或放松，使得必要时一斧子就能把它砍倒，那么它就不能过早地暴露自己迫不得已的原因和内在的空虚。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用简单明了的话说出了这些原因：“如果回忆一下1842年至1848年的财政困难：如企图向海外贸易公司和国家银行借款的行为徒劳无益，路特希尔德加以拒绝，联合议会否决贷款，国库枯竭，如果用这一切比较一下1850年的财政活跃的情况——三次预算中的七千万的赤字两院同意弥补，债券和国库券大量发行，政府与国家银行的关系比任何时候它与海外贸易公司的关系都要好，而且另外还有三千四百万批准作为储备的贷款，那末，这两种情况是多么明显的对照！”<sup>①</sup> 财政困难使得露骨地回到三月革命前的状况成为不可能；没有立宪制，普鲁士国家就不能存在下去，容克地主的野心不得限于使普鲁士的立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66页。

宪制度成为一种假象。

但是不仅是財政困难給官僚—封建反动派設立不可克服的障碍。在社会方面以及政治方面它也必須有所节制。它又恢复了領地警察，封建的县和省的等級會議。它用易北河东的容克地主占固有多数的貴族院代替了第一議院，从而給那个中世紀的組織戴上了桂冠。一旦三級选举制失效，这个十足違反宪法的畸形产物就会破坏整个立法。两院同它們的“革命名称”一起消失了；代替它們的貴族院和众議院組成了有中世紀色彩的邦議會。不过从这里也可以看到維持領主和农民的关系是不可能的。一切封建主权的这一基础必須清除。容克地主骨子里十分害怕农民，因此他們自己就不得不往这个方向走。他們看到——后来的一个內閣說得好——“如果問題不作比較輕率的处理，那么不久就必然得到滿意的解决”。拉薩尔把这悅耳的詞藻翻譯成有力而确切的話：封建精神感觉到它的寿命不长了，于是迅速地又把两只手都伸进人民的口袋，以便在鸡啼以前利用新的暴力把它的封建占有变为资产階級的占有。

1850年3月2日頒布的領主和农民关系的調整和贖买法令把手深深地伸进人民的口袋里。二十几种次要的負担被无偿地廢除了。正如內閣所說，这些被廢除的負担“只是对于义务者自由支配地产的一种麻煩的限制，而对权利者或者不提供物质利益，或者只提供一种很少實現的、取决于完全偶然的情况、因而根本不能用錢估計的利益”，此外还有几种貢稅<sup>①</sup>。大多数貢稅必須贖免，比如每种有相当收益的封建义务以及无法計算的勤务，早在1820年普魯士法律就承认这些义务和勤务具有純封建性质，以致拉薩尔

<sup>①</sup> 向領主繳納的貢稅(Laudemium)；从前农民在出賣地产时向領主繳納的一种手續費。——原編者

有理由譴責要用錢贖免这些义务和勤务是富裕的土地貴族对穷人进行的一种非法的、違反自己的法律意識的掠夺。这一次調整和贖免的范围扩及到整个农民階級包括沒有車馬的小农在內。容克地主正想扫除障礙，把湖里的魚全部捕光。

得到調整的只有 12,706 个农户，而根据 1816 年的統計，仅西里西亚一地就有 25,000 个农户。在三月革命前的几十年中，容克地主就这样彻底地剝夺了农民的不可靠的占有权。贖买的范围广闊得多，同时容克地主作了某些让步，把封建負担折成貨幣地租或谷物地租，繳納地租的十八倍（从前是二十五倍）就可以贖免封建負担。用国家資金、依靠国家保证建立的地租銀行办理繳款手續，向地主按二十倍繳納地租，同时农民如果在五十六年中把每年应繳的偿付清楚，就可以摆脫所有的义务。到 1865 年为止有一百万以上的农民办完贖买手續。

經過贖买和調整的农民所付出的資本为 19,697,483 塔勒，付出的租息为 3,890,136 塔勒和 55,522 雪菲尔的裸麦，此外他們还让出 113,071 摩尔根的土地。根据一个官方統計人的計算，1816 年到 1865 年的整个“农民解放”迫使农民总共花費了 213,861,035 塔勒。但是这个数字是太小了。因为那个統計人把一雪菲尔裸麦只算作一个塔勒，一摩尔根耕地只算作二十塔勒，一摩尔根森林地只算作十塔勒。看来比較接近真实情况的說法是：在五十年过程中，易北河以东的农民为了免去賦役而收回他們的先人作为自由人所占有的一部分土地，向容克地主繳納了十亿馬克。此外，还有成千上万的农民在这个暴力与狡計并施的举世聞名的“社会改革”的阴影中淪落为无产階級。可是容克地主还不滿足，俾斯麦愁眉苦臉地抱怨說，普魯士立法把騎士庄园主当做“十九世紀的最下級人民”看待。

过去，在廢除世襲依附农民制度的同时頒布了婢僕法，現在，在廢除領主—农民关系的同时頒布了1854年4月24日的法令，这个法令的内容是对“違反賦役义务”的惩处，它允許容克地主重新建立領地警察，使得农业工人更加无力抵抗地屈服于容克的暴力之下。除了其他令人憤慨的条文以外，这个法令还規定农村无产阶级如有任何結社企图即处一年以下徒刑。普法尔伯爵坐在領主府邸里心情舒暢地談論着容克地主如何行使領地警察权。他住在西里西亚織工区，自鳴得意地說，他为了鎮压危险的暴动把一个人繩捆索綁投入監獄五天之久，虽然他明明知道这个人并没有犯法；他还自夸說，他让一个人大吃苦头，这个人由于饥饿难忍，从一匹誘捕狐狸的死馬身上割了一点肉吃了。政府对于一个美丽的容克灵魂的这种公开的自供几乎不敢提出輕微的抗議。

此外，官僚—封建反动派还能做到的事同它所办不到的事，在它自己內部剧烈摩擦的情况下进行調整。真正的乡村容克一向不断同国家政权机关进行小規模的战争，由于軍事、賦稅和政治上的原因，这些机关破坏了“小地主”的舒服生活，正如俾斯麦所說，破坏了領主—农民关系的“自然的政治秩序”。俾斯麦根据这些容克地主的心意，写信給瓦盖納說：“官僚制度的头脑和四肢都有毛病，只有它的胃是健康的，它所排泄出来的法律粪便是世界上最自然的污物。”封建容克地主頑固地要想回到三月革命前的状态。1848年的一課足以使容克地主对充实自己的錢袋感到明显的畏惧，但是不足以永远治好他們向往中世紀的病症。他們超过了自己的領袖施塔尔、瓦盖納和格尔拉赫，这些人清楚地知道，大地主作为統治階級不能置身于已被革命彻底摧毁的基础之上。

在这些領袖之間存在着种种意見分歧。格尔拉赫兄弟还深深地陷在浪漫主义之中，施塔尔則相当温情地同現代哲学眉来眼去，

正如拉薩尔用諷刺的口吻所說，是为了从現代哲学中接受雅各宾派的气息，瓦盖納在資本主义社会很能識別方向，而把反对“高大的工厂烟囱后面的現代强盜騎士”的斗争放在用哲学和宗教掩盖容克地主利益的行动之前。但是，不管怎么說他們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他們都强作欢顏，暗地里咒罵正面朝着粪土，背面朝着国家的偏狹愚昧的容克地主，表面上却扮演着被人愚弄的領袖。比他們正直的胡貝尔同封建党派断絕了关系，他說封建党派是附随它的一切力量——从王权到行会——的障碍。

当然，資产階級一被压服，“社会王权”的誘人歌声也就絕响了。最多只有罗侖茲·施泰因从他的书斋里发出謎也似的话音，他說，一切王权如果没有很大的勇气成为社会王权，它将来要么成为一个空影子，要么成为专制政治，要么就走向沒落成为共和政体。不过施泰因是在对牛彈琴。五十年代唯一企图抑止工业无产階級的苦难的法令出自官僚—封建反动派的領袖之一，保守的資产者商业大臣海特之手。他是爱北斐特开尔斯騰父子銀行的股东，伪善的符佩尔塔耳的一个真正的資产者。有人說，他每天早晨都听人唱贊美詩，談到他去世的母亲时，眼里从来没有不舍眼泪，但是这并不妨碍他用一切手段进行資本主义剝削。因此他也哀叹他所熟悉的萊茵无产階級的苦难：这种苦难繼續下去，整个工业就可能垮台。他使 1853 年 5 月 16 日的工厂法得以通过，但却沒有尽力使这个法案付諸实施。

这个法令禁止工厂雇用十二岁以下的儿童，規定十四岁以下的童工每天只工作六小时，十六岁以下的童工每天只工作十小时；而且还給亚琛、安斯貝克和杜塞尔多夫各派一个工厂視察員，監督法令之执行。可是担任这项职务的官員是些毫无能耐的家伙，他們既不能也不想粉碎工厂主的頑强反抗。即使他們真地告发一个

厂主并使他受到处罚，犯罪者却安慰自己说，五十塔勒的罚款，只要一个礼拜，我就又从孩子们身上榨出来了。亚琛的工厂视察员任职三年对于工厂制度还毫无所知，他那虚夸的报告甚至引起行政区政府的不满。1857年继任他的职位的警察顾问皮佩尔却是另一种作风。他被自己的正直、勇敢、干练的性格所推动，同有势力的工厂主进行了斗争。他禁止实物工资制，他的突然出现使得工业企业感到吃惊，他粉碎了一切要想使他不能控制童工的阴谋诡计，他在艾菲尔高地上的分散的工厂前面在深雪严寒之中往往等孩子们一等几个小时，他在市教学委员会中关怀儿童们的正常学习，他这样热心地献身于自己的工作，终于以身殉职。不断的劳累使他长期卧床不起，他的病始终没有能好。“社会王权”用每年施舍一百普鲁士通用的塔勒的办法来减轻这个正直的人缓慢死亡的痛苦。爱国者对于这一浪费的惊异心情由于这笔钱在六十年代才发而有所缓和。正是这个“社会王权”在五十年代就已经得到补偿了，四十年代捐给劳动阶级福利中央协会的著名捐款，在革命时期还有七千塔勒未付，这笔钱被“社会王权”扣留了。

在政府里，卡尔·马克思的内兄冯·威斯特华伦大臣属于封建派。勃兰登堡死后，曼托伊费尔升任首相兼外交大臣，这时封建派就让威斯特华伦当上了内政大臣。但是他并不粉碎官僚对于容克地主的奢望的反抗。特别是他纵容自己的部下，柏林警察总监辛克尔代飞扬跋扈。这个瓦尔德克案、科伦共产党人案、拉登多夫案的制造者是官僚中最懂事、最活跃的人物。这一事实足以证明，官僚一封建反动派内部的可爱的争论，决不涉及人类崇高的善心。住在柏林的辛克尔代同住在西里西亚山区的普法尔伯爵非常相似。当施梯伯在“新纪元”成了五十年代警察暴行的替罪羊的时候，他根据文件证明，辛克尔代同国家检察机关和法庭勾通一气，完全

无视最明确的法令，几乎每天非法搜查住宅和进行逮捕。

可是问题在于，担任职务能增加人的智慧，官僚们不得不注意，在十九世纪中叶普鲁士国家在哪些现实条件下能够存在下去。甚至天性怠惰，只是为了在任何坚决的敌人面前勇敢地退让才故作强悍的曼托伊费尔也不得不决心尝试把普鲁士赋税法在一定程度上从封建基础上搬到资产阶级基础上去。可是他只是半心半意地这样做，他的关于废除土地税免纳权的法令草案被推迟，另一个关于废除磨粉税和屠宰税、征收所得税的法令草案被以残缺不全的形式通过，对此他已经感到满足了。曼托伊费尔只在轻佻的交易所投机活动中尊重比较时新的本能。相反地，辛克尔代却毫无顾忌地从资产阶级所处的状况中得出结论。作为一个真正的将军，他不仅喜欢破坏而且也喜欢建设。他越是憎恨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他就越清楚地理解，如果满足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就可以最可靠地把这些要求压下去。辛克尔代使柏林成为真正的大都市，他建设了许多大城市的设施，如消防队、自来水、清洁队、公共浴室和洗衣房、广告柱、电报网和其他等等，这些设施大多遭到市政当局的激烈反对，这些官员表现了柏林资产阶级的天生的无能，他们认为他们推举曼托伊费尔和弗兰格尔为荣誉市民就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了。此外，在辛克尔代去世时人们看到，他经办了这些大设施，自己却仍然一贫如洗，而那些在著名的“德国资产阶级的自治机关”里博得虚夸的荣誉的“最高贵、最优秀的人物”中，还没有一个人在死后得到这种评语。

在克里木战争时期，官僚派和封建派之间的纷争极其激烈地爆发出来。尽管这次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停留在内阁斗争的范围之内，但是它仍然是对于沙皇在反革命胜利后所攫取的欧洲独裁权的第一次反击。当时普鲁士是俄国的藩臣。普鲁士容克知道，对

他們尊奉为“祖国之父”的沙皇的任何打击都会动摇他們的政权。他們通过侍从武官长馮·格尔拉赫和樞密顧問尼布尔說服了国王,积极支持俄国。相反地,曼托伊費尔和辛克尔代以及王位继承人却站在西方强国一边,它們的胜利必然压抑驕橫的封建势力,而且不会引起任何革命宣傳。波拿巴主义在許多方面接触到辛克尔代的理想。这时开始了一場毆斗,使得政府内部处于十分混乱的状态。封建党人驅使从前的犯罪分子林登貝克当密探,跟踪普魯士亲王,而曼托伊費尔則叫从前的犯罪分子秦辛撬开馮·格尔拉赫將軍的机密文件柜,盜窃他同俄国宮廷的秘密信件。因为曼托伊費尔按照旧普魯士的方式給窃賊报酬时显得十分吝嗇,所以秦辛就把他的赃物也卖給了法国公使,于是这件以紧急信件盜窃案聞名于世界的丑行暴露出来,它使普魯士国家在欧洲剩下的一点威望也丧失了。

無論是官僚或者是容克都沒有从这里面得到重大成果。辛克尔代虽然能够把瓦盖納从《十字报》的編輯部里赶出去,可是不久当他忽然想起取締一个封建的賭博場时,貴族院的一个議員向他提出用手枪决斗,并把他打死。后来,国王的精神病使得官僚一封建反动派内部又恢复了和气,因为这个事件威胁着它的权力的共同根源。

根据古老的习惯,国王被吵架的兄弟拉来拉去。浪漫主义的旧同伴在他的心里占有最溫暖的地位,而当他討厭庸俗的阴謀家曼托伊費尔及其冷靜从事的反动实践的时候,尤其是这样。但是他也很喜爱他的首都警察总监,这位警察总监发现了这样惊人的阴謀,用这样可怕的革命事件使他的恩王的疲憊的幻想恢复了生气。尽管取得种种反革命成果,国王对生活仍然感不到真正的乐趣。在革命風暴席卷欧洲大地以后,旧日的浪漫主义梦想不願回

来，“国家的恶人”仍然不肯听从尊贵的手指任意揉捏。国王感到，他一生的幻想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种苦闷的感觉战胜了他一切摇摆不定的行动和矛盾的感情，他渐渐陷入疯癫状态。

但是王位继承人同官僚—封建反动派——同它的官僚派，尤其是同他的封建派——走的完全是另一条道路。普鲁士亲王既没有他哥哥的天赋，也没有受过他哥哥那样的教育。因为是幼子，他是在军事训练中长大的，当他继承了父亲的软弱而呆板的精神以后，对于军事训练就更加适应了。他缺乏浪漫主义的激情，关于奥地利皇室占有合乎天意的优先地位的感伤的怪论很少能够阻碍他的旧普鲁士的并吞欲望。他不愿这样简单地被人骗去普鲁士政府充当扼杀德国革命的刽子手所追求的报酬，当曼托伊费尔走上通往奥里穆茨的道路的时候，他们两人就不和了。从此，官僚—封建反动派就排斥普鲁士亲王，说他是“自由派”，甚至对他的私人生活也感到气愤。克里木战争使他暂时接近曼托伊费尔集团，但又使他同格尔拉赫集团更加疏远。整个官僚—封建反动派长期隐瞒国王的疯病，这件事使他十分不快，当这个反动派不能再隐瞒病情的时候，它还使他依法摄政一事推迟了整整一年。到了1858年秋天，他才掌握政权。他马上免去了威斯特华伦的职务，几个星期以后又免去了曼托伊费尔和其他大臣的职务，成立了一个由最软弱的哥达党人，由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奥尔斯瓦特、帕托夫、施韦林等十年前曾在康普豪森内阁中任阁员的一批人组成的新内阁。资产阶级不顾自己的一切功劳和尊严，又把一只脚踩到马镫上。

## 二 经济繁荣

在五十年代的反动经济中，资产阶级的处境并不十分困难。

他的右翼有对它虚弱的肢体有益的议会和政论方面的活动自由，它的左翼由于工业繁荣而感到自慰，虽然政治野心暂时不能得逞也不觉得难受。

资产阶级懂得利用反动年代的政治耻辱谋取大量的利润。克里木战争中普鲁士国家在交战国之间无可奈何地摇来晃去，成为欧洲的笑柄，正是这样，它就可以以中立国的身份照顾俄国，并且用资本的最丰厚的利润供给俄国。反革命的凶恶迫害使五十年代移居国外的人数增加到将近一百万人，不过它也在同等程度上增加了海洋航运。现在资本甚至对于反动派的不很严重的压榨也能进行报复了。1851年，普鲁士军官团中差不多有一半的人都陷入资本的暴利之手。被贬为爱北斐特区地方长官的原后波美拉尼亚地方长官迪斯特—达贝尔揭露了莱茵省资产阶级为使自己的子弟免服兵役而建立的广泛的贿赂系统，这时他遭到直到王国内阁的种种不可克服的障碍，结果只得自己找一个适当的机会下台。

归根到底，资产阶级只要买卖做得顺利，只要无产阶级仍然受到束缚，它就愿意忍受政治上的困难。这两点都做到了，或者反动派好像在做。买卖甚至非常顺利。在南德，棉纺工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在萨克森，几乎所有五金工业和纺织工业部门都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发展着。在普鲁士，人们积极地从事开矿和冶炼工作。煤和铁成了时代的口号。十年中，煤的产量在萨克森王国增加了一倍，在莱茵和威斯特伐里亚增加了两倍，西里西亚居中。生铁的产值在西里西亚增加了一倍，在莱茵省增加了四倍。矿产品的总值增加了三倍多。随着生产的发展，交通运输事业也发展起来。船舶业日渐繁荣，由于大量的货物运输，铁路网达到过去想像不到的密度。

虽然德国在各方面还落后于英法两国，可是大资本在这个槲树和菩提树的国家里也已经开出了欺诈之花。在柏林的商业公司

和汉澤曼建立的貼現公司中，产生了第一批大金融势力，在大資本按不同程度吸取人民群众的血液时，它們是不可缺少的工具。柏林已經出現了小規模的濫設公司的騙局，1857年的商业危机以后，这些公司就紛紛倒閉了。国家檢察官起初还不了解情况，想給可疑的資本主义一个打击，可是許多上层力量却拽住他的手，商业界以一种决非獻給某种政治理想的热情为“商业慣例”而大卖气力。

这也并不奇怪。关于这个时代，一个自由派的历史学家用严格的自我批評的方式写道：“人們賺了許多錢，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商业界的暴发戶对于他在經濟上，不久在某些情况下也在社会上胜过貴族和官僚而感到高兴。他們乘着最华丽的馬車，同貴族一样有許多婢僕，他們举行宴会，外交家和大臣都乐意出席，他們得到勳章和封号，如果一切都很順利，他們自己也会成为貴族。这些百万富翁怎么会由于国家困难而感到煩惱呢？这个国家不发行公債，不作有利的让步，完全处在不良的状态之中”。真的，他們怎么会管国家的困难呢？

不过有一点資產階級还是不滿的，而它越有机会撫摩自己的大肚皮，它在这一方面就越有反抗性。德国的分裂状态給資本主义的无限发展戴上了沉重的枷鎖。德国国内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度量衡制度和貨幣制度，結婚限制和定居限制使各邦分离，阻碍資本自由支配无产阶级，在国外缺乏外交保护，这就給德国在世界市場上的竞争增加了很大困难。德国資產階級越是以空前的規模成长壮大，德国分裂状态的这些以及其他的后果就越使它不能忍受。只要利潤增加，它就公开地放棄一切自由理想，可是日益增长的利潤又使它趋向德国統一。对于富有梦想的人說来，这个“偉大理想”从中世紀浪漫主义的崇高境界降落到現代商业的平地上，肯定是一件令人懊丧的事，可是他們必然感到自慰的是，現在这个理想至

少有了牢固的基础。三月革命爆发前不久用书面肯定下来的德国汇票法在革命和反革命的風暴中馬上代替了五十六种不同的汇票法，这是一个很好的預兆，也是在这么多的廢墟中唯一盖成的房子。

总结德国资产阶级为統一所做的种种努力的国民经济学家會議当然同克洛普斯托克的德国詩人林苑或浪漫派的大学生协会的隆重酒宴很少相似。出席这个會議的自由貿易的忠心无二的拥护者是资产阶级的雇佣文人，他們受资产阶级的委托，宣傳德国統一是一是經濟的必然性，宣傳迁徙自由和营业自由、宣傳迅速清除一切封建行会障碍，总之为了資本主义的一切利益进行宣傳。他們履行自己的职务，虽然大多收获很少，但并不是毫无收获。德国自由貿易論者为了使自己的智慧适合德国资产阶级的口味，必須向挨餓的哲学家就教的时代已經过去了。这个阶级有着敏銳的听觉，听到錢在錢柜里叮当作响，而德国自由貿易論者也不願意再同餓肚皮的人們打交道了。他們正在走运。他們的主要首領，出身貧寒的法赫尔和普林斯—史密斯同两个处女結了婚，瀟洒的法国人法赫尔娶了年輕的侄女，讲究实际的英国人普林斯—史密斯娶了年长的姑母，这两位处女在菩提树街有一块大地产，上面盖着破破烂烂的厂棚，由于普魯士首都的交通蓬勃发展，这块地产的价格也大大上漲。同这块出金子的土地发生关系以后，法赫尔就用令人信服的证明力闡明，資本主义的利潤是給資本所有者的一种报酬，因为他們为了积累資本曾忍受了种种困苦。普林斯—史密斯同样动人地說，能够節約最大的資本，从而給国民經濟帶來最大利益的家庭，当然可以而且應該在国家产品中享有最大的份額。

德国资产阶级的旧日不幸又在德国国民经济学家會議上表露出来。这个會議在对它的历史先驅者进行每一打击时，都胆怯地

回头睨視它的历史后继人。它企图使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看不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作用，结果十分狼狽，其程度至少达到它反对过时的中世纪生产方式时用力程度。为了这个目的，英国的自由贸易主义对它說来还太正直，现在它坚决信奉法国人巴师夏的经济和諧論，这个卖弄才气的饒舌家利用经济和諧論在书本中去除了工业无产阶级的一切苦难。虽然洛貝尔图斯在他的《社会书簡》中早已扯碎了巴师夏編織的明显詭辯之网，但是对德国国民经济学家會議說来，使洛貝尔图斯緘默不語是一件极容易办到的事。它虽然没有抓住无产阶级，但确实抓住了小资产阶级。

在五十年代里，德国手工业从经济繁荣的喜雨中得到了一点好处，可是大工业的迅速发展比过去更加厉害地动搖了它的基础。像三十年代那样的真正繁荣时期，它是不会再有了。普魯士政府所喜欢的、根据行会的精神修改营业法規，也不能帮助手工业回到那一去不复返的时代。反动蠢行的唯一作用就是給衰老的行东以不可靠的保证，却更使手工业中还有精力、还很活跃的成員丧失了力量。

信用合作社、預支合作社和原料合作社对这些人进行了有效的帮助。舒尔采—德里奇在政府免去了他的法官职务以后，就积极地为这些合作社进行宣傳。舒尔采为合作事业进行宣傳鼓动可以說是有偶然的。小工业被一項恶毒的法令所压制的、对于正式的信贷机构的需要使他在故乡德里奇及其郊区建立的几个小合作社得到迅速发展。重視实践的舒尔采在合作社的章程中避开了普魯士法律給民办的銀行业設置的障碍。起初他对自己很快就取得成果感到惊奇，对此并不是沒有疑虑，但是这决不能减低他的实际功績。他在进行这一鼓动工作时沒有任何附带的目的。作为一个好心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他想帮助自己的阶级，而且也确实在可能范

園內对它进行了帮助。通过小资产阶级的合作事业来调整“我们工业的不幸弊害”——“拜金主义和社会贫困”，乃是一种空想。舒尔采把这种弊害看做是“真正文明的两个直接对立的力量”，但是这种空想有力地推动了合作事业，对小资产阶级居民来说是直接的，对无产阶级居民来说是间接的。洛貝尔图斯说得对，舒尔采在葡萄园里挖掘，寻找宝物，宝物没有找到，可是翻地工作使葡萄得到了好收成。

起初资产阶级对于舒尔采的活动是非常嫉视的，这些活动使得它在吞并小企业方面遭到了困难，更可怕的是，它们有可能使无产阶级更具有反抗性。但是不久它就发现，可以同舒尔采友好相处。舒尔采认为在1857年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举行的国际福利事业代表大会上发表自己的见解是适当的。大资本的几个先锋战士在这里询问了舒尔采的意图，他们很高兴地发现，舒尔采并没有很大的抱负。那是大商业危机的一年，这个危机起初又使资产阶级为自己像神而感到恐惧。它的比较聪明的分子认识到，舒尔采不是一个无用的家伙而是一个有用之材，他们没有费很大力气就使这个按小资产阶级大人物的方式浮夸、自满的人背离了自己较好的一面。第二年，在哥达召开的国民经济会议上他们就签订了协定。舒尔采兴高采烈地挥舞着巴师夏的旗帜，因此大资本的伙伴就宣布他是工人的新救世主。

小资产阶级又一次被大资产阶级拴在牵引绳上。1848年，小资产阶级由于追随大资产阶级而得到的惨痛教训并不是已经完全消失了。从1849年春季起，小资产阶级中的比较坚强的分子企图聚集在《初选人》报周围。这是一份小报，它的编辑是勇敢、干练的阿隆·伯恩斯坦。这个报纸由于被卷入拉登多夫案的灾难之中而停刊，可是很快又以《人民报》的名义复刊，继续同官僚—封建反动

派展开激烈的斗争。《人民报》一直深入到无产阶级内部，获得广大的读者。可是它也同舒尔采一样在经济领域内改变了方向。对此应负责的主要是伯恩斯坦本人，而不是它的出版人，对自由贸易主义经常有保留的弗兰茨·敦克尔。伯恩斯坦具有在群众中传播自然科学知识的少有的才能，在这一方面也做出很大成绩，可是在经济和政治方面他主要是凭正直的想法而不是靠实际知识工作。他在自然科学方面很有修养，而在经济学方面却是门外汉，因而接受了巴师夏的谬论：粮食必然越来越便宜，工人阶级必然越来越容易得到粮食，因为自然科学的进步允许劳动越来越多地利用自然力，自由竞争不会容忍任何人从自然（不是劳动）用它的力量所做的工作中牟利。因此，几乎在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报纸上也沒有像在当时小资产阶级的这个最重要的报纸上这样虔诚地跟着大资本的追求者做连禱。

### 三 资产阶级的文学和哲学

同五十年代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急剧变化相适应，文学和哲学的发展也发生了变化。封建浪漫主义在雷特维茨的《不雕花》中得到如实的反映；各个部分都表现出盲信和腐朽。一种矫揉造作、软弱无力的叙事诗和抒情诗以其华丽的装璜表明德国诗作的精华已经消失了。博登施泰特企图用他的《米尔查·沙斐》的枯燥无味的教导，罗克特和谢弗尔企图分别用他们的《莱茵河、葡萄酒和流浪者的童话》和《饮酒歌》驱除德国庸人的政治上的消沉情绪，正如印第安人喝烈酒来忘记他们的历史灾难一样。谷兹科夫用两部长篇小说比较认真地抗拒时代的苦难，经过那每部九大本的两部小说的艰苦旅程，他终于承认，他无论是用一切“精神骑士”的秘密同盟

的幻想，或者是用皈依自由村社原則的“羅馬魔术师”<sup>①</sup>的幻觉都不能医治时代的病症。

当时最偉大的剧作家（在許多方面也是德国文学中最偉大的剧作家），在反革命的漩渦里愉快地游泳，嘲笑极端民主主义者，这些人不尊重财产和家庭，不要社会，甚至更彻底一些也可以不要人、动物和树木，因为这些东西也是自由力量，即元素的牢獄。弗里德里希·赫貝尔在四十年代写了可以同席勒的《阴谋和爱情》媲美的唯一的市民悲剧<sup>②</sup>，而現在却使資本主义的理想工人成为一首叙事詩的主人公<sup>③</sup>，这种理想工人为了保护攫取暴利者而要打死他的有社会主义思想的伙伴，他把中世紀的一个公爵对阿格納斯·貝尔諾尔所犯的可恨的謀杀罪行提高到悲剧的高度，为的是在这面鏡子里贊美柏林和維也納的暴虐的反动統治<sup>④</sup>，他輪流地歌頌奥地利皇帝和普魯士国王，說他們是德国的主权和力量的創造者<sup>⑤</sup>。奥托·路德維希在《世襲林务官》中創造了一个对革命的剧的“警告图象”，因而陷入命运悲剧的一切苦痛之中，虽然这个剧通过正直的森林居民不能理解，他作为“接受工作的人”随时都可能被“給他工作的人”解除职务这一事实，表现了群众的本能的正义感。

1849年的五月起义过去还不到一年，这个把革命的瘋狂哲学放到骯髒的流氓嘴里的剧本就首次在德累斯頓宮廷舞台上演，它

① 谷兹科夫的这两部小說，一部叫《精神騎士》(1850—52)，一部叫《羅馬的魔术师》(1859—61)。——譯者

② 指市民悲剧《瑪麗亞·瑪格达倫娜》(1844)。——原編者

③ 这一幕出現在赫貝尔的詩《母亲和孩子》(1859)的第七首歌中。——原編者

④ 赫貝尔的剧本《阿格納斯·貝尔諾尔》，1855年出版。——原編者

⑤ 毫無疑問，梅林在这里指的是赫貝尔的詩《呈奥地利皇帝陛下》(1853)和《呈普魯士国王威廉一世陛下》(1861)。——原編者

受到了热烈欢迎，演出是在虐待瓦尔特海姆监狱里五月起义的俘虏而使文明世界震惊的大臣博伊斯特眼前进行的；人们在四十年代的革命文学中找不到像奥托·路德维希由于这次演出而表现出来的艺术上枯燥无味、政治上轻举妄动的现象。卢道夫·文巴尔克曾以青年德意志派美学发言人的身分坚决反对的方言文学的复兴也是这个时代的特征。弗里茨·罗伊特在他仍然是最有力量的诗中，把在正当自卫中打死容克地主的受虐待的奴隶献给了良心的复仇女神。由于他幽默地描述了迫害“煽动家”的情形（迫害“煽动家”曾破坏了他自己的生活），因此齐格勒说了这句感伤的话：罗伊特是一个真正的德国人，所以他能够讽刺这样可耻地嘲弄法律的行为。

在哲学领域内，叔本华开始出名，他在给他的宣扬者的信里，把“尼罗河在开罗旁边”这句话重复到令人讨厌的程度。庸俗的食利者的哲学对青年黑格尔分子的猛烈攻击取得了胜利。只要德国资产阶级内部还有一点力量和勇气，叔本华的著作就像出版家仓库里的铅似的放了整整三十年；现在他年纪大了，他的短篇集和补遗才得出版。德国资产者多么幸运啊！一种聪明的哲学使他摆脱了一切悔恨和羞愧的感情，因为它向他指出，他一切自私的和嫉妒的本能构成人类智慧的核心。当叔本华的队伍在德国胜利前进时，《福斯报》作为鼓手走在前面，这是不足为奇的。

革命的浪潮把所有唯心主义的青年黑格尔分子都抛到沙滩上。卢格在试图“整理事变的理性”时，踉踉跄跄地从一个悲喜剧性的冒险闯入另一个悲喜剧性的冒险。施特劳斯被他的故乡路易堡的乡土的爱国主义选入维尔腾堡议院，当他给杀害罗伯特·勃鲁姆的帝国—王国的凶手投半信任票时，他自己也就从他的最忠实的选民那里得到了不信任票。1848年和1849年布鲁诺·鲍威尔在

柏林努力追求議員席位，可是选民不信任他，他十分严肃地向选民們保证，他将使批判的清洁、新鮮的空气流入大厅，由于利害之爭，这个大厅里的空气已經变得污浊和悶热了，詞句上的爭論使人喘不过气来。这时他对俄国的原始力很感兴趣，他本人也在里克斯多夫当农民，白天拿着鋤和鍬在地里劳动，晚上用鋼笔和墨水在他从前的牛棚里工作。每个星期日，他都使《十字报》的服装华丽的先生們大吃一惊，他足登一双污泥靴，身穿一件七領外套，圍着一条綠羊毛圍巾，出現在他們的編輯部里，交出他給瓦盖納的社会和国家百科辞典写的稿子，他在这些稿子里一会儿批評古代哲学，一会儿批評現代犹太人。麦克斯·施蒂納成了一个不声不响的人。他曾把背脊朝着不可能是“唯一者”的“所有物”的革命，但是他这个哲学的宣傳者也不能同資本主义竞争的實際相抗衡。因此已經成了活人中的阴影的施蒂納过着贫困的生活，慢慢地走向死亡。

三月革命前的唯心主义的不灭的灵魂早已走进了历史唯物主义。在它的殘骸的坟地上蹲着三月革命后的唯物主义这个可笑的鬼怪。这种唯物主义的“积极頌揚、到处宣傳”的信奉者雅科布·摩莱肖特、卡尔·福格特、路德維希·毕希納在自然科学的队伍中快步前进，同一切工业繁荣时期一样，五十年代自然科学也在大力发展。他們的唯物主义同十八世紀法国的唯物主义相似，正如五十年代的曼托伊費尔化的資產階級同进行了法国大革命的資產階級相似一样。它不仅落后于德国唯心主义而且也退回到法国唯物主义的較早阶段。这种唯物主义促使把自己的政治理想放进烟窗，但对工业和自然科学的进步感到十分高兴的正在发展的資產階級，把唯物主义的力的詞藻当作飯后的点心，正如拉美特利曾使老弗里茨把同样詞藻当作飯后点心一样。当卡尔·福格特对飽食終日、只图享受的市民断言，思想同大臆的关系就和尿同腎臟的关系一

样的时候，这些市民在他们的厕所里一定还自以为是很了不起的！

仔细观察一下，这种唯物主义在它企图做点事情的时候也不及时甚至很不及时。它在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旁边打转，就像猫在热粥周围转圈一样，不过它至少要想取消宗教的“盲信”，它不愿在信仰和知识之间“记两笔账”。但是德国唯心主义就已经取消了形式粗糙或细致的宗教，五十年代的资产阶级唯物主义者写不出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这样的著作。他们甚至不懂得正确区别哲学概念，在这种窘境里，他们的补救办法是把不是每个受过教育的人，也就是资产者都能马上理解的哲学一律取消。可是，正因为他们根本不懂唯心主义，所以他们也就不能打中宗教的要害。他们在思维上栽了跟斗，正如唯心主义在存在上栽了跟斗一样。福格特可以抛出思想和大脑之间的关系的力的相位这个法宝，在这种浮夸而枯燥的理论中得到满足，可是对待事物比较认真，嗜过一点他的哥哥格奥尔格的烈酒的路德维希·毕希纳，由于他偏狭的力的谬论被卷回最陈腐的教会长老的怀抱里去了。

他一面驳斥福格特的豪言壮语，一面说，力和物质是不可分离的，可是在概念上离开很远，“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彼此否定”。他接着说：“至少我们不知道，人们怎样想把精神、力量确定为另一种的东西，即确定为非物质的东西、本身排除物质的东西或同物质对立的東西。”这样一来，基督教的整个二元论就得到承认，阿尔伯特·朗格在这一点上已对毕希纳进行了批判。力和物质不可分离地结合在一起这一点，对于可以看见的、可以把握的自然来说已经得到充分证明。可是，如果力就其本质来说是非物质的，那么为什么它不存在于我们的感觉不能把握的世界上，为了自身的存在或者同非物质的实体发生联系呢？关于宗教的产生和消失的问题，历史唯物主义可以回答，而抽象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不能回答，这

种唯物主义排斥历史过程，它一旦超出自己的特殊能力，就立刻在黑暗中摸索，在宗教领域内是这样，在政治和社会领域内也是这样。

费尔巴哈也认识到这种唯物主义的不足之处。他承认它最好的一面，同时嘲笑反动派的愚蠢行为，为了给自然科学的研究大开方便之门，反动派热中于哲学和政治的讨论，可是费尔巴哈补充说，对他来说，摩勒肖特的唯物主义是人的本质和知识的建筑物的基础，并不像对摩勒肖特那样是建筑物本身。走进这个建筑物以后，费尔巴哈用许多有先见之明的话，也就是用今天还能折断德国学院派哲学中的吹毛求疵的折衷主义者的爱国主义长矛的那种“声名狼籍的谬论”，用这个论点进行探索：人就是他所吃的东西，这个人具体到费尔巴哈的情况下应该说，群众的像样的生活是一切人类教育和修养的前提条件。但是这个高尚的思想家没有前进步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地步，因为他从来没有认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内部轮机。他在忧郁的孤独生活中衰老下去。

三月革命后的唯物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时新玩具，它随时都可以粉碎这个玩具，而当用假虔诚比用假自由精神可以把生意做得更好的时候，它就的确粉碎了这个玩具。资产阶级的现在的理想和它将来的希望在两个杂志——一个是柏林出版的《普鲁士年鉴》，一个是莱比锡出版的《边境使者》上比在三月革命后的唯物主义上更确切地反映出来。这两个机关刊物成为德国资产阶级同普鲁士国家的联盟的热心的撮合人。它们的嗅觉十分灵敏。

在它们之间甚至还有一定的分工。聚集在《普鲁士年鉴》周围的是把普鲁士国家说成是一个殉难者的小德意志的历史建筑师，这个殉难者本来一向就为德国的统一和自由流血流汗，只是同其他殉难者一起遭到被忘恩负义的世界所误解的恶劣命运。于是德

罗伊曾把旧普魯士的約克將軍描写成一个民族英雄，其实他是普魯士史所能談到的最粗野的容克之一。这本傳記成为德国資產階級愛讀的一本书，由于約克的封建陰謀曾經招来不少煩惱的八十岁的雪恩老人，虽有普魯士的爱国主义精神却也对这种情况惊奇得搖脑袋。

《边境使者》用資產階級的普魯士化来帮助普魯士的資產階級化。它的台柱是古斯达夫·弗賴塔克和朱利安·施米特。弗賴塔克的《借方和貸方》从文学上給五十年代的德国資產階級臉上貼金。它的新世界里还充滿着因襲的偏見，还带有小資產階級的畸形怪态：不要国际貿易，而要像 T. O. 施呂特尔家族經營的轉口貿易。小說里的主人公的庸俗无聊是各国小說都比不上的。可是这个模范少年的吃飽飯的美德和有支付能力的道德同破产的容克階級形成多么鮮明的对比啊！弗賴塔克很善于攪拌道德的肉汁，德国資產者經常希望用这种肉汁为自己的利潤服务。他的文学才能不高，几乎沒有任何想像力。但是弗賴塔克让 T. O. 施呂特尔家族的每点商业利潤都由許多仙童奉獻，而一个极端热情的宗教作家也决不会让这样多的天使住在天上。他在《新聞記者》一剧中頌揚資產階級报刊这个文化奴僕是天才的、愉快的、亲切的；在《德国昔日的图象》一书中指出，两千年来德国人“在美德和缺点，天賦和性格方面”几乎永远同他那个时代的庸人相同。一切都令人惊異地順从这个标准人物的心意，像貪婪的競争这样使他不順心的东西已經在犹太高利貸者和沒有节操的文人身上受到彻底的懲罰了。

弗賴塔克用一根柔軟的导索把資產階級引进他所喜爱的普魯士主义之中。他是在波兰—西里西亚边境上长大的，至少也是一个道地的、令人信服的普魯士人。这一点同他从德国学术的过去的好时代中所受的一段真正的教育一样使他容易获得成果。他用

灵巧的、輕便的而且也不是不体面的手段帮助资产阶级由唯心主义者变成拜金主义者，从黑紅黃旗帜下面走到黑白旗帜下面。他的同伙朱利安·施米特做得更糟。他的唯一想法就是要求小說描写德国人民的能耐即他們的工作，也可以說是追求利潤的本領。《边境使者》的最初几期里充滿了朱利安·施米特对从莱布尼茨到谷茲科夫的所有空想家的既荒誕又武断的批評，后来他又把这些批評总结在三厚本的德国文学史里，并且作为一碗水也似的稀粥放到心滿意足地用羹匙舀了吃的资产阶级公众面前。

朱利安·施米特对浪漫主义至少怀着一种并非完全不真实的憤怒，虽然他那淺薄的枯燥无味的批評不能冲击它的側翼。可是，他对古典文学和古典哲学的粗暴态度却是十分可恶的。假如他干脆把它們当作廢物扔掉那也好，为什么不会有这样一种怪人呢？可是他却加害于它們：他用恩主的优越感，用固执己見的无知（隱藏在这种无知后面的只有他的无能），从精神上渗透它們，削弱它們的强大的行动力量，使资产阶级庸人产生一种幸福的感觉，即莱辛、歌德和席勒，康德、費希特和黑格尔本来是他們的人，而且是些极端愚蠢的家伙。費尔巴哈（关于他，朱利安·施米特曾說过，只有才疏学淺的人才會贊同他）用冷冷的輕蔑口吻說：“这是一个孩子对大人的判断。”可是不仅是費尔巴哈，而且連卢格和叔本华也对这种行为（說这种行为是幼稚地褻瀆神殿还是最溫和的）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但是他們只是在口袋里攥起拳头，还没有一个严厉的人給《边境使者》的批判的艺术評論家以应有的懲罰。

## 第七章

# 科学共产主义的进步

在五十年代的德国，共产主义的宣傳沒有任何活动余地。工人阶级对于这种宣傳沒有反应，而主要的宣傳人員又散居世界各地，几乎全都要为衣食进行艰苦的斗争。甚至德国的图书市場也对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的人关上了大門。而一些还以最激进人士自詡的出版家在碰到关于出版他們的著作的“不合时宜的要求”时，簡直怕得要死。到了五十年代末期，弗兰茨·敦克尔才树立了开辟这条道路的功績。

因此对于科学共产主义來說，五十年代沒有白白过去。它是科学共产主义的集結和深化的时期。科学共产主义把自己的劍在革命年代的火热斗争中所产生的缺口磨去，用巨大的石块砌成攻守之牆，它的敌人一定会在这垛牆上碰得头破血流。在还能进行实际宣傳的地方（如在美国和英国报刊上），宣傳从沒有停止。在巴塞尔和波士頓两地同时出版的《揭露科倫共产党人案件》一书中，馬克思宣布了普魯士政府的罪状，使它受到了应有的譴責。他为他的朋友魏德迈在美国出版的一个德文月刊写了叙述法国政变的历史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馬克思在这本书里指出，法国的阶级斗争怎样使一个平庸、可笑的人物能够扮演英雄

的角色；这是唯物主义历史著述的一部杰作。这种閃爍着聰明和机智的火花の尖銳批判向欧洲所有的社会拯救者以惊異的目光注視着的波拿巴主义指出，无論是成功或失敗，它的前途都是可耻的。一直到美国内战为止，馬克思是《紐約每日論壇报》の欧洲編輯。他在这个报上用有力的笔触描繪了德国革命和反革命的历史<sup>①</sup>。他以忘我的热情为在1848年宪章运动の重大失敗以后还繼續宣傳普选权的宪章派报刊写稿；在几篇短文里，他譴責了帕麦斯顿勳爵对沙皇政府の深情厚意。甚至对一个有才能的人來說，这也是一件了不起的工作，然而这只是馬克思在五十年代所做的工作の最小部分。

馬克思为《紐約每日論壇报》写稿，得到他生存的物质基础，而恩格斯則又走进他父亲在曼彻斯特開設的公司里。空間的分隔不能阻碍他們的合作。他們繼續这样分工：恩格斯在敌人的攻击面前捍卫他們の共同立場，但在許多年間，都沒有得到进行这一工作的机会；而馬克思則通过广博的研究，奠定現代共产主义的科学基础，使現代共产主义的目标切实以它的一切历史联系为依据。大英博物館の宝藏給他提供了知識の无穷源泉。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十年里研究和学习了多种不同的科学。他們也像在斗争期間为了他們の偉大事业利用最好的时机那样，充分利用了斗争的迫不得已的停歇時間。在祖国，一提到他們就是咒罵和誹謗，而他們的敌人可以通过这些咒罵和誹謗不受制裁地发泄對他們的憎恨。但是这种情况任何时候也沒有使他們迷失方向。

然而这毕竟是一个艰苦的时期，三十年后恩格斯在馬克思夫人墓前所做的演說里还震蕩着它的余音：“这一次燕妮·馬克思遭

<sup>①</sup> 見本卷第二章第四節第132頁原編者注。——譯者

遇到的是具有一切恐怖的流亡生活。她眼看着她的两个男孩和一个小女孩在物质压力下走进了坟墓。尽管如此，这种物质困难她还是可以克服的。可是，政府和资产阶级反对派（从庸俗的自由派到民主派）勾结起来，策划一个大阴谋来对付她的丈夫，他们向他倾注了最卑鄙下流的诽谤，所有报刊都对他关上大门，剥夺他进行任何辩护的权利，以致他霎时间毫无自卫能力地站在他和她所蔑视的敌人面前，这就使她受了深重的创伤。这种情况继续了很长时间。”<sup>①</sup>在这阴郁的年月里，马克思为他的主要科学著作做了重要工作。

在德国国内，共产主义宣传在个别工人的沉默的反抗里，在斐迪南·拉萨尔的热切希望中继续存在。他在这个时期写给马克思的信给他的革命热情提供了最光辉的证明。他像一块不可动摇的岩石屹立在反革命的狂澜之中。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他在杜塞尔多夫的家成了所有被迫害者的躲避风暴的避难所。不顾警察的侦查，他仍然同莱茵区的工人保持密切的联系，给他们做有教育意义的报告，供给他们书籍，只要他能帮助他们，他从不吝惜金钱。同革命年代的老朋友分离，使他感到十分痛苦。他在1857年4月26日写信给马克思说：“唉，你们没有流亡，流亡的是我！因为你们是许多老战友、老同志同住在一个城市里！可是这些年来，我却独自生活着，完全离开了从前的战友，在这种伤感情绪发作时，我就把我自己叫做最后的莫希干人<sup>②</sup>。这也确实令人难受。因为撇开工人阶级（它的思想和感情不仅保持健康而有朝气，而且从那以后也有很大发展）不谈，在所谓有教养的人们中，同过去一样的怯懦、

<sup>①</sup>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燕妮·马克思（父姓威斯特华伦）》，载1881年12月8日《社会民主党人报》（苏黎世）。

<sup>②</sup> 原来住在美国东部哈得逊河上游的印第安人，现在已被灭绝。——译者

一样的畏惧、一样的隱匿，仍然而且比过去更甚地占有統治地位。其中几乎沒有一两个例外。当然，杜塞尔多夫是一个小城，根本就沒有精神上的能人。”1854年，拉薩尔在哈茨費尔特伯爵夫人案件中取得胜利，然后以“两年发瘋似的工作”完成了論赫拉克利特的著作。一方面为了監督这部著作的出版工作，另一方面由于患了眼病需要到著名眼科医生格雷費处就医，他好容易得到柏林警察机关的許可在首都住两三个月。正如他在給馬克思的一封信中所說，几天以后他就要移居柏林。

拉薩尔从沒有对馬克思或其他任何人隱瞞想在大城市生活的願望，他也沒有絲毫理由这样做。从精神上和政治上来說，这都是正当的生活需要，由于这一点而責备他，說他受虛荣心驅使，渴望得到声誉，乃是一种令人不快的吹毛求疵的举动。有很长一个时期流傳过一种神話，說拉薩尔为了得到临时在柏林居住的許可，曾經由亚历山大·馮·洪堡介紹，朝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这个神話終于被粉碎了。相反地，最近发表的档案資料证明，拉薩尔为了粉碎柏林官厅对他居住柏林所施加的非常恶毒和頑固的阻力，不得不一再采用对他不适合的手段。无論是1855年5月，他給警察总监辛克尔代写的信，或者是拉薩尔为了使当局收回1858年6月对他下的驅逐令而給代替患精神病的国王执政的普魯士亲王上的呈文都是不辱他的身分的。毫无疑问，这个驅逐令是出于最輕薄的动机而发布的。拉薩尔剛在柏林住下来，又将被赶出城去，因为军队里的一个恶棍毫无理由地在大街上毆打他，而被他打倒在地上，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1848年和1849年的革命者不应給“炮彈亲王”上請願书。馬克思所說的简单的道德感本来應該阻止他这样做，馬克思本人就沒有同現政权进行表面上的妥协。

人們从拉薩尔的越軌行为中还可以看到哈茨費尔特案件的余

波。拉薩尔为一个受虐待而沒有抵抗能力的妇女辯护，在三月革命前就已經給基督教国家造成把他逐出柏林的第一个动因。他同哈茨費尔特伯爵夫人的关系，后来在柏林警察机关的公正和善意的人士考虑让不让他住在柏林的問題时起了一定的作用。永远值得考虑的是，正是这个案件(不管人們对它的評价如何)把这个“最后的莫希干人”拘留在德国，使他能够不断接触到德国状况的发展。他在柏林亲身体会到，距离虽然不大，但已經容易引起錯觉。如果說，他在萊茵省工人群众中还十分生动地看到革命年代的傳統，那么他在柏林就痛心地了解，易北河以东的居民还很少“反对专制政权”。拉薩尔是同那些喜欢自称为自由派的沒有主見的人們完全不同而且見解比他們深刻得多的实际政治家，他懂得考虑这个事实，他在柏林逗留期間同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从各方面表明，人們一向視为柏林生活对他的人格所加的不良影响的，乃是聪明的考虑。

因此这样一种不良影响是不能完全加以反駁的。几千塔勒的租息(这在当时是一笔很可观的收入)，使拉薩尔不用为一般的生活发愁，他在柏林社会中正如他在少年时代的日記中所說是“引人注目的”。在文学和政治方面的反对派聚会的弗兰茨·敦克尔家里，他是被許多人敌視，又被許多人欽佩的中心人物，可是他不仅同伯克和洪堡这样的科学家集团发生关系，而且也同許多在思想意識上几乎毫无共同之处的社会阶层发生关系，于是一种道地的新貴作風开始形成。

哈茨費尔特伯爵夫人继拉薩尔之后也到了柏林，这对拉薩尔并不是什么幸事。虽然对于拉薩尔忠实于伯爵夫人，伯爵夫人忠实于拉薩尔的这种高尚精神产生誤解是不公正的，可是同这个五十岁的聪明伶俐、久經世故的妇女經常交往，把这个年輕得多、虽

有一切天才的自觉但却天真得多的人引入并非永远正确的道路。毫无疑问，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只要能够引导拉萨尔，她就经常把拉萨尔导向她根据自己的真诚信念认为是对他最有利的道路，可是她根据自己的全部经历，对于什么是拉萨尔的最大幸福，最多只能有一种因袭的理解。她出于感激而对拉萨尔处处表示尊敬，这种态度促进了拉萨尔的软弱的本能而不是促进了他的坚强的本能。

虽然如此，他从来也没有忘记他的伟大目的。他时刻准备着，一旦重新发生革命，他就干预革命的发展。他在这些期望和等待的日子里写下了自己主要的科学著作，他可以說，这部著作是“人类勤劳的巨大作品”。在这本书里，他追求同马克思相同的革命目标，但是所走的道路不同，这两条道路清楚地说明什么东西使他們結合，什么东西使他們分离。

## 一 马克思和拉萨尔

阿尔伯特·朗格曾经把马克思的《资本论》同拉萨尔的《既得权利体系》作了一番比较，他說：“两部著作有一个共同点，即在这两部著作中贯穿着思辨的因素和确实的材料，这是其他著作所做不到的，但是它們的区别在于，拉萨尔在思辨的基础方面，比較自由地——就真正哲学的性质而言——比較独立地同他的老师（黑格尔）对峙，而他的著作的法学材料虽然是用不同寻常的精神力量得来的，但毕竟是专为完成这部著作而找来放在这里的。相反地，在马克思的著作里，国民经济学的材料仿佛是自发地从經驗的专业知識的令人惊異的、被极其罕見地自由支配的源泉中流出来的，而思辨的形式則紧紧依从哲学示范者（黑格尔）的方法，在这部著

作的許多部分，这种形式勉强挤入材料里，起了不良的效果。”这段評論在这一方面恰恰把事情弄得顛倒了。不是拉薩尔比馬克思更自由和独立地同黑格尔的思辨对峙，而是相反。馬克思能够算出黑格尔賬里的全部錯誤，而拉薩尔只能算出一半錯誤。朗格的錯誤看法可以这样解釋，这就是他自己不懂历史唯物主义。但是在另一方面，他接触到拉薩尔和馬克思之間的差別的最深处。两个人都是革命者，但是拉薩尔努力求得大量的科学材料，作为进行社会革命的最有力的手段，而馬克思利用經驗的专业知識追究事物的根底，以便起到变革資产階級社会的革命动力的作用。

如果我們把这两个人所喜爱的文学家作一个对比，那么这种差別可以說是有形的了。馬克思喜爱的是荷馬、但丁、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在近代作家中是巴尔扎克；拉薩尔則喜欢胡登、萊辛、費希特，在近代作家中是普拉頓。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文学类型。前者是这样一些人，他們把整个一个时代的形象这样客观地收容在自己的作品之中，以致任何主观殘余都或多或少地消失了，有一部分甚至完全消失了，因而作者被他們的著作的神話般的阴影掩盖了。后者是这样一些人，正如他們之中的一个人所吟咏的，他們只是把“世界图象的图象”再現出来，在他們的作品里，我們看不到他們的世界是什么样子，而只知道他們自己怎样夺取或者企图夺取他們的世界。今天有誰讀胡登写的小册子是为了它們本身，为了它們的內容或是仅仅为了它們的形式呢？人們是为了胡登而讀它們。在所有的历史人物中，胡登最合拉薩尔的心意。他曾經說过，胡登的命运同他的命运完全相同，惊人地相似，这种看法是應該受到反对的，当拉薩尔提出这种看法的时候，它是极不适合实际情况的。虽然它是从一种非常真实的感情中产生的。我們把拉薩尔和胡登最早的作品——拉薩尔的日記和胡登的对委茨之流的控

訴——放在一起，就会发现它們的气质的基本形式惊人地相似。甚至在孩子气的自欺这一点上，他們也很相似，他們利用这种自我欺騙装作无辜受到迫害的羔羊。可是我們只要讀一百行胡登的作品和拉薩尔的作品，就知道他們从小就必然是很不受他們周圍的習慣势力欢迎的人。拉薩尔为了同他喜爱的詩人普拉頓交談，他在胡登的一段話里发现“他混乱的生命之謎的結”解开了，胡登說：“的确，在这一方面我需要担心的不比別人多，甚至比許多人还少一些，只是上帝使我产生忧虑之情，一般的苦惱使我比別人更感痛苦，也許比別人更深入內心。”

任何比較都不适当。如果根据拉薩尔和馬克思的文学爱好在他們之間作比較，并使这种比較超出足以說明他們的精神活动的不同的基本特征的範圍，那就是愚蠢。这样比較就会大大貶低拉薩尔和馬克思的作用。但是仅仅根据这一点做比較，也有它的道理。我們姑且假定有这样一种实际上不可能的事情：人們可能連馬克思的名字都忘掉，可是他的主要著作作为大工业时期的最忠实的图象将会繼續存在許多世紀，而拉薩尔的著作只会存在几十年（他的著作的一部分今天已有这种情形），而且它們不是經典性地表現偉大的世界轉折的永久性巨著，而是一个天才人物在一个世界历史运动中所想的和所做事情的記錄，是人类精神的不朽的证据。这种关系十分明显地表现在，拉薩尔在他的科学著作中也喜欢表露个人的見解，而馬克思本人在政治宣傳中完全不显露自己，以致几十年来关于他的最不可靠的謊言能够得以傳播而且为人相信。

由此还产生第二个差別。馬克思在精神方面掌握了比拉薩尔大得多的範圍。他的研究一給他开辟新的远景，他就不倦地从一個科学部門走进另一个科学部門。这里只提一点，馬克思和恩格

斯在自然科学方面做过許多研究，而拉薩尔最多只是粗淺地接触过这个領域。对这一点有影响的事实是，馬克思流亡英国期間站在欧洲社会的最高了望台上，而拉薩尔却生活在欧洲社会的可以說是最不可救药的角落——曼托伊費尔的普魯士。然而他在那里与其說是精神上感到孤单还不如說是心情上感到寂寞。他反而滿足于一个比較狹窄的範圍，因为这个範圍恰恰包括他想改革的那个世界。他有理由說，他由于一种浮士德式的冲动，用最坚韧、最认真的努力，从希腊哲学和羅馬法学經過历史科学的各个部門一直研究到現代国民經济学和統計学，仅就精神科学而言，他对他所熟悉的当时的整个教育所說的諷刺話决不是无聊的浮夸。虽然如此，对拉薩尔來說科学研究居于次要地位，这是无庸置辯的。

有一回，他在給海尔維格的一封信中，把科学研究說成是一种痛苦，虽說是一种解放的痛苦，但毕竟是一种痛苦，即使他在这封信里为了使海尔維格从昏沉沉的状态中警醒过来而有些夸大，那么他在1859年給恩格斯写的信无疑是他的真实思想，他說，如果不因为实际运动終于开始(这是很值得希望的)而使一切較大的理論活动暂时停止的話，他就繼續研究国民經济学和历史哲学。“假如能够做几件我們能做的事情，我是多么希望不把我知道的东西写下来啊。”关于馬克思，恩格斯曾說：“虽然任何理論科学中的每个新的甚至尚无从預見其实际应用的发现都使他感到異常喜悅，但当有了立即会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起革命〔梅林引文中缺“革命”一詞〕影响的发现时候，他所感到的喜悅更是完全不同了”<sup>①</sup>，而对拉薩尔來說，問題只在于科学对于历史发展的革命的干預。除了他在四十年代已經起草，而且絕大部分已經写成的論

<sup>①</sup>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馬克思墓前演說》，載《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67頁。

赫拉克利特的著作以外，拉薩尔的五十年代的科学著作完全圍繞着从政治和社会方面清算三月革命。

第三点即拉薩尔的唯一心主义世界观，同这是有关系的。严格說来，他不屬於青年黑格尔派而屬於老年黑格尔派，他完全相信思辨的概念是世界历史的动力。他的精神生活帶有古典哲学及其养母古代教育的特征。当拉薩尔最初接近古典哲学时，古典哲学已經处于彻底解体的阶段，但是像他这样准备战斗的人，从沒有参与这些哲学斗争。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几乎沒有提过施特劳斯、布魯諾·鮑威尔和費尔巴哈，从沒有联系到他們使古典哲学解体的傾向。拉薩尔肯定是这种哲学的晚熟的果实。为了認識伏尔泰在历史上的作用，歌德說过，古老的民族将来也許能够把它們的一切美德和缺陷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这句话在这个意义上对拉薩尔是适合的，即在德国墮落最深的日子里，唯一使德国維持在西欧文明民族的水准的唯一心主义的一切优缺点再一次体現在拉薩尔身上。

我們的古典哲学的唯心主义同今天为了把起决定作用的阶级斗争变成空洞的詞藻而自称唯心主义并引证拉薩尔的著作来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沒有任何关系。拉薩尔假如知道，他一定会用嘲笑来反对这种引证。使他同古典哲学結合起来的，是古典哲学的革命的內核。就人而論，在它的代表者之中，同他最接近的是最热情地掌握了法国大革命的精神、最远地推动资产阶级理性的要求，使它成为劳动阶级的权利的費希特。但是費希特的大胆的唯心主义并不妨害拉薩尔的对现实事物的感觉，康德曾用下面的話說明了这种感觉：真理只存在于經驗之中，对事物的一切認識如果来自單純的理智，那就純粹是假象。拉薩尔写道：“沒有思想的材料还有相对的价值，沒有材料的思想只是一种空想。”拉薩尔十分巧妙地把黑格尔的辩证方法用作革命变革的武器，他同时強調說，

黑格尔在他的著作的各个方面都不厌其烦地强调，哲学要求最迫切的莫过于深入到经验科学中去。

拉薩尔对那些没有思想、没有生气的随声附和者进行了激烈的论战，他们用黑格尔哲学制造出一种新的著述癖好，把它变成一种新的文才之汁，以便浇在不理解的和不知道的事物上。拉薩尔对三月革命后的唯物主义的过分宽容的评价比这一论战更清楚地表明，拉薩尔是多么厌恶这些人。他恭维三月革命后的唯物主义说，赫拉克利特就已经把思想是物质的运动这一论题当作他讨论哲学的基础，毕希纳以最古老的爱奥尼亚学派的哲学为依据是对的。差别是不小的，那就是在赫拉克利特那里，这种观点在原来的精神哲学以前，在思维和存在的差别展开以前出现，而它在精神哲学完成以后同现代生理学一起回来，“这种返回正如经过和克服差异后的任何返回一样，不可能仍然只是向第一个直接性的返回，而必须收容和具备已经克服的差别”。拉薩尔对这一点加了一个注解，他说，为自己的存在感到最初的喜悦而扰攘不安的新哲学将常常违反这个要求，但是，即使加上这个限制，他也大大高估了毕希纳和他的同伙，由此证明，他的唯心主义确实同今天以唯心主义为名在德国大学里游荡的没有血肉的幽灵毫无共同之处。

拉薩尔的唯心主义同历史唯物主义的差别在于：拉薩尔没有从经济角度去理解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条件和必要性，而是先把它翻译成首先是资产阶级时代所特有的唯心主义的思维形式，即翻译成哲学和法学。不过，拉薩尔并不因此而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者，正如克伦威尔的铁骑兵<sup>①</sup>虽然用旧约的语言却非封建的革命者一样。资产阶级革命有几百年之久还在封建时代的宗教思

<sup>①</sup> 1648年以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领袖奥利弗·克伦威尔所统率的带甲骑兵被称为“铁骑兵”（英语是：Ironsides）。——原编者

想形式中进行，而无产阶级革命至少有几十年之久在资产阶级时代的法学和哲学的思想形式中进行。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自觉地、彻底地粉碎了这种形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和社会主义的空论家所不能理解的东西，即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世界历史意义，拉萨尔能够理解。把他同历史唯物主义分开的，是一条不很明显的界限，那就是他先以资产阶级思想形式理解事物。

拉萨尔是符合《共产党宣言》精神的坚决的共产主义者。他之所以犯许多错误，只是由于他把《宣言》的经济观点先翻译成法学和哲学的观点。因为他理解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所以古典哲学的国家崇拜在他身上可以不像在洛贝尔图斯身上那样达到形式主义的僵化地步，但是由于他从没有摆脱唯心主义的思想形式，所以他也从没有摆脱那种国家崇拜。虽然说他在经济学方面根本没有进行实际的、独立的研究，是过甚其词，但是毫无疑问，他在法学和哲学领域活动要比在经济学领域内有把握得多。他的确进行过研究，而且还取得了能使一群腐儒充分受惠的成果。但是他没有像马克思或恩格斯那样得心应手地掌握这个部门，因为他的唯心主义思想方式常常阻碍他前进。在紧急的斗争中，他根据莱辛的那句话的精神，在他找到武器的地方拿起武器。莱辛说：“不是做梯子的人而是爬上梯子的人能够达到目的，一个敏捷而勇敢的人即使是一个坏梯子他也敢上。”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这一点上是对的，他们说，拉萨尔不是先驱的社会主义理论家。但愿这些在黑暗中得其所哉的鼯鼠也看一看亮光！

如果说拉萨尔的唯心主义是他的缺点，那么它也是他的优点。它使他坚决相信思想的力量，这种力量曾使拉萨尔完成了巨大的工作。即使有必要肯定，拉萨尔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运动规律和发展规律的认识没有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尖锐和深刻，那么只

根据这一点或者根据較多的但不是重要的方面来衡量拉薩尔的历史作用是不正确的。这样做就是把历史問題当作小学生的作业对待，当然改作业只要找出里面的錯誤就行了。任何历史人物只有在他的历史环境中才得到他的历史权利。

如果拿拉薩尔同在基本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成长起来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相比，拉薩尔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不及他們。因为从一开始，在他的生活道路上就有比他們濃密得多的阴影。如果拿他同在大致相同或者甚至还比較有利的境遇中接受主要的生活感受的同时代人相比，即在哲学方面同青年黑格尔分子，在經济学方面同洛貝尔图斯，在政治方面同約翰·雅科比相比，那么他就显得又高又大了。

他虽然同这些人一样具有唯心主义世界观，但是由于他有偉大的天才，有革命的本能，首先也由于他真誠地、不倦地追求真理，所以他能够一直深入到科学共产主义的核心，而这一点是那些人所做不到的。

## 二 馬克思論商品和貨幣

《政治經济学批判》这部部头不大的书，是馬克思在五十年代所完成的科学工作的最初成果。在这本书的序言里，馬克思按照下列順序考察資產階級經济制度：資本、土地所有权、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貿易、世界市場。在前三項下，他打算研究現代資產階級社会分成的三大階級的經济生活条件。研究資本的第一册的第一篇共分三章，分別論述商品、貨幣和資本一般。論述商品和貨幣的两章构成了馬克思在1859年出版的第一分册的內容。

在这篇序言里，馬克思还简单地回顾了他的研究經過。他說，

他研究黑格尔的法哲学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和国家形式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黑格尔用“市民社会”这个名称把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概括起来，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则应该在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接着，马克思对唯物主义历史观作了经典性的叙述；从此以后，人们便常常引用这一叙述。

马克思在序言里十分明确地指出了他的著作的历史性质，而在每一页正文中，这种性质也表现得同样明确。“最初一看，资产阶级的财富表现为一个惊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则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原素存在”<sup>①</sup>〔重点是梅林加的〕，他的叙述就是这样开始的。马克思研究社会的一定的历史形态，他不是想确定，商品和货币从一般哲学意义上看能够或者应该成为什么东西，而是要确定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它们是什么东西。马克思早在反驳蒲鲁东的著作里，就曾嘲笑那些把资产阶级社会的生活条件抬高为人类社会的一般生活条件的经济学家。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里详尽地描述了商品和货币的各种理论的历史发展，从而也描述了这些理论的历史局限性。尽管如此，资产阶级分子为了故意欺骗别人，或出于无意识的自我欺骗，经常陷入无可救药的混乱，一再硬说马克思特别是利用他的价值论从自己的头脑中臆造出一套理想原则或道德原则，据说只有从更加聪明和更有道德的头脑中创造出来的其他的理想原则或道德原则才能推翻这套原则。这就是马克思自己，他深入地论述了李嘉图间接认识到的东西：价值规律的充分发展，要以大工业生产和自由竞争的社会，即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为前提！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5页。

馬克思的历史观点使他在資產階級經濟学的研究綫索的断头处抓住了这条綫索。李嘉图非常完全地闡明了用劳动時間規定商品价值的理論，但是在他的理論中仍然有許多無論是資產階級經濟学，或者是以前的社会主义都不能解决的矛盾。只要提一下劳动報酬和劳动产品之間的差異，就可以知道这种矛盾了。这种差異同李嘉图的价值規律具有尖銳的矛盾，格雷、蒲魯东和洛貝尔图斯都試圖用消灭貨幣的办法来消灭它。馬克思比任何人都更加明确地证明这种試圖是毫无成功希望的。但是現在的問題是积极地证明李嘉图的錯誤发生在什么地方，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学在哪一点上还没有充分浸入資產階級社会的机体。馬克思彻底考查了劳动創造价值的特性。他探討了什么劳动創造价值，劳动为什么創造价值，劳动怎样創造价值，为什么說价值不外是这样的一种結晶劳动等問題。然后，他分析商品和貨幣的关系，并且指出商品和商品交換怎样和为什么（由于商品固有的內在价值特性）必然制造商品和貨幣之間的对立。

馬克思第一个发现資產階級社会的劳动的二重性。每个商品都表现出使用价值和交換价值两个方面。“不論财富的社会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内容，而这个内容最初同这种形式无关。我們从小麦的滋味中尝不出种植小麦的人是俄国的农奴，法国的小农，还是英国的資本家。使用价值虽然是社会需要的对象，因而处在社会联系之中，但是并不反映任何社会生产关系。……同經濟上的形式規定像这样无关的使用价值，就是說，作为使用价值的使用价值，不屬於政治經濟学的研究範圍。只有当使用价值本身是形式規定的时候，它才屬於后者的研究範圍。它直接是表現一定的經濟关系即交換价值的物质基础。”<sup>①</sup>馬克思用这些明晰的

<sup>①</sup>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6頁。

論点,堵塞了无穷无尽的誤解的根源,并把一大堆經濟学教科书扔进火里。

作为交换价值,只要比例适当,一个使用价值和另一个使用价值完全同值。“一座宮殿的交换价值可以用一定数量的鞋油表示。反过来,倫敦的鞋油厂主們曾用几座宮殿来表示他們的大批鞋油的交换价值。”<sup>①</sup>不論商品的自然存在的样式怎样,不管商品作为使用价值所滿足的需要的特殊性质怎样,商品在互相交换时,尽管它們的样子形形色色,却代表着同一个統一物。

使用价值直接是生活資料。但是,这些生活資料本身却又是社会生活的产物,是人的生命力消耗的結果,是物化劳动。一切商品,作为社会劳动的化身,都是同一个統一物的結晶。“等量地物化在它們之中的劳动,本身應該是同样的、无差别的、簡單的劳动,对这种劳动來說,不論它出現在金、铁、小麦或綢緞中都是沒有差别的,正如对氧气來說,不論它存在于铁锈、大气、葡萄汁或人血中都沒有差別一样。”<sup>②</sup>既然使用价值的差別来自創造这些使用价值的劳动的差別,那末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同使用价值的特殊物质无关,因此也同劳动本身的特殊形式无关。其次,既然不同的使用价值是不同个人的活动的产物,也就是个性不同的劳动的結果,那末作为交换价值,它們代表相同的、无差别的劳动,也就是沒有劳动者个性的劳动。因此,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是抽象一般的劳动。这种劳动已經沒有质上的差別,只是随着它物化在不等量的交换价值中的数量的多寡而有量上的差別。对于在量上有差别的抽象的一般劳动,只有一个衡量大小的尺度,这就是劳动時間,而劳动時間的尺度則是时、日、周等自然計时尺度。劳动時間是劳动的活的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6—17頁。

② 同上书第17頁。

存在，与劳动的形式、内容和个性无关。作为交换价值，一切商品都只是一定量的凝固的劳动时间。物化在各种商品使用价值中的劳动时间，是使使用价值成为交换价值因而成为商品的实体，同时它又衡量商品的一定价值量。

把不同的劳动简化为无差别的、同样的、简单的劳动，看来是一个抽象，然而这是社会生产过程中每天都在进行的抽象。“把一切商品化为劳动时间同把一切有机体化为气体相比，并不是更大的抽象，同时也不是更不现实的抽象。”<sup>①</sup>这种抽象存在于平均劳动中，这是一定社会中每个平常人所能完成的劳动，是人的肌肉、神经、脑等的一定的生产消耗。这是构成资产阶级社会劳动总量的绝大部分的简单劳动。复杂劳动是效能较高的简单劳动。例如一个复杂劳动日等于三个简单劳动日。复杂劳动向复合的简单劳动的这种转化，不管它是根据什么规律完成的，实际的经验都显然证明它是每天进行的。复杂劳动的产品，每天按照一定的比例关系去交换简单劳动的产品。不言而喻，创造价值的劳动时间一定是必要劳动时间，也就是在当时一般生产条件下生产另一个同样的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就已经指出，一种商品的价值不是由实际生产它的时间来确定，而是由可能生产它的最低限度的时间来确定。

劳动的二重性是一种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即商品生产的产物。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商品生产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社会密不可分。既然劳动创造使用价值，那末它就具有各种不同的社会形式。劳动作为以某种形式占有自然物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是同一切社会形式无关的、人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9页。

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的条件。这种劳动要有物质作为前提，所以它不是它所创造的东西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尽管在不同的使用价值中，劳动和自然物质之间的比例大不相同，但是使用价值总有一个自然的基础。

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则相反，它是劳动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形式。在一切文明民族的历史初期所存在的原始公社中，个人劳动被直接纳入社会机体之中。在中世纪的徭役和实物租制度下，成为社会纽带的是劳动的特殊性，而不是劳动的一般性。在农村宗法式家庭里，女纺男织供本家庭的需要，在家庭的范围内，纱和布是社会产品，纺和织是社会劳动。家庭联系同它的自然发生的分工在劳动产品上打上了自己特有的社会烙印。纱和布并不作为同一个一般劳动时间的并无差别而同样有效的表现而相互交换。只有在商品生产中，个人劳动才通过它采取与自身直接对立的形式，即抽象一般性的形式变成社会劳动。交换价值是劳动的一种特殊社会形式的物化表现。作为这种表现，交换价值本身不包含自然物质，而劳动是交换价值的因而也是由交换价值构成的财富的唯一源泉。

可是，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直接的统一；同时，它只有在同其他商品的关系中才是商品。商品相互间的实际关系是它们的交换过程。在这个彼此独立的个人所参加的过程中，商品既表现为使用价值又表现为交换价值，既表现为满足特殊需要的特殊劳动，又表现为可以交换等量的一般劳动的一般劳动。物化在一个特殊商品中的个人劳动应该直接具有一般性，而商品的交换过程必然要发展和解决这个矛盾。

作为交换价值，每种商品都成为一切其他商品的价值尺度。反过来，一切其他商品用来衡量它们的价值的每种商品都成为交

換价值的相等的存在，因此交換价值变成一种特殊的分离出来的商品，并由于一切其他商品都向它轉化而直接变成一般劳动時間的化身。于是，在这个商品上解决了商品本身所包含的矛盾：它既要作特殊使用价值，同时又要作一般等价物，因而作每个人的使用价值、一般使用价值。这种商品就是貨幣。

商品的交換价值作为一种特殊商品結晶在貨幣之中。貨幣这种結晶体是交換过程的必然产物，在交換过程中，各种不同的劳动产品实际上被彼此等化，因而实际上被变成商品。貨幣是在历史过程中本能地形成的。直接的物物交換，这个交換过程的原始形式，与其說表示商品开始轉化为貨幣，不如說表示使用价值开始轉化为商品。物物交換越发展，使用价值越变为商品，交換价值越是得到一种自由形态，不再同使用价值发生直接联系，物物交換就越促进了貨幣的形成。起初，一种商品或几种具有最一般的使用价值的商品，如牲畜、谷物、奴隶起貨幣的作用。許多极不相同的、不大适合的商品交替地执行过貨幣的职能。最后，这一职能落到貴金屬身上，因为貴金屬具有一切商品的貨幣存在應該結晶在其中的那种特殊商品所必需具备的物理屬性（就其直接由交換价值的本性产生來說）：使用价值持久，可以任意分割，各部分是同质的，这种商品件件全无差別。这种商品必須經常处在交換过程中；作为一般劳动時間的化身，它必須是同质的东西，只能表現量的差別。

在貴金屬当中，黄金逐漸变成唯一的貨幣商品。黄金成了价值尺度和价格标准，变成商品的流通手段。通过商品向黄金作 *salto mortale*（拚命的一跳），积累在商品中的特殊劳动证明自己也是抽象的一般劳动，即社会劳动。如果商品未能实现这一轉化，那末它不仅失去作为商品的存在，而且也失去作为产品的存在，因为

它之所以成为商品是由于它对自己的持有人没有使用价值。

充当价值尺度和商品流通手段的特殊商品——黄金，没有得到社会的进一步协助就变成了货币。黄金与那些仅仅代表交换价值的独立存在、代表一般的社会劳动、代表抽象财富的商品不同，它是抽象财富的物质存在。但是黄金也是实物财富的物质代表者，它可以满足各种需求，因为它能够直接交换各种必需品。黄金在它的坚实的金屬体里，以隐蔽形式包含着在商品世界发展起来的一切财富。同时，从黄金的形式来说，它是一般劳动的直接体现，而从它的内容来说，则是现实的一切劳动的总和。黄金作为个体是一般财富。它由僕人变成了主人，由一个普通助手变成了商品之神。

馬克思闡述了货币在资产階級社会中的作用的一切細節，照亮了以前半明半暗或者漆黑一团的地方。他的經濟分析的識別力使人想起他曾經談到的那种汽錘，他說：“它輕而易舉地把花崗岩的巨块击成粉末，而且也能輕輕的几錘把釘子打进軟木里去。”<sup>①</sup>因此，再沒有比罗雪尔及其追隨者对馬克思所做的指責更錯誤的事情了，他們說馬克思高談感人的神話和曖昧的神秘論。恰恰相反，馬克思驅散了籠罩着商品生产，一再使资产階級經濟学家認識不清的那层神話和神秘論的烟霧。

馬克思指出社会生产关系怎样表现为存在于个人之外的对象，这些个人在自己的社会生活的生产过程中发生的一定关系怎样表现为物的特殊屬性，这种顛倒和不是空想的、而是平凡现实的神秘化怎样表明創造交换价值的劳动的一切社会形式。“在商品上这种神秘化还是很简单的。大家多少总感觉到，作为交换价值

<sup>①</sup> 參閱《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65頁。

的商品之間的关系，不过是人們与他們相互进行的生产活动的关系。在比較高級的生产关系中，这种簡單的外貌就消失了。货币主义的一切錯觉的根源，就在于看不出货币代表着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却又采取了具有一定屬性的自然物的形式。嘲笑货币主义錯觉的現代經濟学家，一到处理比較高級的經濟范疇如資本的时候，就陷入同样的錯觉。他們剛想拙劣地断定是物的东西，突然表現为社会关系，他們剛剛确定为社会关系的東西，却又表現为物来嘲弄他們，这时候，同样的錯觉就在他們的天真的惊異中暴露出来了。”<sup>①</sup> 罗雪尔本来應該稍微思考一下这种明确的区分，而不應該在他著的几大本書里前后六次以卖弄才气来安慰自己，他說馬克思是一个聰明人，但不是一个有識別力的人。

在商品和货币方面，馬克思揭露了商品生产的神秘化現象。他本来打算接着在資本方面作同样的证明，但是一些外来的原因，其中包括使他屢次中断工作的长年疾病，一連八年妨碍他繼續写作 1859 年开始出版的这一著作。在这段時間里，第一分册也就变得沒沒无聞了。相反地，罗雪尔的国民經济学教科書却接二連三地再版，历史方法在其中通过关于商品和货币的胡說八道庆祝自己的胜利，一直到令人鼓舞地發現货币是一种“暢銷的商品”为止。

### 三 拉薩尔的《赫拉克利特》<sup>②</sup>

1857 年出版的、拉薩尔論赫拉克利特的著作同他的社会活动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3 卷，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23 頁。

② 关于馬克思对拉薩尔这本著作的評語，見 1858 年 2 月 1 日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載《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97—99 頁。还可參閱列宁：《拉薩尔〈愛非斯的晦澀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書摘要》，載《列宁全集》第 38 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385—402 頁。——譯者

沒有直接联系。在某种程度上，这个著作是黑格尔的学生的优秀毕业论文，是他賴以走进生活大学的资格证明书。

拉薩尔以偉大的精神执行自己的任务。他引用了一个当代学者(大概是伯克)的話，这位学者說，自从文克尔曼、海德和康德以来，德国科学有意識地和无意識地致力于神和人的事物的世界历史考察，并企图通过語言学、史学和哲学的結合来进行这一工作。拉薩尔以預言家的眼光补充說，这样一个时代就要来了，在这个时代里，人們也像写宗教史、艺术史、国家史和資产階級社会的生活形式史那样，不会把哲学史当作一个孤立的学科来写，而是根据一切科学在历史幽灵的諸神庙里发生的具体的相互作用——首先根据它們的产生和活动——理解它們、叙述它們。由于贊成一切科学的統一，独立的思想家一开始就同专门学識的手工业者分开，因此拉薩尔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首先发现支配整个世界的規律的人。

为了了解这个人和他的功績，需要在語言学、史学和哲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詣。拉薩尔“根据它的新編的殘篇、根据古代人的記述”在两厚本著作中討論的《爱非斯的晦澀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在古代就以难懂著称。像亚里士多德这样的思想巨人也承认，在赫拉克利特的話里找不到句点，因此把他写的东西分成句子就是一件巨大工作，因为一个字應該属于下一句还是上一句，不是一看就知道的。今天的研究者連赫拉克利特論自然界的著作也沒有。这本著作只剩下一些支离破碎的論題，其他都已經散失了，这部分殘篇只以被歪曲、被損坏的形式保留下来，希腊—羅馬哲学派和基督教的会长老为了自己的特殊目的利用这种形式来解釋和修飾这些片断，把它們收罗在自己的特殊的思想体系和信仰体系里。

自从荷兰学者丹尼尔·維騰巴赫在前一世紀首先注意到赫拉克利特以来，德国的卓越人物，如施萊艾尔馬赫爾、謝林、克罗伊澤尔、伯克、黑格尔等人为解开赫拉克利特哲学之謎首先做了許多工作。施萊艾尔馬赫爾在收集和解釋这个哲学方面获得了最大的功績。他把这个希腊哲学家的基本思想理解为运动和生成，但是运动是成直綫的不断运动，生成是單純的无分別的变化。相反地，黑格尔认为赫拉克利特首先認識到作为辯证运动的生成，認識到对立的統一、存在和非存在的同一性，并把它們当作自己的体系的基础，在赫拉克利特那里，哲学观念首先以它的思辨形式出現。拉薩尔根据这一点开始对赫拉克利特进行研究，这个不到二十岁的青年想在充滿想像不到的困难的領域內胜过当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和研究者的这一事实，表明了他的崇高意志和自信心。

对于拉薩尔的著作同黑格尔的关系有两种同样錯誤、至少是同样夸大的意見。一种意見是說，拉薩尔沒有提出什么黑格尔的著作中基本上沒有的东西，这种說法同馬克思沒有提出什么李嘉图的著作里基本上沒有的东西的說法差不多是相等的。研究者可以从別人已經闡明之点出发研究科学問題，拉薩尔就以研究者的这种权利同黑格尔結合起来。同黑格尔不多几頁的粗略論述相比，拉薩尔的著作是一部訂正、补充、扩大和深化的、完全独立的作品。另一种意見是說，拉薩尔把这个希腊哲学家塞进黑格尔哲学的框框里。不过，只有沒有讀过或者最多只是翻过拉薩尔的著作的人才会提出这种看法。拉薩尔不厌其烦地反复說，赫拉克利特基本上还是一个物理学家，不是思辨的邏輯学家，他曾企图掌握辯证的世界过程的感性概念，他不能用思想的形式表达思想的本性，正是他的哲学的局限。

拉薩尔以惊人的判断力和对希腊、羅馬研究資料的同样惊人

的了解指出，赫拉克利特利用火、河流、战争以及其他感性概念叙述存在和非存在的正在进行的统一，比如他不是把火这个最初的元素理解为一定的感性的元素，而只理解为哲学形式中的生成、运动和过程，他不是用他的世界燃烧来说明万有在感性的火中的燃烧，而是说明生成的辩证之河，认为这是创造世界、支配一切的规律。拉萨厄尔把赫拉克利特的哲学放到最远的历史联系之中，从东方宗教的神秘观念和学说到柏拉图和斯多葛派的思辨，甚至一直到原始基督教的教义。诚然他是站在唯心主义立场上，但是他不像官方黑格尔派那样冲淡这种立场，而是在黑格尔哲学——用拉萨厄尔后来用过的一句话来说——对自己取得胜利的场合，在绝对理念必须让位给历史发展的场合，寻找这种立场的重心。拉萨厄尔把哲学史看做是理解自我的科学的思想史，但是他补充说，哲学史不仅是在思维意识这个特殊领域中的为本身的发展，而且首先通过在一般人中事先存在的意识和这种意识所充实的现实范围来媒介自己，哲学史是从这个现实范围分离出来的，而又反过来对它发生作用。

责备拉萨厄尔把爱非斯人黑格尔化的说法，只有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那就是拉萨厄尔把他从现代哲学学来的辩证法，当作理解古代哲学的钥匙。谁把存在和非存在的绝对对立的统一和它们的相互转化看做是“谬论专家”黑格尔的轻率的虚构，谁就可能批评拉萨厄尔论赫拉克利特的著作是“深刻的混乱”；当然他也就必然满足于赫拉克利特的哲学，满足于一堆不可理解的断简残篇。但是，如果这种看法至少是一贯的，那么写拉萨厄尔传的一个资产阶级作家要想缩小论赫拉克利特的著作的意义的做法就是枉费心机的，他说，蔡勒“常常十分认真地订正”这本著作。独立的研究者的思想成果不会由于一个有学问的专家“订正”他的著作而消失。蔡勒给

拉薩尔“訂正”，拉薩尔也給蔡勒“訂正”。拉薩尔以最亲切、最真誠的方式同蔡勒論战，而蔡勒却用浮夸、煩瑣、傲慢、令人生气的詞藻，也可以說是絕望的遁辭，充分使用不能被看做是胜利的优势的證據的詞句攻击拉薩尔。

因此，蔡勒等人也許有理由对拉薩尔的观点提出一些反对意見，这是无庸置辯的。即使他們的一切反对意見都是正确的，即使拉薩尔真正誤解了赫拉克利特的哲学，这也无損他的著作的意义。他可以像萊辛——專家們对于他論古代文学的著作也不很喜欢——那样冷靜沉着地对他的反对者說：“在研究古书时發現近似真理往往比發現真理有更多的荣誉。”先驅者的特权是，用天才的錯誤能够比熟练的日常练习用陈腐的真理更好地推动难题的解决，因此一个資產階級的哲学史家說得对，他說拉薩尔的著作处于关于赫拉克利特的爭論問題的中心，关于这个晦澀的哲学家的进一步研究（不管承认他或反对他），可以以拉薩尔的著作作为它的出发点。当卢格在拉薩尔死后閱讀这本“明晰的优秀的”著作时，尽管他憎恨社会主义者，尽管他痛罵魔鬼制造的犹太人，可是出于古老的哲学良心，他給拉薩尔作证說：“这是一个哲学的艺术品，虽然內容艰深，但却是我国全部学术著作中最易懂、最可讀的著作，因为作者完全掌握了他的偉大对象，充分理解哲学，他毫无困难地把他自己看到的東西指給別人看。”这个評價对于著作的形式和內容都是正确的。

正是在拉薩尔的《赫拉克利特》中看到公元前六世紀的黑格尔的这些人，想把拉薩尔本人造成十九世紀的赫拉克利特，这件事是够奇怪的。这一次又是一位写拉薩尔傳的資產階級作家在他的主人公和赫拉克利特之間找到了十分惊人的一致，他們不仅在推理的才能和辯证傾向方面是一致的，而且在为总体而牺牲自己的倫

理学方面，甚至在他們个人的特性，無論是美德还是恶习，都是一致的。据說拉薩尔在无限自負和蔑視人类方面同这个爱非斯人相似；虽然他們自信和驕傲，但是他們也都热心追求荣誉，追求別人的欽佩和称贊，最后，他們的国家哲学也是相同的。他們的差別只是——这里露出了馬脚！——，人們根据这位希腊思想家的国家理論很容易理解，他虽然尊重总体，但却同他的故乡爱非斯城的群众統治处于尖銳对立的地位，而人們很难看到拉薩尔如何能够根据他关于国家的相似的基本概念成为普选权的維護者，成为史无前例的群众統治的先鋒战士。这里，在这个有趣的个性身上出現了內部的分裂。“精神貴族和社会民主党人！一个人的心里可以容納比这还大的对立，但是人們不能順利地把这些对立藏在自己的情感里”。如果拉薩尔穿着漆皮靴和上等內衣对滿臉灰尘，滿手老茧的工厂工人說話，原則世界里的这个差異就“完全显露”出来了。

現在从較小的問題談起。赫拉克利特和拉薩尔的自負来自完全不同的根源。在拉薩尔那里，它是对恶劣的生活环境的胜利激战的产物，在赫拉克利特那里，是对于認識而且是独自認識絕對合理的世界規律的坚定信心。拉薩尔說，赫拉克利特被这种認識所陶醉，用一种諷刺和輕蔑的語調談論他的哲学先驅者，更不用說平庸的同时代人了，在他的全部殘篇中都貫穿着这种語調，这就不能不使他被人批評是个傲慢不遜的人。拉薩尔个人恰恰也是有权进行这个否定的批評的，因为同他沒有关系的莫过于赫拉克利特的对人的蔑視。我們只談最近的一点，那就是拉薩尔在关于赫拉克利特的研究中用同赫拉克利特的論战方式完全相反的尊敬态度，对待自己的先驅者。拉薩尔的科学論战恰恰在这个形式問題上是无可非难的。他可能用棍棒乱打了一陣，但是，除了有一次他以我

們的被污辱的大师的复仇者的面貌出現以外，他只有自己被最严重激怒的情况下，才使用棍棒。毋宁說他容易犯相反的錯誤，即过分重視对人的評价，他“对于荣誉的喧嚷的不幸偏爱”也被用来反对他的自負。但是两者产生于相同的根源；拉薩尔的虛荣心是內在不穩定性的最后残余，他在斗争中增加了自信，就是沒有完全克服这个不穩定性，但是据我們所知，赫拉克利特又絲毫沒有这种虛荣心。

拉薩尔十分美妙地描述說，赫拉克利特对荣誉的喜爱不是直接的，而是有意識的，以思想为媒介的，这种喜爱同他的哲学体系有最密切的联系。荣誉，最优秀的人选择的代替一切的一件东西，是人在他們的非存在中的存在，是在感性存在本身的灭亡中的純粹的繼續；因此它是已經达到的和真正形成的人的无限，是一种现实，不过这种现实已不存在于人的直接定在之中。拉薩尔說，这說明为什么荣誉自古以来就这样有力地抓住偉大人物，使他們超越一切微小的有限的目的，为什么一个有希腊精神的德国詩人（普拉頓）談到荣誉时說，“同試探的魔鬼手携着手”，荣誉才能接近，这也說明，为什么赫拉克利特把荣誉看做是自己的思辨原則的倫理的实现。赫拉克利特对荣誉的爱同他的基本倫理原則即对总体的献身是一回事。赫拉克利特把这理解为个人对普遍的世界規律的自觉自願的服从；因为个人在“永远繼續的荣誉”中才能达到存在和非存在的真正的統一，所以荣誉就成了人类追求的最高目标和死者的最大幸福。

拉薩尔也把为总体献身看做是“一切道德的永远的基本概念”。但是把他同赫拉克利特区别开的，是总体的概念。拉薩尔懂得思想是历史产物，而不只是存在于“思維意識的特殊領域之中”。在赫拉克利特看来，总体是支配全世界的規律，后来分成認識論、

物理学、伦理学、政治学的一切还毫无区分地汇集在这规律之中。由于爱非斯人不承认这个自然规律的客观理性，所以他们的群众统治也只是许多人的妄想，而认识这个问题的赫拉克利特只能反对这种妄想。他根本还没有能够明确地按现代字义讨论国家概念。他的最激烈的论战锋芒指向同时代市民对神的崇拜，指向占星家，甚至指向相信有支配人的高级力量存在的诗人。在这个意义上他说，应当把荷马从宴会中逐出，并且加以鞭笞。

为了说明赫拉克利特的总体的概念，拉萨尔做了确当的比较，即在黑格尔哲学中，规律也被理解为普遍的实体意志的实现，在这个定义下丝毫不考虑形式上的主体意志和主体的计算。但是，拉萨尔是客观理性的尊崇者同时也是争取普选权的先锋战士，他同上述观点并没有丝毫矛盾。拉萨尔同赫拉克利特和黑格尔一样不妄想能够从人的数量中算出客观理性，他对普选权也不是这样理解的。对他来说，普选权并不是制造客观理性的手段，而是帮助客观理性取得统治地位。因为，如果拉萨尔同赫拉克利特和黑格尔一起把对总体献身看做永久的基本伦理概念，那么根据历史发展，总体的历史意义在他那里同在赫拉克利特和黑格尔那里就不一样。对他来说，总体不是普遍的世界观念，不是绝对的国家观念，而是“工人等级的观念”。拉萨尔并不是因为工人阶级人数最多，所以为它说话，而是因为工人阶级——他曾屡次表明这个思想并提出深刻的论据！——在现代阶级国家的历史条件下是对总体献身的体现，因为在所有阶级中，只有它能够舍己，而且也因为在混乱复杂的阶级利益中，它的特殊阶级利益就是普遍利益。拉萨尔的漆皮鞋和产业工人的长满硬茧的双手当然也只“纯粹表面上”出现在这种“原则的世界”里。

关于拉萨尔的“内在的分裂”，关于“精神贵族”和“社会民主党

人”之間的悲劇性的、有时也很可笑的对立的一切謔言归根到底都是一种笨拙的謬論。它是由已經遭到拉薩尔的严厉批判的思想的孤立和割裂产生的，自由派资产階級只能孤立和割裂地掌握政治內容。

#### 四 拉薩尔写的悲劇<sup>①</sup>

1844 和 1845 两年，拉薩尔写了論赫拉克利特的著作的草稿，并且对其中的三分之二进行了加工；为了补充最后的三分之一，他又花去了从 1855 到 1857 年两年時間。

他在給馬克思的一封信中叙述了什么事情使他懶得动笔，他叙述了“在已經流了这么多血，这么多的行动喊叫报复以后”，必須研究理論的痛苦；他只把国民經济学著作算做例外，因为它们也是实际行动。他对行动的渴望使他叹息說，研究理論根本没有什么直接用处，因为人們永远安静地繼續生活下去，就像最优秀、最偉大的著作和思想从来沒有写出或想出似的。因此，拉薩尔把他对赫拉克利特的研究当做一种特殊研究，“几乎作为一种安慰”进行，这种特殊研究同他的现实利益有一些接近，但是还没有现实到把他完全吸引住的程度。他研究了宗教改革时期的偉大的世界轉折点。

拉薩尔的这些自白是有特色的，而他用来表示研究成果的形式也是有特色的。他用弗兰茨·馮·济金根做一个历史悲劇的主

<sup>①</sup> 关于这一节可參閱馬克思和恩格斯給拉薩尔的論悲劇《弗兰茨·馮·济金根》的信（中譯文載《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文艺》，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3—16頁。——譯者）。梅林沒有看到这两封信，因为它们保存在拉薩尔的遺物中，1922年，才由古斯达夫·迈耶尔在他出版的拉薩尔的《遺著和通信》第三卷中发表出来。——原編者

人公。拉薩尔不是詩人，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他承认，他在青年时代連一首抒情詩也沒有写过，他沒有任何想像力，他主要是用革命的行动力而不是用詩人的天才来写他的悲剧的。他还可能写的其他任何剧本也是具有不同形式和名称的这种剧本。他承认，对他本人來說，把他关于宗教改革时代的思想写成一部学术著作是一件比較容易的事，但是他以自觉的認識和动人的热情想使这个文化历史过程为全体人民所了解，因此他決定写剧本。亚历山大·馮·洪堡的話（他认为，写韵文是对一种題材的最大寵愛），成了这个悲剧的座右銘。

因为拉薩尔本人自动暴露了朝向詩人方向的側翼，所以再一次列举他的悲剧作为文学作品时常出現的缺点是多余的。花費很多時間討論拉薩尔的美学观点，也沒有必要。他同艺术沒有深刻的关系，艺术对于他是手段不是目的。在五十年代經常同他交往甚密的一位画家（当然并不恰恰是他那一行的大师），甚至誹謗拉薩尔，說他对于艺术的創造性毫无所知，他只把艺术当做思想的解說者，在音乐方面，他对理查·瓦格納的朗誦的悲愴調子流露出一些好感，在造型艺术方面，他把一个年輕的战争画家（后来这个画家通过他的宫廷式的战争画对德国繪画的沒落起了协助作用）捧为未来的解放战争的最著名的表現者。这段叙述无疑是过甚其詞，但是它并不完全是虛构的，拉薩尔在他的悲剧的前言中关于历史剧的前途所写的一些警句式的話說明了这一点。

他不想再把剧作的历史內容放到历史材料、事件和人物里，而是主要放到一个时代的最內在的世界历史思想和思想冲突用戏剧的形式十分明确地展开和表現的地方。他沒有能够避开这样一种剧的礁石，抽象的学究气的韵文这个怪物，但是拉薩尔认为，这块礁石是完全可以避开的，由于个人所有的思想和目的的規定性，个

人可以得到一种完全坚强有力的、甚至质朴和现实的个性。显然在这里，拉薩尔被他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引入歧途了。历史斗争的“质朴的现实主义”并非产生于思想冲突，进行斗争的人对于他们的目的的想法越被明确地表现出来，它们通常就越不适应向后看的历史家可能概括在历史思想冲突这个概念中的东西。

当然，在拉薩尔的作品中常常出现的夸大，只是对德国生活的一种严重损害的过分激烈的反应。他说：“在我这个基本上在古代韵文及其光辉形象的怀抱里形成艺术观点的人看来，只有最近时期在我们的艺术中扩展的那种不良的狭隘观念，向偶然性格的无思想、无实质的特殊性的巨大深化，被这个剧本的构思排除了，而且对事情十分有利地排除了。”拉薩尔以此对朱利安·施米特进行了第一次打击，当时施米特正把古斯达夫·弗赖塔克的妙龄女郎和吝啬的小商人或奥托·路德维希的用石板瓦盖屋顶的老实工人捧为民族文学的“光辉形象”，如果一个可爱的女人热情地倒到这些工人怀里，阴暗的念头就出其不意地袭击他们，好像“一个墨水瓶似的东西”可以掉到“内衣或一张有价证券似的东西上似的。”<sup>①</sup>拉薩尔想把韵文由这些潮湿的低地送回历史生活的高峰，不过他给剧本蒙上哲学外壳这个错误，不像在韵文怯懦地想从时代的重大问题旁边偷偷溜过去的时候时常出现的那种“不良的狭隘观念”那样严重。拉薩尔不是诗人，但是宗教改革时期的历史精神在他的《济金根》里比在真正的诗人盖尔哈特·霍普特曼的《弗罗里安·盖耶尔》<sup>②</sup>里更为充沛。

虽然恩格斯在《新莱茵报》的评论中已经明确指出经济动力对于德国宗教改革的发展的决定性影响，但是拉薩尔在研究这个伟

① 梅林在这里是说奥托·路德维希的小说《天地之间》。——原编者

② 霍普特曼写的描写十六世纪德国农民战争的剧本，1896年上演。——译者

大时代时，还没有摆脱他的唯心主义观点。他始终想把恩格斯当做德国人民的革命传统对待的偉大农民战争只看做是一种反动现象。使他走上这条错误道路的，是他把历史灾难理解为内在的思想冲突的偏向。因为土地占有是封建的中世纪的“支配原则”，农民虽然比较坚决、比较单纯地想发展这个过时的原则，但是正因为如此就不顾这个原则的内在的腐朽性而想维持它，所以他们的反抗虽然使用种种血腥的暴行仍然是反动的。不可否认，在拉萨尔的这个论点中有某种眩目的假象。从宗法式的农业经济的阶级立场出发，不能根本改变封建的生产方式。一切企图用自己的力量粉碎封建枷锁的农民起义，除了在某些地方由于地区的条件或其他特殊条件有利，在十分有限的范围内成功以外，其他都失败了。摧毁封建社会制度的革命力量不是来自农民而是来自城市人民。但是，如果这是事实，那么任何资产阶级革命——在英国、法国，只要它取得胜利，在德国也是这样——首先是依靠农民的力量取得胜利的，这也是事实。因此，拉萨尔把农民战争看做反动现象是根本错误的。农民战争之所以失败，并非因为它们把历史车轮倒转，而是因为它们在推动历史车轮前进的条件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就想把历史车轮向前推进。

相反地，企图挽救已经不可更改地走上了历史的没落道路的中世纪骑士阶级的济金根暴动却是一个本质反动的反抗行动。恩格斯已经明确指出这一点，拉萨尔对这一点基本上没有别的想法。但是，他从唯心主义立场出发也不能否认，中世纪的骑士的两只脚是站在土地占有这个“支配原则”上的。乍一看，更使人感到惊奇的是，拉萨尔把一个历史上的反动人物当作一个充满革命行动力的剧本的主人公。不过这里也有一个思想上的媒介。

使拉萨尔迷恋德国宗教改革史的，是胡登这个人物。胡登不

仅是低级贵族的理论家，而且也是，并且首先是一个人文主义者。除去路德以外，他是宗教改革时期的唯一作家，尤其是当胡登开始用德文写作时，他的声音往往在所有阶级中得到反应。当他唱着：

“我们要团结一致，  
莫让我单独斗争，  
你们要怜悯祖国，  
尊敬的德意志人，动手吧！  
为自由斗争的时刻现已来临，  
这是上帝的意旨。”

这时真正的民歌回答了那个“法兰克尼亚的高贵骑士”。但是胡登比路德有自由人的热情。他那同样吮吸古代文化的乳汁的火热、激烈的雄辩，以高超的思想反对诸侯和僧侣，胡登越是热情地在正在发展的斗争中争取城市联盟，甚至争取农民联盟——如果《新农民》是他写的话，关于这一点，拉萨尔认为是毫无疑问的——他的雄辩就更多地揭露了狭隘的阶级立场。于是对拉萨尔说来，胡登成了民族英雄。

但是拉萨尔并不隐讳，正是使他对胡登感到兴趣的“抒情诗的基调”使法兰克尼亚的骑士成为一个非政治的英雄，在胡登那里归根到底一切都停止于理论阶段。胡登本人把济金根捧为德国的救星。现在给拉萨尔提出的问题是：济金根为什么失败？他失败在哪一点上？革命思想如何化为革命行动？如何解决矛盾？当革命者采取第一个实际步骤的时候，这个矛盾立即在原则的令人鼓舞的力量和完全的彻底性为一方，思考的理智和一切政策的必要的片面性为另一方之间出现。拉萨尔把他的历史悲剧的形式上的悲哀观念叫做一切行动的性质，尤其是革命行动的性质所掩盖的深

刻的辩证矛盾。

按照拉薩尔的看法，济金根的失敗是因为他想用反动手段实现革命的目的，他没有为了实现自己的民族性的目的号召全民族，而是想在对一个帝国的僧侶諸侯做騎士战斗的弯路上开始民族革命，这条弯路任何时刻也不能蒙蔽諸侯和僧侶，但却能蒙蔽人民群众。拉薩尔用深刻的論证回答了这样一种智力上的过錯能否是悲剧性的过錯的問題：一个革命者不相信自己的原則，因而他想从后面繞过来实现这个原則，他想推翻一个腐朽的世界，但在精神上并不比这个世界优越，不能找到推翻它的正确手段，这个革命者的智力上的过錯也是一种道德上的过錯，这种道德上的过錯又由于它是一种智力上的过錯，并表示最真实的悲剧冲突而得到減輕。可是拉薩尔所不認識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济金根的历史过錯在他手里已經变成它反面的东西。济金根之所以失敗，并不是因为他想用反动手段达到革命的目的，相反地，是因为他想用革命手段达到反动的目的。正如恩格斯已經指出的那样，济金根的民族目的是一种以君主为首的貴族民主制，树立了这个目标，济金根就坚决、明确地行动起来，他的手段中完全貫穿着他的目的，从革命策略的立場看来，这是最理想的。假設他能够而且也想号召整个民族，那么他就一步也不能往前走。因为当时的小貴族是最爱国的階級，也是农民和市民即广大群众最痛恨的階級，事实上，沒有任何其他东西比济金根所計劃的帝国改革更严重地違背农民和市民的利益了。毫無疑問，按照拉薩尔的看法，济金根的历史过錯也是一种悲剧性的过錯，但这是同实际情况相反的看法，济金根以革命者自居，实际上却是个反动分子。

相反地，拉薩尔以为在济金根身上看到的悲剧性的过錯却是三月革命中的德国資產階級的历史过錯。德国資產階級應該完成

一个革命任务，假如它选择另一条通往可以达到目标的可行的道路，它是可以完成这一任务的。当然，德国资产阶级妄图用来欺骗它的死敌的怯懦的狡计到底同策略有没有一点关系，这还是一个有待争论的问题。但是拉萨尔并不像这个阶级所表现的那样看待这个阶级，而是像它在最有利的条件下可能被看待的那样看待它，我们也不能因此而指责他。他在自己的辩护发言中为了驱使德国资产阶级在最后关头采取坚决的行动，而在它的背上抽了许多血痕。现在，当它被反革命蹂躏的时候，他就以善意的宽容态度对待它。他在五十年代所遵循的政策始终考虑资产阶级能从三月革命的命运中吸取教训的可能性。只要这种可能性确实是一种可能性，只要对于过去的宽容不损伤现在和将来的要求，那么毫无疑问这也就是从无产阶级立场提出的政策。拉萨尔十分严格地遵守这个界限：他在他所写的悲剧中对德国资产阶级所讲的关于革命策略的一课是最动人的。

因此拉萨尔的《济金根》是一个倾向剧。如果有人要说，拉萨尔以作家的可以反对的或不可反对的权利，给他的主人公济金根安上了他实际上没有的倾向观点，那么这是一种夸张的说法。拉萨尔公开发表的言论，尤其是他关于他写的悲剧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使人毫不怀疑，他从历史上对于济金根的暴动就是像他在剧本中所表现的那样理解的，尽管这种理解是唯心的。当然，他所以把这个历史题材写成剧本，只是因为他把济金根的命运看做是德国资产阶级使三月革命遭到的命运的忠实反映。

拉萨尔在他的剧本中用革命目的只有用革命手段才能达到这个论点解决了革命行动的性质中的辩证矛盾。他对革命手段的理解当然不是某种专门意义上的暴力手段。在这一方面，他只是说，必要的革命手段不能因为它是暴力手段而不采取。十六世纪的资

产阶级革命和十九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完全相似就在于此，这两次革命的代表者只要到了射程之外，他们就开枪挥剑进行威胁，但是，一旦进入射程，他们就装扮成世界上最和平的教父。因此拉萨尔在剧本里安排了一个路德派的教士在讲道时说，世俗的暴力褻瀆了纯洁的教义，即不应受到血腥的剑污辱的爱的教义，他借胡登之口严厉叱責为自由而揮舞的剑就像叱責生于现实的神那样。但是在这个剧本中，同片面的、现实的革命者济金根相比，胡登代表(这是不可忽视的)十分热情的、看到现实的实际条件的、也片面甚至更片面的革命者。胡登在回答那个教士时说：

“尊敬的先生！你对历史很不了解。  
你说得对，历史的内容是理性，  
可是它的形式永远是暴力”。

这是拉萨尔的历史哲学的信条，而不是他的实际革命的信条。他无数次嘲讽提到革命便立刻看到干草叉閃光的愚蠢行为，但是他对于与此相反的愚蠢行为也是不以为然的，这种蠢行要求不用暴力推翻剥削阶级和压迫阶级，甚至只有用暴力才能推翻它们的时候也不这样做，这样就给这些阶级开了许可证。

拉萨尔认为黑格尔的论点——一个目的只能通过一种手段达到，如果这种手段事先已经完全被目的特性所渗透的话——是革命手段的真正檢定标准。当拉萨尔把这个论点实际运用到历史的阶级斗争上的时候，他还在某种程度上使用了哲学概念，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的革命实践怎样从这些哲学概念逃脫出来的，以致它们只像破蛋壳那样附着在它上面。从本质上来看，拉萨尔是根据阶级斗争的实质来作证明的。

一切統治阶级的永久的长处是它们用来保卫自己的阶级利益

的階級意識，這種階級意識是經過鍛煉的、十分明確的、不受任何迷惑的。一切革命階級的永久的弱點在於，它們的階級意識還沒有受到鍛煉，因此它們的政治眼光還不明確，它們的認識還粗淺，它們的力量還沒有組織起來。在這種情況下，革命的領袖們考慮現有的手段，對別人（正因為如此有時也對自己）不公開運動的真正的、最後的目的，通過有計劃地欺騙統治階級取得組織新力量的可能性，以便通過智取的一部分現實戰勝現實本身。如果是這樣，那麼革命的領袖們就似乎可以慶賀擴展的智慧的勝利。但是這種表面上聰明的策略必然埋葬一切革命。它欺騙不了統治階級，因為統治階級有十分明確的階級意識而決不可能受到欺騙。可是這種策略却欺騙了還沒有階級意識的革命階級，它懂得革命的全部直接的原則，但被這種原則的緩和和妥協而引入歧途。“最後必然出現這種情況：這些革命謀士本來希望面前沒有受到欺騙的敵人而身後有他們的朋友，可是結果相反，面前有敵人而身後卻沒有他們的原則的擁護者。好像是最高的智慧事實上卻表現為最高的愚蠢。”因此只有革命的一切實際措施貫穿着革命的原則，不玩弄外交手腕，不捉迷藏，把最公開的手段看做是最有力的手段，只有這樣革命才可能勝利。

在這些話里包含了拉薩爾的革命行動綱領，內在信念的深度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創造了詩人，在劇本結尾時，詩人讓巴爾塔沙爾老人對濟金根說：

“哦，你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末一個  
在大事情上要狡猾而送掉性命的人，  
在歷史的市場上，化裝行不通，  
在那混亂的市場里，人民只根據

甲冑和徽章来辨认你。  
经常大胆地把你的全身  
都染上你的旗帜的色彩吧，  
然后你在巨大的斗争中考验我们，  
你的真正基础的整个行动力，  
拿出你的全部能力挺立和战死。”

拉萨尔这个悲剧是写给资产阶级看的，可是资产阶级没有注意这个剧本，即使它看到，它也不能理解。一直到今天，资产阶级的政策还是原封未动，即“在大事情上要狡猾”。拉萨尔的革命行动纲领在德国工人阶级的政治发展中得到具体实现。如果我们用比较的眼光看一下，以德国资产阶级为一方，德国无产阶级为另一方三十年来在政治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那么我们就可以十分容易和迅速地决定拉萨尔的行动纲领是否正确的问题。

## 五 拉萨尔的法哲学主要著作

促使拉萨尔写悲剧的那种对实际行动的渴望，又推动他写了《既得权利体系》<sup>①</sup>一书。

一部艰深的理论著作，一部以几乎无限渊博的学识深入到几千年的法学史的最深处的著作是根据实际政治利益而写成的，这种说法听来好像是不合理的。但是事实就是这样，而且这对拉萨尔也不是什么不光采的事。他的伟大才能表现在能够看到事物的重大联系。在他那里，实践和理论不是两个对立的观念，也不是一

<sup>①</sup> 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拉萨尔这一著作的评语，见1861年12月2日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载《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3卷，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54页）和1861年12月9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载同上书第56页）。——译者

个概念的两个方面，它們是同样通过思想和行动而存在的同一个概念。因为对德国人說来，研究理論的时代始終沒有过去，所以拉薩尔在理論中准备在重新开始斗争时能够立即使用的武器。他在他写的悲剧中問道：为了胜利，革命的思想应该怎样变为革命的行动？而在他的法哲学著作中他又問道：胜利以后，革命原則如何变成成文法，旧的法的状态如何轉变为新的法的状态？拉薩尔“从古羅馬的考古学堆房里，从世界历史的全部运动中，为实现最近的目的鍛造武器”，他想“为革命和社会主义建筑一座科学的法的体系的坚固城堡”。

1848年，柏林議會未能完成把封建的法轉变为资产阶级的法的任务。它沒有可以同庇护一切封建垃圾的既得权利的要求进行明确爭論的原則。反革命胜利以后，任何既得权利都被宣布为神圣的，如果为严酷的必要性所迫，不得不放棄中世紀形式的这种权利时，就用現代的形式把它恢复过来，正如五十年代的反动立法屢次表現的那样。正当拉薩尔在写他的法哲学著作时，封建的土地税免納权要用无数的錢去贖买，又一次宣告“人民对貴族地主的依附关系”。另一方面，拉薩尔科学地发展了既得权利的理論，他确定了新法律对于既得权利能够以及如何追溯既往的問題。

拉薩尔认为黑格尔的法哲学沒有解决这个問題。他发现，黑格尔最多只提出了对真正的法哲学的一般处理，而沒有談到法哲学本身。黑格尔的学生满足于不断重复他的处理，顛三倒四地談論最淺薄的普遍的基本內容如财产、契約等等；他們待在一概詞藻的天空中，尽可能远离現实的法的元素的粗糙土地，而不深入实际的法的材料的財富并具体地說明这种財富。現在拉薩尔想做这件事。他把法学比做一块地，他想熟悉它的犁沟和沟渠，以便让光的火焰从它們之中上升，而黑格尔的追随者只知道用从上面仓促落

下的焰火照亮这块土地。

拉薩尔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明确地摆脱了绝对理念，以便赋予历史发展以它的权利。他认为像财产、继承权、契约、家庭这些抽象的一般范畴根本没有什么意义，罗马的财产观念同日耳曼等的财产观念不同，换句话说，适应历史精神王国的法哲学同逻辑的永久范畴没有什么关系，而法的原理只是历史的精神概念的现实化，只是各种不同的历史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的精神内容的表现，因此只应这样理解它。

但是拉薩尔同黑格尔的决裂只到这一步。他不願离开黑格尔的旗帜，而是用不同的手段把这面旗帜导向胜利。他牢牢地抓住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辩证方法。法的唯一源泉是全体人民的共同意识，是一般的精神。“自黑格尔以来，这个论点在理论上确定下来，因而它不需要什么新的证明。”拉薩尔正是把这一点当做自己的任务，即从各种不同的民族精神的历史的法中夺得法的观念，把这种观念提高为完全明晰的东西：法的形式逻辑，说明新的法律（不管该时代意识具有什么内容）怎样根据法的观念对已经存在的法的关系发生作用。考虑到流出和流进的波涛的变动和波涛回来的漩涡，拉薩尔想用有力的笔触为追溯既往的概念画出难以毁坏的基线。

他用最一般的笔调写出下列结论。只通过个人的意志行动的媒介涉及个人的法律不能追溯既往。这种追溯既往是对人的自由和可负责性，对思想和愿望的自由，对一切权利的不可侵犯的基础的一种绝对不可容许的侵害。不管立法者的权力有多大，它也不可使一个个人想做同他过去想做的不同的事。但是由此同时得出结论，个人只有当他的自愿行为，个人的意志行动将被后来的法律所取消或歪曲的时候，才能提出这种异议。法律本身不以个人意

志为媒介，用来接触个人的权利无非是只随着法律颁布而存在，随着法律的消失而消失的一般的性质和权能。在法律中体现了全体人民的法的意识。因此一切合法权利只是一种由经常变化的一般精神设定的规定，因而任何新的规定立即用过去的规定接触个人所用的权利把握个人。对个人来说，只有他通过自己的行动和愿望由这个河流中导出的东西，变成了他自己的东西，才是巩固的。不涉及从前的个人的意志行动的任何法律，只要它不涉及这种行动，根据它的性质必然立即进行干涉。

因此，同任何只以个人意志行动为媒介涉及个人的法律不可追溯既往这一论点相一致的有另一个论点，即任何没有插入这种自愿行为而涉及个人的法律，任何在个人的不任性的、一般人的或自然的或由社会带给个人的性质中涉及个人的，或者只是由于个人改变社会的有机制度而涉及个人的法律可以追溯既往。

但是，从追溯既往这个概念还产生更多的东西。如果现行法律许可，而且在这种许可的范围内，个人才可以通过他的行动，通过一方的或双方的契约保证自己或别人的权利。从一开始就必须附带考虑任何契约的缄默的条款。为自己或别人约定的权利只在立法认为这种权利是可以允许的时候，才是有效的。个人的相反的意志从来就是无效的、不合法的，因为法的唯一泉源是普遍的民族精神，不扬弃法的概念本身，个人就不能摆脱普遍的民族精神。个人不能在法制基础上打下木桩，利用木桩宣称自己在任何时代都是自主的。个人希望得到的自主权就是要求既得权利在绝对或强制的法律，即不允许向个人的自由意志让步的法律排斥它的容许性的时期也继续存在下去。“不能把一个木桩打入地下，并且要求，如果木桩所在的整个大地震动起来，木桩本身还要留在原来的地方，同样把这样一个木桩打入法制基础也是不可能的。这是时

常听到的、沒有反对法的法这种說法的真正意义。这无非是說,每个单个的法都依从法的实体的变化,法是从这个实体中产生,而且同这个实体紧密联系着的……只要公共精神在繼續发展中从現在起能够取消一种从前的权利,如农奴制、依附关系、徭役、領地权、强制权、勤务和一定实物的賦稅、狩猎权和土地稅免納权、世襲財產继承权等等,权利者就发出使人意志混乱的偏頗的叫声,根据上述,已經可以看到这种叫声是完全空虛而且深刻違背法律的。”排斥一定的法的内容的絕对的或强制的法律也在个人获得的权利中破坏这个内容,不可因此而談到一种不允許的追溯既往。

拉薩尔在同普魯士封建派的理論家施塔尔的一次光輝論战中,論证了这个观点。他用辛辣的諷刺口吻指出,这个具有一切欺騙才能的人,正因为他想向現代意識作某些让步,才发表了关于既得权利的无思想、无内容的,毀灭自己的謬論。然后拉薩尔把矛头轉向法的历史学派的首領薩維尼。薩維尼不很坚决地承认絕对法律对既得权利有溯及力,但却要求在每个这样的場合“給权利者以真正的完全的补偿”。拉薩尔对他說,这种所謂要求賠償的权利是大錯而特錯了。“即使通过契約,一开始就由个人合法地約定权利,权利也只能約定到这种权利的普遍存在碰到否定这个权利的,认为它是不可能的公共精神的意識的那一天为止。这个权利在它能够而且應該有效的时期內生了效。那个不幸的日子,一开始就預先决定了行动的必要的日子已經到了——一切都清楚了。权利應該而且能够有效的界限已經达到了,因此从邏輯上和法学上看,都沒有考虑賠償問題的余地。这里沒有什么應該賠償的。”但是,当被取消的权利的内容已被公共意識所禁止的时候,也就是被規定为非法的时候,仍然承认賠償权实际上就是利用邏輯的力量,授与階級或个人这种权利,即要求公共精神为它的繼續发展繳納貢

稅的权利，也就是承认公共精神对那些有权的阶级或个人的有納貢义务的隶属关系或依附关系。

如果从追溯既往的概念中看到这一点，那么从这个概念中当然还看到另外一点。如果新的法的意識不是排除法的关系本身，而只是排除它一定的应用方式，那么只有这种方式，而不是法的关系本身被认为是非法的，而且必然出現賠償的形式可能有的而且时常有的一种变化。但是这只是它虛假的外表。事实上，这种变化只是把还被认为有效的法的内容由受禁止的滿足它的方式轉为不受禁止的方式。由于很簡直的理由，必然发生这种变化，因为被廢止的不能多于新的法的意識的观点实际禁止的。

拉薩尔特別以 1848 年普魯士狩猎法为例說明了原則的这个方面。他說，因为新的法的意識排除了狩猎法的封建領主的根源，所以柏林議會不得不宣布廢除由領主权利中产生的在他人土地上狩猎的权利，但是，因为新的法的意識允許通过土地所有者的自由的意志契約使狩猎权与土地分离，所以柏林議會必然允許由土地所有者有償轉让的反证，在这种場合必然規定贖买。拉薩尔认为，柏林議會对于不适当地追溯既往負有責任，因为它否決了舒尔采—德里奇提出的相应的提案。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这里对于資產阶级也是非常寬容的。他对封建的理論家和高等法院的卑鄙的實踐进行最沉重的打击，而只在比較起来非常緩和的場合，提到資產阶级的人民代議机关在这方面所犯的罪过，而且还补充說，柏林議會由于实际事件紛繁而沒有注意一种主要是理論上的差別，决不能因此而責备它。狩猎权的贖买必然出現的情况恐怕不会很多，法学家應該主要注意常規，而不是主要注意例外。

既得权利的这一套理論，不是拉薩尔从自己的脑子里想出来的，而是他遵守自己的諾言，从实际的法的原料中发展出来的。他

探索追溯既往的思想，从罗马十二表法一直到五十年代的普鲁士立法。他以令人不断惊叹的对法律材料的广博知识和深刻的哲学思辨在各种不同的法律制度中研究这种思想。拉萨尔从非常玄妙和众多的材料中，使追溯既往的概念很容易地变得透彻明白，这永远是人类精神的值得纪念的功绩。

如果有人问，拉萨尔的著作起了什么实际作用，那么洛贝尔图斯对拉萨尔的结论所提的几点反对意见很快成为这个问题的核心。根据拉萨尔的看法，赔偿问题取决于人民意识是否原则上排除一种规定的权利，还是只排除这种权利的一种既定形式。洛贝尔图斯表示不同意说，根据什么能够看出这种区别呢？多数票，甚至全体通过都不能确定这个差别。拉萨尔回答说，这个问题同法的形式逻辑，同追溯既往的理论根本毫无关系。今天的或者将来任何一个时代的意识需要什么，今天的时代对婚姻、国家、君主国、狩猎、矿山、报纸、财产如何看法，或者将来如何看，这是决不能用可以成为全部世界历史便览的形式上的规则来确定的。这个答辩看来是清楚的，但是拉萨尔觉得洛贝尔图斯的反对意见并没有因此而结束。如果内容不明确，那么用于这个内容的最清楚的法的逻辑也必然变成不明确的。于是拉萨尔“顺便”回答说，当然多数票和一致通过都不能确定今天的时代意识需要什么，但是他认为可以“非常简单”地确定这个意志。“时代需要您能通过理性、逻辑和科学给自己和时代以证明的东西！”这句话又描绘出拉萨尔的全貌，说明了他的毅力，他集中的热情，他对不可抵抗的思想力量的不可动摇的信念，但也表现出他同这些优点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缺点。

当然时代总是仅仅提出它能够解决的任务。可是在它把这些任务发挥到这种地步，以便认识它们并利用成文法解决它们以前，

可能过去几十年乃至几百年，在那以前，理性、邏輯和科学不能证明时代需要什么。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就沒有那么多的对此有所了解的、給他們的时代证明它需要什么的前驅者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和被燒死了。拉薩尔不久就亲身体驗到，他举的这个例子是多么不恰当。他看到，时代的活跃的推动力量在进行解放无产阶级的的工作，但是他用来证明这个确凿无疑的事实的一切理性、邏輯和科学却不是向时代这样闡明它的意志，使得一个新的法的意識产生出来，而法的形式邏輯可以利用这种意識考驗自己。

拉薩尔的唯心主义世界观有它的长处，也有它的弱点。当他辛辛苦苦地研究法的实际材料的时候，他必須“不断”确定这一事实，即立法依靠它的实际的法律感比理論家利用他們的理性、邏輯和科学更接近法的观念。假如拉薩尔再往前走一步，他就会发现，群众的內在欲望往往比立法的实际法律感更明确得多地把握法的观念。3月18日以后向容克压迫者进攻并宣布廢止封建勤务的农民掌握既得权利的理論比普魯士議會深刻得多。

是的，拉薩尔在他的著作的最有趣的一章中也在一定程度上迈了这一步。他在这里說，在古代民族中，民族精神表现为这样一种客观的实体的紧密性，民族精神的这种倫理統一和一致在个人身上是生动而活跃的，以致事实上被这种內在的实体明确否认的东西可以看做是被法律否定的东西。但是只是在古代民族中，这是可以允許的，而且在他們那里也只有古典时代是这样。在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教养和怀疑等等使民族精神的倫理观点在个人中存在的严格的統一和一致松弛的近代，在屬於同一个国家的个人的倫理意識常常是圍繞着几乎全部世界时期分离存在的倫理意識的近代，这是不允許的。对于近代來說，只有已經間接或直接地被設定的、普遍的法的意識的內容能够要求法的现实。所以說間接

地或直接地，是因为把这个内容放在全体人民的言語里，当然是不必要的，而对它的法的现实来说，把它放在全体人民的行动中就够了。于是拉薩尔說，当法国国民議会使它关于继承权的法律一直追溯到攻打巴士底獄的那天为止的时候，国民議会沒有进行不容許的追溯既往。因为法国人民在这一天摧毁了封建社会的法的状态，表明了他同封建特权对立的法律上平等的法的意識。

拉薩尔对薩維尼說过的話，对他自己也差不多是适用的：他十分接近正确的东西，結果却由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从原則上把正确的东西弄錯了。显然攻打巴士底獄不是全体人民的行动，而是一大部分或一小部分人民的行动。他不把在个人中松弛的民族精神的倫理观点总括成严格的統一和一致，而是恰恰证明属于同一国家的个人的倫理意識确实可以圍繞整个世界时期分离存在。如果他像他在历史上肯定已經創造了的那样創造新的法，那么这个法的源泉就不是普遍的民族精神。用拉薩尔的話來說，在攻打巴士底獄的行动中沒有一种一般的法的意識，而只有一种特殊的階級意識，这种意識只有当它与社会的普遍需要相适应时，才发展成为一般的法的意識，其发展程度随其适应程度而定。拉薩尔所理解的时代的唯心主义概念始終是一个一定的社会，这个社会的历史发展在自身的变更中也决定法的变化。

但是，首先受到駁斥的是拉薩尔为他的追溯既往的理論所做的证明而不是这个理論本身。因为他根据許多实际的法的材料闡明这种理論，所以他可以完全正确地闡明它，不管他是在正确的或不正确的地方寻找它的基础。可是洛貝尔图斯也用第二个反对意見攻击理論本身，他說，拉薩尔在羅馬的《学說汇纂》<sup>①</sup>中找到他的

<sup>①</sup> 《学說汇纂》——羅馬法学家著作的摘录汇编。它是羅馬民法典(Corpus Iuris Civilis)的主要部分。——原編者

理論一事，由于历史精神的不同是完全不可能的。拉薩尔經常強調历史精神的不同，但又想在像近代和羅馬时代这样不同的时代里，再認識同一理論，这是一个矛盾。拉薩尔用洛貝尔图斯本人曾經作过的比較来回答这个问题，人們可以談論一个动物、一种脊椎，虽然深入研究只有作为对动物各目的研究才有可能。在法学上情况是这样，历史精神的内容是不同的，但是他称之为法的形式邏輯的另一个因素却完全相同地貫穿这个不同的内容。正如他有意識地为了后来的一切时代闡明这种法的形式邏輯一样（不管每次的法的意識具有何种内容），同一个法的形式邏輯在羅馬人那里已經能够成为无意識行动的动因了。

如果拉薩尔說，脊椎动物的体格虽然各不相同，但同无脊椎动物相比，它們都是有脊椎的，因此，一定的法的体系，它的历史发展虽然各不相同，但同其他法的体系相比，它可以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特征，那么他的答辯会有力一些。他在自己的著作中詳細叙述中国、印度、甚至埃及的立法都不知道追溯既往这个概念，因为他們对于精神的主观性、个人的自由和责任能力毫无所知，希腊羅馬时代的古典民族才明白这些东西。拉薩尔繼續前进并且說，中世紀的日耳曼的財產概念或多或少地使追溯既往的理論不再通行，使不追溯既往广泛流傳。他对法的观念本身談得很多，他不自觉地也只是把它当做历史的而不是当作邏輯的观念理解。他把它限制在羅馬法的时代和在中世紀末期又撿起羅馬法用自己的方式繼續发展了它的现代民族的时代。

但是羅馬法是一个商品生产者社会的法律。希腊羅馬时代的古典民族并不像拉薩尔所說通过教育或艺术或宗教，而是通过从原始共产主义发展出来的私有財產和商品生产而达到“精神的主观性”，达到“个人的責任能力和自由”的。只有在这个一定的社会

基础上,历史发展的任何进步,任何革命都必然是一种私有制对另一种私有制的胜利。正如拉薩尔用自己的唯心主义方式所說,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既得权利的概念可以成为“一切其他形态的推动的噴泉”。可以理解,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貿易在中世紀的自然經濟中枯竭,《学說汇纂》的法的形式邏輯也黯然失色,随着它們在中世紀末期复兴,羅馬法又得到了成为最适合商品生产者社会的法的新荣誉。只有当专门意义上的法、特殊的法学、法学家的业务本身由商品生产中产生并保证商品生产的发展条件的时候,拉薩尔才可以把法的观念本身当做一个邏輯范疇来談論。他的卓越功績在于,他研究了从古代简单的商品生产到现代资产階級社会的高度发展的資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有意識地显露出来的法学基本思想,一直到彻底弄清楚为了在私有财产和商品生产的基础上还可能发生的上次革命,为了从封建所有制轉变为资产階級的所有制而制定的成文法为止。

即使像洛貝尔图斯所說,拉薩尔在这部巨著中过分肯定地根据后来的情况推論从前的情况,讀《学說汇纂》比讀这本书更有得益,那么拉薩尔的上述功績的价值也不会因此而大大减少。更重要的問題是,拉薩尔可不可以为后来一切时代不仅为封建的私人所有制向资产階級私人所有制的轉变,而且也为私人所有制本身向公共所有制的轉变要求他的法的形式邏輯的有效性。

他在自己的著作中的一个长注(后来他很喜欢引用这个注)里,非常詳細地論述了这个問題。他在这里說,一般說来,法学史的文化历史的过程在于日益限制私有财产的所有权范围,把越来越多的对象放在私有财产之外。如果人們把自由竞争的統治理解为财产通过它才得到真正的自由和发展的一种統治,如果这一派的发言人談論“财产的无限自由”,那么依靠屬于一切概念規定的

辩证法，这一方面就其实际后果而言也完全存在，并且是不可否认的。但是从它的最内在的实质来看，采取自由竞争，取消垄断和行会还不如说是基于这种思想，即营业和销售的垄断权（即要求别人不可采取自己被允许的行动的一种权利），不能是个人的私有财产。

当然，人在历史之初（今天的孩子还是这样）对什么都伸手，把一切东西都当做自己的，不知道自己的自由意志的界限。后来，他才在前进的过程中认识了这个界限。拜物教徒当他的偶像不顺从他的意志时就粉碎他的偶像，因此他还把自己的神当做财产。礼拜很早就摆脱了私人意志，但是很长时间人本身仍然是别人的所有权对象。然后奴隶变成农奴，农奴变成各种不同程度的依附农，一直到隶属的工人被宣布为自由的工人为止。现在欧洲面临两个很有趣的所有权问题：在政治方面是取消一个民族的公共意志能够成为一个家族的财产的情况，即废除君主制的问题，在社会方面是，在没有直接使用人的所有权的今天，这种所有权是否应该依靠间接剥削人而存在，自己的劳动力的自由活动和发展是否专门是劳动基础和劳动预支（资本）的所有者的私有财产，对别人的劳动价值（资本利润）的所有权是否应该归于企业主。

私有财产范围的不断缩小无非是以人类自由的积极发展为基础的。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从前被认为是可以出让的一部分自由被规定为属于人的不可出让的自由，因而被看做是由伦理观念和公共权利产生的，受绝对法律支配的。由所有权范围中把越来越多的内容完全一致地放到法的历史的这个运动上去，在经济发展中产生了十分适当的趋势，把越来越多的生产因素和产品本身日益大量地从经济的所有权范围，有偿的范围投入无偿的范围，简单地說，就是降低生产成本，这是一个十分正确的基本思想，而巴

师夏在他的《經濟和諧論》中却对这种思想作了完全錯誤的片面解釋。

洛貝尔图斯对此提出了他的第三个不同意見，他說，依仗巴师夏的豪言壯語，工人們得不到塗面包的黃油。他用拉薩尔明确否认的精神解釋拉薩尔的观点，因此拉薩尔比較激烈地反对这种粗暴的誤解是很自然的。但是他用客气的用語結束了他的反击，他說，他所作的比較“确实并不特別深奧”，也許这就促使洛貝尔图斯在这个比較上寻找比它所能有的更为深奧的意义。拉薩尔在这里又接近了正确的东西，可是，由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又把正确的东西根本弄錯了。

比較是够深奧的，只是拉薩尔戴着法学眼鏡看不到它的根底。他关于法的历史的过程所說的話在这种条件下是完全正确的，那就是，人們必須狭义地理解法的历史，即法是从私有财产和商品生产中发展起来的。拉薩尔还不知道，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包括人类历史的第一个、迄今最长的阶段。他认为在历史初期向一切伸手的野蛮人(用他的話來說)，实际上沒有存在过。可是他尖銳和中肯地观察到的东西，又被他自己弄模糊了，因为他不是在平地上而是在天空中找原因。私有权範圍的不断縮小不是基于人类自由的积极发展，而是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生产的进步导致拉薩尔的那个比較；这些进步使产品减价并扩大人类的自由。奴隶比农奴劳动差，产品貴，农奴比依附农劳动差，产品貴，依附农比自由工人劳动差，产品貴。古代社会由于奴隶劳动而灭亡，封建社会由于农奴和依附农劳动而灭亡，正如资产階級社会将因自由劳动而灭亡一样，但并不是因为它在法律上是自由的而是因为它在經濟上是不自由的。

私有制的辯证发展的“最內在的原因”不在于限制它的权利而在于扩展它的权力。重心在于“实际的、现实的后果”，曼彻斯特学

派（尽管它，或者由于它有其狭隘性）正确地认识了这一点。发展权力才造成限制权利的结果。财产解除了权利的束缚，使工人在法律上自由，但是结果只是为了能够更加没有限制地发展它的经济权力，更加大量地利用工人的经济上的不自由。拉萨尔把假象放在本质之上，对法学提出了它力所不及的要求，即它在取消工人的法律上的不自由以后，也应该取消工人的经济上的不自由。它做不到这一点，正如封建神学不能用一切人都是神的儿子的理论取消中世纪工人的法律上的不自由一样。一个新的社会不仅摧毁产生它的旧社会的经济建筑，而且也摧毁旧社会的思想意识的上层建筑。

拉萨尔向欧洲现实提出的两个有关所有权的问题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正如拉萨尔所理解的那样不在法学范围之内；当然它们也有差别，那就是一个问题在法学后面，另一个问题在法学前面，一个问题随着法学的产生而得到解决，另一个问题随着法学的消失而得到解决。君主制作为所有权问题，作为一个民族的公共意志能否是某个家庭的财产的问题，属于一个还不知道“个人的自由和责任能力”的时代，属于对于“精神的主观性”还毫无所知的东方的法。在希腊和罗马古代，甚至在封建的中世纪（更不用说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里了），不管在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下，君主制始终只是一个政治组织的问题，统治阶级根据情况回答这个问题，而不管君主制的陈腐妄想：它的意志就是最高法律。取消君主制在物质上丝毫没有改变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所有制关系，而只是在形式上使这个社会变得十分鲜明，因为民主共和国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决战的理想战场。

相反地资本利润的问题是一个意义最明确的所有权问题，甚至是特定的所有权问题，因为资本利润是从私有财产的历史上和逻辑上最发达的形式中产生的。取消资本利润就是取消各种形态

的私有财产，因而也是取消在私有财产基础上生长起来的权利。简单些說就是：法律手段对資本利潤是不起作用的。一切这种方式的社会主义企图都归于失敗而且必然归于失敗。科学共产主义比从前的社会主义大有进步的地方就是，它不是把資本利潤（更确切些說是剩余价值）看做对正义和道德的一种侵犯，而是把它理解为一个經濟事实，懂得把它作为必然瓦解私有制向公有制轉变的經濟事实。

拉薩尔的法的邏輯不能解决这个任务。如果問題是私有制轉变为公有制，而不是由一种私有制轉变为另一种私有制，那么他的追溯既往的理論的真正核心就有一个完全不同的面貌。私有制是有产階級对无产階級的統治，对被統治者來說，他們是否有責任，牺牲自己的利益把一种已經变得无力統治的所有制变成能够进行統治的所有制，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問題。但是公有制是一切階級統治的消灭，应不应该給至今的私有财产的所有者以一种补偿（不管这种补偿是多是少，也不管它具有何种形式都不能保证那些所有者又对人进行統治），这是比較次要的問題。馬克思从沒有认为有必要公开討論“剝夺剝夺者”时应该怎样处理其补偿的問題，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证明，馬克思常常在私下談話中表示，假如能用贖买方法完全摆脱这个匪帮，那就会最便宜不过的了。<sup>①</sup>

---

① 恩格斯在1894年写的《法德农民問題》一文中写道：“我們的党一經掌握国家政权时，就应该干脆地剝夺大土地所有者，也像剝夺工厂主一样。至于这一剝夺是否要用贖买办法实行，这大半不是决定于我們，而是决定于我們取得政权时的情况，尤其是决定于大土地所有者老谷們自己的行为。我們并不认为，贖买办法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容許的；馬克思曾向我讲过（并且讲过好多次！）他的意見：假如我們能用贖买方法完全摆脱这个匪帮，那对于我們就会是最便宜不过的了。”（《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38—439頁。）——原編者

拉薩尔把他的既得权利的理論用于把一种私有制导向另一种私有制的时候，这种理論是不可辯駁的，而在企图攻击私有制本身，并且首先把现代继承权证明为一种严重的誤解，证明为一种理論上的实际的不可能性的时候，他的既得权利的理論就毫无用处了。他的著作的第二卷是专门证明这一点的，这一卷由于丰富的学識和思想的辯证活动几乎比第一卷更为惊人。但是拉薩尔并没有证明他想证明的問題。即使他没有錯誤地从古羅馬人的永生观念中引出羅馬人的遺囑，他也不会证明這個問題。假如現代的继承权的确是古日耳曼和古羅馬的继承权的一个被誤解的沉淀物，那么这只是证明，它穿了一件不合身的衣裳。如果拉薩尔把这件衣裳撕成碎片，那么現代继承权就更加站在赤裸裸的現實之中。有私有制的地方也就有继承权；继承权对自己的来源所做的幻想的理論上的实际不可能性对这种邏輯結論不能作任何改变。

拉薩尔对他的著作的实际作用所寄予的希望没有实现。他曾正确地預言，立法的“多事之秋”快要来了，假如資產階級有胆量同容克地主作严肃的斗争，那么当然如拉薩尔所期望的那样，任何“議員和政治家”都不能缺少这本书。这部著作除了偶尔被一个“議員”用来裝飾自己的发言而外，对于实际立法没有发生任何影响。比如1869年1月，一个反对普魯士法律的封建婚姻特权的自由党議員就曾引用过这本书，这种情况后来几乎没有出现。至于普魯士立法二三十年来如何滿意于拉薩尔用最激烈的詞句譴責为缺乏責任感和羞耻心的事情，是人所共知的。尤其俾斯麦是一位艺术大师，他善于根据本階級在現代資產階級社会中提出的封建要求，通过谷物稅、送給燒酒厂厂主和糖厂厂主的慰劳品以及其他等等，“使賠償权面向公共精神”。在普魯士立法中，尤其是在資產階級立法者中，这种伎俩并没有随着俾斯麦下台而絕迹。一直到

两三年前，普魯士財政大臣米凱尔（他由于有共产主义的旧傳統應該懂得拉薩尔的证明），才从人民口袋里拿了几百万馬克从十几个中世紀的萊茵河上游的伯爵手里贖买了封建的免稅特权。

拉薩尔的著作在学术界引起了个别的热情贊揚。只看到第一卷的年迈的薩維尼說，自多納路斯以来沒有人写过这样一本书，这句话表示了他对自己和他的勁敌的尊敬。阿尔伯特·朗格根据既得权利的理論研究被剝夺的权利的實踐。可是一般說来，德国学术界达不到这个科学討論的高度。齐格勒忿忿地說，在柏林除了大学以外，恐怕沒有十个法学家讀过这本书，沒有五个法学家了解它的内容。在有名的法学家中，耶林根本不想从拉薩尔著作第二卷的六百頁中發現一点智力的痕迹，却对拉薩尔的几个大胆的比喻进行令人难受的嘲笑，他的意見即使作为反对哲学思辨的戏言也是枯燥无味的。耶林被拉薩尔的一个朋友教訓了一頓之后为自己轉圜說，他不想反对思辨的方向本身而想反对这个方向所犯的錯誤，这些錯誤正是最有天才的人犯的。在悬岩上碰头的只有羚羊和山羊而沒有綿羊。耶林根本沒有接触拉薩尔所需要的东西的核心。对他这样一种人來說，这个核心是一个十足的謎，关于爭取权利的斗争他能說一大堆曖昧不明的話，而却卑躬屈膝地贊揚俾斯麦的暴力政策，为了反对这种政策，在德国进行了差不多三十年的爭取权利的斗争。如果說拉薩尔证明封建权利，如普魯士的婢僕法在資產階級社会自行消失，那么耶林在他論爭取权利的斗争的著作中教导說，“一个不敢使用婢僕法的主人”不仅損害他的倫理的生活条件，丧失他的性格的詩才，而且也威胁法律的理想权威，放棄資產階級生活的实际秩序。德国資產階級热心地閱讀这个实际生活哲学的小日課經本，而对拉薩尔的偉大理論著作却摸也不摸。

在哲学家中米希勒通过他的批評表明，官方黑格尔主义已經幸运地到达最庸俗的自由貿易主义的沼澤地。他否认資本利潤的存在并认为資本必然作为節約下来的劳动参加“共同的報酬”。巴师夏对經濟范疇比拉薩尔有較好的認識，可是当拉薩尔的著作落到俾斯麦恩准的所謂国家社会主义之手的时候，一种調和的微光甚至落到这种平庸的智慧上。因为立法者“大多出于政治的和公正的考虑”抹杀了既得权利理論的明确規定，所以拉薩尔把这个理論整理了一下，与此同时，阿道夫·瓦格納根据拉薩尔的“优秀著作”建立了他的“国民經濟学的剝夺理論”，他教导說，即使在对賠償沒有合法要求的場合，“进行賠償也往往能够而且也将适合正义和政策”。这样一来，这个問題就一絲不差地回到符合有产階級和統治階級利益的、旧日的混乱状态，而拉薩尔就是由这种状态中以巨大的精神努力提出这个問題来的，于是普魯士的国家社会主义根据它特有的邏輯有冒充拉薩尔的精神继承人的最不可爭辯的权利。

幸而拉薩尔在这时候为自己教育了他的精神的真正继承人！

## 第八章

### 一八五九年的欧洲危机

当 1857 年的大商业危机的影响把欧洲群众带进新的政治运动的时候，拉萨尔还在写他的法哲学著作。同十年前一样，意大利和法国的群众首先活跃起来。在意大利，一个迅速扩展的人民运动把矛头指向奥地利异族统治。萨瓦王朝是够狡猾的，它自己投身到这个运动之中，从而把运动掌握在自己手里。在法国，旧的革命精神在无产阶级中觉醒，资产阶级开始对波拿巴主义表现得桀骜不逊了。资产阶级因为想做好买卖才甘心放棄政权的，可是波拿巴主义不能经常使资产阶级生意兴隆。

波拿巴主义决非一个天才头脑的自由发明。它在至少有一个天才代表的第一帝国的形式下不是这样，在有一个非常平庸的人物作代表的第二帝国的形式下更不是这样。第一个拿破侖实行资产阶级賴以重創封建主义的革命的遺志；第三个拿破侖继承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其中斗得筋疲力尽的革命。法国无产阶级在城市里已經高度发展，可是在人数方面却被农村的小农远远超过，它在一个偉大的斗争中，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军队战胜了。可是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这个斗争中受了伤，吃了几年苦头之后在六月战斗的真正的胜利者面前，在军队和作为军队的主

要补充来源的阶级——终于想在城市骚动者之先过安静日子的小农面前退却了。军事专制主义体现在拿破侖的名字中。

恩格斯说明了波拿巴主义的实质，任何改写都可能使这些话减色。他说：“面对工人和资本家，波拿巴主义的特点在于，它阻止工人和资本家互相战斗。这就是说，它保护资产阶级不受工人的暴力攻击，支持这两个阶级之间的小规模的和平的散兵战，并且剥夺它们的一切政治权力。没有结社权，没有集会权，没有出版自由；普选权处于官僚制度的压力之下，以致反对派的选举几乎是不可能的。甚至在警察化的法国迄今也没有见过它那样的警察制度。同时一部分资产阶级和工人被收买了；收买资产阶级用的是把小资本家的钱送进大资本家口袋的大规模的信贷欺骗；收买工人用的是大规模的国家建筑，它们除了自然的、独立的无产阶级之外把人为的、拥护帝国的、依赖政府的无产阶级集中在大城市里。最后，用表面英勇的战争向民族自豪感献媚，这些战争都是得到欧洲高级政府的许可，对一般的替罪羊进行的，而且只是在胜利一开始就得到保证的条件下进行的。”<sup>①</sup>像恩格斯所描述的这样，波拿巴主义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自发地成长起来的。在类似的条件重新出现时，它就照例出现。

1857年的商业危机首先揭露波拿巴主义的响亮诺言是毫无用处的。然后奥尔西尼的手榴弹吓得冒牌的凯撒牙齿打战，他在极端恐怖中颁布的保安法，不仅没有引起恐惧，反而表明波拿巴主义在七年之后还没有站稳脚跟。波拿巴只有一条生路，就是进行一次深得人心的战争，这个战争利用一些虚假理由而具有文明外貌，可以阻止革命的狂澜。奥尔西尼的炸弹以最大的明确性指出到哪

<sup>①</sup>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党》，载德文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德国史》第2卷，第832页。

里去寻找这种战争。

波拿巴为了摧毁奥地利在意大利的暴力统治而同萨瓦王朝结成同盟，这就使意大利革命掺杂了一个反动因素。意大利的国家统一同法国政策的一切传统是有矛盾的。在波拿巴嘴里，意大利的国家统一成了公开的谎言，因为这个虚假的目标同推动他进行战争的真正动机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他的目的首先是攻击共同的替罪羊，同时他正确地认为这个替罪羊就是奥地利。哈布斯堡专制政权由于它在意大利的经营成了欧洲的耻辱。它同神圣同盟的反动老盟友——同普鲁士由于奥里缪茨，同俄国由于克里木战争已经不和；最多在英国托利党人里，他还有冷淡的朋友。如果伦巴第和威尼斯摆脱了奥地利的统治，那么这两个省就归皮蒙特，而波拿巴就把萨瓦和尼斯作为报酬给自己留下。其他一切可以暂时根据事件的进程和利益再作决定。如果窃据意大利中部和南部的王位的奥地利人让可敬的波拿巴家族的成员接替自己的位置，那就更好。在任何情况下，意大利的统一都不能超过一个新莱茵联盟<sup>①</sup>的形式，这个新莱茵联盟应该在名誉主席教皇和实际保护者法国的统治下把意大利各邦统一起来。

战争的局部化首先使得塞纳河畔的民族解放者感到比意大利将来的形势更大的忧虑。他同俄国勾通一气，此外还可以指望英国保持中立。可是，即使德意志邦联没有义务保护它的成员在德国以外的占有地，难道它会眼看着自己的领导力量受到沉重的打击而毫不干涉吗？如果德意志邦联同奥地利联合起来，就会打乱波拿巴的计划。

奥地利当然了解它的有利形势，于是就为把德意志邦联拖入

<sup>①</sup> 莱茵联盟是指1806年7月在拿破仑第一的保护下成立的德国南部和西部的各邦的联盟，这些邦实际上成了拿破仑法国的藩属。——译者

战争而展开了热烈的宣传。宣传的中心是奥格斯堡的《总汇报》，这家报纸的外交家和策略家详尽地证明，奥地利在意大利的暴力统治符合德意志的利益，应当在波河上保卫莱茵河，如果整个德意志不愿在它孤立的重要力量失败以后毫无抵抗能力地躺在强大的胜利者的宝剑之下，它就应当拿起武器支援奥地利。帝国一王国之笔一会儿用最可怕的声调召唤耶拿的亡魂，一会儿又陷入最丰富的幻想。用官方声明的话来说，就是奥地利保卫所谓的“最神圣的财产”免受“颠覆”。它准备进行一个反对十二月凶手的血腥的可耻统治的各民族的十字军远征，在奥地利的保护下将出现一个中欧大国，这个国家从比利时、荷兰和亚尔萨斯—洛林到匈牙利和斯拉夫—罗马尼亚人的多瑙河国家，包括日耳曼人的原始力量，并在这里控制诺曼底人，在那里控制斯拉夫人。面对着奥地利的这种宣传，法国的鼓动工作也不甘示弱，在选择手段方面也没有感到困窘。它的主要发言人就是从前的帝国摄政卡尔·福格特，后来在土伊勒里宫发现的收据证明，他曾被法国用金钱收买。他在著作中颂扬波拿巴主义是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者，这些著作作为它们的作者的无节操和无知提供了有力的证明。

在这种雄辩的甘露滋润下，由于本身缺水而干枯的、小德意志和大德意志之间的旧矛盾又复活了。小德意志派倾听波拿巴主义的济伦之歌；统一意大利这种方式完全合乎他们的心意。他们从来就想让霍亨索伦王朝充当萨瓦王朝的角色。大德意志派同样热心地，或者更为热心地迷恋维也纳宫城的占卜者向他们散布的幻影。

如果断言小德意志派比大德意志派眼光远大是一种过分奉承的说法，那么人们倒是应该说，大德意志派比小德意志派更为目光短浅。后者至少要想统一德国的一大部分，而前者却想保持德国的分裂状态。普鲁士的大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比巴伐利亚的教皇

主义者、士瓦本的分裂主义者或法兰克福的投机商(这些人的忧国忧民之心在奥地利对他們的錢柜的要求权中卜卜地跳动),較多地預感到历史的必然性。当然大德意志派中有一些人,如布赫尔和洛貝尔图斯对待他們的德国爱国主义是认真的,萊比錫历史学家烏特克也是其中之一。但是,恰恰是这些人的1859年的著作证明,大德意志方針是多么矛盾。烏特克从大德意志派領袖在罗曾海姆举行的一次秘密會議带回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即南德貴族为了巩固他們在反动年代非法恢复的特权而濫用大德意志派的口号,他們公开反对大德意志派阻止召开德国議会的企图。布赫尔和洛貝尔图斯在許多小册子中要求德国統一成一个邦联执政內閣,普魯士和奥地利为当然成員,第三个成員由諸侯选举产生,三个成員輪流担任議長,內閣輪流設在維也納、柏林和法兰克福三地。这是一种反动的空想,同它相比甚至邦联議會也有虽是非常可怜的現实但毕竟是現实的优点。

不以大小德意志派之間的爭吵为轉移,在德国人民群中产生了一个具有自然力的民族运动。这个运动的一般原因也就是五十年代末期在欧洲各族人民中引起新生活的原因,不过法国对奥地利的进攻是吹入重新燃起之火的第一陣風。法国王座上的冒險家只有占領了萊茵河左岸,才能认为他的地位相当巩固,如果別人为了同德国米歇尔毫无关系的問題互相毆斗起来,德国米歇尔却應該經常代人受过,那么这种本能的也是正当的感觉就由于感到无計可施,痛心地認識到本民族仍然是別人的陪臣,沒有民族意志的机关而变得更为敏銳。沒有民族意志的机关,甚至也沒有民族可以了解它的真正利益的場所。既然这种民族运动是本能地产生的,那么它对自己就更不了解,它面临着成为大小德意志派口号的鹵获物的危險。为了防止这种危險,恩格斯、馬克思和拉薩尔来做

一些解釋。

恩格斯首先以《波河和萊茵河》這一著作出現在比武場上，由于拉薩爾接洽，這本書由弗蘭茨·敦克爾出版。恩格斯在這一著作中清除了大德意志—奧地利宣傳的幻想。並不像有人所說的，他在“保衛最神聖的財產”，反對“顛復”這個問題上大做文章！這是不必要的，因為五十年代的德國庸人在精神和道德上還沒有墮落到被這種口號所欺騙的程度。但是，恩格斯用巧妙的諷刺批駁了中歐大國的理論，而且更加深刻得多地駁斥了大德意志派的得意口號——应当在波河上保衛萊茵河。他從軍事科學方面證明，德國為了本身的防禦並不需要占領意大利的任何一個部分，如果只有軍事原因發生作用，那麼法國對於萊茵河比德國對於明喬河有強烈得多的要求。恩格斯這樣確凿而不可辯駁地證明了這一點，以致他匿名發表的著作被普遍認為是一位地位很高的學識淵博的軍人，甚至在較新的歷史著作中也存在這個錯誤。

恩格斯同樣確凿而不可辯駁地指出，從政治觀點來看，德國的利益不是要求保持奧地利對意大利的統治而是取消這種統治。他稱這種外國統治的實質“是任何一個文明的國家聞所未聞的”<sup>①</sup>；只要這種統治繼續存在，意大利就必然是法國反對德國的盟邦。奧地利人寫道，德國的使命不是給在波拿巴王朝頭上聚集的雷殛作避雷針，那麼意大利也同樣有權說，意大利的使命並不是給德國人作緩沖國，以緩和法國對他們的打擊，而為此所得到的報答是挨奧地利的杖笞。恰恰德國人應當注意，說意大利人政治上無能的這種自私的謠言。“因此，如果我們不是把占領別國領土和鎮壓別國民族（只有被偏見弄瞎了眼睛的人才會否認它們有歷史發展的

<sup>①</sup>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78頁。

能力)当作自己力量的源泉,而是关心使自己在本国内成为统一的和强大的,那样我们就会做得好一些。”<sup>①</sup>统一的德国同统一的意大利恐怕任何时候都不会发生矛盾,可是由于意大利人时常需要德国帮助他们反对法国,德国在意大利将有重大影响。

恩格斯在批判地粉碎大德意志—奥地利口号的同时,当然一点也没有迎合波拿巴主义。他强调指出,占领伦巴第的问题是德国与意大利之间的问题,决不是路易·拿破仑与奥地利之间的问题。“对于……只为了自己的、在某些方面是反德国的利益才愿参与共间的第三者来说,问题只在于简单地握有一个省份,只是在万不得已时才放弃它,问题只在于简单地扼守一个军事阵地,只是在不能再守时才放弃它。在这种场合,政治问题就立即让位于军事问题;有人袭击我们——我们自卫。”<sup>②</sup>恩格斯在德国群众进行的民族运动中看到正确的本能——波河是路易·拿破仑的借口,而莱茵河在任何情况下都必然是他的最后目标。他想使这个运动能够正确地参加为人期待的斗争,他用以下的结论结束了他的研究:如果德国人以波河、明乔河、艾契河以及所有意大利的废物换得德国的统一,那就是作了一桩漂亮的生意,因为统一会使德国人不蹈华沙和布隆采耳的覆辙,只有统一才能使德国人在国内和国外强大起来。

恩格斯同马克思取得一致意见后出版了这一著作。马克思本人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以同样的方式既驳斥奥地利在意大利继续进行统治符合德国利益这一说法,也痛斥了波拿巴主义的阴谋家。他指出,波拿巴借解放意大利为口实以束缚法国人民,把意大利置于暴力政权之下,把法国的“天然疆界”推进到德国境内,使奥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81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297页。

地利变成俄国的工具，强迫人民加入合法的反革命对不合法的反革命的战争。<sup>①</sup>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发表的论 1859 年欧洲危机的文章中从各方面研究了欧洲的整体情况。他们动用一切科学的辅助手段，以便照亮最隐秘的角落。只有一个问题他们没有研究，这就是：德国的民族运动对它最直接的敌人，德国王侯应抱什么态度？只有法俄同盟以直接的危险威胁德意志民族的时候，这个问题才是多余的，因为一个民族在它决定它应该如何生存以前，它必须先生存。但是，如果这些危险不存在，这个问题就成为一切问题中最重要的问题。

这时拉萨尔用他论意大利战争的普鲁士任务的著作参加进来，这一著作同恩格斯著作在同一家出版社出版，它在某种意义上是恩格斯著作的补充。恩格斯曾说，如果我们受到攻击，我们就自卫，拉萨尔则补充说，对，不过我们先研究一下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受到攻击。在一切原则问题上，比如关于德国统一和意大利统一的必要性、关于波拿巴的自私自利的政策、关于反对奥地利在意大利的统治、关于波拿巴的和哈布斯堡的宣传的内容贫乏，最后关于在德国利益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进行战争的必要性等问题，拉萨尔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看法是一致的。拉萨尔和他们一样，同资产阶级的大德意志派和小德意志派没有什么关系。他同他们在一个实际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即上意大利的战争是否已经威胁到德国的利益。拉萨尔的眼光不是那么短浅，他不要求战事发生以前，法国军队必须越过德国边界。当波拿巴想为他自己或他的家族征服意大利的时候，拉萨尔认为战事已经发生了。因此德意志民族应当进行战争，反对波拿巴主义，同意大利人民和法国民族的民主本能结

<sup>①</sup> 参阅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所写的一组论文，载德文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德国史》第 2 卷，第 641—686 页。——原编者

成同盟。拉薩尔的这种想法是很不“爱国”的，他对这些同盟者的重视远远超过他对德国王侯的同盟关系的重视。

如果德国王侯出于自己的打算，考虑到自己的危险而对法国宣战，只要德国的利益不受严重威胁，问题只涉及奥地利在意大利的暴力统治，即涉及削弱奥地利而不涉及削弱德国，拉薩尔就不反对这种王侯战争，他反而热烈欢迎这种战争，不过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民族运动反对这种反革命的王朝战争，把它那不可避免的变动局势变成革命的资本。拉薩尔希望德国诸侯在这样一次战争中遭到彻底的失败，他认为这就会大大促进德意志民族的真正利益。拉薩尔所极力反对的，是德法人民的战争，在这个战争中，大陆上两个文明大国为了民族的幻想而互相厮杀，事实上双方都为王朝的利益所利用。拉薩尔认为一个同民族的切身问题无关、只从病态的过分强烈的民族感情，从极端的爱国主义，从幼稚的反法主义中吸取精神养料的反法的全面战争，对于欧洲文明，因而对于一切民族利益和一切革命利益是最大的危险。因为发生这种战争的可能性日益增加，因为还站在极左边的社会舆论的报纸《国民报》和《人民报》把民族运动推入这种战争，所以拉薩尔就把反对即将到来的灾祸看做是自己的义务。

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深入地论述，德国根本没有面临真正的威胁。德意志民族由于意大利统一运动的成功，可以得到最切身的利益，一件好事不会因为一个坏人要实行它就变成坏的。“如果路易·拿破仑把一件伟大的、完全符合民族利益的事业拿在手里，恰恰是为了通过这一事业在各族人民心中得到的反应，为自己骗得几文钱的民心，那么人们就不给他这几文钱，使得他为了个人目的而决心做的事对这种个人目的没有好处。但是，根据最普通的常识，人们现在怎么能想拔剑反对那一事业呢？人们现在怎么能想

反对他过去需要、希望和追求的东西呢？”一方面有一个坏人想实行一件好事。另一方面有一件坏事和一个——“是呀，什么人呢？这个人的情况如何呢？我們很想知道，人們所指責的路易·波拿巴所做的坏事，有哪些是奥地利沒有做过的……路易·拿破侖有凱恩<sup>①</sup>，奥地利不也有阿拉德<sup>②</sup>的屠杀之夜和匈牙利將軍的絞架嗎？……至于談到分裂的德国的責难和普魯士的責难，誰的天平應該大大下沉，是由事情的本质决定的。对于罗伯特·勃魯姆、奧里繆茨、霍尔斯坦、布隆采耳，路易·拿破侖不应負責。”同波拿巴专制主义相比，奥地利专制主义是民主发展的更危險的敌人。它代表一个完整的反动原則而波拿巴本人虽是一个专制君主，可是由于經常向民主原則献媚必然使自己成为可笑人物并使自己的地位成为不可靠的。

阻止削弱奥地利，对德国人民沒有什么利益，相反地，彻底摧毁奥地利乃是德国統一的首要条件。德国統一运动至今失敗的原因在于奥地利依靠德国以外的占領地取得了独立的世界地位。在意大利和匈牙利独立的那一天，一千二百万德意志—奥地利人回到德国人民的怀抱，然后他們才能感到自己是德国人，然后才可能成立一个統一的德国。关于奥地利这个国家概念，拉薩尔說，这个概念必然被扯碎、割裂、消灭、压碎，它的灰必然被撒到四面八方。他明确反对对这个論点的任何普魯士解釋。他不是以一种专门普魯士的意識而是以純德意志的意識談論世界的；即使他是奥地利人，他也这样說。

然后拉薩尔詳細說明，路易·拿破侖为什么不能考虑占領意

① 凱恩(Cayenne)是法屬圭亚那(南美)的首府，从十八世紀末年到1854年是法国政治犯服苦役和流放的地方，有“不流血的断头台”之称。——譯者

② 阿拉德(Arad)羅馬尼亚西部城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屬匈牙利。——譯者

大利，更不能考虑为夺取莱茵而进行战争。虽然他在欧洲是个被许多人估价过高的人物，可是他决不会醉心于这样愚蠢和不可行的、不适合他的整个地位的征服计划。他所能追求的最高目标就是把萨瓦并于法国。由于语言、位置、主张和交往关系同法国接近，萨瓦迟早总要并于法国，在德国得到同这一扩张相当的补偿的时候，这种合并是没有妨害的。

但是，假设有这种很不可能的情况，即波拿巴醉心于幻想的征服计划，德国人有什么理由这样不体面地惧怕呢？为什么要这样可怕地呼救并且想到耶拿之战呢？同恩格斯相似，拉萨尔嘲笑了从耶拿之战看到德国国力的正常水平的可爱的爱国者。由于过分的畏惧而变得不顾死活！因为害怕至少很不确实、很不可能的法国对德国进攻的灾祸，所以就想推动对法国进攻，把不确实的灾祸变成确实的，把担心的可能性变为实际的现实性。的确，人们这样做就扩大了一个仅仅认为可能的灾祸，因为很明显，德国在对法国进攻的抵抗中和在入侵法国的战争中能够而且必将发展的力量大不相同，入侵法国会使法国人民集结在波拿巴的周围，只会巩固他的统治。

拉萨尔用热情的笔调描述了德法人民之间的战争的结果。他强调指出，虽然两国人民之间的任何战争都是不幸事件，但是并非每个这种战争都必然有这样有害的后果。双方或者只有一方进行的是真正的内战，就像没有打到色当以前所进行的战争就不会有这种有害的后果。但是，不是为了德国人民的民族利益进行的，同时能够激发德国的社会舆论和民族情绪的战争，就像打到色当以后所进行的战争，就像1859年所谓民主派的发言人所鼓吹的战争就会有这种有害的后果。“要说民主派方面没有看到这种战争是可以想到的最违背文明的事件，这怎么可能呢？欧洲的一切

政治自由，一切导致文明的进步，精神的观念群的一切增殖和实现，总之一切民主发展，从而一切文化发展都不可改变地依赖于两个大文明民族，德国人和法国人之间的很好的谅解，对于每个只要能够大致看到欧洲文化史进程的人来说，决没有比在这反法主义复兴的时刻宣布这件事更合时宜的了。不仅某一个民族的命运同这一点有关——这是整个欧洲民主的切身问题！这两国人民之间的民族仇恨这只终于被制服的吃人老虎又从洞里走出来——大约再过三十年，任何文化进步都被阻止，任何政治进展都受到阻碍，一切精神的混乱都有可能，又给一切黑暗的馬基雅弗利主义的內閣政策开了方便之门，相互征服和相互消灭的野蛮欲望代替内部的发展被写在两国人民的旗帜上。这是反动原则自从1848年8月以来所取得的最巨大、最不可忽视的胜利！”在色当之役发生三十年后，对于这一预言的深刻性和正确性就无须赘言了。

拉薩尔著作的重点是在这里，而不是在人们常常提到的最后一节。拉薩尔在说明了民族运动正想走上的灾难性歧途以后，为了在他的证明里砌好最后一块石头，他必须回答，既然存在这个运动（拉薩尔也同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承认这一点），那么它应该选择哪条道路。他用下面几句话说明了这条正确的道路：“唯一的、体面的、偉大的、符合德意志民族也符合普魯士人的利益的态度是下述的普魯士的话：‘拿破侖根据民族原则在南方修改欧洲的地图，那么好吧，我们在北方也这样做。拿破侖解放意大利，那么好吧，我们就占领什列斯維希—霍尔斯坦。’在这样宣称的同时，我们的军队就被派去同丹麦人作战。”在这一战争中，普魯士的民主派可以而且必将充当旗手。如果普魯士政府躊躇不前，什么也不干，那就又一次证明德国的君主制已经不能为民族做事了。如果普魯士政府在民族利益没有受到危害的情况下终于使德国卷入民

族仇杀的对法战争之中，那么它就会发现民主派是它的敌人。

拉薩尔的著作被两个广泛传播而又没有根据的错误所歪曲。柯尼希格累茨战役<sup>①</sup>以后，民族自由党的一个国务活动家为给自己的不安的良心寻找安慰的理由，看了这本著作，并且立即向外界宣称，俾斯麦的德国政策在民族革命家拉薩尔身上得到了一个很有证明力的宣誓证人。出于这种党派政策的考虑，就渐渐产生了一种神话，說拉薩尔写这本著作时有一个目的，就是给后来俾斯麦所执行的普魯士的分裂政策开路。可是我們只要用不多几句话就可以駁倒这些臆断。

1863年丹麦国王逝世，什列斯維希—霍尔斯坦問題又一次被提到日程上来。这时产生了一个民族运动，它同1859年运动的区别是，它有一个十分明确的目标——使易北河公国脱离丹麦，这就等于撕毁1852年5月8日的倫敦議定书，在这个議定书里大国利用专制的暴力手段，偏袒丹麦王室改变了什列斯維希—霍尔斯坦的继承权。大小德意志派的政治活动家在这种场合终于暴露出自己是同一种资产阶级局限性的相对的两极。他们的合作迫使反对丹麦異族統治的广泛运动接受一个价值大有疑問的实际綱領，即承认奥古斯滕堡王儲为什列斯維希—霍尔斯坦的公爵，承认王侯的一种权利，自从王儲的父亲得了一笔可观的錢而出让了这种权利以来，它的合法性就不再放出純洁无瑕的光輝了。但是俾斯麦对这点并不介意，或者只是在他打算为了普魯士王权的利益欺騙奥古斯滕堡家族的时候才注意这个問題。他用力打击的对象是民众运动的真正核心，是撕毁倫敦議定书的要求。俾斯麦以宣布庄严地肯定德国的耻辱的議定书是一个合法文件来开始他的民族政策。

<sup>①</sup> 柯尼希格累茨，捷克斯洛伐克地名，捷克称作：赫腊德茨—克腊洛佛，1866年7月3日在此举行普奥战争的決定性战役，結果普軍得胜。——譯者

他的什列斯維希—霍尔斯坦政策以这一事实为依据，即丹麦沒有履行倫敦議定书給他規定的义务，这样他正好承认了这个議定书在法律上有效。俾斯麦不願得罪任何大国，而是利用外交伎俩在它們之間周旋，以便为普魯士王室攫取什列斯維希—霍尔斯坦。他爭取同奧地利結成同盟并让奧地利插手，适当控制民族运动，以緩和奧地利的妒嫉心。他投效沙皇专制政权，担任鎮压波兰起义的劊子手，以压制俄国的妒嫉心。他用“拖延談判”刺激波拿巴对德国边界的野心，引誘法国的妒嫉心。比較厉害的敌人只剩下一个英国了，可是他一开始就知道，英国是不会单独用武力帮助丹麦的。虽然如此，假如丹麦政府听从英国外交家的意見，表示願意放棄把什列斯維希合并于丹麦王国的政策，这样，首先就違反了倫敦議定书，而俾斯麦的天才政策就会得到輝煌的成果，即把易北河公国永远送給丹麦。普魯士历史学家中最忠实地崇拜俾斯麦的人搖着脑袋說，俾斯麦把他整个什列斯維希—霍尔斯坦政策全押在欺騙丹麦这一張牌上是他的巨大冒險。俾斯麦本人后来也吹牛說，他为这件外交活动最感到自豪，可是当火还燒着他的指头的时候，他說話的声調却是另一种样子。在丹麦的頑固性使他能够拋棄倫敦議定书以后的一天，他給一个朋友写信說：“我在政界工作越久，我就越不相信人的算計……同时在我身上，对神至今的保佑的感激之情上升成为一种信念，那就是主也能把我們的錯誤变成我們的幸福，我每天都以有益的謙恭态度，体会到这点。”玩弄假虔誠的詞藻向来不是俾斯麦的弱点。如果說他这次攪扰了主，那就是从心底吐出一口长气。

这里沒有必要研究俾斯麦在他的特殊情况下是否必須执行这种政策，或者他能否执行另一种政策。在任何情况下都十分明显的是，他 1863 年的政策同拉薩尔 1859 年的政策不同，正如反动的

內閣战争同革命的人民战争不同一样。拉薩尔正是要求普魯士用革命的決議撕毀倫敦議定书，把字片扔到欧洲大国的面前。普魯士应当用行动证明，德国终于能够独立处理自己的事务。俾斯麦通过自願在波兰充当劊子手博得沙皇专制政权的欢心，而拉薩尔則想利用波兰起义，“赶走这个凶神”，这种相似性又是多么惊人啊！只要这样說就够了，拉薩尔所要求的就是十一年前《新莱茵报》所要求的解放什列斯維希—霍尔斯坦的革命的人民战争。因此責备他为了煽动民众而鼓吹一种他根本不希望有的，而且肯定打不起来的战争，这也是不正确的。拉薩尔很希望，非常希望有这种战争，他希望有这种战争的原因（他当然知道而且决不諱言）就是使普魯士王权不可能进行这种战争的原因。因为普魯士王权不可能进行使自己也遭到牺牲的战争。它不能从事“民族事业”，因为开始做任何“民族事业”时，都必须对它自己进行审判。

因此，拉薩尔推荐的不是俾斯麦后来执行的德国政策，而恰恰相反，但是这种推荐对拉薩尔决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拉薩尔想使民族运动不犯重大錯誤，提出了正确的目标来对抗民族运动所追求的錯誤目标，可是也不諱言，实际上这个正确目标在当前的情况下也是达不到的。他对激动的群众說，如果你们要想推行民族政策，那么就使王侯成为你们的民族利益的挽馬。如果他们不願被利用，那么你们就更要警惕他们使你们成为王朝利益的挽馬。

拉薩尔沒有向大德意志派的立場作任何让步，也沒有向小德意志派立場作任何让步。在要求粉碎奥地利这个問題上也是这样，拉薩尔由于有这个要求而被誤认为“小德意志派”，恩格斯因为不能热衷于奥地利在意大利的暴力統治偶尔也有人罵他是“小德意志派”。欧洲不能沒有奥地利，这是一个教条，小德意志和大德意志的錯誤都是由这个教条产生的。所有小德意志派——从加格恩到

特賴奇克——，都认为毁灭奥地利是一个“可怕的不幸”。正因为没有这一毁灭，就不可能有整个德国，所以他们就以一个拔掉毛的德国为满足。根据这一点后来拉薩尔说过，小德意志纯粹是在严肃性、战争、革命、共和国面前的怯懦和恐惧，是一种很大的民族背叛。他一辈子没有写过一句有利于小德意志派的话。马克思和恩格斯用十分相似的话说过，从十八世纪中叶以来，能为奥地利作为一个国家存在进行辩护的唯一情况，是它对俄国在东欧的进展的无用的、不彻底的、怯懦但又顽固的抵抗，拉薩尔的看法也是这样。如果一个独立的德国，一个独立的波兰，一个独立的匈牙利能比奥地利强权国家对沙皇专制政权的扩张进行更为顽强、彻底和勇敢的抵抗，那么上述的存在理由就完全丧失了。

拉薩尔的策略在各方面都是正大光明的、革命的，而且也是正确的。事态的历史过程是人所共知的。已经担任了几个月摄政的普鲁士亲王踌躇不定。用薩瓦王朝的方式掌握民族运动，完全在他的反动视界之外。对于推行牺牲奥地利利益的普鲁士侵略政策，他并不是没有欲望，只是暂时缺乏勇气。他不知道他应该坐在法国给他搬来的椅子上还是坐在奥地利给他搬来的椅子上，他终于十分热情地坐在这两张椅子之间。他动员了普鲁士军队，这是对法国的一半威胁，他要求对德国邦联军队有独立的指挥权，这是对奥地利的一半威胁。法国政府同样大声宣称，普鲁士阻碍它完成解放民族的使命，奥地利政府宣称，普鲁士阻止它保卫最神圣的财产。法奥两国很快地缔结了維拉弗兰卡和约，普鲁士的政策又一次成为欧洲普遍嘲笑的对象。

事情不仅有可笑的一面，而且也有其严肃的一面。奥地利政府正式声明，普鲁士拒绝作为奥地利的藩臣进行战争，使放棄倫巴第訂立和约成为不可抗拒的必然性。同保持奥地利对德国的霸权，

即延續德國的分裂狀態相比，不忠誠的倫巴第的價值要小得多。由此可見，在奧地利的監督下進行的德國人民的反法戰爭，不管是波拿巴專制政權勝利還是哈布斯堡專制政權勝利，都是使德國人民的民族利益去一害又來一害。粗野的波拿巴對他的恭順的上院聲稱，假如繼續進行戰爭，他就必須做一個君主只是為了本國的獨立才敢做的事情，也就是說遠遠超過波拿巴主義的力量做的事情。可見，對這只狐狸來說，萊茵的葡萄掛得太高了。在普魯士動員軍隊以後，沙皇終於派侍從武官長到法軍司令部去促成和約的締結。由此證明，俄國同法國一樣沒有準備打世界大戰，而不打世界大戰就得不到萊茵河，也得不到君士坦丁堡，因此證明德國根本沒有受到嚴重威脅。正如拉薩爾在他的著作中預言的那樣，事實必然證明他是正確的。

第二年，馬克思、恩格斯和拉薩爾又一次在專門著作中回到1859年歐洲危機這個問題上來。拉薩爾在他論費希特的政治遺言的著作中指出，只有成立統一的不可分的共和國，才能實現同德國的奧地利化或普魯士化相反的民族統一。他非常客氣，但也十分明確地說出民族可以對諸侯抱什麼期望，他寫道，要求這種決斷合乎理想，要求某些人為了民族統一犧牲王朝利益，這簡直是愚蠢，這些人的精神品格同其他所有人的精神品格一樣，是他們的教育、傳統、喜好和歷史等因素的固定產物，我們之中的任何人（如果他的教養和教育由這些因素決定的話）所做不到的，他們也做不到。

馬克思在他反對卡爾·福格特的著作中回顧了1859年的歷史。從前的帝國攝政，現在的波拿巴的僱傭文人用最卑劣的、被《國民報》熱心採用和廣泛傳播的誹謗攻擊馬克思。馬克思企圖在普魯士法庭上反駁對他的告發，可是由於柏林法官採取了著名的公正態度而未能實現。法官們用最卑鄙的借口否定了被誤解的革

命者的权利。于是馬克思自己在对誹謗者进行懲罰的可怕的法庭上实现这个权利。这是一本很有份量的著作，它的标题上有福格特的名字，拉薩尔称它是一本“杰出的书”。馬克思在这本书里没有直接接触一年前他同拉薩尔爭論的問題。为什么不談这个問題呢？他在序言中說：“为了避免可能的誤会，我只注明一点：1848年以前，人們已經都同意波兰、匈牙利和意大利的独立不仅是这些国家的权利，而且也是德国和欧洲的利益，而在路易·拿破侖 1859年意大利战争之际，对德国应采取的策略，却有了完全对立的观点。这种观点的对立，是由于对事实的前提有对立的判断而产生的，决定这些判断还須留待以后的时间。关于我的判断，在本书内，我只涉及与福格特和他那一伙人的观点有关之处。甚至他假装着要代表的，或他在想像中代表一大堆沒头脑的人的观点，也都落在我批判的范围以外。我只討論他所真正代表的观点。”<sup>①</sup>但是馬克思在揭发福格特的鼓动工作的波拿巴主义根源的同时，必須分析前一年的历史，并在这今天还有很大教益的研究中得出事实上对拉薩尔的策略作了重大让步的結論。馬克思指出，波拿巴只能进行局部的战争，这比拉薩尔的說明几乎更为确切。

恩格斯的关于薩瓦、尼斯和萊茵的著作<sup>②</sup>的情况也大致相同。恩格斯說，路易·波拿巴只是沙皇政府手中的一个工具，沙皇政府很希望法奥两国締結維拉弗兰卡和約，因为始終还没有克服的国力枯竭、俄屬波兰的騷动，貴族对廢除农奴制的反抗使它不能进行对外战争。这一切越是正确，就越不用担心去年簽訂的波拿巴—沙皇条約会威胁德国了。恩格斯的著作的核心是关于波拿巴主义

① 卡尔·馬克思《福格特先生》，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3頁。

② 指恩格斯1860年写成的著作《薩瓦、尼斯与萊茵》，中譯文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633—680頁。——譯者

并吞薩瓦和尼斯而形成的强大軍事地位的十分重要的軍事科学論述。拉薩尔在他的著作里几乎沒有接触到这个重要問題。

在回顾整个爭論时，我們看到馬克思和恩格斯对欧洲政局的理解比拉薩尔深而广，可是在拉薩尔同他們发生意見分歧的一个問題上，他比他們看得清楚，明确。对德国來說，这个問題是一个决定性的問題。

## 第九章

# 普魯士宪法糾紛

### 一 新紀元和俾斯麦內閣

1859年的事件对于德国的尤其是对于普魯士的状况发生了强烈的影响。人們希望普魯士亲王摄政給他們带来幸福和安宁，而1859年的事件使这种希望成为泡影。

今天人們很难理解资产階級对这位六十岁的亲王的欢呼，1848年以前，这位亲王被认为是专制主义的最頑固的代表，在革命时期这个称号完全得到证实。人們甚至不能责备他本人假装具有自由思想。他在担任摄政时发表的施政綱領中明确宣布，同过去一刀两断是决办不到的，而只有在出現专横和違背时代需要的情况时，才应该加以注意和改善。可是自由派內閣連这个修补工作也沒有做。一切照旧，同曼托伊費尔担任首相时完全一样。唯一的区别在于，这些王室的新顧問个人沒有腐敗行为，并且不过分恶毒地使忠实的臣民受苦。他們的个人的正直性同政治上的正直性是毫无共同之处的。当青年作家威廉·艾希霍夫在他的文章中大胆揭开了掩盖着警察国家的无限腐朽的面紗，甚至柏林高等法院里也有一个国家檢察官，不管出于何种动机敢于对国家救星施梯

伯因极严重的失职罪起訴的时候，恭順的法庭受命判处施梯伯无罪。人們給了他一笔可观的退職金叫他退休，可是对他提起公訴的檢察官也被免职，而艾希霍夫則被同一个恭順的法庭判处很重的徒刑，理由是艾希霍夫“破坏”了施梯伯的脆弱的名譽。由于相信自由派执政时期普魯士的正义性，他受到了流亡的懲罰。

自由派的大臣們不敢碰一碰仍然盤踞在貴族院里的容克地主的一根毫毛，也不敢得罪資產階級。只有两三个太使普魯士亲王本人生气的反动官吏不得不下台。在攝政开始后立即改选邦議會时，地方长官的行为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恶劣。如果說，他們在曼托伊費尔內閣时期以无比的技巧执行选政府派当候选人的計劃，而現在他們却把同一个計劃当作对合法的选举自由的可恶限制加以反对，內閣做出好像它在純洁的立宪制度下不理解辛辣的嘲弄的样子。

形形色色的自由主义对于缺乏忠君思想更感憤怒，它也有充分理由这样做。因为它自己表示，上帝曾大量賜給它这种稟賦。它用各种欢呼的声調庆祝“新紀元”，虽然或者因为它知道（正如瓦列斯罗德嘲笑說），在普魯士不是根据宪法而是根据攝政王的命令應該实行一点点立宪制度，它知道奥尔斯瓦特、帕托夫、施韦林并不是由于他們的自由主义而是因为他們的自由主义无害而被任命为大臣的，在最好的情况下，他們的內閣也不过是对曼托伊費尔內閣的一个修正。1848年的拒絕納稅派馬上撤銷了政治障碍，除少数例外都大大發揮了他們爱国的牺牲精神，竟把三級选举制当做立宪政体的无价之宝加以珍視，正是由于这个制度，他們曾退隱九年之久。

他們一面决心參加选举，一面又宣布自己沒有被选举的資格。瓦尔德克、洛貝尔图斯、舒尔采—德里奇拒絕当候选人，为的是不

讓他們過去的議員，在反动派面前，給自由派大臣造成困難。當1848年曼托伊費爾惡毒地諷刺他們以後，這些正直的人裝出，仿佛他們真是政治煽動者和謀殺國王的凶手的樣子。甚至約翰·雅科比也拒絕當候選人，贊揚攝政王執政是“真正果敢的、合乎憲法的”，並且聲稱他的“充分的真誠的信念”是，在整個民主黨中沒有一個人願意普魯士採取君主國以外的國家形式，至於追求其他國家形式只有在做夢時才會想到。雖然他在堅持“平等的選舉權”方面是只白烏鴉，可是他否認，他是以“分期付款”，以“應該立即實現的要求”，以“不適當的逼迫”，以一個“確定的時間或提出的條件”為目標的。當時最激進報紙《人民報》以同樣的精神宣稱，民主派的首要問題，即平等的普選權過幾年就實行。在這無比信任的陶醉狀態中，只有少數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如瓦列斯羅德和齊格勒保持清醒的頭腦。

儘管地方長官做了種種鼓動工作，選舉結果還是對內閣有利。在三百五十二名議員中，擁護內閣的分子占二百六十三人，其中大多數人在曾在聯合議會上利用所謂法制基礎施展過騙人的口才的、威斯特伐利亞的芬克男爵的領導下，緊緊地團結在一起。因此自由主義有着自由活動的天地，可是在它沒有能夠走進這片天地的時候，1859年的戰爭就爆發了，戰爭使攝政王喪失了唯一的威望，他的自由派的名聲就是利用合法的外表建立在這種威望的基礎上的。當他在法奧戰爭中暴露了普魯士政策的弱點（就是他的浪漫主義的哥哥也沒有這樣做過）的時候，事情就更糟了。國民運動在普遍懊喪中結束，這種懊喪心情化為普遍的爭吵。北德和南德，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民主派和立憲派互相爭吵。因為沒有一個爭吵者願意接觸禍害的根源，即德國的王朝的多頭政治，所以從沸騰的魔女鍋里只出來一個鬼魂，說得更確切些，是一個鬼魂的鬼魂，

即已故的 1849 年的帝國憲法。

1859 年秋天成立的、以中小邦的資產階級為主要支柱的民族聯盟團結在帝國憲法的周圍。該黨主席是漢諾威的自由黨人卡尼格先。剝去一切冗長的詞藻的外殼，聯盟的綱領要求德國以資產階級精神進行統一。民族聯盟想把哥達派和拒絕納稅派，立憲派和民主派在資產階級物質利益的更高統一中融合起來。它要求他們放棄一切空洞理論，它對帝國憲法的空論也毫不考慮。主要問題是強有力的中央集權，以德意志議會代替邦聯議會，為達到這個目的必須依靠普魯士的主動性。為了宣布“普魯士領導”是德國的救星而選擇的時機很不適當，因此還需要作某些保留，因為普魯士政府應該表明給它的榮譽，它可以當之無愧。但是像卡尼格先先生這樣一些老練的政治活動家希望，只要普魯士在德國的混亂狀態中先建立資產階級的階級利益所需要的秩序標準，他們就願意協商。民族聯盟在政治上同國民經濟學家會議在經濟上得的是同一種病症。

這時普魯士本國產生了更大的憂慮。1859 年，新邦議會第一次會議在歐洲危機的壓力下沒有得到任何結果就閉會以後，1860 年自由派內閣在議會第二次開會時提出了第一個重大措施，即要求實行廣泛的軍事改革，這一改革使國家每年增加開支約一千万塔勒。圍繞軍事改革的還有關於民法婚姻、新市區法規、選區的合法分配等一些有限改革的法令。這些法令草案中最重要的一個是廢除封建的土地稅免納權，整編軍隊的費用主要來自這個方面。

大家知道攝政王個人支持軍事改革，1859 年動員軍隊的經驗證明軍事改革是必要的，因此在這個範圍內它也是無可非議的。軍隊在三月革命前的專制制度的財政困境中所受的嚴重損害已經在 1850 年的動員以後表現出來，在曼托伊費爾內閣時期，這些損

害大部分已經被消除了。可是最近一次动員表明，純防禦性的旧后备軍制度已經过时，不能适应以現代軍队进行的战斗了。在这一方面沒有什么严重的意見分歧。从軍事技术观点来看，整編的方式是无可厚非的，从把普魯士軍队看做德国統一應該鍛造的劍的資產階級自由派立場来看同样是无可厚非的。政府的提案使普遍兵役制接近于实现，普遍兵役制是普魯士唯一的民主制度，虽然这个制度只是紙上的制度。政府要求每年的征兵額由过去的四万人增加到六万三千人，这个要求同 1815 年到 1860 年的人口增长数字差不多完全适应。因为在这段时期中，普魯士財富的增长比人口的增长还要快，而且欧洲其他大国在同一时期內大大加强了它們的軍队，所以普魯士軍队的增加数字并不显得太大。毫無疑問，如果在軍队中的服役期限提高到五年至七年——現役三年，預备役四年——，相应地縮短第二次征集后备軍的义务，軍队的作战能力必然大大提高。虽然自从三十年代以来实际上現役期仅为两年，可是法律規定仍为三年，对三年現役期，人們有理由提出抗議，說这个要求不是根据軍事技术上的原因而是根据反动的政治原因提出的。

到那时为止，軍事改革是符合自由派資產階級的願望的，自由派資產階級終于認識到，沒有一支能打仗的普魯士軍队，它所希望的統一是不会实现的。但是誰向它保证，它磨快的武器将被为它自己的目的而使用呢？攝政王肯定不会做这种保证。如果說他在 1859 年的危机中表現得动摇和犹疑不决，那么現在他甚至拿出最枯癟的正統原則来反对意大利的統一运动。完全像拉薩尔所預言的那樣，这个运动摆脱了波拿巴的监护，利用加里波第的革命的英雄力量摧毀了那不勒斯的腐朽<sup>1</sup>主权。每天都可能被把自己捧上台的手推翻的自由派內閣現在又能提出什么保证呢！

人們還清楚地記得，浪漫主義國王的莊嚴許諾：軍隊要宣誓遵守憲法，却在禁止軍隊宣誓遵守憲法這一憲法條文上得到實現。當時拉薩爾給馬克思寫信說：“法律是可恥的！完全地，只是隱匿地取消1810年那個時期的最後的民主殘余——後備軍，為專制制度和容克地主創造一個無限的權力是同一個目的的兩種說法”，這是一個普遍的印象，拉薩爾的看法是正確的。關於“後備軍不能打仗”的叫囂並非第一次成為反動新陰謀的序曲。1819年伴隨着這種叫聲的是自由派陸軍大臣博伊恩的下台，現在却是自由派陸軍大臣博寧下台，一個道地的反動分子羅恩將軍接替了他的位置，作為一個爆炸物擠進了自由派內閣。攝政王也沒有忘記，後備軍在革命年代的態度減低了軍隊對於政變目的價值，將來還要更加降低這種價值。他在進行“最特殊的工作”時最後才考慮資產階級的目的。除了個人喜愛軍隊以外，加強他對內和對外的實力地位是他的推動因素。每年為此花費一千萬塔勒，自由派資產階級決不會感到興趣，姑不論上百種其他原因，這些原因必然使他們內心對這種“非生產的”支出感到氣憤。

因此自由派資產階級處在兩難境地，但是還沒有因此而處在沒有出路的死胡同里。攝政王不能考慮，不得到邦議會同意就實行同群眾利益有這樣深刻關係的措施。貴族院雖然不反對能使容克階級得到新的權力的軍事改革，可是卻極力反對這一改革的經濟基礎，即調整土地稅，這時攝政王就更加依靠眾議院的好意了。貴族院對於內閣的這個提案以及其他小改革法案一律採取否定態度。眾議院中的多數議員在一定條件下贊同攝政王整編軍隊，這些條件主要是促使他們達到目的，而不是保證攝政王和普魯士的議會政治終於得到一部分實力。看來這件事變成了一樁長期拖延下去的買賣，但是，如果自由派資產階級在討價還價中還不能戰勝

自己的对手，那么它在什么时候还能做到这一点呢？情况是这样明显，甚至头脑决非过分聪明的曼托伊费尔当时也說，如果自由派有才干，他們就用軍事問題永远把我們推下台。

可是他的顾虑完全是沒有根据的。正如內閣对摄政王那样，众議院对內閣也选择了一个不顾死活的口号：就是別推！容克的果敢必然給资产阶级的怯懦起了掩盖作用。众議院借口貴族院否决了土地稅提案以后，軍事改革問題已被推迟，就对这个问题不表示贊成也不表示反对，作为对“有名望人士”——大臣們投的“信任票”，同意九百万塔勒的特殊撥款，以便在危急时机維持“进一步的战争准备”。当然摄政王和他的反动的陸軍大臣所理解的“进一步的战争准备”无非是实行軍事改革。由于一个真正神話般的愚蠢行为，众議院放棄了斗争。对摄政王來說，違背人民代議机关的意志实行軍事改革是困难的或者是不可能的，对众議院來說，軍事改革一旦存在，要想制止它也是困难的或者是不可能的。普魯士議會政治的呵气达不到这么远，不能把两三百个步兵营、騎兵連和炮兵連从活生生的现实中又吹进有名无实的存在中去。

1861年1月，瘋顛的国王死了，摄政王即位称威廉一世。一个可怜的充滿政治奸計和政治条款的大赦充分证明，新統治者学到的和忘記的东西是多么少。对于德国的統一来說，对一个把可耻地鎮压巴登起义当做一項荣誉的君主还能期待什么呢？那些勇敢的战士——軍事法庭的报复性的判決证明，他們为德国的統一献出了自己的鮮血和生命——只有屈辱地請求赦免，祖国的大門才对他們开放！容克地主知道，他們的时代已經来到了。現在他們用封建的賦稅免納权換取国王的好話和納稅人的大量金錢，并以此证明，王权只有依靠他們才能站穩脚跟。他們又把內閣的几个小改革法案扔到字紙簍里，而无損国王的恩典。相反地，众議院

在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會議期間，除了再一次同意整編軍隊的經費以“进一步的战争准备”的名义在特別會計預算中开支以外，不知道有更好的办法。众議院休会了，芬克发表了关于众議院的英勇行为的响亮的长篇讲话，其实这些行为就是自由派的改革等于沒有实行，而軍事問題却发生了严重的糾紛，国王和容克地主建立了友好的关系。

选民們漸漸看清了自由派的这种壮举。他們的不滿情緒至少同国王的厌恶心情同样迅速地增长。被芬克諷刺为青年立陶宛人的少数东普魯士議員已經在邦議會里反对多数派的自杀政策。議會休会以后，他們同至今不願当选的 1848 年的老議員为改选組成一个統一的組織。1861 年 6 月 9 日，新党的綱領公布了。它取了德国进步党这个忸怩的名字，也有一切理由不采用民主派的光荣名称。它的原則完全局限于資產階級的自由主义。不但資產階級而且无产階級也很重視的民主要求根本沒有提到，这是很有意义的。首先是普选权，在預备會議中由于柏林、科尼斯堡和科倫的代表反对而被否决了，其次是出版自由和結社自由，新党的綱領沒有用一个字对反动派破坏这两种自由宣战。綱領要求“恢复陪審員审判政治犯罪和触犯出版法的罪行的权能”，因此它只想保证資產階級使用这些曼托伊費尔式的法宝。

綱領的全部要点是：对国王和宪法的忠誠，德国的紧密团結（沒有集中在普魯士手中的强大力量，沒有共同的德国人民代議机关，这种团結是不可想像的），貴族院的改革，大臣責任制，限制官僚的全权，取消領地警察，在軍事上进行最大節約，現役期規定为两年，解放經濟力量等等，这些都是矛头指向官僚制度和封建主义的資產階級的片面要求。甚至工人階級的最起碼的要求也被冷酷无情地忽視了，仿佛这些要求根本不存在似的。从本质上看，新党

同芬克的党团没有什么差别，新党也只责备芬克党团做得不够。它想多“推”几下，此外对“新纪元”的内阁并不作“原则性的反对”。那些还有某些理由可以自称为民主主义者的 1848 年的老議員也不肯給这个剛生下来的嬰兒洗礼。綱領上沒有布赫尔、洛貝尔图斯、齐格勒的名字，甚至也沒有瓦尔德克的名字。1848 年柏林議会的領袖中只有翁魯和舒尔采—德里奇簽了名。在同他們一起簽名的新進的政治上的大人物中，菲尔肖夫教授尤为出众，他在专业科学方面所得到的荣誉沒有妨碍他保持一切资产阶级的偏見。

尽管新党沒有任何恶意，可是在把 3 月 18 日牢記在心的受过惊的国王看来，新党会使地上长出街垒。他好像发了热病，胡說什么能够引起“从前的不幸的混乱状态”的“企图”。7 月 3 日他发布了一个文告作为对付手段。他在文告中宣称，他要通过在科尼斯堡举行的隆重的加冕，給神圣的、在任何时候也不消失的禀承天命的王权作证。这完全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做法。只是先行者对于这种伪装比后继者有更好的了解。聰明的浪漫主义者在这种場合經常找到这个或那个迷人的詞句，而平庸的軍事教练却以最粗野的挑战姿态出現。在加冕典礼上他号召軍隊反对“不管来自哪一方面”的一切敌人，他叱責邦議会的代表說，“王冠只是上帝賜与的”，他将“从主的桌上拿起王冠，戴在自己头上”。他补充說，邦議會应当“給国王出主意”，他寬大仁慈地答应“听从这种忠告”，这不是緩和而是加强了对邦議会的合法职能的攻击。于是选民們的虔誠心情漸漸消失了。在改选中，进步党一下子就得到一百六十一个議席。迄今的政府多数派只得到九十五个席位，其中大多数为多数派的比較坚决的分子所得。格拉博夫代替沒有被选上的芬克担任这一派的領袖，他曾任 1848 年議会的議長，对进步党頗有好感，这时也被选为众議院議長。

取得这样巨大的成就以后，1862年1月召开邦議會时，这个党就大胆地“推”起来了。它首先决定比較认真地对待迄今完全是幻想的众議院批准預算的权利。从曼托伊費尔时期以来，就有这样一种不正当的行为，即每年年初邦議會开会时，才向它提出当年預算，当众議院討論这项預算时，錢已經被用掉了，此外預算上只列几个大項，在这种掩盖下，大臣可以違背人民代議机关的意图进行种种欺騙活动。前一种弊端暂时不能消除，后一种弊端却有消除的可能，进步党議員哈根提出一个扩大預算分类的提案，3月6日以一百七十一票对一百四十三票通过。自由派內閣对于这一“不信任投票”感到十分气愤，于是就解散了議院，可是几天以后，它自己也痛切感到自己沒有价值而下台了。不体面的新紀元就这样不体面地結束了。

随后，国王任命了一个反动內閣。它的成員大多是无用的官僚和封建地主；除去陆军大臣罗恩以外，它的灵魂是上届內閣的貿易大臣，本届內閣的財政大臣海特，他靠着符佩尔塔耳的伪善者的厚臉经历了从旧曼托伊費尔主义到新曼托伊費尔主义的新紀元。这时开始了一场激烈的选举战。反动派聚集在“王权还是議會？”这面旗帜周圍，但是它正确地估計到这句高尚的口号只有很少的吸引力，因而同时它还大量使用皮鞭和甜面包。为了天授的王权而进行的贿选行为，甚至在曼托伊費尔时期都沒有見過。可是人們也答应減稅、縮減軍事預算，特別是答应实现构成解散众議院的原因的要求；及时提出預算并列出具體目。相反地，进步党却发出震耳欲聾的叫声，說宪法将被廢除了。选民們使它得到明显的滿足。在1862年5月的选举中，它大获全胜，得到大約二百五十个議席。格拉博夫党团完全瓦解了。其中一部分人轉入进步党，另一部分人作为从前的哥达荣华的忧郁的殘存者过着漠不关心的退隱生

活。封建党更加縮小了，它的成員只剩下十来个人。

进步党起初希望选举的結果足以使反动內閣垮台，但是它的这个願望沒有实现。邦議会在5月里一召开，它就必須决定自己将来的策略。它的最迫切的要求实现了：1862年的預算列出細目，1863年的預算及时提出来了。政府也遵照自己的諾言，縮减了軍事費用，減低了賦稅負擔。进步党現在必須决定，它批不批准政府在1862年預算的正式开支中提出的軍事改革經費。它終于开始認識到，它所要求的在普魯士尖頂盔下的德国統一不經過軍事改革是办不到的。它自己內部就有人提出警告說，不要作出它自己不願看到它实现的決議，尤其是柏林市法官卡尔·特韦斯騰这样說。特韦斯騰由于对軍事內閣的首腦进行一場尖銳的、最后以手枪解决問題的斗争而博得政治声誉，而人們不怀疑他过分迷信軍隊。加之有关的經費，屬於1862年的已經大部分使用了，政府可以把邦議会两次同意这笔开支作为根据。在这种情况下，还要事后勾銷这笔开支，这就可以說是迫使內閣同宪法决裂。政府內部的类似考虑接近这些謹慎的考虑。海特虽然在政治上沒有任何节操，可是他是一个道地的資產者，因而睨視日益增长的軍費，同时也真正害怕自己的政府成为沒有預算的政府。

在一个短時間內，似乎在两年現役期的基础上达成了協議。进步党从自己的立場出发在这一方面是很坚决的。誰都知道，两年現役期对于軍隊訓練作战能力來說已經够了，而且就改革这一方面來說，两年現役期比三年現役期更为合适，第三年只是激励“尚武精神”，沒有这种精神的軍隊就不能用于政变。如果国王在这一点上让步，那么众議院就得到一个重大的胜利，进步党把大大減輕軍事負擔当做礼品送給了选民。

可是进步党眼里的丑八怪，到了国王眼里却成了美人。国王

在大臣會議上宣稱，他宁可退位，也不肯放棄三年現役期。根據國王的半官方傳記作者的說法，大臣們繼續反抗下去，王位也確實讓給了王太子，可是王太子拒絕接受，理由是即位之初就傷害了“尚武精神”的普魯士國王，他的地位是不可靠的。這件軼聞即使不是真的，從當時乃至今天的情況來看也是編得很巧妙的。不管怎麼樣，陸軍大臣又對眾議院表現了粗暴的一面，財政大臣施展了最後的絕望手段，威脅說，如果議院不讓步，就會發生憲法上沒有載明的事件。當然他用這種手段得不到他所期望的東西，反而得到了相反的效果。國王的頑固態度使得任何進一步的讓步成為不可能。1862年9月23日，眾議院把軍事改革經費列入1862年預算的特別開支項下，然後又以絕大多數否決了這項支出。隨後，國王免除了財政大臣的職務，把普魯士駐巴黎大使俾斯麥召回柏林擔任首相。

俾斯麥出生於老馬爾克一個沒落的容克世家，十四世紀以前這個家族是當時的富庶城市施滕達爾的一個城市貴族。後來俾斯麥為了文化鬥爭的更高榮譽，想把這位祖先變成一種顯示預兆的精灵；他硬說，這位開明人士由於同天主教僧侶發生爭執而被逐出施滕達爾。如果他真的感覺到隔世遺傳的刺激，那麼他就不應該在宗教領域內尋找這種刺激。假如是同天主教僧侶發生爭執，尼古勞斯·俾斯麥就可以安安靜靜地生於施滕達爾，死於施滕達爾。把他永遠逐出他的故鄉的是一次行會暴動，這次暴動是他同幾個同伙殘酷地壓迫老百姓，自私自利地掠奪本城錢財而挑起的。可是他善於同不義的財神成為好朋友。欠他很多債的當時的維特斯巴赫選帝侯給了他一塊城堡領地，把他列入老馬爾克小貴族的行列。這樣發迹的情況在十四世紀不像今天這樣多見，毫無疑問，俾斯麥的這位祖先一定是個很狡猾的商人。他所獲得的莊園由於有

很好的猎場在十六世紀被当时的霍亨索倫家族夺去了，霍亨索倫家族从掠夺来的教会和修道院領地中拿出一部分給俾斯麦家族作为赔偿。对于俾斯麦家族是否被它的合法的王族所欺騙这个问题，这个家族的最出名的子弟十分果断地給予肯定的答复，不管这是真的还是出于对自己祖先的可敬的孝顺。不管怎么說，他的祖先只給他本人留下两三块耕地，十九世紀他必須在这几块土地上辛辛苦苦地过着适合正式乡村貴族身分的生活。

因此他在革命年代扮演了容克中最有容克本性的角色，用一个好胃口、餓肚子的人的一切才智爭取封建特权，厌恶資產階級的德国統一，把它看做是对普魯士容克主权的致命伤。反革命不会不把桂冠授与这样崇高的斗争。俾斯麦对奥里繆茨的日子的明显热情使得浪漫主义的国王把他看做是被屈服的普魯士駐在恢复了的邦联議会的最合适的代表。这个穷容克在富庶的貿易市場法兰克福認識到，資本主义世界虽然用一切可恶行为使一个真正容克心惊胆战，可是它也提供了一个十分迷人的前景，这种前景使得在易北河东的不大的土地上对人的封建压迫，看来好像是一种非常可怜的生計。俾斯麦同路德希尔德家族交了朋友，这个家族在柏林的代理人布莱希勒德使他拮据的經濟情况有所好轉。但是他并不因此而不是容克，他从内心深处仍然憎恨資產階級的政权要求。他从来没有理解自由主义乃至社会主义的历史联系。在他一生中，这对他是一个謎，当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出现在他眼前的时候，他按照中世紀容克的方式，用火与劍攻击它們。

这个容克卓越地继承了本階級的遺產：强烈的欲望，毫无顾忌地进行干涉的意志，同这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是历史的局限性——处理事务时目光敏銳，但完全看不见人民生活的推动力。俾斯麦不把波拿巴主义看做資產階級和无產階級之間的世界历史

性階級鬥爭的一個暫時的插曲，而看做為了用暴力壓制資產階級的政治要求而發展了資產階級的巨大生產力的現代專制主義的典型形式。早在克里木戰爭時期，俾斯麥就痛罵本階級中的一些人裝模作樣，這些人出於封建的或者正統主義的考慮，拒絕同塞納河畔的天才政治家做生意。他本人沒有產生這些懷疑，他越看清波拿巴的治國之術，他就越疏遠了陷入長期的財政困難不能自拔的哈布斯堡的政治。他在邦聯議會中的官方職務使他清楚地看到，德國的分裂狀態對於資本主義造錢機器的運轉起了多大的阻礙作用，不久他就學會咒罵“德國王侯的完全非歷史的、無法無天的主權欺騙”。這裡是指那些其天授權利妨礙普魯士容克階級的統治利益和德國資產階級的金錢利益的王侯，雖然這種權利和普魯士王室在同一時期這樣堅決依靠的天授權利是同一類型的。

這個小容克逐漸變成一個大外交家。五十年代，俾斯麥小心翼翼地以他的才幹在官僚—封建反動派的內部傾軋中周旋。他學會克服容克地主對官僚制度的天生憎恨到這種程度，以致他同曼托伊費爾的友誼並不次於同格爾拉赫兄弟的友誼。他既是國王的寵臣，也是王位繼承人的寵臣。他也懂得同“新紀元”妥協，因而只把他“貶”到涅瓦河畔，讓他當上一向被認為是普魯士外交界的首要職務的駐彼得堡的大使。俾斯麥在這裡研究了俄國外交的不道德的實踐，在自由派執政期間，執行獨立的政策。當時他還不知道外交界的教條：大使應該像軍士那樣旋回進入。新國王對俾斯麥保持着舊日的恩寵。他願意傾聽俾斯麥的大膽的未來計劃，雖然國王是個膽小而多疑的人，不會毫不考慮地服從他的“勃蘭登堡選侯國的臣子”的專橫意志。國王把俾斯麥看做是最緊急關頭使用的後備軍，“新紀元”垮台以後，這個事業欲很強的容克又沒有得到他垂涎的職位。他利用這個拖延期間，以駐巴黎大使的身分在波拿巴主

义的权术中作最后的磨炼。到了1862年9月23日，最紧急关头随着众議院的決議到来的时候，他的日子也就来了。

在把俾斯麦召回柏林的时候，容克地主們欢呼說，买卖人的插曲演奏完了，进步党人叫喊說，这是政变。可是俾斯麦本人却从“更高的”角度来理解自己的任务。他想按照波拿巴主义的榜样誘惑资产階級，但是，只要可能就不伤害它，因此他向它提出和平建議。在关于軍事改革的爭論中，资产階級的主要問題就是：我們只要确知这个工具是用于統一德国的！于是他就答应资产階級，整編軍队的經費一經批准，他就用“铁和血”解决德国問題。进步党的回答是够无礼的：你这个穷鬼能有什么办法呢？人們毫无道理地責怪它当时“忽視了天才”。它对这位“天才”是有認識的，但是舒尔采—德里奇立即在众議院发表意見說，封建党决不会执行强有力的外交政策。一年以后，菲尔肖夫用驕傲自滿的口吻諷刺說，俾斯麦已經不是抱着推行强有力的外交政策的意图进入內閣的人了。俾斯麦直截了当地回答說，無論哪里他都應該停留，因为自由派諸神不听他的禱告，所以他委身于保守党的地獄。进步党很了解这位“天才”，可是它一点也沒有看清支持这位“天才”的力量。

俾斯麦不是由于他的德国計劃而被任命为首相的，而是尽管他有这样的計劃仍被任命为首相。他从国王和容克手里得到領導一个无預算、无宪法的政府的全权，但是他的对外政策是他个人的事情，决沒有得到国王和容克階級的批准。进步党人并不是这样不中用的买卖人，他們不会为了在某个不可思議的未来可能付給他們的一点代价而在現在放棄自己的政治要求，他們不会为了一个可疑的“天才”的靠不住的支票而付出他們的通用的証券。

在国王通过任用俾斯麦表明了他粉碎众議院批准預算的权利的意图以后，进步党不能再退让了，它必須进行斗争，現在的問題

只是：它想用什么办法胜利地进行这一斗争。它侥幸地碰到了一个给它指出走向胜利道路的开路人。

## 二 拉薩尔的战役计划

拉薩尔在新紀元的日子感到越来越不耐烦。有一次他写信给馬克思說：“誰要是現在住在柏林，沒有因为自由主义而死去，他就决不会气死”，另一次他用更为尖刻的話譴責自由派明里和暗里掩护腐朽的司法的“报刊阴谋”。

那时候，《国民报》要想詆毀馬克思的人格而散布了許多流言蜚語，普魯士法官却不願过問。馬克思在写给拉薩尔的一封信中对于这种拒絕审理的粗暴行为表示惊異，拉薩尔回信說：“你似乎把普魯士的司法看得太好了。我从这些家伙身上却得到了完全不同的經驗……当我想到这十年我每天所經受的司法迫害，我的眼睛里就冒金星，我就觉得好像有一場怒火要把我燒死！現在我早已克服和熬过了这一切，从那以后已經过了很長時間，足以使我的心情平靜下来，但是当我听人談到法官和法律的时候，我的唇边仍然挂着最輕蔑的微笑。在我看来，同我們的法官相比，那些重刑犯人是值得尊敬的人。”馬克思认为，这些普魯士人向他提供了一件材料，这个材料的可爱后果，他們不久在倫敦報紙上就可以看到，拉薩尔对馬克思的这种看法回答說：“不，亲爱的朋友，他們什么也不会看到。虽然我不怀疑你将在倫敦報紙上描繪他們和歼灭他們。但是他們不会知道，一点也不会知道，結果就好像你根本就没有写一样。因为我們这里的人不看英国報紙，我們的德国報紙中也沒有一家会注意这种事，也不会有一家哪怕只刊载这方面的片言只語。它們决不这样做！我們的自由派報紙更是如此！这些

蠢貨只要提到他們神圣的保护神——‘普魯士的法律状态’就喜欢得咂嘴，他們哪里会說一句反对它的話呢（他們在說这个詞的时候总是鼓起两个肥胖的嘴巴），他們对于这位保护神尊敬得五体投地！哦，他們不会談到这方面的問題，而是从多瑙河到萊茵河，以及只要‘有德国人說話’的地方，干脆就諱莫如深！对于这种报刊阴谋又有什么办法呢？哦，我們的警察（不管人們怎么說）仍然是比我們的报刊更自由主义的机构！”这些极为沉痛的話证明拉薩尔对普魯士的情况比馬克思了解得更为正确。

当时拉薩尔計劃同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在柏林出版一个大型民主派报纸，同自由派的腐朽报刊对抗。还在1862年1月，他就企图使萊比錫的布罗克豪斯老人对此发生兴趣。可是这个計劃始終是个不能实现的幻想，这也是不值得惋惜的。在这样一些人领导下的这种报纸从资本主义出版商身上得到的体验将比《新萊茵报》从它的股东身上得到的体验痛苦得多。而且算盘也沒有打对，也就是沒有考虑自由派大臣施韦林的話，他在解释大赦的反动性保留条件时說：要是馬克思回到德国，他将被看做是外国人，警察可以任意对待他。

只要资产阶级仍然陶醉于信賴之中，在德国就什么也干不成。1861年夏天，拉薩尔出版了他的法哲学著作以后，就到瑞士和意大利作較长时间的旅行。他在苏黎世同海尔維格和威廉·呂斯托夫过从甚密。呂斯托夫是著名的軍事作家，他为了民主信念而牺牲了普魯士少尉的职位，后来在瑞士參謀总部供职并升为少校，参加了加里波第向那不勒斯的远征，带着荣誉回到瑞士。由于呂斯托夫的介绍，拉薩尔認識了意大利爱国者集团。他在卡普里拉島上拜訪了加里波第，对于意大利行动党計劃对奥地利进行一次新的打击，似乎很感兴趣。可是从拉薩尔分散发表的意見中以及他关

于这一插曲的其他言論中看不出，他期待这一牵制攻击对于德国的发展发生什么作用。根据一个很不可靠的材料，根据給布赫尔写傳記的半官方作家的說法，拉薩尔希望加里波第对达尔馬提亚的攻击引起匈牙利的革命，据說拉薩尔曾“口头上”对布赫尔說过：“佩斯的革命就是維也納的革命，而維也納的革命就是柏林的革命。”但是这个所謂的拉薩尔的看法同他对于德国庸人的革命欲望的冷靜判断存在着极尖銳的矛盾，甚至人們剝去这种說法的幼稚形式（俾斯麦的雇佣文人利用这种形式来理解革命政策）也是这样。拉薩尔欢迎一切革命行动，但是他是一个考虑周到的聪明的政治家，不会对一个完全飄浮在空中的、大家都知道决不会成功的計划寄予很大希望。1862年2月9日，他相当冷靜地写信給呂斯托夫說，他要求意大利人給他一个确实的消息，这一年春天准备不准备行动。可是三星期以前，他在給布赫尔的一封信中以大不相同的热情談过一些計划，同这些計划的革命意义相比，意大利义勇軍向达尔馬提亚的进軍只是一件相当次要的事情。

1862年1月初，拉薩尔回到柏林，他发现这里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月以前进步党在选举中得到第一次胜利，現在开始“进逼”。拉薩尔起初对此沒有寄予很大希望。他写信給呂斯托夫說：“在我們的議院里，旧日的苦恼依然存在！这些大人先生不知道应该背着風还是迎着風轉帆柁！連一条最小的船也不会駕駛，却想駕駛国家这条大船！”假如拉薩尔真的存在幻想，那么“新紀元”的三年也給他彻底打消了。他同进步党和民族联盟的某些領導人的私人友誼一刻也沒有使他迷惑。这种关系就同一百年前，萊辛同柏林启蒙运动者的关系相似。同萊辛一样，拉薩尔也沒有扮演一个狂信某种見解的无知角色，隐藏在这种角色身后的通常是精神上的局限性。他是一个有吸引力的亲切的伙伴，喜欢开

有趣的玩笑，甚至喜欢放蕩不羈，他也沒有掩飾自己的这种才能。同他交往的人无疑是相当复杂的，他终于在这个圈子里感到比在个人虚荣心較少的場合舒服些，但是这个环境对于思想家和战士拉薩尔的影响比哈茨費尔特伯爵夫人对他的影响还小得多。这种影响事实上等于零。拉薩尔同进步党的权貴談政治，同哲学协会的衰老的黑格尔主义者談哲学，他一刻也沒有忘記什么东西把他同一切可爱的中庸之道分开。

相反地，他把对进步党的看法同他沒有很大差别的 1848 年革命的参加者看做身分相同的朋友，这些人是齐格勒和布赫尔，稍晚一点，洛貝尔图斯也成了他們一伙。拉薩尔有一次写信給齐格勒說，諾尔丽<sup>①</sup>在他們誕生的时候，扔給他們相同的命运，另外一次他給洛貝尔图斯写信說，他們好像是作为暹罗双胞胎<sup>②</sup>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但是布赫尔比这两个人更像是第二个拉薩尔，如果沒有拉薩尔的硬骨头和在他身上奔流着的热血也能有一个拉薩尔的話。

布赫尔同拉薩尔一样具有法学和哲学的修养，他的目光也很尖銳，能够看到事物的现实性。拉薩尔的許多得意的思想都是首先由布赫尔提出来的，他的提法不像拉薩尔那样明确，但是已經具有初步的明确性。早在 1848 年普魯士議會中，他就提出既得权利的理論和宪法理論，根据他的理論，宪法問題从根本上来說不是一个法律問題而是一个权力問題。后来布赫尔在他論英国議會政治的才华橫溢的小册子中叙述了进步的分工对资产阶级的影响与对无产阶级的影响完全不同。分工越細，人就越成为不完全的，大小商人越是企图壟断各个商品，他們就在这种资本主义投机中变得

① 北欧神話中司命运的三女神之一。——譯者

② 身体接合着的双胞胎，1811年生于暹罗，故名。——譯者

更愚蠢，相反地，工人的精神解放，工人的全部精神力量的釋放進行的程度同機器的改進把人的輔助降低為機械式的活動的程度相同。這個思想本身已經由馬克思在他反駁蒲魯東的著作中闡明了，但是布赫爾通過自己對英國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實際觀察獨立地說明了這種思想。他的論點：“在社會梯子的最外面的兩級，即在只靠自己的教養生活的紳士和通常被稱為‘手’的工人之中能夠找到最正確的判斷”，成了貫穿拉薩爾的整個工人鼓動工作的主要旋律。

當德國自由派看到英國資產階級統治這個光輝榜樣而暈眩、驚異的時候，布赫爾已經看到英國資產階級統治的內情。這也是他同拉薩爾接近的一個重要之點。四十年代，德國資產階級欽慕法國資產階級，而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則欽慕英國資產階級，從實際情況上看，這是一個十分反動的轉變。資產階級反法主義的矛頭不是對着波拿巴主義（德國資產者不久就同它親善友好了），而是對着法國的“政治發展”，拿《人民報》的話來說，德國資產者想從這種發展中“解放”出來。這種“政治發展”就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人們以為階級鬥爭在英國已被克服了，從而傳播一種有害的觀念，仿佛英國資產階級不是通過革命行動，而是通過議會演說取得政權的。

布赫爾在他給《國民報》寫的倫敦通訊中指摘英國資產階級說，外交和政治被國民經濟吞噬了，崇高的權利、歷史傳統和神學的套語必須咬着牙屈服在稅率表的權威之下，英國的外交政策是沒有任何思想動力和目的的純粹的貿易政策。這同德國資產者的騙人勾當當然是不相適應的。它決不願意讓人在自己心愛的報紙上破壞自己心愛的妄想。當布赫爾在大赦令發布以後回到祖國時，受到他舊日的同志的很不客氣的接待。《國民報》解了他的職，

这家报纸的老板沃尔弗认为用一点微薄的薪水雇布赫尔在他的电报室里“潤色”电报，还是一件宽容的奇迹。沃尔弗說布赫尔是一个可恶的異端者，这种說法足以使“自由党”（后来翁魯本人也承认这一点）对布赫尔的命运不負任何責任。德国資產階級从来就比英法两国資產階級更渺小，更卑賤，它对敢于在它内部怀疑它的光荣偉大的人进行饥饿迫害的手段从来也更凶恶、更殘酷。这就彻底摧毁了布赫尔的越来越弱的生活勇气。当拉薩尔在哲学协会中同他真誠相見时，他以胆怯的不信任的态度迴避拉薩尔，后来他逐渐改变了这种态度，但是始終沒有完全克服。

拉薩尔在同布赫尔的詳談中，考察了1862年初的政治局勢。他很少依賴进步党所应允的英雄行为，但他却渴望为了革命目的利用群众的活跃生活。他同布赫尔的第一次談話是在1月21日进行的。拉薩尔从意大利行动党准备对奥地利进攻談起，但是正如布赫尔所证实的，后来他就从沒有回到这个問題上。对他說来，这个計劃只是一次原則性討論的实际起点，这次討論的中心問題是，在德国推翻和压制現存秩序（或无秩序）有沒有可能。布赫尔认为推翻是可能的，压制是不可能的。第二天他写信給拉薩尔說：“您想代替（資產階級制度）的东西不能使我滿意。您所謂的一切措施又只是政治上的（可以說是法律上的）措施，处在旧的社会基础之上，只能創造新的資產者。这种不是通过占有的化学特性（用我的話來說），而是通过人事变动所形成的新的占有关系，只有通过一場曠日持久的战争，一小撮人的一种恐怖政治才能維持。我是根据統計数字和我对东部諸省的农村居民的精确了解这样估計的。”只要少数人能給多数人提供一种利益，至少提供一种信念，这才是可能的。“我再提一下我过去說过的話：人民缺少神，我們缺少我們可以为它光荣地死去的東西。”从布赫尔的这封信可以看

出，拉薩爾一定向他暗示了他后来的宣傳活动的一般計劃；布赫爾关于停留在旧社会基础上的政治—法律措施的話，基本上包括了他后来正确地反对拉薩爾的国家資助的生产合作社的論点。

拉薩爾随即写了一封回信，坚决反对“他真正的社会綱領是由那些瑣事构成的”这一誤解。据說，那些小問題，只是他临时而且在对于經濟沒有任何比較深刻的了解的情况下仓促写出来并且特別強調的。人們不用置身于社会基础之上，只要从法制基础出发就可以解决这些問題。我們又可以明显地看到，拉薩爾的思想意識在实际的行动上立即开始風化。他在这里清楚地說明，从法制基础出发解决不了当代的社会問題，这一点他在写《既得权利体系》时还不了解。布赫爾关于“占有的化学特性”的“十分确切的話”为他可靠地证明，他們彼此是会諒解的。布赫爾正确地深入最內在的起源，即社会綱領，对这个起源來說，一切政治問題只是結論和結果。“对于像我这样的一个社会主义者說来，我对您所作的观察只能是一种同情的观察，它的作用是，而且也只能是证实我是正确的，每个比較認真思考的人都以不可避免的必然性自发地奔向我本人也只从那里吸取明确和解决、安心和确信的源泉。”布赫爾是社会主义者，他們只需要討論科学批判的問題。

拉薩爾一面摆脱法律意識，一面还被哲学意識糾纏着。他說，馬志尼关于神的神秘言論只是說明，他从未把什么东西看做是一种新的世界原則的不可缺少的条件，也就是要說明这种东西有力量由自己內部建立一个新社会，把政治形式作为它的結果并且建立一个新倫理学的基础。这样，拉薩爾就說明了他后来的工人綱領的基本思想。只有一个同时又是倫理原則的原則才能发展成为一种新的世界状态，成为像科学一样的现实中的普遍性。“假如1793年的山岳党人今天，而且恰恰是为了今天从坟墓里爬起来，那

么他们只是在自己的想像中是革命者。”人的思想很有力量发展成为这种整体。

拉萨尔在这封信里要求同布赫尔作第二次会谈，后来这次会谈也举行了。2月9日，拉萨尔写信给吕斯托夫说，在这历时八小时的第二次谈话中，他被迫阐明和领会经济学的“整体”，布赫尔承认自己被说服了，被战胜了。拉萨尔死后，布赫尔本人在呈给他当时的上司俾斯麦的一个报告中硬说，拉萨尔在那次谈话中没有说服他。因为布赫尔在这个报告中谈到他从前同拉萨尔的交往时，一定要显示自己，所以不能认为他是矢口否认。相反地，他的叙述对他们两个人来说都是公正的，他说在他们之间有许多接近点，但也有一个经常出现的对立：拉萨尔作为形而上学者和黑格尔主义者经常由普遍走向个别，由抽象走向具体，而他，布赫尔具有比较现实的素质，对学派体系的了解不够，而且在英国待了十年，经常喜欢走相反的道路。在那次会谈中也是这样。“结果是我們对于社会的本质和历史进程的認識基本上一致；可是我們之間的旧冲突馬上又以这样的形式出现了，他从历史中的思想发展出发，期待最近的变化不久（还在他有生之年）实现，而我根据我对阶级和集团的各个类型进行的观察，根据这一个人的天生的利己主义和另一个人的怠惰，认为可以看到物质对思想的长期反抗，因而认为要过几十年才能看到新的经济形式出现。”布赫尔补充说，拉萨尔并不是很容易就接受了他的反对意见的，尤其是莱辛的一句话对他发生了影响，按照莱辛的说法，在任何时代都有人能够正确地看到未来，只是不能等待这个未来；为此历史要用几百年的时间，这应该在历史存在的时刻成熟。但是，这样一来另一个热情的人物的影响占了优势，拉萨尔抱着时常向他的朋友表示的对胜利的希望，进行他的宣传活动。

这段叙述带有真实的特征，它同拉薩尔的叙述也很吻合。布赫尔“基本上”被战胜了；使他們两人分开的，与其說是信念的对立，还不如說是气质的对立。两个人也本能地感到这一点。拉薩尔在向吕斯托夫报告他的胜利时补充說，他想先看一看，布赫尔的轉变是否持久，而布赫尔对拉薩尔对他的不同意見的反抗只能用另一个热情的人物的影响来解釋。

大家知道，拉薩尔对布赫尔的坚定性的怀疑是很有道理的，这一思想斗争就其实际影响而言，不值得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史中特別加以討論。可是从这个斗争可以深入地了解拉薩尔的工人鼓动的根源，因此它是很值得討論的。这一斗争彻底粉碎了拉薩尔是由于功名心受到损伤，或者由于其他卑鄙的动机而对工人进行宣傳活动的鬼話。相反地，它表明工人鼓动一开始就进行了充分的规划，它的成績和缺点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它是由一个深刻的、不可动摇的信念产生的。拉薩尔决沒有輕易接受布赫尔的反对意見，这是可以相信的。只要布赫尔这样一个城府很深的人能够对某一个人有所偏爱，那就是对拉薩尔。布赫尔本人也承认，他要进行多大的克制才能做出这样客观的判断，不顾自己所有的一切理由，憎恨这个旧的世界秩序。他的反对意見也不是从表面上得来的。布赫尔不仅对易北河东的农业无产阶级，而且也对大資本主义的发展以及它的內部規律的作用比拉薩尔有更多的了解。在經濟上十分重要的1850年到1860年这十年，他不是杜塞尔多夫和柏林，而是在倫敦和巴黎度过的。只要对布赫尔的反对意見再进行一次审查，就可看到这些意見十分接近可以对拉薩尔的宣傳活动进行客观的历史批判的論点。

虽然如此，布赫尔还是大錯而特錯了。他說，拉薩尔由于哈茨費尔特伯爵夫人或其他人的影响，对他的反对意見充耳不聞。拉薩

尔的听觉比他好得多。只是不可遏止地奔騰而来的未来的响声較大，使他听不見現在的警告的声音罢了。拉薩尔的唯心主义的特殊的长处和特殊的弱点，在任何地方都沒有像在他同布赫尔的这一爭論中表現得这样明显，后来他同齐格勒和洛貝尔图斯也进行了类似的爭論。他的朋友們的“现实的素质”对他提出的反对意見是很有道理的，但是拉薩尔比他們看得更尖銳、更深和更远。他說，尽管如此，形势已經成熟，人的手可以作有力的推动，使形势向前进展了。因此他不是个幻想家，而是一个用可靠的眼光把握事物最內在核心的天才。一个完整的人同組成他的千百个細节始終有些不同，無論他在細节上犯多少錯誤，他仍然可以有自己这一方面的历史权利。

### 三 拉薩尔和进步党

拉薩尔就这样开始了他的现实的政策。他从1862年春天到1863年春天所进行的战役是他的一切战役中最重要和最有效果的，同时也是（如果可以这样說的話）艺术上最圓滿的和最合乎人情的战役，是革命战略的一个真正的杰作。这个战役是循序漸进的：开始用活潑的輕騎兵小战，然后以不可抗拒的邏輯的密集队伍进迫，运用經過冷靜考虑的战术，但始終处在原則高度上，最后用銅錘敲开了大門，有階級覺悟的无产階級将通过这个大門胜利地走进德国历史。

同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一样，拉薩尔在1862年同资产階級运动的极端派发生联系。尽管他在新紀元时期，从自由主义那里得到痛苦的經驗，但他仍然坚持在五十年代支配他的观点：只要还有一綫希望，资产階級能够完成它的历史使命，能够推翻封建

專制的反动派，就不攻击它，削弱它，而是加强它，推动它。由于国王的頑固不化，进步党几乎得到全国支持，无論如何得到人民中政治上最开展的部分——除了工人階級中觉醒的阶层以外，也有資產階級的坚强和能干的分子——的支持。拉薩尔虽然沒有任何幻想，但是他决沒有忽視这一点。推动进步党前进是值得试一试的，即使这种尝试毫无希望，也必須试一试。在进步党还没有在全体人民面前清楚地表明，它不能而且也不想完成給它提出的历史任务以前，对它不管不顾是不合道理的。

拉薩尔劍下的第一个牺牲者是由《边境使者》轉到《柏林总汇报》的朱利安·施米特。新紀元的国务活动家的这个机关报对进步党怀着很大的敌意。它完全用半官方雇佣文人的态度指摘进步党关于預算中列出細目的提案是对財政大臣帕托夫的“怀疑”，它說帕托夫“在他的行政工作方面是一位行家，而且也是立宪自由的先鋒战士，这是举国皆知的”。拉薩尔对“格拉博夫分子”朱利安·施米特的应有的打击同这一点有关，而不是像人們錯誤地认为的，同資產階級反对派有关。在資產階級反对派开始认真对待議會批准預算的权利的时候給它添麻煩，这同拉薩尔的意图是完全不合的。他在惩罚朱利安·施米特的同时，也就惩罚了一个因为进步党真正保卫人民权利而向它进攻的可耻的爭吵者。

当然拉薩尔并不因此想做进步党的打手。他在很有份量的前言中說明了，他獻給正直的朱利安的排字工古典旁注<sup>①</sup>要想达到什么目的。他想反对使德国資產階級趋于墮落的精神上的无知和沒有內容和行动的夸夸其談。他拿朱利安·施米特当做这种文学和政治上的腐敗的典型，而不諱言被召的只有一个，被选上的却有

<sup>①</sup> 原文是 Setzerscholien，根据梅林写的注，应指《文学史家朱利安·施米特先生》一书。——譯者

許多，而且也不隱瞞可愛的公眾對於混亂狀態負有責任。從這一點來說，拉薩爾的小冊子也針對着，而且首先針對着進步黨。但是這是符合它本身的利益的，在整個著作中沒有一個字可以妨礙它對王室進行的鬥爭。拉薩爾鞭責了哥達派的文學和政治的發言人，哥達派過去不對王室進行鬥爭，而現在却給進步黨製造障礙。消滅自由主義的這個派別只能對王室有害，對資產階級反對派有利。

拉薩爾駁斥朱利安·施米特的著作有資格進入德國文獻的古典抨擊性文章之列，雖然它，還不如說因為它（正如阿爾伯特·朗格在它出版以後不久所說），除了許多千真萬確的東西以外，也有許多牽強附會的和不合理的東西。萊辛駁斥克洛茨和克洛茨分子的文章，歌德和席勒的警句，普拉頓和海涅的諷刺文也是這樣。如果人們不想把鬥爭逐出文學和政治——逐出鬥爭就是扼殺一切文學生活和政治生活——，那麼人們就必須承認這一事實，即戰爭就是戰爭。的確，這些鬥爭越正當，它們就必然在某種意義上越不公平。它們的正義性隨着它們為了事業而對人進行鬥爭的程度而增長，但是它們越是把人只看做事情，它們就越侵犯人的私人權利。

人們可以十分尊重批判性的研究，這一研究事後證明，克洛茨和施米特並不完全是像萊辛和拉薩爾所描繪的那樣的壞蛋。這是一件正義的義務，萊辛和拉薩爾對此也不會表示異議。但是這並不證明他們是不對的。他們反對腐朽的東西，壞的東西，因為它腐朽，因為它壞，所以有理由不管它在後世的審判席前能否為自己找到這種或那種可以寬恕的情況。拉薩爾在這一方面甚至比他的有名的先驅者更為寬容。他公開說，朱利安·施米特的政論活動是普遍分解過程的產物。他對被他拖上法庭的被判處死刑的罪人表示了沒落家族的國王應該享受的尊敬，他的排字工古典旁注的形式一開始就排除了這種假定，即他想按照字面來解釋他對他的牺

牲者的一切高傲的嘲弄。从事情的实质来看，他进行了一次正义的好的斗争，一切真正的科学工作者为了这一斗争都感激他。今天，谁要想了解朱利安·施米特的文学史怎样阴险和没有根据地嘲弄我们的古典文学和古典哲学，还应该感谢他。

布赫尔对拉萨尔的这一著作还给予了一些帮助，后来拉萨尔却独自前进，他发表了两个使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了解政治局势的演说。他在四个自由派的市区联合会中陆续发表的关于宪法问题的演说对进步党当时提出的号召拯救宪法的竞选口号作了必要的说明。

拉萨尔研究宪法的本质并且说明正如每个身体都有其体质一样，每个国家都有它的宪法。因为每个国家必然存在某些实际力量对比，而这些实际的力量对比始终是一个国家的真正宪法。拉萨尔十分明确地指出，一个掌握军队和大炮的国王，一个对宫廷和国王有影响的贵族，大工业和大商业，银行和交易所，在某种限度内还有一般意识，在极特殊情况下甚至人民群众都是宪法的组成部分。这些实际的宪法永远存在而且必然永远存在。近代所特有的，不是实际宪法而是成文宪法，或者是一张字纸。

对于成文宪法的要求是怎样产生的呢？显然只是由于在出现这种要求的国家里，实际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实际力量对比没有发生变化的社会，根本没有制定新宪法的需要。在近代，这种需要产生于其力量超过了王室和贵族力量的资产阶级的巨大发展。资产阶级不愿再做任人随意统治的群众。相反地，它想自己进行统治，并把王侯作为自己意志的工具。为了自己的统治，它想把国家的一切制度和管理原则确定和总括在一个文件内。可是它的事实上较大的力量没有组织起来，所以它不能同国王由于掌握军队和大炮而拥有的、虽然较小但已经组织起来的力量抗衡。只

是在国王违背民族的意志和利益，继续领导和管理国家事务，资产阶级决定用它没有组织的优势力量同有组织的力量对抗的时候，才发生了1848年3月18日的事件。

在这一天，国家的旧宪法被粉碎了，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制定一个新的宪法。那么应该干什么呢？柏林议会应该制定有利于资产阶级，改变国内的实际力量对比、把军队和大炮的有组织的力量变成自己的权力的实际宪法。然后它就可以在三天内制定成文宪法。它没有这样做，却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当它为了掌握军队，终于通过施泰因的提案，战战兢兢地迈出第一步的时候，整个资产阶级和半个国家叫嚷说，不要干这种蠢事，不要非难内阁，而要不惜一切代价制定宪法！因此王室用它没有被摧毁的权力手段解散了议会。

王室方面对宪法的实质有较深的了解。当它取得胜利以后，它决不是想制定一个反动的宪法。相反地，它自发地颁布了一个相当自由主义的成文宪法。它的第一个实际措施却是解散市民自卫团，即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解除失败者的武装，是胜利者的大事，如果他不随时都会重新发生斗争的话。”只要胜利的王室手里掌握着实际力量，只要它知道实际的宪法将以重力法则中的必然性一步一步地对成文宪法取得胜利，它就乐意颁布一个自由主义的成文宪法。事实上也是这样。“任何一面在战争中用过百次的旗帜，也不会像我们的宪法这样破烂，有这样多的窟窿。”虽然如此，仍然十分害怕地集合在这面破旗的周围，这就等于发出一种悲鸣，等于承认在成文宪法中始终还有某种同实际的力量对比相矛盾的东西。

在成文宪法符合实际力量对比的情况下，一个党决不会紧紧抓住宪法，发出特别的喊杀声。每个人都自动地离开这种宪法三步远。可是，在实际力量对比同成文宪法存在矛盾的情况下，成文

憲法——上帝和喊叫都不能幫助它——就不可挽回地消失了。它要么被向右修改，以適應已經組織起來的力量的實際力量對比，要么被向左修改，這樣，沒有組織起來的社會力量就再次證明，它比軍隊和大炮的有組織的力量強大。但是不管怎麼樣，成文憲法總是消失了。

拉薩爾把他的看法總括了一下：“憲法問題本來不是法律問題而是權力問題。一個國家的實際憲法只存在於一個國家的實際力量對比之中。如果成文憲法是社會上的實際力量對比的精確表現，它才有價值，也才能持久。”他補充說，適用於有組織的權力手段中最有決定性的和最重要的手段——軍隊的東西，當然同樣適用於司法官吏和行政官吏等等的組織。關於這一點，他一句話不說，他的聽眾也會知道軍事改革是由於何種需要產生的。

他在結束這個報告時說：“先生們，王侯們有實際的僕人，不是空談家，而是像你們所希望的實際的僕人。”

這個十分尖銳地刺中局勢的有病神經的報告，對於它的對象似乎沒有發生什麼巨大影響，這在今天幾乎是不可理解的，但也更加清楚地證明了當時的混亂。拉薩爾在市區聯合會所做的報告受到普遍的歡迎，為了對演講人表示特殊的尊敬，在他講話時，人們遵照他的願望停止吸煙。此外，善良的人們似乎沒有注意到，拉薩爾端給他們的是同他們所習慣的普通套語完全不同的東西。進步黨的領袖當然不是用這樣粗糙的方式所能欺騙的。拉薩爾的意圖很難瞞過他們。但是當時他們已經掌握了在可能的情況下使他們不歡迎的人無聲無臭的巧妙手段，只要他們的小綿羊沒有搗亂，他們也就沒有理由同拉薩爾爭論。拉薩爾的演說在王室的“實際的僕人”那里，比在這些“空談家”這裡受到更大的注意。《十字報》聲稱，拉薩爾這個過去很有名的革命的猶太人以正確的本能打中了

問題的要害，他還沒有說出他所知道的和他所想的一切。這是希望王室儘快地，儘量不可挽回地同資產階級決裂的容克地主的話。政府本身的态度比較謹慎一些。陸軍大臣羅恩和半官方的《星報》責備拉薩爾的破壞意圖。

如果說，拉薩爾在這個報告里警告資產階級：別再干使你們1848年的活動歸于失敗的那些蠢事，那麼1862年4月12日，他在奧德尼恩布克郊区手工業工人協會對這個市區的機器製造工人所做的另一個報告中說：不要忘記，你們在一般的資產階級的反對派中，代表着特殊利益。這個報告就是後來由拉薩爾定名的《工人綱領》。他想在這裏面論述“現代歷史時期同工人階級的思想的特殊聯繫”。

為了解釋他的題目，拉薩爾先談了談歷史，談了談過去，如果了解正確，那麼這裏也同其他地方一樣，過去說明現在的意義並且預先描出未來的輪廓。在中世紀，土地占有是主要原則，它植根于這個時代的農業經濟狀況，植根于它的生產狀況。社會的力量、領地制度、公共權利、國家憲法、大地主的免稅權和社會的歧視都以土地占有為基礎，這種社會歧視是針對農業勞動以外的其他一切勞動的。

然後拉薩爾進一步指出，工業和資產階級生產的進步、日益發展的分工的進步、由此產生的資本財富怎樣使中世紀的社會組織瓦解。這段歷史敘述基本上是以《共產黨宣言》為根據，不過它不是抄襲，而是獨立思考出來的。工業的不聲不響、不知不覺地進行着的變革抑制了土地占有的勢力。在法國爆發革命以前很久，革命就已經存在于社會內部。“先生們！所有的革命都是這樣。人們決不能製造革命。人們只能對已經在社會的實際關係中出現的革命給予外部法律上的承認並堅決地進行這個革命。要想製造革

命，是对历史規律毫无所知的、不成熟的人的愚蠢行为。正因为如此，要想压制已經在社会内部进行的革命，并想否定它的合法性，或者要想指責一个这样的社会或参加这一助产工作的个人是革命的，也同样是不成熟的、幼稚的。如果革命存在于社会之中，存在于社会的实际关系之中，那么它就必然要出头露面并且載入法令汇编。”摧毁了中世紀的行会組織，为自由竞争做好准备紡紗机就是活生生的革命。

在法国大革命中，资产階級，第三等級取得了同他的实际力量相适应的合法地位。起初它认为自己就是全体人民，它的事业就是全人类的事业。情况真是这样嗎？还是这个第三等級即资产階級内部还有一个它又想正式推开并置于自己的統治之下的第四等級呢？拉薩尔对资产階級这个概念做了如下的說明，市民階級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和今天都是由两个下层階級組成的，一个階級完全或者主要靠自己的劳动得到收入，在这方面完全得不到，或者只得到少数資本的支持，另一个階級占有大量市民階級財產，即大量的資本，在这个大資本的基础上生产或得到利息。这种大市民本身还不是资产者<sup>①</sup>。他在自己的房間里，为生活的安乐感到高兴，这是最簡單、最自然、最合情理的。只有当大市民不滿足于大量財產的实际上的安乐而想把这一事实变成政治統治的合法条件，大市民就变成了资产者。从这个意义上說，通过法国革命取得統治权的第三等級当然把自己看做资产階級，它把人民置于自己的特权政治統治之下。在中世紀，貴族把土地占有变成一切社会机构的支配原則，而资产階級則把資本变成这种原則。

拉薩尔通过許多类似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资产階級利用选

<sup>①</sup> 大市民，德文是 der Großbürger；资产者，德文是 der Bourgeois，——譯者

举的财产资格限制把纳税额从而把资本占有变成一个尺度，用它来规定被选进议院的权力以及个人参加国家政权的份额。它利用虽不是由它发明，但却由它发展成为一种空前的体系的间接税，给大资本创造了大地主在中世纪享有的免税权。这时，拉萨尔指出了下述做法的特殊矛盾和特殊的正义性，那就是把整个国家财政的需要都加在间接税上，即放在贫穷人民的身上，并把直接税变成选举权和政治统治权的标准和条件，在普鲁士一亿另八百万的整个国家开支中，直接税只占一千二百万这个很小的数字。拉萨尔说，遗憾的是，他的听众经常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体会到，没有资产阶级财产的人（不管他们在哪里以及怎样努力劳动）受到怎样的社会歧视。而且在许多方面，资产阶级还超过了封建贵族，它通过保证金和印花税把成年人的国民教育（这种国民教育在中世纪由教士进行，在近代由报纸进行），变成了资本占有的特权。

但是这个历史时期的气数也尽了，虽然从外表上还不大看得出来。“1848年2月24日出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曙光。这一天在法国爆发了革命。在法国的巨大的国内战斗中，自由的胜负意味着全人类的胜负。这次革命把一个工人送进了临时政府，它宣布国家的目的就是改善劳动阶级的生活，它提出普遍的直接的选举权，使每个二十一岁以上的公民，不论其财产状况如何一律参加对国家的管理，共同决定国家意志和国家目的。”如果说1789年的革命是第三等级的革命，那么1789年还藏在第三等级内部，好像同它是一个东西的第四等级现在就想把它的原则提高为社会的支配原则，使这个原则贯穿一切社会机构。拉萨尔完全根据《共产党宣言》的精神说，社会上的这个最后的最低的等级，被剥夺了继承权的等级不再提出而且也提不出法律上的或事实上的专门条件，在这个第四等级的内部不再含有新特权的萌芽，因此它同全人

類就是一回事。事實上它的事業就是全人類的事業，它的自由就是人類本身的自由，它的統治就是一切人的統治。誰把工人等級的思想稱做社會的支配原則，他就不會發出分裂社會各階級的叫聲，而發出調和、聯合和友愛的叫聲，這個叫聲自第一次從人民心裡發出以後，就永遠不失為真正人民的呼聲，從它的內容來看，即使它作為人民的戰鬥口號鳴響時，它還是一種愛的呼聲。

拉薩爾根據以下三點，把工人等級的原則看做是社會的支配原則：關於實現這個原則的正式手段，關於它的道德內容，關於它內在的國家目的的政治見解。

實現這個原則的正式手段是普遍的直接的選舉權。它不是防止一時錯誤的魔法杖，而是長期自動地消除它一時誤用所能造成的過失的唯一工具。它是自己把自己刺開的傷口醫好的投槍。長期下去，在實行普遍、直接的選舉時，被選舉的集團必然是選民的逼真的肖像。

工人等級的原則一旦進行統治，它的道德內容必然引起史無前例的道德、文化和科學的繁榮。很久以來，各族人民的發展，即歷史的呼吸趨向日益廢除保證上層等級占有作為上層和統治等級的地位的特權。因此上層等級的每個不能斷然用遠大的眼光完全超脫和無視個人存在的成員希望繼續保持特權和個人利益，這種願望一開始就使他在原則上同人民的發展，同教育和科學的傳播，同文化的進步，同歷史生活的一切呼吸和勝利處於敵對的地位。這種對立招致上層等級的嚴重的、必然的不道德行為。下層階級卻不一樣。雖然在它們之中還有很大成分的自私心，而且比應該有的要多得多，但是在有這種自私心的地方，它只是個人的缺點而不是階級的不可避免的錯誤。一種十分平常的本能告訴下層階級的成員，如果他們之中的每個人都只管自己，都只想到自己，他

就不能大大改善自己的处境。但是，只要社会的下层阶级致力于自己的阶级命运的改善，它们的个人利益按其方向来说就同全体人民的发展，同思想的胜利，同历史的生活原则即自由的发展完全一致。“它们是幸运的，因为构成它们的真正个人利益的东西同历史的脉搏，同道德发展的推动的生活原则相一致。”所以工人们能够以个人的热情献身于历史发展，而且可以肯定，这里所说的这种热情越熾烈，他们的道德水平就越高。

第四等级的国家观同资产阶级的国家观的差别同这一点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无非是保证每个人能够不受阻碍地自己发挥自己的力量。假如我们大家都一样强壮，一样伶俐，一样受过教育，一样有钱，那么我们可以把这种观念看做是充分的、合乎道德的。可是我们不是这样，也不可能是这样，所以这种思想是不充分的，结果就必然导致严重的不道德行为。因为它使较强的、较伶俐的、较富的人剥削较弱的人，把手伸到他的口袋里。相反地，工人等级的道德观念是，不受阻碍地、自由地发挥个人的力量还不够，还应该在一个合理组织起来的公共团体中增加利益的一致性，发展中的共同性和相互性！”同这个差别相适应，资产阶级这样来理解国家目的，即国家应该专门保护个人的自由和他的财产。这是一种更夫思想，“说它是更夫思想，是因为它只能把国家本身想像为一个其职能只是防止盗窃的更夫”。如果资产阶级愿意下断语，那么它必须承认，一旦盗贼绝迹，国家也就完全是多余的了。

第四等级对国家目的的看法却完全不同，而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历史就是同自然的斗争，是同困苦、无知、贫穷、无权以及人类在历史初期所遭遇的各种不自由而进行的斗争。不断地战胜这种无权状况就是历史所表现的自由的发展。如果我们各自为己、

各自为战地进行，或者想这样进行这个斗争，那么我们在斗争中就一步也没有前进，而且将来也不会向前迈进。国家的职能就是完成这种自由的发展，完成人类向自由的这种发展。国家是个人在一个合乎道德的整体中的统一，这种统一把集中在这个团体中的所有个人的力量增加了几百万倍，把他们所有的人作为个人可以随意支配的力量增加了几百万倍。”工人等级通过它的成员作为个人所处的困苦境遇有了深刻的感受，它认识到国家的任务是，而且必然是通过一切人的联合帮助个人达到他作为个人不能达到的发展。“一个被置于工人阶级的思想统治之下的国家，不会像所有国家至今已经做过的那样被事态的性质和环境的强制不自觉地，甚至有时勉强地推动，而是以高度的明确性和完全的自觉，把国家的伦理性质变成自己的任务。它将随心所欲地、十分彻底地完成至今只是在最狭小的范围内零散地从相反的意志那里夺来的东西，因此，它也必然会促成精神的跃进，幸福、教养、健康和自由的总的发展，这在世界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甚至过去最受赞扬的状况也相形见绌。”

拉萨尔把他这样阐明的一系列思想称为工人等级的思想，他由此得出结论说，工人有义务采取一种崭新的态度。“这种任务的世界历史性的崇高荣誉必然对你们的全部思想提出要求。被压迫者的不道德行为，没有头脑的人的懒散的消遣，甚至没有地位的人的无害的轻率行为对你们都不再适合。你们是岩石，现代的教堂就要盖在这块岩石上。”拉萨尔用壮丽的词句表达了这种思想，哪怕只有两三个听众身上燃起这种思想的烈火，他就认为是一项丰富的报酬了。他警告工人不要由于丧失勇气，由于怀疑而不再努力。在科学的高峰上比在下面日常生活的混乱状态中更早地看到新的一天的曙光。每一天的自然景象中的一小时，在世界历史的

日出的壮丽得多的景象中是十年或二十年。

拉薩尔在这个报告中，比在論宪法問題的报告中更多地表露出他的特点。材料的安排十分明确，邏輯推論謹严，語言动人，对无产阶级的深厚同情使报告明确而具有热情，它既沒有蠢惑者的冷靜的考虑，也沒有感情用事的人的伤感的激情，并且明确認識到无产阶级在現代资产阶级社会中必須解决的任务。这一切使得《工人綱領》按自己的方式成为一部偉大的杰作，正如《共产党宣言》按自己的方式是一部偉大杰作一样。可以說，拉薩尔的《工人綱領》是反映德国状况的《共产党宣言》。

由此也說明，它比《共产党宣言》片面，但是在这种片面性中也有它的优点。拉薩尔忽略了十七世紀的英国革命，忽略了在二月革命前很久就使普选权成为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的宪章运动，他忽略了英国的资产阶级的典型。可是由于拉薩尔把他的观察限制在法国和德国的发展上，他的叙述虽然或多或少片面，但是决不是不真实的。拉薩尔对事物的看法确实同他写的一样，所以沒有主观上的不真实性，他自己的教育过程和发展过程充分說明，为什么他对英国的发展总不如对法国和德国的发展关心。因为拉薩尔的观点在所及范圍內都是正确的，它所及的范圍很远，足以使德国工人明了，对他們來說現在和将来最重要的問題是什么，所以这个綱領在客观上也不是不真实的。在现实情况下，《共产党宣言》对德国无产阶级群众必然是一本难懂的书。按他們当时的理解程度來說，它至多只在德国工人阶级必然要走的历史道路上投下暗淡的光輝。相反地，拉薩尔的《工人綱領》虽然只給德国工人阶级指出这条道路的最初几站，但指得却十分明确。

拉薩尔在《工人綱領》中闡述的是资产阶级历史时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有决定意义的阶段。他只是在他自己认为很不重要的

報紙保證金和報紙印花稅這個問題上弄錯了。報紙保證金和報紙印花稅基本上是充當封建專制統治的工具，一般地受到資產階級的反對。他據以考察資產階級統治的那些極重要的特征肯定是適當的。英國資產階級在爭取改革法案的鬥爭中，法國資產階級在1848年的革命中十分頑固地維護選舉的財產資格限制。不論過去和現在，選舉權的任何擴大，都被這個階級看做是動搖它的統治，因此必須從它手里奪來。在普魯士，封建專制的反革命違反資產階級的意志，也不顧它的書面抗議制定了三級選舉制，可是在拉薩爾發表《工人綱領》的時候，資產階級早已認識到自己的暫時錯誤，並且通過更加熱愛有財產限制的選舉而彌補了這個錯誤。今天，德國資產階級對已有的普選權怎樣敵視以及怎樣頑固地防止它進入至今還不存在選舉權的地區，是人所共知的。

間接稅的情況與此相似。拉薩爾說，資產階級沒有發明這種稅，但卻把它發展成爲一種前所未有的體系，他所說的也就是馬克思在反駁蒲魯東的論著中已經說過的話：“消費稅只是隨着資產階級統治的確立才得到了充分的發展。”<sup>①</sup> 歷史事實完全証實了這種見解。有人反駁拉薩爾說，恰恰在普魯士，“資產階級”不負在十七世紀開征間接稅的責任，這種反對意見只有當它說在十七世紀沒有現代意義上的普魯士“資產階級”的時候，才是完全正確的。實際上在1667年的勃蘭登堡邦議會上，各城市違反騎士階級的意志，決定征收消費稅，它們說消費稅“既符合上帝的意旨也符合自然”。城市的代表請求他們可愛的國君，傾聽城市和鄉村中成千上萬人民要求減輕負擔的呼聲，在國內普遍征收消費稅以代替當時的直接稅，軍稅。反對拉薩爾的那個意見看起來越確切，它就越對拉薩爾有利。十七世紀的勃蘭登堡城市越是今天的資產階級的微

<sup>①</sup>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79頁。

弱的开端，它們对消費稅的热烈要求就越证明間接稅在資產階級历史时期的特性中扎的根是多么深。

当然，正如拉薩尔后来所說，在間接稅方面，只涉及“一种丰富的、鑲嵌式的材料”。爭取在其开征期間尤其也在背后处处損害貴族的封建捐稅免納权的間接稅的斗爭，既在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之間进行，也在統治階級与統治階級之間进行。王侯和容克不久就对間接稅发生了特殊的兴趣，而当它加强國庫力量和封建力量，对資產階級不利的时候，当它提高了土地稅，減低了資本利潤的时候，資產階級就激烈反对它。在这一斗爭中，資產階級經濟學收集了一大批武器来反对間接稅，这并不妨碍資產階級的实践以专门或主要符合自己階級利益的形式，通过消費稅把国家开支轉嫁到劳动階級身上。在拉薩尔的《工人綱領》論述这些事物的偉大历史联系中，毫無疑問間接稅在資產階級統治下已經发展成为一个前所未有的体系，成为資產階級历史时期的最基本的特征之一。

此外，考察历史发展的經濟基础也是《工人綱領》的一个优点。拉薩尔的意識形态在这里只好像是一張很薄的皮，通过它人們到处可以看到生命的鮮血在流动。他从中世紀的生产方式中导出封建的“原則”，实际上，把“工人等級的思想”解釋为无產階級的階級斗爭，甚至关于国家的論述，人們也只能从形式上而不能从內容上加以攻击。拉薩尔在写給布赫尔的信中，把建立一个新的团体——不是一个新的国家——称做原則的一个要求，在《工人綱領》中，拉薩尔不是根据国家的变革而是根据社会的变革来研究历史的运动。面对着当时支配輿論的曼彻斯特学派的关于国家的更夫思想，很有必要強調工人階級为了自己的解放需要国家。在这一点上，拉薩尔同《共产党宣言》完全一致，虽然他沒有补充說明，工人階級夺取政权将使国家化为社会主义社会。他沒有这样做的

理由很简单，那是因为《工人綱領》的任务是首先启发衰滅的或者根本还没有觉醒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没有必要推测拉薩尔不同意《共产党宣言》的那个结论，或者故意不提它。他十分强调，国家只有在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下才能完成它的文明的使命，而它至今只是不自觉地，在环境的强制下或者往往违背领导人的意志或多或少地完成这个使命。这就证明拉薩尔努力防止关于国家概念的任何导致错误的观点。

拉薩尔的这个报告似乎也没有立即产生巨大的效果。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竞选上。1862年参加选举的盛况在实行三级选举制时期是空前绝后的。听拉薩尔的报告的是进步党的最忠实的拥护者，而这个报告的目的决不是要他们在这次竞选中背离进步党，因此他们更容易忽视演讲人的更深刻的意义。报告的唯一实际要点，即对普遍、直接的选举权的要求，对他们来说大概也不是什么新鲜东西，因为当时柏林有一个国民选举协会，由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作家阿道夫·施特雷克富斯领导，在进步党内部为选举主张恢复普选权的候选人进行宣传鼓动。对进步党的领袖来说，这可能就是他们尽量不使人注意拉薩尔的异端的原因。他们决心赶紧解决普选权的问题，但却十分慎重地不让这个崇高的企图过分公开地表露出来，而采取闪烁其词，绕弯子的十分狡猾的策略。在这种催眠方法的影响下，施特雷克富斯领导的宣传工作不久也就停顿了。

政府对拉薩尔的报告的意义了解得比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深刻。同年6月，这个报告出版以后，国家检察官谢林立即下令加以没收，并雷厉风行地办理，在拉薩尔的住所里进行了既多余又非法的搜查。甚至对于一个普魯士国家检察官来说，利用普魯士刑法常有的富有弹性的法律条文，查禁严格科学性的学术论文，也是一

道难题，所以拉薩尔后来的估计是很有道理的，他认为他被选做替罪羊，政府要想牺牲他来同资产阶级和解。当时的首相海特一定很厌恶拉薩尔的《工人纲领》，看来他想通过对拉薩尔进行法律迫害，向资产阶级担保，只要资产阶级同意政府进行军事改革，政府就为它约束工人。没收拉薩尔的报告是一种权术性的救国行为，起先没有对他起诉这一事实就说明了这一点，这种情况在普鲁士司法界是十分罕见的，通常普鲁士的法官们在政治案件中总是尽力用迅速行动来弥补他们所缺乏的正确性。

这时进步党在选举中取得重大胜利，拉薩尔必须等待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必须等待资产阶级反对派表明它能否完成自己的任务。在这些日子里，他考虑了重新研究理论的可能性。他想写一本题为科学的国民经济学纲要的经济学著作。5月17日为了庆祝费希特诞生一百周年，他又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代表哲学协会发表了庆贺演说。在这个协会里，许多人主张学识是有特权的。当时它正对文化大臣米勒的不体面的选举阴谋感到十分愤慨，看来它想用选拉薩尔为致祝词人来表示抗议。无论如何，这一选择证明资产阶级集团对于拉薩尔至今的宣传活动还没有严重不满，关于费希特的演说和前不久在瓦列斯罗德的《民主研究》上发表的文章，标志着拉薩尔作为大众演说家和作家所达到的唯心主义的最后界限。可是两个著作之间存在着一个差别，那就是论费希特的演说按照它的任务必须在哲学的唯心主义的大地上活动，致贺词的人要想穿着费希特的服装，带着他的色彩，而论莱辛的文章则有些苦苦拘泥于按照一个十分平庸的现实主义模型裁剪的唯心主义结构。在论莱辛的文章里，拉薩尔似乎受到普鲁士民主派的不确当的特性的传染，这在他的著作中是绝无仅有的，而论费希特的演说表明他确实登上了古典哲学的高峰。同时这篇演说

也是他向古典哲學的告別詞。

1862年7月，拉薩爾到倫敦旅行，為自己的計劃努力爭取馬克思。可是他們沒有能夠取得諒解，此後他們的通信也就中斷，雖然他們並沒有真正決裂。後來，馬克思把他同拉薩爾的分歧總括了一下：拉薩爾受直接的時代條件的影響太深了。他選擇了一個小小的出發點，他把國家援助當做自己的宣傳活動的中心，同舒爾采—德里奇這樣一個侏儒所宣傳的自助相對立。這樣，他就只是重新提出了法國天主教社會主義的首領畢舍為了反對真正的工人運動而提出的口號。拉薩爾把憲章派的普選權口號同要求國家對協會援助聯繫起來。他忽略了，德國和英國的條件是不同的。他也忘記了波拿巴主義對普選權的教訓。他否認同以前的工人運動有任何自然的聯繫。他犯了蒲魯東的錯誤，他不是在实际的階級運動中尋找自己的宣傳活動的真實基礎，而是根據某種教條式的處方來規定這一運動的進程，因此他的宣傳活動就帶有宗派性質。<sup>①</sup>

這些反對意見的重要性，拉薩爾是不會認識不到的。可是這些意見沒有說服他，這是毫無疑問的，因為他受“直接的時代條件”的壓力太大。那麼現在還剩下一個問題，就是誰對德國的這些條件了解得比較正確，是馬克思，還是像在1859年歐洲危機時期那樣，是拉薩爾？這個問題又匯合成另一個問題，即普魯士資產階級怎樣同王室和容克階級進行鬥爭。

<sup>①</sup> 梅林此處指卡爾·馬克思於1868年10月13日致約·巴·施韋澤的信（參閱《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28頁。——譯者）。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拉薩爾的批判的其他重要總結載：卡爾·馬克思1865年2月23日致路德維希·庫格曼的信（同上書第175—180頁）；卡爾·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以及恩格斯論哥達綱領的信）；恩格斯1891年2月23日致考茨基的信（《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76—479頁）。此外，馬克思和恩格斯之間的通信中有許多地方談到這個問題，比如1862年8月7日的信，1865年2月13日的信等等（見《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原編者

#### 四 资产阶级退出政治舞台

1862年秋天，拉萨尔回到柏林的时候，普鲁士的宪法纠纷达到了顶点。10月13日，政府结束了邦议会的会议。事先，众议院根据宪法第九十九条宣布，政府规定一项已被众议院的决议明确地、最终地否决了的经费，那就是违反宪法。贵族院否决了众议院建议的预算（它有权这样做），而通过了政府所提出的预算（这是公然违反宪法）。政府终于宣布，众议院根据宪法第九十九条得出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修改宪法的议院已经明确拒绝按照现在众议院所喜欢的精神解释这个条文。更确切些说，在讨论宪法时，明显地留下了一个问题，即如果任何预算案都得不到三个立法因素的一致同意，那么怎么办。因为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出现，所以政府无论如何必须维持现存的国家机构，也就必须确定被众议院否定的、用于事实上已经进行的军事改革的经费。

这时，俾斯麦毫不隐讳，他对这场纠纷一点也不感到高兴。作为一个实际的政治家，他清楚地知道，钱包的钥匙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全国都反对他，在他认为真正重要的问题上，连王室和容克也不支持他。他按照他的容克本性，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大胆行动。当时他也像后来任何时候一样不了解，由于这些挑战行为，他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强了他想克服的阻力。他也立即施展了他的波拿巴式的伎俩，同时向资产阶级摆出一副笑脸一副苦脸。这时人们终于对拉萨尔的《工人纲领》进行毫无意义的控诉了，说他公然煽动没有产业的阶级仇恨和蔑视有产阶级，而无产阶级中有些可疑人物散布普鲁士王国政府对工人阶级友好的奇谈怪论。可是俾斯麦并不隐讳，他宁可今天而不愿明天同资产阶级和好。他“抱

怨”必須“掌管沒有在憲法中奠定基礎的國家經濟”的狀況。他不遺余力地同他稱之為立憲制的靈魂的進步黨求得妥協。他認為事實上憲法並不限制三個立法因素確定預算的權利。這三個立法因素依賴相互間的讓步。只有當一個部分由於“偏狹的專制主義”拒絕任何和解時，掌握權力的部分才必須按照自己的意志前進，因為國家生活是一刻也不能停止不前的。

不管俾斯麥的立場遭到怎樣的反對，可是他也有一件功勞，就是把爭論的問題看做是一個現實的權力問題，這是符合實際情況的。不管人們怎樣為資產階級反對派辯護，可是它總還有一個缺點，就是把爭論的問題看做是一個形式的法律問題，這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進步黨仍然為憲法大叫大嚷，好像憲法是一件受到空前的陰謀加害的聖物。它把普魯士憲法描繪為一個還沒有受官僚和容克凌辱的純潔的處女，這種虛構需要一種比瑪麗亞無垢受孕的教條更堅強的信仰。同時在反對政府的資產階級中產生了一種認為俾斯麥的妥協論不無可愛之處的傾向。這種傾向在資產階級的議會前衛中比在它的經濟—政治勢力集團，民族聯盟和國民經濟會議中弱一些。顯然，在衝突尖銳化以後，就不能再通過妥協攫取一部分政權，但是關於資產階級的物质利益，俾斯麥是會充分考慮的，這總是一件相當重要的事情，在某些情況下是很重要的，而對資產階級中的一大部分人來說，這就是一切。

這時，拉薩爾用他關於憲法問題的第二个報告：怎麼辦？來澄清這種混亂狀態。他第一次在1862年11月，後來又在以後的幾個月里陸續在柏林的許多市區協會做了這個報告。他可以有根據地說，事實已經充分證明他第一個關於憲法問題的報告的理論是正確的，憲法糾紛表現為一個實際的權力問題。現在必須從正確的理論中得出保證人民勝利正確手段，事實的確是這樣。

首先必須正确地提出問題。如果有人問，怎样才能維護确定的普魯士憲法，這就是錯誤地提出問題。對這個問題不能作答，就像對通電流能否使一個屍體復活這個問題不能作答一樣。維護有着無數后門的普魯士憲法對人民沒有什麼好處。憲法糾紛提出的正確問題還不如說是：怎樣能使人民的絕對權利，即批准預算的權利發生效力？甚至這個憲法也承認這個權利，不管什麼時候，在將來的所有憲法中也應該包括這個權利。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拉薩爾首先指出不能選擇哪種手段，不管這些手段表面上怎樣可取。他說，許多人考慮到拒絕納稅。但是這個手段只適用於已經掌握實際權力，已經坐在要塞里的人民，如英國人民，而對只有一個成文憲法，剛想占領要塞即實際權力手段的人民是完全不起作用的。1848年的柏林議會由於在這方面缺乏明確的理論，而歸於滅亡。在剛想奪取實際的權力手段的人民中，拒絕納稅只有在下述情況下是有意義的，那就是它被用來發動一個普遍的起義，這在當時的條件下自然是辦不到的。假如1848年，柏林議會繼續堅決行動，發動全民起義，起義當然就會勝利，當時的拒絕納稅也就是聰明的舉動。可是大家知道，由於翁魯所發明的消極抵抗，這件事沒有能夠實現，這是一個痛苦的回憶。

如果這個手段不適用，那麼議院仍然有一個不可抗拒的勝利手段，就是它說出真實情況，換句話說，就是摧毀假立憲，沒有這種假立憲，專制政權就不能維持較長的時期。專制政權清楚地知道，資產階級的社会勢力遠遠超過自己。它也清楚地知道，它不能坐在刺刀尖上過日子。不管它的態度怎樣粗暴，它也決不滿意同社会力量對比存在明顯矛盾的不可靠的存在。因此，它需要假立憲盡量長期地延續自己的壽命。

拉薩爾用下面一段話來說明假立憲的本質：“專制政權頒布了

一个宪法，在这个宪法里，它把人民及其代表的权利降低到极小的、没有任何实际保证的程度，通过这个宪法，它一开始就剥夺了人民代表对它采取独立地位的可能性和欲望。議員使人民反对政府的意志发挥作用的任何企图，专制政权都用議會制度这个名詞加以譴責，就好像任何真正的立宪政权的实质不是确实存在于議會制度中，而且仅仅存在于議會制度中似的。一旦人民代議机关决定进行一个独立的、同政府的意志不符的表决，专制政权就在骨子里把这一表决看做是好像沒有这回事，但始終不肯放棄立宪制形式的外部裝飾。”不难看出，拉薩尔是根据普魯士的情况对假立宪制作这番符合实际的叙述的。

假立宪不是人民的成就，相反地，是专制政权的成就，它大大延长了专制政权的寿命。专制政权用它不加隱蔽的旧形式不能长期經受同整个社会状态处于明显的、公认的对立的緊張状态。他用立宪制形式的空虛外表掩盖这种对立，使这种对立緩和、減弱、无声无臭。面对这种謊言及其权力，唯一有效的絕对的手段就是揭发这种謊言，强迫政府放棄掩盖物，在公众面前露出专制政府的本来面目。因此，根据政府繼續动用被議院否决了的軍事改革的經費这一情况，議院在开会以后應該立即决定，无限期地延长它的会期，也就是延长到政府证明被否决的經費已不再使用为止。

这样，政府就被打敗了。如果它解散議院，新选出的議員也会提出同一口号，新議院会立即发表同一声明。长期沒有議會，政府不能进行統治。看一看欧洲，就知道除去俄国以外（俄国的社会状况同其他国家确实大不相同），所有国家都实行立宪制。甚至波拿巴和哈布斯堡专制政权也不能缺少假立宪制。难道恰恰是有着强大的資產階級的普魯士可以沒有立宪形式而存在嗎？这是决不可能的。政府同本国人民存在公开的、持久的矛盾，不在任何糾紛中

被其他政府高傲地、令人难以忍受地踩几脚，它就不能执行外交政策。拉薩尔否认这是一种不爱国的議論。同自然科学家一样，政治活动家也应该考察一切情况，考虑一切实际力量。如果不是自古以来各政府之間的妒嫉和对立就是一个强迫它們在国内求进步的有效手段，世界还会处在什么样的野蛮状态，这是几乎完全不能想像的。而且德国人的生存也不具有这样不可靠的性质，以致他們政府的一次失敗也包含着民族生存的真正危險。在一次大規模的对外战争，个别政府，如薩克森政府、巴伐利亚政府、普魯士政府可能瓦解，但是德意志人民将会像一只长生鳥那样由灰复生。

同样，由于国内的假立宪制遭到破坏，政府也就瘫痪无力了。拉薩尔談到賦稅負担的急剧增长，然后作出結論說，一个必須制定这样一个預算的政府，一个經常把手伸到每个人口袋里的政府，也就必須至少造成得到每个人同意的假象。他把說出事情真相叫做最有力的政治手段，正如費希特已經证明的那样，老拿破侖利用这种手段取得了巨大成就。一切偉大的政治行动都在于說出事情真相并由此开始。一切政治上的淺薄都表現在隱瞞和掩盖事情真相。与此相联系，拉薩尔严厉批評了新紀元时期的盲目信任，在这些日子里，政府企图以实行立宪制欺騙“人民党的領袖”，但只是欺騙了人民，給假立宪制开辟了道路，最后提出了軍事方面的要求。

但是，拉薩尔就这样結束了过去的和平这个偏向。只是在現在的艰苦斗争中，必須更热心、更严格地注意不再让欺騙的政策夺去人民的权利！选民应当通过不断的宣傳活动强迫議員采取这唯一可以胜利的策略。議院利用繼續开会这个办法不能制服政府。如果議院的第一次无疑合乎宪法的否决被踐踏了，那么第二次、第三次乃至第四次否决也就不可能有較好的命运。政府和人民将会只习惯于把議院的不受欢迎的決議看做是沒有公布的。更坏的恐

怕就是妥協。根據事態的發展，立憲的基本問題首先是：政府已經被迫停止使用議院所否決的經費了嗎？在這種情況下，妥協不是一種和解，而是完全放棄公共權利。

拉薩爾最後說，他的手段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是沒有壞處的。如果它不起作用，那麼議院的延長會期就更不起作用，只會使政府能繼續扮演假立憲的喜劇，使人民的思想發生混亂，並且像任何以謊言為基礎的統治制度一樣，破壞人民的道德。但是這個手段也是沒有危險性的。要使用它，只需要明智和毅力，決不需要很大的勇氣。對於罷工的議員，國家檢察官和法庭都沒有辦法。在最壞的情況下，他們必須在一定的時期內放棄重要的官職。也許政府有一些時候仍然頑固，可是這對人民大有好處。如果後來政府不得不讓步，它在人民的威嚴面前就更加恭順，它就更加承認資產階級的社会力量是超過它的力量。“先生們！那時就沒有調和的幻想了。現在你們積累了充分的經驗，可以看到舊專制制度是什麼東西。然後就不同舊專制制度進行新的妥協，而是使它屈服！”

大家知道，拉薩爾建議的策略沒有經過實際試驗，所以對於這種策略議論紛紛。它所引起的反對意見，差不多有十分之九是由於批評者沒有正確理解拉薩爾的思想所致。特別有才氣的是最常提出的反駁：雖然發生了憲法糾紛，可是俾斯麥仍然勝利地進行了對丹麥和奧地利的戰爭。如果拉薩爾事先已經指出，同他的建議恰恰相反的策略不會削弱政府的力量，而實際情況也是這樣，當然他就遭到了出色的反駁。這些批評家應該考慮一下，為什麼俾斯麥在他全綫勝利以後，在1866年7月3日整編好的軍隊摧毀了奧地利—薩克森的軍隊，普魯士的選民打垮了議會的反對派以後，他不顧容克的強烈反對，提出追認沒有預算的政府的問題，並且特別通過對外交政策的考慮來說明他的願望。另一種反對意見的才

气也不很小，这种意见认为：即使众议院根据拉薩尔的意见行事，政府还掌握着一个装备很好的机器，可以通过解散、竞选以及各种行政压力终于使反对派屈服，經常保持假立宪的形式。拉薩尔在自己的报告中的許多地方已經強調指出，政府利用这些手段还可以使自己的投降推迟一些时候，同时拉薩尔也正确地把这种情况看做是一个好机会。他所主張的只是像当时的进步党那样說大話的，的确也得到全国支持的反对派不應該“屈服”。如果进步党人不是像拉薩尔所认为的那样严肃认真的人，那么就更坏了！于是就更有必要建立一个工人党。四十年来工人党就指出，一个真正的反对党能够經受同当时俾斯麦用来对付进步党的微不足道的詭計大不相同的东西，而不“屈服”。

不管人們如何公正地无視这些目光短淺的反对意见，但是还有一个对拉薩尔当时的策略的評論值得考虑，这个評論的正确或錯誤使人对拉薩尔同进步党之間的关系有迥然不同的理解。社会主义方面有人說，如果尽快地引起一次革命，拉薩尔的行动就是正确的，同时拉薩尔也就被确定为一个革命者。但是，如果进步党从它还不想或者根本不想进行革命的立場出发，拒絕拉薩尔的建議，那么我們也不能說进步党不对。在直接的后备軍中沒有革命，自願放棄議會讲坛并不比有名的消极抵抗更有意义。因为拉薩尔从相同的推論出发，反对拒絕納稅的临时計劃，所以他在自己的建議里就不可能有这样一种隱意。还不如說，他的真正看法是，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可能发生革命。他同进步党之間在这一点上，也同在拒絕納稅問題上一样沒有意見分歧。过了一些时候，当約翰·雅科比提到这种想法时，进步党最有威望的領袖瓦尔德克完全根据拉薩尔的精神宣称，为了能够有效地拒絕納稅，人們必須有像約翰·汉普敦当时的机构，尤其是要有在法庭上反对强制征稅的可能性。

拉薩爾的建議仍然停留在資產階級可能性的基礎上。它是完全適合資產階級的內在本質的。拉薩爾是善于從歷史中學習的少有的人中的一個。他的要求並不高于四十年代的普魯士資產階級能夠以差強人意的成就和態度做到的事情。要求特維斯騰和瓦爾德克在六十年代有利得多的條件下做康普豪森和漢澤曼在四十年代做過的事情，這並非過分。把拉薩爾的策略用一句明確而通俗的話總括起來，他不過是要求資產階級堵塞專制政權的財源，使它就範。自古以來，原形畢露的普魯士專制主義在歐洲的貨幣市場上的信用小得可憐。兩三年以後，恩格斯寫道：“這些先生們”——指歐洲的金融巨頭——，“只貼現有兩個簽名的支票，如果除了政府以外只有貴族院沒有眾議院簽字，或者只有一個做擺飾的眾議院，他們就把這看做是使用空頭支票，不做這筆生意。”<sup>①</sup>這正是拉薩爾的建議的真正核心，資產階級按照拉薩爾所提的辦法，可以十分可靠地逼迫專制政權投降。

即使沒有這種可靠性，拉薩爾說他的計劃還是比相反的策略符合資產階級反對派的利益，這也是對的。關於這一點，最好是从反面來證明。拉薩爾所預言的議院延長會期的不良後果字字應驗了。眾議院妄想通過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的否決打垮政府對第一次否決的反抗，這就使得議會批准預算的權利完全成為幻想。像拉薩爾所預言的那樣，人們只慣于把議院的不受歡迎的決議看做是沒有公布的。亨·伯·奧本海姆——從1848年起他就是盧格的追隨者，憲法糾紛時期他是進步黨承認是它可謂“科學的”機關刊物的《德國年鑑》的主編——關於這一點寫道：“討論預算不久就成為一項空洞的、幾乎可笑的工作，因為政府在軍事費用以外的其他

<sup>①</sup>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普魯士軍事問題和德國工人黨》，載德文本《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德國史》第2卷第824頁。

方面也不考虑第二議院的否决（比如在秘密基金方面），貴族院当然否决了修改的預算案，公然違反宪法，恢复了政府的提案。这种情况甚至对于會議的严肃性也有不良影响。国家生活的最现实的职能被貶低为一种空洞的示威。人們从这一点出发，越走越远，以为自己是在执行議会的职能，比如人們毫不犹豫地不断向受到鄙視的大臣递交請願书，請他了解、考虑甚至解决他們的疾苦，向大臣說明自己的願望和希求。”《德国年鉴》不过是說，議院可以“在这种情况下避免受到不体面的和可笑的咒罵”，因为它利用一种“天真的形式主义”，利用“作为法律假定的、在有次序的議會活动中的坚持”，“摆脱”一种存在的内在矛盾，人們对于这些矛盾的基本条件不断发生剧烈爭論。但是不久事实证明，拉薩尔由于这种“天真的形式主义”（他虽然比較不客气，但比較正确地称它为实际情况的“歪曲”），有理由担心民族精神的混乱和民族道德的墮落。

还不到一年功夫，資产階級反对派内部态度比較严肃，思想比較深刻的人就对进步党的行为感到憤慨，进步党在它軟弱无力的抗議和決議中表现为一个能够像折断草莖似的折断普魯士刺刀的巨人。不仅是像布赫尔、雅科比、洛貝尔图斯、齐格勒这些对 1848 年事件有些了解的政治活动家相当强烈地反对进步党的政策，而且較年輕的人物也是这样，比如阿尔伯特·朗格不久就看到，进步党在冲突的真正要点面前，在同王室的斗爭面前吓得后退，再比如亨利希·馮·特賴奇克在进步党議員的獅皮下面发现了性情最溫和的正直人，这些人明天可能成立一个社会拯救委员会，可是后天他們就会以賢人的平靜心情过隱退生活，繳納捐稅并在猎兵面前脫帽。还不到两年，进步党的比較激进的报纸，如《萊茵报》和《柏林改革报》一本正經地宣称：“現在我們对于庄严的抗議已經厌倦了。发表演說和做決議在全德国連一片枯叶也动不了”，甚至最流

行的自由主义的报纸，如《爱北斐特报》和《布勒斯劳报》也嘲笑“通常，当他們囊囊地走上可爱的讲台的时候还不知道自己要說什么的空談家”。对进步党进行批判的决不是拉薩尔一个人，他十分尖銳地看穿了欺詐行为，他只做历史进步的必然性在这种情况下所要求的事情，同时使工人阶级不再追随这个有趣的资产阶级政党。其他批評家做必要的事情不是迟緩就是拖延（如雅科比和朗格），或者終于陷入进步党的泥淖里（如齐格勒），或者投靠至少准备送給他們一小块統一的俾斯麦（如布赫尔、洛貝尔图斯和特賴奇克）。

拉薩尔的建議很明确，至少可以使柏林的选民，甚至进步党的議會党团大吃一惊。这一次不能再緘默不言了。1月10日，《人民报》对拉薩尔进行了攻击，虽然没有指名，可是它那毫无事实根据的攻击更为可恶，同时显然是害怕这一回有人听拉薩尔的話。1863年1月13日，邦議會开会的时候，东普魯士議員馬丁尼真地把拉薩尔的建議作为提案在进步党党团中提出来，至少有一个时期，意見似乎是不一致的。下述事实清楚地說明了这一点：《改革报》和《福斯报》于1月13日和16日刊登了拉薩尔对《人民报》的攻击的尖銳反駁，并且以对拉薩尔頗有好感的精神报道了1月16日由于《工人綱領》而对拉薩尔提起的轰动一时的控訴。可是后来进步党議會党团除了馬丁尼一人以外，其他人一致否决了他的提案，馬丁尼在发表了一个相当有根据的声明以后放棄了自己的議席。1月27日，施韦林伯爵公开曲解俾斯麦的发言，在众議院声称，在普魯士哪一次都是法律胜过权力，而不是权力胜过法律，这时进步党用无休止的欢呼来欢迎在伯爵嘴里三倍沒有意义的长篇发言，这一欢呼，暴露出它准备大踏步地走向毀灭的心願。

促使进步党否决拉薩尔建議的原因很多，但是大体上可以总括为三个方面。首先是議會迷这种病症全力反抗。拉薩尔知道他

在跟誰打交道，他在自己的建議中对进步党議員說，在实行他的策略时，不必有性命之忧，这种策略要求他們作出的唯一牺牲——暂时放棄官职，并不怎么困难。可是对充斥于进步党之中的真正的庸人來說，官职就是一切，他們决不让“拉薩尔先生”碰一碰这个宝贝。令人遺憾的是，他們得到头发理得很好的被进步党报纸称为“民主派的盔上羽毛”的瓦尔德克的有力支持。瓦尔德克自从1849年被控叛国以后，成了对于拉薩尔的建議最感兴趣的比較激进的小资产階級集团的最有名望的人物。可是正是这场官司使普魯士王国民主义者瓦尔德克受到了永远不会完全痊愈的創伤，起初他还怀疑进步党政策的正确性，可是这个創伤的剧烈疼痛很快打消了他的怀疑。如果說瓦尔德克在1848年就把議會議席变成了大祭司的职位，那么現在他就以妒嫉、怀疑的心情保护党团，反对一切外来影响，比如他相反地要求，議員在議院以外不要进行公开的政治活动。瓦尔德克比任何人都坚决地声称：“我們繼續討論而不考虑后果，我們让上帝和人民来决定后果。”先同人民一刀两断，然后又把人民尊为对人民代表的一切愚蠢行为應該負責的最高裁决者，毫無疑問这是議會迷的頂峰。可是瓦尔德克到底是个老实人，后来他克制了高傲自負甚至痛心地承认，进步党把“拉薩尔先生”看做一个愚蠢的青年，这是一个很大的錯誤。

使进步党对拉薩尔的建議充耳不聞的第二个，也是比較深刻的原因是它的妥協性。它把“从貝克尔到施韦林”的一切反对派分子都团结在一个“密集的方陣”之内，这是它引以自豪的一件事。只可惜，从前的共产主义者貝克尔和頑固的君主主义者施韦林在上面并肩前进的道路是不存在的。拉薩尔說得对，他的策略虽然不要求特殊的勇气，但却要求毅力和明智，而进步党絲毫也沒有这两种特性。正如阿尔伯特·朗格所說，进步党的著名的“团结”在于，

它的优秀分子互相拆台。进步党的报纸狡猾地声称，拉萨尔宣传无所作为，而进步党的大人物则想采取实际行动。这种颠倒黑白的说法丝毫也不能改变下述事实，即进步党这个混杂的组织不可能采取拉萨尔要求它采取的实际行动，而它永远也不停止的演说才是无所作为。为了使整个集团始终不致背离自己的旗帜，进步党在每个紧要关头都降下这面旗帜，它“不屈不挠地”离开正路越来越远，在泥沼里越陷越深。进步党的领袖们说，他们能够做出最英勇的行动，但是人民还不够“成熟”，不能对这种英勇行为作出正确估价。在他们仓皇退却的情况下，这种说法听来就更加可笑了。

进步党反对拉萨尔的第三个，也是最深刻的原因（虽然它懂得一点也不强调这个原因）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对立。横亘于四十年代的资产阶级同六十年代的资产阶级之间的，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开端。从资产阶级立场来看，拉萨尔的建议是不可攻击的，他提出普鲁士宪法问题并论及它的根源，他不仅要求归还资产阶级被夺去的权利，也要求归还无产阶级被夺去的权利。可是进步党人做梦也没有想到把封建专制反革命诈取去的工人的权利归还工人。正是由于这些权利被人巧取豪夺，因此工人仍然喜欢普鲁士宪法。拉萨尔在谈到这面“残破旗帜”时所用的轻蔑方式，他的公开声明——同专制主义的跳舞必须从头再跳一回——使所有资产者的心中充满不可克服的厌恶。

对拉萨尔进行真正猛烈反击的是翁鲁。1862年12月22日，即拉萨尔发表他的演说的同时，翁鲁率领一个代表团向柏林进步党议员递交了一份有四万人签名的感谢信。翁鲁说：“但愿敌人們不想忘記或隱諱，我們現在的选举法是1849年5月制定的，也就是在1848年的国民議会被解散的时候制定的！1849年1月由普选权产生的第二議院在同年4月就被解散了。当时反动派取得了普遍的

胜利。选举法不是由議院的決議产生的，而是解散上述两个人民代議机关的曼托伊費尔內閣根据国王的命令頒布的。三分之二的选举人由納稅最多的第一等級和第二等級选出，而这两个等級共总只占总选民人数的十分之一。由富豪构成的这个少数派对选举起决定作用。如果由这种选举产生的众議院不仅得到有产階級，而且也得到不太富裕的人們，甚至也得到居民中靠双手劳动的人們的支持，那么这就充分证明在全体人民中产生了一种罕有的一致。”扯得真远，說得真好。人們也許應該期待翁魯得出这样的結論：既然无产階級这样勇敢地維護資產階級的被取消的批准預算权，那么資產階級也應該同样勇敢地維護无产階級的被取消的选举权。可是事与願違！因为当时瓦盖納和其他反动分子为了吓唬資產階級而玩弄普选权思想，所以翁魯繼續說：“根据宣过誓的宪法第一百十五条的明确內容，1849年5月30日的选举法令——就是翁魯本人认为非法的，根据三級选举制頒布的法令——成了宪法的不可缺少的部分；对于以命令形式公布的选举法的任何修改不可否认都是違反宪法。我們不能认为政府在完全安靜的、严格遵守法令的人民面前，会建議采取对普魯士的法律意識和权力地位有这样严重后果的步驟，我們深信，国王陛下不会接受这种建議。”狡猾的政客和坚决的反对派領袖翁魯在这里成了一个神秘主义者，同他的瘋狂的幻想相比，整个反动的浪漫主义都黯然失色了。“国王陛下”的誓言顛倒了是非。普选权是正当的，它被三級选举制不合理地取消了。但是，因为“国王陛下”把不正当的三級选举說成是正当的，所以正当的普选权就不得不将就成为不正当的权利。假如翁魯的演說不是全文登載在当时进步党的报纸上，透过几十年的灰尘还閃耀着听演說的議員流出的感动之泪的潮湿的光澤，人們就可能认为它是一个非常恶毒的諷刺家对进步党当时的

政策进行的一种諷刺。可是实际上它并不是什么諷刺，还不如說它是从資產階級内心发出的叫喊。它同时指出，即使进步党是一个原則明确的、沒有被議會迷这种病症感染的政党，也不会接受拉薩尔的建議。資產階級只打算在无产階級的帮助下把宪法糾紛进行到适合它单方面的階級利益的程度，一步也不肯多走。它宁願同“国王陛下”妥协，也不願分給工人一份他們所期望的胜利果实。“用双手劳动”的階級應該为有产階級火中取栗，然后再走开，就像履行了义务的黑奴那样。

拉薩尔一直到最后一刻还为資產階級把門开着。他在1月16日的辯护发言中还說：“我們資產階級和工人都是人民的成員，在反对我們的压迫者方面是完全一致的。”进步党却不是这样。当它作出决定以后，它就力图利用“拉薩尔同俾斯麦志同道合，他要求先权力后法律”这个既恶毒又幼稚的謠言，破坏选民对拉薩尔的建議产生的好感。拉薩尔企图反駁这种不光采的中伤，可是这时《柏林改革报》和《福斯报》也不肯登載他的文章了。“封住嘴巴，禁止发言，压迫一切不合进步党心意的人”——正如拉薩尔沉痛而又真实地所說，現在資產階級及其机关报的策略又变成这样了。拉薩尔設法把那些報紙拒絕发表的抗議印成了独立的傳单出版，傳单的标题是：权力和法律。对他來說，要证明历史研究不是倫理学論文是很容易的。他說明，先权力后法律，以及为什么是这样，可是当他列举事实的时候，他一个字也沒有提到同这个证明毫不相干的問題，根据他的主观意識應該是这样的，他在應該先法律后权力这一点上，例外地同施韦林伯爵和《人民报》意見一致，但是只有老民主派有权利談論法律，因为老民主派从沒有同权力妥协过。施韦林伯爵、翁魯先生、《人民报》沒有这种权利，因为他們参与或者粉飾或者事后认可一系列的破坏法律的行为。他們牺牲法律，希望

在这场买卖中得到一点权力，但是除了受践踏以外，从权力那里没有得到任何东西，这是理所当然的。

任何叛卖政策都使自己的主谋者承担最严重的后果，这一次也不例外。如果进步党不愿把宪法纠纷当作一个历史的权力问题，而愿意当作一个形式的法律问题来处理，那么它就必須回到 1848 年 4 月的法案上去。这些法案只是资产阶级的法，是为了从无产阶级手里夺取三月革命的成果而拼凑起来的。马克思在 1849 年就从革命立场出发反对过它们，拉萨尔后来也只是为了说明进步党的不彻底性才提到它们的。但是从进步党的立场来看，它们是形式的法律，而且仅仅是这种东西。因为随着它而来的解散柏林议会、钦定宪法和三級选举制都是违反宪法的行为，这些行为不可能由于由三級选举产生的议院事后认可它们，而成为形式的法律。从形式的法律观点来看，普鲁士宪法（正如拉萨尔后来再三说过的那样）連一天也沒有合法地存在过。

但是进步党不愿回到 4 月 6 日和 4 月 8 日的法案上去，虽然这些法案最确凿无疑地承认人民代議机关有批准預算的权利。因为这些法案也承认普遍的，虽然是間接的选举权，它们也承认无限制的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进步党根本不想触及反革命对工人阶级施加的不正当的暴力行为。它的不幸是，当它为了欺騙无产阶级企图紧紧依靠法制基础的时候，它自己失去了脚下的可爱的法制基础。在普鲁士宪法里，从它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从它经过修改宪法的议院討論，并得到国王承认的情况来看，确实存在那个“缺口”，俾斯麦用它来偿付宪法纠纷的理論費用。如果普鲁士宪法的精神和文字起决定作用，那么众议院的批准預算的权利就是可疑的，正如根据 1848 年 4 月 6 日的法案这种权利是不可侵犯的那样。修改宪法的议院曾經明确拒絕按照这个法案的精神解釋宪法第九十九条。

它們故意使這個問題成為懸案，因為三個立法因素不能對預算法案取得一致意見，就必然發生這種情況。俾斯麥根據普魯士憲法有理由說，他的沒有預算的政府雖然不符合憲法，但也不違背憲法。資產階級企圖用來欺騙無產階級的“法”就是給專制政權的純利。

於是普魯士的，在歷史上也可以說德國的資產階級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退出了政治舞臺。由於害怕無產階級，它又避免同國王和容克進行決戰。儘管它企圖用這種豪言壯語使自己看不見它的政策的結果，可是這些結果並不因此而不一一顯露出來。自從四十年代以來，德國資產階級就放棄了爭取政權的鬥爭。它滿足於以無恥的自私維護本階級的物质利益，也許從國王和容克手裡竊取或騙取一點點政治統治權。如果資產階級之中的一個人能夠鑽進內閣，他就認為他的首要任務是，做國王的最忠實的臣僕，到了無可奈何的時候甚至做容克階級的最忠實的臣僕，比如從米凱爾的光輝範例上就可以看到這一點。毫無疑問米凱爾還是德國資產階級中政治上最明達的人物之一。

這種發展對拉薩爾肯定不是一種失望。因此他的政策也是正確的。只要能同資產階級合作一天，他就堅定不移地執行這種政策。只有當資產階級經常表現出不能同專制制度和封建主義進行清算的時候，當它因為想同專制制度和封建主義一起壓迫工人階級而不想完成自己的歷史任務的時候，工人階級才有理由採取獨立的政策。事實本身在拉薩爾的政策上打上了印章。在資產階級扯去了掩蓋自己的內在本質的最後面紗的同時，工人階級中發出了頭幾次呼聲，宣告工人階級準備而且能夠履行本階級的歷史權利和歷史義務。

在德國資產階級退出政治舞臺，放棄了人民的權利的同時，德國無產階級拿起人民的權利，宣布了自己對政權的要求。

## 注 釋

### 第 二 部

当这部著作出第一版的时候，还没有人根据社会主义发展的观点，论述从三月革命爆发到拉萨尔《公开的答复》发表的这一时期，而且在这部书出版以后到现在也还没有第二个人这样做过。某些资产阶级批判家对于我这样详细地叙述革命和反革命的年代感到不解，并带着一种天真的惊奇的神情问道，普鲁士的宪法纠纷同社会主义又有什么关系呢？但是我可以有根据地说，另一种批评家十分了解我的意图，并且完全同意我的看法，他们特别称赞的正是我的著作的这一部分。除此而外，我只是把我这样做的理由（已在第一版的注释中提到过）重复一遍。

#### 德国革命的阶级斗争(第3--94页)

即使这样简要地论述德国革命时期的历史书，过去也没有见过；在这一方面我参考了布罗斯著的《德国革命》，1892年斯图加特版(Blos, Deutsche Revolut., Stuttg. 92)。论述1848年革命的资产阶级文献大多不能用，尤其是那种教授文献，歇尔的轰动一时的庸俗小说也是如此。A. 伯恩斯坦《人民的年代》，1875年柏林版(A. Bernstein, D. Jahre d. Volkes, Berl. 75)，虽然不是阿諛的、反动的，但有资产阶级的局限性。按照我的目的，主要问题是仔细研究文书资料 and 同时代的资料，寻求一切能够说明德国社会民主党后来的发展的材料。如果不用批判的眼光，深入革命年代的阶级斗争之中，就决不可能正确地理解这种发展。尤其是，只有用这个办法才能对拉萨尔及其宣传活动作出详尽而公正的评价。当然我要感谢《新莱茵报》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事后关于德国革命所写的一些文章给我的很大帮助，读者可以特别参考马克思《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①（德译者考茨基，1896年斯图加特

① 見本卷第二章第四节第132頁原編者注。 譯者

版)。但是我必須把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簡要地或者完全沒有接觸到的許多問題加以說明。在革命年代的其他報紙中，我看了《國民報》和《福斯報》，在工人報紙中，我看了《人民報》、《結義報》、《孔柯迪婭》和《普羅米修斯》，這些報紙都不全，有的多些有的少些。麥克斯·庫阿克博士《1848-1849年的工人結義會》，1900年法蘭克福版（Max Quarck, Dr., *Arbeiterverbrüderung 1848/49, Frankf. 1900*）一書中，收有《結義報》上的最重要的論文。斯蒂凡·波爾恩《回憶錄》（1898年萊比錫版），沒有提供什麼新材料。1897年10月，波爾恩很高興地寫信給我（過去我同他沒有來往），談到我在恩格斯的過於嚴厲的批評面前為他的歷史活動辯護的事；他現在想實現一個長時間的心願，出版他的回憶錄。可惜他在这本回憶錄中對恩格斯進行了不漂亮的報復。此後不久他就去世了。我對他最後的著作不能有所贊揚，當然我也堅持我在本書中關於他在革命年代的有功活動所說的一些話。然後我對《普魯士國民議會的會議速記記錄》共九卷，1848年柏林版（*Stenographischen Berichte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r preußischen Nationalversammlung, 9 Bde., Berl. 48*），作了深入的分析；這些會議在歷史上比受到更大注意的法蘭克福議會的會議要重要得多。阿·沃爾弗《革命編年史》（1851年柏林版）（*Ad. Wolffs Revolutionschronik, Berl. 51*），收有許多關於柏林狀況的資料，但是這部包羅萬象的三卷著作只談到康普豪森內閣倒台為止。施呂特爾寫的關於革命年代的社会史的論文很好（載《新時代》第3卷第28頁）。此外我利用了下列資料：雅科比《普魯士和德國》（*Jacoby, Preußen u. Deutschland*）；翁魯《速寫》，1849年馬格德堡版（*Unruh, Skizzen, Magdeb. 49*）；格奈斯特《柏林狀況》，1849年柏林版（*Gneist, Berliner Zustände, Berl. 49*）；洛貝爾圖斯《我的態度和其他》，1849年柏林版（*Rodbertus, Mein Verhalten etc., Berl. 49*）；彼·賴辛施佩格《普魯士國民議會》，1849年柏林版，洛貝爾圖斯編（*P. Reichensperger, D. preuß. Nationalvers., Berl. 49, geg. Rodb.*）；瓦爾德克案件，速記記錄，1849年柏林版（*Prozeß Waldeck, Stenogr. Ber., Berl. 49*）；魏克塞爾《齊格勒案件》，1850年馬格德堡版（*Weichsel, D. Zieglersche Proz., Magdeb. 50*）；讓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與本生的通信集》，1873年萊比錫版（*Ranke, Briefwechs. Friedr. Wilh. IV. m. Bunsen, Leipz. 73*）；H. 勃魯姆《羅伯特·勃魯姆》，1878年萊比錫版（*H. Blum,*

Robert Blum, Leipz. 78), 这本书所以值得重視是因为其中有許多文件資料, 此外淨是一些忧伤的廢話; A. 伯恩斯坦《舒尔采-德里奇》, 1879年柏林版(A. Bernstein, Schulze-Delitzsch, Berl. 79); 亨·伯·奥本海姆《瓦尔德克》, 1880年柏林版(H. B. Oppenheim, Waldeck, Berl. 80)。

### 《新莱茵报》(第95--135頁)

我尽力从各方面来扼要論述这份著名的革命报纸的内容, 正因为如此在个别問題上我往往只得满足于极其簡略的敘述。最重要的論文現在已收到《馬克思恩格斯拉薩尔遺著选集》(Aus dem literarischen Nachlaß von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und Ferdinand Lassalle, Stuttgart 02)第三卷中。梅林《三月革命和共产主义者同盟》, 載《新时代》第20卷上册第737頁(Mehring, Märzrevolution und Kommunistenbund, NZ 20<sup>1</sup>, 737)。1848年春天沙皇的备忘录《柏林和彼得堡》, 1880年萊比錫版(Berlin und Petersburg, Leipz. 80)。維尔特《著名的騎士史納卜汉斯基的生平事迹》, 1849年汉堡版(Weerth, Leben u. Taten des berühmten Ritters Schnapphahnski, Hamb. 49); 天才的諷諧的小品文的单行本, 今天这些小品文对于那些大有希望的大学讲师的道德意識还是一个严重的威胁。

### 斐迪南·拉薩尔(第136--151頁)

評論拉薩尔的著作的特点是量多而不是内容精辟。一篇真正有用的著作只是伯恩斯坦写在他編的拉薩尔文集前面的一篇小傳; 虽然我同伯恩斯坦的看法有許多不同, 但是这篇文章仍給了我一些重要指示。除了最近出版的开格尔斯著的紀念著作(1889年斯图加特版)以外, 值得一提的著作还有布兰德斯《斐迪南·拉薩尔, 文学的性格描写》, 1877年柏林版(Brandes, Ferd. Lassalle, e. literar. Charakterb., Berl. 77)和普倫納尔《斐迪南·拉薩尔》, 1884年萊比錫版(Plener, Ferd. Lassalle, Leipz. 84)。布兰德斯的著作对拉薩尔的外在的文学才能作了一些好的評述; 在反社会主义者法公布的前夜, 他的著作也是一个勇敢的告白; 但是这部著作对政治和社会的了解很差, 利用有才气的, 往往只是卖弄才气的文学研究的方式評价拉薩尔的著作是不适当的。普倫納尔的著作的优缺点与此类似, 只是他不是作为一

个片面的文学評論家而是作为一个片面的法学家来写他的书的。了解拉薩尔的心理的很重要的材料是他的日記(1892年柏林版, P. 林鳥編, 附有一篇枯燥无味的导言), 尤其是拉薩尔写給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 載《馬克思恩格斯拉薩尔遺著选集》第4卷。哈茨費尔特案件: 拉薩尔《关于文件匪一案的发言》(Lassalle, Kassettenrede) 和拉薩尔写的《哈茨費尔特伯爵夫人离婚訴訟》(Lassalle, Ehescheidungsklage der Gräfin Hatzfeldt), 有一本存在党的档案里, 还有拉薩尔生活中的一支恋爱插曲, 1878年萊比錫版(E. Liebesepisode a. d. Leben Lass., Leipz. 78)。关于拉薩尔参加革命斗争: 《新萊茵报》和拉薩尔《辯护发言》(N. Rhein. Ztg. und Lassalle, Assisenrede)。

### 德国革命的尾声(第152—192頁)

本章的參考資料有一部分同第二部第一章相同。德累斯頓的五月起义: 瓦尔德尔賽《德累斯頓的斗争》, 1849年柏林版(Waldersee, D. Kampf in Dresden, Berl. 49); 勒克尔《薩克森的起义和瓦尔特海姆的監獄》, 1865年法蘭克福版(Röckel, D. Erheb. Sachsens u. d. Zuchthaus i. Waldheim, Frankf. 65), 还有波尔恩发表在《結义报》上的一篇論文, 波尔恩的《回忆录》内容貧乏, 它用不充分的論据把巴枯宁描写成一个不起任何作用的人物。萊茵普魯士起义: 《新萊茵报》和恩格斯《維護帝国宪法的运动》。巴登—普法尔茨起义: 約·菲·貝克尔《南德五月革命史》, 1849年日内瓦版(J. Ph. Becker, Gesch. d. südd. Mairevol., Genf 49), 恩格斯著上述著作, 最近出版了济格尔的《回忆录》, W. 布罗斯編, 1902年曼海姆版(Sigel, Denkwürdigkeiten, hgg. v. W. Blos, Mannheim 02)。德国的流亡者: 《新萊茵报評論》, 已經引用的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著作。馬克思《福格特先生》和(反对維利希的)《高尚意識的騎士》, 1853年倫敦版。呂埃克《四八年革命的参加者(鮑尔克海姆)的回忆录》, 《新时代》第8卷第125頁(Rüegg, A. d. Erinner. a. Achtundvierzigers (Borkheim) NZ 8, 125)。

### 科倫共产党人案件(第193—205頁)

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文件, 尤其是馬克思《揭露科倫共产党人案件》和

《福格特先生》。A. 伯恩斯坦《反动的年代》，1881年柏林版(A. Bernstein, D. Jahre d. Reaktion, Berl. 81)。魏特林的晚年：左尔格在《新时代》第9卷下册第234頁和《未来》第78期上发表的文章。

### 五十年代(第206—233頁)

除了比德尔曼和胥伯尔的历史著作而外，参考貝倫哈蒂、俾斯麦、本生、格尔納赫、曼托伊費尔、罗恩、瓦盖納的书信和回忆录。里德尔《俾斯麦在反革命議會中的演說》，1881年柏林版(Riedel, Bismarcks Reden [i. d. konterrevol. Parl.], Berl. 81)。帕辛格尔《邦联議會中的普魯士》，1882年萊比錫版(Poschinger, Preußen im Bundestage, Leipz. 82)。迈岑《普魯士国家的农业状况》，1868年柏林版(Meitzen, Landwirtschaft. Verhältn. d. preuß. Staats, Berl. 68)。图恩《萊茵河下游的工业》(Thun, Industrie a. Niederrhein)。安东《普魯士工厂史》(Anton, Preuß. Fabrikges.)。迪斯特-达貝尔《金錢权力和社会主义》，1874年柏林版(Diest-Daber, Geldmacht u. Sozialism., Berl. 74)。鲍姆葛尔滕《德国的自由主义》，1866年柏林版(Baumgarten, D. deutsche Liberalism., Berl. 66)。巴师夏《国民經濟和諧論》，德譯者普林斯-史密斯，1852年柏林版(Bastiat, Volkswirtschaftliche Harmonien, Berl. 52)。德国的曼彻斯特文献(普林斯-史密斯、法赫尔、布隆等)只不过是巴师夏等人的著作的翻版。舒尔采-德里奇《德国工人階級和合作事业》，1858年萊比錫版(Schulze-Delitzsch, D. arbeit. Klass. u. d. Assoziationswesen i. Deutschl., Leipz. 58)。关于五十年代文学和哲学发展的資料正文中已經提到。

### 科学共产主义的进步(第234—288頁)

H. 翁肯《1857—1858年拉薩尔回到柏林》，載《普魯士年鉴》，1903年2月出版(H. Oncken, D. Rückkehr. Lassalles n. Berl. 57/58, Preuß. Jahrb., Febr. 03)。梅林《关于拉薩尔的傳記》，載《新时代》第21卷上册第627頁(Mehring, Zur Biographie Lassalles, NZ 21<sup>1</sup>, 627)。白劳伊《拉薩尔为柏林的斗争》，載《德国論壇》1903年6月号(Bailleu, Lassalles Kampf um Berlin, Deutsche Rundschau, Juni 03)。梅林《論拉薩

尔的心理学》，载《新时代》第21卷下册第456頁（Mehring, Zur Psychologie Lassalles, NZ 21<sup>2</sup>, 456）。馬克思《政治經济学批判》。拉薩尔《晦澀哲人赫拉克利特》，1857年柏林版（Lassalles, Herakleitos d. Dunkle, Berl. 57）。蔡勒《希腊人的哲学》，1892年萊比錫版（Zeller, D. Philos. d. Griechen, Leipz. 92）。諾阿克《哲学史用历史—傳記小辞典》，1879年柏林版（Noack, Histor.-biogr. Handwörterb. z. Gesch. d. Philos., Berl. 79）。拉薩尔《弗兰茨·馮·济金根》（Lassalle, Franz von Sickingen）。拉薩尔《既得权利体系》，1861年萊比錫版（Lassalle, System der erworbenen Rechte, Leipz. 61）。伯恩斯坦在上述著作中对本书沒有談到的第二卷作了精辟的分析。拉薩尔《致洛貝尔图斯的信》，1878年柏林版（Lassalles Briefe an Rodbertus, Berl. 78）。耶林《爭取权利的斗争》，1872年維也納版（Jhering, D. Kampf ums Recht, Wien 72）。阿·瓦格納《普通国民經济学》，1876年萊比錫版（A. Wagner, Allgem. Volkswirtschaftslehre, Leipzig 76）。

#### 一八五九年的欧洲危机(第289—307頁)

洛貝尔图斯《短文》，1890年柏林版，M. 威尔特編（Rodbertus, Kleine Schriften, Berl. 90, hgg. von M. Wirth.）。烏特克《为祖国》，1859年萊比錫版（Wuttke, Pro patria, Leipz. 59）。福格特《欧洲目前局势研究》，1859年日内瓦版（Vogt, Studien z. gegenw. Lage Europas, Genf 59）。恩格斯《波河和萊茵河》，1859年柏林版。拉薩尔《意大利战争和普魯士的任务》（Lassalle, Der itallen. Krieg u. d. Aufg. Breuß.）。福格特《我对〈总汇报〉的控訴》，1859年日内瓦版（Vogt, M. Proz. geg. d. Allgem. Ztg., Genf 59）。拉薩尔《费希特的政治遺言》（Lassalle, Fichtes polit. Vermächtn.）。恩格斯《薩瓦、尼斯和萊茵》，1860年柏林版。馬克思《福格特先生》。

#### 普魯士宪法糾紛(第308—365頁)

写普魯士宪法糾紛的历史，也必須像写德国革命史那样，指出它的主要特点，理由是相同的，因为否則就不能理解拉薩尔对工人进行的宣傳活动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发展。从桑巴特身上可以看到在这方面存在着

何等的混乱。桑巴特自命不凡地写道，拉薩尔由于“野心勃勃”，由于“贪图名誉”才建立了一个工人政党，因为进步的反对派根本不理睬他，而且——想一想下面这句话！——“只要俾斯麦存在，另一个人就只能相形见绌”。瓦列斯罗德《民主研究》，1860年和1861年汉堡版(Walesrode, Demokr. Stud., Hamb. 60 und 61)。雅科比《普鲁士民主派的原则》(Jacoby, Grunds. d. preuß. Demokr.)。帕里修斯《德国政党》，1878年柏林版(Parisius, Deutschl. polit. Part., Berl. 78)。缪勒《威廉皇帝》，1878年柏林版(Müller, Kais. Wilh., Berl. 78)。马尔克斯《皇帝威廉一世》，1897年莱比锡版(Marcks, Kais. Wilh. I., Leipz. 97)。葛采《施滕达尔城的地方志》，1873年施滕达尔版(Götze, Urkundl. Gesch. d. Stadt Stendal, Stend. 73)。哈恩《俾斯麦侯爵》，1878年柏林版(Hahn, Fürst Bismarck, Berl. 78)。以及其他有关俾斯麦的文献，尤其是布施和帕辛格尔的著作。俾斯麦曾经说过，规规矩矩的人不会为他写作，那么他还可以补充一句：严肃认真的作家也不这样做。世界上再没有比哈恩、布施、帕辛格尔、哈尔登之流更轻率的文人了。拉薩尔《致格·海尔维格的信》，1896年苏黎世版，M. 海尔维格编(Lassalles Briefe a. G. Herwegh, Zür. 96)，这本书的内容很不完全。布赫尔《议会政治真相》，1855年柏林版(Bucher, D. Parlamentarismus wie er ist, Berl. 55)。帕辛格尔《一个四八年革命的参加者》，1891年柏林版(Poschinger, E. Achtundvierziger, Berl. 91)，这本布赫尔的传记，是作者找了些材料拼凑而成的，布赫尔本人看了也曾大发雷霆，不过因为它里面有一些文件材料所以必须用它。L. 皮齐《我怎样成为作家》，1893年柏林版(L. Pletsch, Wie ich Schriftst. gew. bin, Berl. 93)，这本书虽不是很美，但很确当地叙述了拉薩尔所生活的柏林的环境。拉薩尔《文学史家朱利安·施米特先生》(Lassalle, Herr Julian Schmidt. d. Literarhist.)。拉薩尔《论宪法问题》(Lassalle, Über Verfassungsfragen.)。拉薩尔《工人纲领》(Lassalle, Arbeiterprogramm)。马克思《致施韦泽的信》，载《新时代》，第15卷上册第5页。拉薩尔《怎么办？》(Lassalle, Was nun?)。翁鲁在1862年12月22日发表的演说也载于舒尔特赫斯《欧洲历史年鉴》，1863年吕尔德林根版(Schultheß, Europ. Geschichtskal., Nördl. 63)。拉薩尔《权力和法律》(Lassalle, Macht u. Recht.)。

## 人名索引

## a

阿尔宁-博伊岑堡, 阿道夫·亨利希 (Arnim-Boitzenburg, Adolf Heinrich, Graf von 1803-1868)——伯爵, 普鲁士国务活动家, 反动容克阶级的代表; 曾任普鲁士内政大臣(1842-1845)和首相(1848年3月19日至29日)。——10, 15, 17, 46.

阿尔宁-亨利希斯多夫, 亨利希·弗里德里希 (Arnim-Heinrichsdorff, Heinrich Friedrich, Graf von 1791-1859)——伯爵, 普鲁士国务活动家, 曾任外交大臣(1849年2月至5月), 后任驻维也纳公使。——15, 17, 29.

阿伦特, 恩斯特·摩里茨 (Arndt, Ernst Moritz 1769-1860)——作家, 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 曾积极参加德国人民反对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斗争; 法兰克福协会会员(中间派右翼), 君主立宪制的拥护者。——24, 208.

阿朔夫, 馮 (Aschoff, von)——普鲁士将军, 柏林城防司令官; 1848年4月至5月任柏林市民自卫团指挥官。——14.

## ai

埃尔哈特, 约翰·路德维希 (Ehrhard, Johann Ludwig 1820年生)——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被告。——195.

埃卡留斯, 约翰·格奥尔格 (Eccarius, Johann Georg 1818-1889)——见第一卷人名索引。——187, 188, 193.

埃林堡, 克利斯提安·哥德弗利德 (Ehrenberg, Christian Gottfried 1795-1876)——见第一卷人名索引。——72.

艾韦贝克, 奥克斯特·海尔曼 (Ewerbeck, August Hermann 1816-1860)——见第一卷人名索引。——81, 182.

艾希霍恩, 约翰·阿尔勃莱希特·弗里德里希 (Eichhorn, Johann Albrecht Friedrich 1779-1856)——普鲁士文化大臣(1840-1848)。——25.

艾希霍夫, 威廉 (Eichhoff, Wilhelm 1833-1895)——德国社会主义作家, 曾在报刊上揭露施梯伯是间谍, 因而受到法庭迫害; 后来成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纸的编辑。——译者——308, 309.

## an

安内克, 弗里德里希 (弗里茨) (Anneke, Friedrich (Fritz) 约1817-约1872)——见第一卷人名索引。——129.

## ao

奥本海姆, 亨利希·伯恩哈特 (Oppenheim, Heinrich Bernhard 1819-1880)——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作家和新闻工作者, 1862-1864年出版《德国年

鉴》，1874—1877年是民族自由党的国会議員。——358。

奥地利皇帝(1848—1916)——見弗兰茨·約瑟夫一世。

奥多尔夫, 雅科布(Audorf, Jakob)——社会民主党人雅科布·奥多尔夫(1835—1898)的父亲。——202。

奥尔斯瓦特, 阿尔弗勒德·馮(Auerswald, Alfred von 1797—1870)——普魯士国务活动家, 內政大臣(1848年3月至7月)。——15, 31, 41, 47, 118, 220, 309。

奥路西尼, 費利切(Orsini, Felice 1809—1858)——意大利民族主义者, 1858年暗杀拿破侖第三, 被处死。——290。

奥古斯滕堡(公爵)——見克里斯提安·卡尔·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

奥古斯滕堡(王儲)——見弗里德里希·克里斯提安·奥古斯特。

奥托, 卡尔·烏尼巴特(Otto, Karl Wunibald 1810年生)——化学家, 1848—1849年是科倫工人联合会會員,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 1852年是科倫共产党人案件的被告, 被判五年要塞監禁。——195, 201。

## ba

巴尔扎克, 奥諾萊·德(Balzac, Honore de 1799—1850)——240。

巴枯宁, 米哈依尔·亚历山大罗維奇(Bakunin, Michail Alexandrowitsch 1814—1876)——見第一卷人名索引。——112, 114, 134, 163—165。

巴塞爾曼, 弗里德里希·丹尼尔(Bassermann, Friedrich Daniel 1811—1855)——曼海姆的书商, 溫和的自由主义政治活动家; 1848—1849年任巴登政府

駐邦联議會代表, 預备議會和法兰克福国民議会的議員(中間派右翼)。——72, 83。

巴帥夏, 弗雷德里克(Bastiat, Frédéric 1801—1850)——法国庸俗經濟学家, 資本主义的辯护人。——224—226, 283, 288。

## bai

白尔尼, 卡尔·路德維希(Börne, Karl Ludwig 1786—1837)——見第一卷人名索引。——139。

拜倫, 乔治·諾埃耳·戈登(Byron, George Noël Cordon Lord 1788—1824)——勋爵, 英国詩人, 革命浪漫主义的代表。——139。

## ban

班貝尔格, 路德維希(Bamberger, Ludwig 1823—1899)——德国政論家, 資产階級民主主义者, 1849年参加巴登-普法尔茨起义, 1871—1881年为民族自由党的国会議員。——172。

## bao

鮑姆施塔克, 爱德华(Baumstark, Eduard 1807—1889)——見第一卷人名索引。——25, 33。

鮑威尔, 布魯諾(Bauer, Bruno 1809—1882)——見第一卷人名索引。——228, 243。

鮑威尔, 亨利希(Bauer, Heinrich)——見第一卷人名索引。——95, 182, 187, 188, 193。

## bei

貝克尔, 海爾曼·亨利希(Becker, Her-

mann Heinrich 1820—1885) ——科倫地方法院候补法官,政論家; 1848年是科倫民主协会会员和工人业主联合会的理事, 被选入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和科倫安全委员会; 《西德意志报》編輯(1849年5月至1850年7月), 1850年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 1852年在科倫共产党人案件中被判刑; 后来成了民族自由党人, 任多特蒙德和科倫的市长。——80、119、121、129、193—195、201、360、361.

貝克尔, 約翰·菲力浦(Becker, Johann Philipp 1809—1886) ——見第一卷人名索引。——172、173、177、178.

貝姆, 約瑟夫(Bem, Joseph 1795—1850) ——波兰將軍, 1830年波兰起义的領袖之一, 1848—1849年在維也納和匈牙利参加革命斗争。——89.

### ben

本生, 克利斯提安·卡尔·約西亚斯·馮(Bunsen, Christian Karl Josias von 1791—1860) ——普魯士駐倫敦公使(1842—1854)。——4、35、155.

### bi

毕尔格尔斯, 亨利希(Bürgers, Heinrich 1820—1878) ——見第一卷人名索引。——98、130、193、195、201.

毕林, 卡尔·約翰(Bühning, Carl Johann 1820年生) ——木器工人,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 汉堡工人联合会會員。——90.

毕舍, 菲力浦·約瑟夫·本札曼(Buchez, Philippe-Joseph-Benjamin 1796—1865) ——見第一卷人名索引。——349.

毕希納, 格奧尔格(Büchner, Georg 1813—1837) ——230.

毕希納, 路德維希(Büchner, Ludwig 1824—1899) ——前者之弟, 医生, 庸俗唯物主义哲学家, 自然科学的普及者。——229、230、244.

比斯基(Bisky) ——金匠,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 先在柏林工人中央委员会, 后在工人結义会担任领导工作。——85、86、90、91、93、203.

俾斯麦, 奧托(Bismarck, Otto, Fürst von 1815—1898) ——侯爵, 德国首相(1871—1890)。——17、21、80、105、159、181、205、207、214、215、286—288、301—303、319—322、325、330、350、351、355、356、359、363、365.

俾斯麦, 克勞斯(尼古勞斯)(Bismarck, Klaus(Nikolaus)) ——奧托·馮·俾斯麦的祖先, 十四世紀时的人。——319.

### bian

卞尼格先, 魯道夫·馮(Bennigsen, Rudolf von 1824—1902) ——民族自由党政治活动家, 德意志民族联盟的創建人之--。——311.

### bo

博德尔施文克, 恩斯特(Bodelschwingh, Ernst, Freiherr von 1794—1854) ——男爵, 普魯士国务活动家, 反动容克地主的代表; 曾任財政大臣(1842—1845), 內政大臣(1845—1848年3月); 1849年是第二議院議員(右派)。——13.

博登施泰特, 弗里德里希(Bodenstedt, Friedrich 1819—1892) ——詩人和散

- 文作家, 1854年起是慕尼黑大学教授, 1866—1870年任梅林根剧院院长。——226.
- 博奈曼, 弗里德里希·威廉·路德维希 (Bornemann, Friedrich Wilhelm Ludwig 1798—1864)——普鲁士司法官吏, 自由派政治活动家; 1848年为普鲁士国民会议議員(中間派右翼), 司法大臣(1848年3月至6月)。——60.
- 博宁, 爱德华·馮 (Bonin, Eduard von 1793—1865)——普鲁士將軍和陸軍大臣(1852—1854和1858—1859)。——313.
- 博伊斯特, 弗里德里希·斐迪南 (Beust, Friedrich Ferdinand, Graf von 1809—1886)——伯爵, 薩克森和奧地利的反动的国务活动家, 1849年任薩克森外交大臣, 1858—1866年任首相, 1867—1871年任奧地利首相。——164、165、228.
- 博伊恩, 列奥波特·海尔曼·路德维希·馮 (Boyen, Leopold Hermann Ludwig von 1771—1848)——普鲁士元帅, 原籍捷克; 在反拿破仑战争期間組織过后备軍; 曾任陸軍大臣(1814—1819和1841—1847)。——313.
- 伯恩斯坦, 阿隆 (笔名为雷本斯坦) (Bernstein, Aaron [Pseudonym Rebenstein] 1812—1884)——民主主义政論家, 柏林《人民报》編輯, 有一个时期做过犹太經师。——225、226.
- 伯克, 菲力浦·奥古斯特 (Böckh, Philipp August 1785—1867)——哲学家和历史学家, 柏林大学教授。——72、238、255、256.
- 波尔恩, 斯蒂凡 (Born Stephan 1824—1898)——見第一卷人名索引。——85—89、91、92、94、157、163、164、203.
- 波拿巴, 路易 (拿破侖第三) (Bonaparte, Louis [Napoleon III.] 1808—1873)——拿破侖第一的侄子, 共和国總統(1848—1852), 法國皇帝(1852—1870)。——185、191、289—291、295—300、305、306.
- 波伊克尔, 爱德华·馮 (Peucker, Eduard von 1791—1876)——普鲁士將軍; 1848年在法蘭克福为“帝国”陸軍大臣, 1849年指揮軍隊鎮压巴登—普法尔茨起义。——40、41.
- 柏拉图 (Plato [n] 約公元前427—347)——見第一卷人名索引。——257.
- 勃兰登堡, 弗里德里希·威廉 (Brandenburg, Friedrich Wilhelm, Graf von 1792—1850)——伯爵, 普鲁士將軍和国务活动家, 反革命內閣首腦(1848年11月至1850年11月)。——45、55、57—60、65、68—70、72、161、165、207、209、212、217.
- 勃朗, 让·約瑟夫·路易 (Blanc, Jean-Joseph-Louis 1811—1882)——見第一卷人名索引。——27、75、87、89、144.
- 勃魯姆, 罗伯特 (Blum, Robert 1807—1848)——見第一卷人名索引。——21、40、41、79、83、153、223、298.

## bu

- 布赫尔, 洛塔尔 (Bucher, Lothar 1817—1892)——普鲁士司法官吏, 政論家, 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会议議員(中間派左翼); 1848年革命失敗后流亡倫敦; 后来成了民族自由党人, 俾斯麥在外交事务上的助手, 拉薩尔的朋友。——24、26、27、30、42—44、48、50—52、56、67、

70、293、316、325—332、335、358.

布萊希勒德, 盖尔宗·馮 (Bleichröder, Gerson von 1822—1893) ——柏林銀行家, 作为俾斯麦的私人銀行家对他有过影响。——320.

布萊桑, 約翰·路德維希·烏尔班 (Blesson, Johann Ludwig Urbain 1790—1861) ——普魯士軍官和軍事作家, 反对立宪制; 1848年6月任柏林市民自卫团指揮官。——14.

布雷斯勒 (Breßler, Graf) ——伯爵, 1848年为普魯士国民議會議員。——54.

布里茲培恩, 阿伯特 (Brisbane, Albert 1809—1890) ——美国新聞工作者, 《紐約每日論壇报》編輯, 傅立叶的拥护者。——120.

布龙, 卡尔·馮 (Bruhn, Karl von 1808年生) ——本来是炮兵軍士, 1836年以后是被逐者同盟的特使, 1848—1849年参加美国河畔法兰克福和巴登的起义, 1850年止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 后来是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成員, 汉堡《北极星报》的編輯。——179.

布呂希爾, 盖普哈特·列貝雷希特, 瓦尔施塔特侯爵 (Blücher, Gebhard Leberecht, Fürst von Wahlstatt 1742—1819) ——普魯士元帥, 曾参加反拿破侖第一的战争。——9.

布倫坦諾, 罗侖茲·彼得 (Brentano, Lorenz Peter 1813—1891) ——曼海姆的律師, 小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 1848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議會左派議員; 1849年任巴登临时政府主席, 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 后至美国。——171—173、177、180.

布罗克豪斯, 亨利希 (Brockhaus, Heinrich 1804—1874) ——从1823年至去

世为止是萊比錫 F. A. 布罗克豪斯书店的老板。——324.

## cai

蔡勒, 爱德华 (Zeller, Eduard 1814—1908) ——1872年到1895年是柏林大学哲学教授, 有关于哲学史的著作。——257、258.

## cha

查理·馬特 (Karl Martell 約688—741) ——715年起任法兰克王国的宮相。——111.

## da

达尔曼, 弗里德里希·克利斯托夫 (Dahlmann, Friedrich Christoph 1785—1860) ——历史学家, 基尔、哥丁根和波恩的大学教授, 自由派的政治活动家; 1833年在汉諾威协助制定宪法, 后来他同六个同事 (“哥丁根七教授”) 反对恩斯特·奥古斯特廢除宪法 (1837), 被驅逐出境; 1848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議會議員 (中間派右翼)。——40.

达赫, 西蒙 (Dach, Simon 1605—1659) ——歌詞作家, 科尼斯堡大学詩学教授。——143.

达拉什, 阿尔伯特 (Darasz, Albert 1808—1852) ——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領袖之一, 1830—1831年起义的参加者; 波兰流亡者民主組織的重要成員; 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員會委員。——191.

## dan

但丁, 阿利格里 (Dante, Alighieri 1265—1321) ——240.

丹尼尔斯, 罗兰特博士 (Daniels, Dr. Ro-

land 1819—1855)——科倫医生, 1850年起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科倫中央委员会委員, 1852年科倫共产党人案件的被告之一, 被陪審法庭宣判无罪。——195.

### de

德朗克, 恩斯特 (Dronke, Ernst 1822—1891)——見第一卷人名索引。——98, 122, 134.

德律埃, 昂利 (Druey, Henri 1799—1855)——見第一卷人名索引。——176.

德罗伊曾, 古斯塔夫 (Droysen, Gustav 1838—1910)——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231.

德斯特尔·卡尔·路德維希·約翰 (d'Estler Karl Ludwig Johann 1811—1859)——科倫的医生, 共产主义者同盟科倫支部的成員; 1848年是預备議会的議員和普魯士国民議会的左派領袖之一; 曾参加1848年10月在柏林举行的第二次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 被选进德国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 1849年是第二議院議員 (极左派); 1849年在巴登-普法尔茨起义中起过重要作用, 事后流亡瑞士。——78, 118, 173.

### deng

邓宾斯基, 亨利克 (Dembinski Henryk 1791—1864)——波兰革命者, 1830年参加波兰起义, 1848年任匈牙利革命軍將軍, 1849年为該軍司令官。——89.

### di

迪斯特-达貝尔·奧托·馮 (Diest-Daber, Otto von 1821—1901)——1851年为爱北斐特的行政长官, 曾揭露萊茵

大资产阶级的贿赂方法, 七十年代反对俾斯麦同財閥的同盟。——221.

### dun

敦克尔, 弗兰茨·古斯塔夫 (Duncker, Franz Gustav 1822—1888)——出版商, 希尔施-敦克尔工会的創始人之一; 拉薩尔的朋友。——226, 234, 238, 294.

敦克尔, 海爾曼 (Duncker, Hermann 1817—1893)——前者之兄, 1845年为柏林市參議員, 1848—1849年为普魯士国民議會議員 (中間派右翼); 1872—1892年任柏林第二市长。——26.

### duo

多納路斯, 胡果 (Donellus, Hugo 原名 Doneau 1527—1591)——加尔文派的法学家。——287.

### en

恩格斯, 弗里德里希 (Engels, Friedrich 1820—1895)——80, 87, 90, 95, 97—99, 101, 106, 120, 121, 129, 133, 134, 139, 140, 156, 168, 170, 179—181, 186—189, 192—194, 198—200, 204, 234, 235, 238, 242, 245, 246, 264, 265, 267, 268, 285, 290, 294—296, 299, 300, 303—307, 324, 332, 357.

### fa

法赫尔, 尤利烏斯 (Faucher, Julius 1820—1878)——德国政論家, 青年黑格尔分子, 德国自由貿易的拥护者, 五十年代初期, 他宣傳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观点; 1850—1861年流亡英国, 后来成为进步党人。——223.

法因, 格奧尔格 (Fein, Georg 1803—

1869)——1833年因进行反政府的政治活动被迫逃亡;在《新苏黎世报》担任过一个时期的编辑;1848年返回德国,1849年又逃往瑞士。——81.

## fei

费尔巴哈,路德维希(Feuerbach, Ludwig 1804—1872)——230, 231, 233, 243.

费希特,约翰·哥特利勃(Fichte, Johann Gottlieb 1762—1814)——233, 240, 243, 305, 348, 349, 354.

菲尔肖夫,鲁道夫(Virchow, Rudolf 1821—1902)——卓越的病理学家和生理学家,反对达尔文的进化论,进步党人,帝国议会議員(1880—1893)。——316, 322.

## fen

芬克,格奥尔格(Vincke, Georg, Freiherr von 1811—1875)——男爵,普鲁士自由派政治活动家;1848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右派领袖之一,后来是老自由党人。——310, 315, 316.

## fu

伏尔泰,弗朗斯瓦-玛丽·阿鲁埃·德(Voltaire, François-Marie Arouet de 1694—1778)——见第一卷人名索引。——139, 243.

福格特,卡尔(Vogt, Karl 1817—1895)——吉森的大学教授,自然科学家,庸俗唯物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是预备议会議員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議員(左派);1849年是临时帝国摄政之一;后流亡瑞士,任日内瓦大学教授;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运动

的死敌,拿破仑第三的雇佣间谍。——83, 160, 171, 176, 187, 229, 230, 292, 305, 306.

弗莱里格拉特,斐迪南(Freiligrath, Ferdinand 1810—1876)——见第一卷人名索引。——5, 11, 122, 134, 169, 187, 195.

弗赖塔克,古斯塔夫(Freytag, Gustav 1816—1895)——德国自由主义作家。——48, 232, 264.

弗兰格尔,弗里德里希·亨利希·恩斯特(Wrangel, Friedrich Ernst, Graf von 1784—1877)——伯爵,普鲁士将军,反动的军事宫廷权奸领袖之一;1848年是柏林第三军团司令,参加了1848年11月在柏林举行的反革命政变。——41, 44, 45, 57, 59, 60, 64, 218.

弗兰茨·约瑟夫一世(Franz Joseph I. 1830—1916)——奥地利皇帝(1848—1916)。——191, 227.

弗里德里希二世(弗里德里希大帝)(Friedrich II. (der "Große") 1712—1786)——见第一卷人名索引。——229.

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Friedrich Wilhelm II. 1744—1797)——见第一卷人名索引。——55.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Friedrich Wilhelm IV. 1795—1861)——见第一卷人名索引。——3, 8, 10—12, 15—18, 20, 21, 35, 39, 46, 53, 56—58, 64, 72, 74, 77, 105, 136, 153—156, 161, 174, 191, 195—197, 219, 220, 237, 313, 314, 316, 320, 321.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二世(Friedrich August II. 1797—1854)——萨克森国王(1836—1854)。——162, 163.

弗里德里希·克利斯提安·奥古斯特 (Friedrich Christian August 1829—1880) ——什列斯維希-霍尔斯坦王儲 (1863年起是公爵); 1848年任什列斯維希-霍尔斯坦軍參謀將校。——301.

弗呂貝爾, 尤利烏斯 (Fröbel, Julius 1805—1893) ——見第一卷人名索引。——80、81.

弗呂利希 (Fröhlich) ——排字工人, 1848年是柏林工人工資鬥爭的領導人之一。——94.

弗倫克爾 (Fränckel) ——在倫敦的德國工人, 1847年是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和倫敦德國工人教育協會會員; 1849—1850年是共產主義者同盟中央委員會委員; 同盟分裂后, 他參加了維利希-沙佩爾宗派集團。——188.

弗洛孔, 斐迪南 (Flocon, Ferdinand 1800—1866) ——法國政治活動家和政論家, 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 《改革報》編輯; 1848年是臨時政府成員。——95、97.

弗略里, 沙爾·弗里德里希 (克勞澤, 施米特) (Fleury, Charles Friedrich (Krause, Schmidt) 1824年生) ——五十年代初在倫敦的普魯士密探; 曾偽造文件陷害科倫共產黨人案的被告。——197—201.

傅立叶, 弗朗斯瓦-瑪麗-沙爾 (Fourier, François-Marie-Charles 1772—1837) ——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75.

### gan

甘洛夫 (Gangloff) ——排字工人, 繼斯蒂凡·波爾恩之后, 擔任工人結義會的

領導工作。——203、204.

### ge

歌德, 約翰·沃尔弗岡·馮 (Goethe, Johann Wolfgang von 1749—1832) ——139、233、243、334.

格爾拉赫, 恩斯特·路德維希·馮 (Gerlach, Ernst Ludwig von 1795—1877) ——普魯士法學家和政治活動家, 保守黨的創建人之一。——215、220、321.

格爾拉赫, 列奧波特·馮 (Gerlach, Leopold von 1790—1861) ——前者之兄, 普魯士將軍, 虔誠主義者。保守黨人, 在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時期是宮廷黨的領袖之一。——215、219、220、321.

格拉斯布倫勒 (布倫格拉斯), 阿道夫 (Glaßbrenner (Brennglas), Adolf 1810—1876)。——85.

格拉博夫, 威廉 (Grabow, Wilhelm 1802—1874) ——普楞茨勞市市長, 溫和的自由主義者; 1848年為普魯士國民議會議長 (右派)。——25、51、85、316、317.

格萊夫 (Greif (f)) ——普魯士警官, 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初是普魯士在倫敦的間諜組織的領導人之一。——198—201.

格林, 雅科布 (Grimm, Jacob 1785—1863) ——德國語言學的奠基人, 柏林大學教授, 溫和的自由主義者; 1848年是法蘭克福國民議會議員 (中間派)。——72.

格林, 威廉 (Grimm, Wilhelm 1786—1859) ——前者之弟, 德語學家, 他哥哥在著述方面的合作者。——72.

格律恩, 卡尔 (恩斯特·馮·德尔·海德  
的笔名) (Grün, Karl, Pseudonym  
von der Haide 1817—1887)——見  
第一卷人名索引。——204.

格雷, 約翰 (Gray John 1798—1850)——  
見第一卷人名索引。——248.

格雷費, 阿尔勃萊希特·馮 (Graefe,  
Albrecht von 1828—1870)——医生,  
在眼科方面有过重要貢獻。——237.

格奈澤瑙, 奧古斯特·威爾·安东, 奈特  
哈尔特伯爵 (Gneisenau, August  
Wilhelm Anton, Graf Neidhardt  
von 1760—1831)——普魯士元帥和軍  
事政治家, 在反对拿破侖統治的民族解  
放战争中起过重要作用; 作为“人民抵  
抗运动的理論家”(恩格斯語)参加普魯  
士軍事改革, 起了决定性作用, 他是后  
各軍和国民軍的創建人。——45.

格奈斯特, 亨利希·魯道夫·海爾曼·弗  
里德里希·馮 (Gneist, Heinrich Ru-  
dolf Hermann Friedrich von 1816  
—1895)——資產階級政治活动家和法  
学家; 普魯士众議院和帝国議会的議  
員。——10, 45, 55, 59, 60, 65.

盖勒恩 (Gellern)——司法顧問, 1848 年  
是普魯士国民議會議員。——53.

盖伊, 路德維特 (Gaj, Ljudevit 1809—  
1872)——克罗地亚語言学家, 政治活  
动家和新聞工作者, 南方斯拉夫 (伊利  
里亞) 民族运动的領袖, 泛斯拉夫主义  
者, 拥护建立在联邦基础上的哈布斯堡  
王朝; 1848 年是克罗地亚临时政府的  
成員。——112.

戈德海姆 (Goldheim)——普魯士警官  
(少尉), 十九世紀五十年代是普魯士派  
往倫敦的密探。——201.

## gu

谷茲科夫, 卡尔·斐迪南 (Gutzkow,  
Karl Ferdinand 1811—1878)——見  
第一卷人名索引。——226, 233.

## ha

哈根 (Hagen)——六十年代普魯士众議  
院議員。——317.

哈茨費尔特, 爱德蒙 (Hatzfeldt, Ed-  
mund, Graf von 1789 年生)——伯  
爵。——145, 146.

哈茨費尔特, 索菲娅 (Hatzfeldt, Sophie  
Gräfin von 1805—1881)——伯爵夫  
人, 拉薩尔的朋友和拥护者。——144  
—146, 148, 238, 239, 326, 331.

## hai

海德, 約翰·哥特弗利德 (Herder, Jo-  
hann Gottfried 1744—1803)——  
255.

海爾維格, 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 (Her-  
wegh, Georg Friedrich 1817—1875)  
—97, 177, 242, 324.

海爾維格, 爱瑪 (Herwegh, Emma 1904  
年死)——前者之妻。——143.

海爾瓦特·馮·比滕費耳特, 卡尔·艾伯  
哈特 (Herwarth von Bittenfeld,  
Karl Eberhard 1796—1884)——普  
魯士將軍, 1848 年 3 月 18 日是柏林王  
宮的指揮官, 1871 年升元帥。——69.

海耳特, 弗里德里希·威廉 (Held, Frie-  
drich Wilhelm 1813—1872)——德  
國政論家; 1831 年是普魯士少尉, 后来  
当演員, 以后是激进报刊的发行人和編  
輯。——23, 85, 90.

海涅, 亨利希 (Heine, Heinrich 1797—

1856)——135、139—141、143、334.

海特, 奧古斯特 (Heydt, August Freiherr von der 1801—1874)——男爵, 爱北斐特的銀行家, 普魯士商业大臣 (1848—1862) 和財政大臣 (1866—1869)。——216、317、348.

海因澤 (Heintze) ——德累斯頓五月起義革命政府的最高指揮官。——163.

### han

汉普敦, 約翰 (Hampden, John 1595—1643) ——英国政治活动家, 长期議会的議員, 资产階級革命中的清教徒反对派的領袖。——357.

汉澤曼, 大卫·尤斯图斯 (Hanseemann, David Justus 1790—1864) ——見第一卷人名索引。——4、15、17—19、21、31—39、42、43、45、47、48、101、118、212、222、357.

### hao

豪普特, 海爾曼·威廉 (Haupt, Hermann Wilhelm 1833年生)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 住在漢堡; 科倫共产党人案的被告, 出卖了科倫中央委员会的委員, 在审讯前逃往巴西, 后来在那里任德国总領事。——195、199.

### he

赫貝尔, 弗里德里希 (Hebbel, Friedrich 1813—1863) ——227.

赫拉克利特 (Heraklit (Herakleitos aus Ephesos) 約公元前 540—480) ——希腊哲学家, 辯证法的創始人之一。——143、242、244、254—262.

荷馬 (Homer) ——見第一卷人名索引。——240、261.

### hei

黑格尔, 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770—1831) ——192、233、239、240、243、244、247、255—258、261、269、272、273.

黑克尔, 弗里德里希·弗兰茨·卡尔 (Hecker, Friedrich Franz Karl 1811—1881) ——曼海姆的律師, 小资产階級民主主义者, 激进的共和主义者; 1848年是預备議會議員, 1848年4月巴登起義的領導人之一, 事后流亡瑞士, 后至美国, 站在北方一边参加了美国内战, 任团长。——21、39.

### heng

亨策, A. (Hentze, A.) ——少尉,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 1850年同盟分裂后, 屬維利希·沙佩尔集团; 1852年科倫共产党人案中是原告的证人。——199.

### hong

洪堡, 亚历山大·馮 (Humboldt, Alexander von 1769—1859) ——見第一卷人名索引。——143、238、263.

### hu

胡貝尔, 維克多·艾梅 (Huber, Victor-Aimé 1800—1869) ——見第一卷人名索引。——144、216.

胡登, 烏尔利希·馮 (Hutten, Ulrich von 1488—1523) ——人文主义者, 詩人, 德国貴族起義时期 (1522—1523) 帝国直轄騎士的理論代表人物。——240、241、265、266、263.

### huo

霍尔堡, 路德維希 (Holberg, Ludwig,

Freiherr von 1684—1754)——男爵，  
丹麦作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  
115.

霍弗尔 (Höfer)——小学教师，1849年  
因参加革命斗争被处死。——174.

霍普特曼，盖尔哈特 (Hauptmann, Ger-  
hart 1862—1946)——264.

霍伊勃纳，奥托·列昂哈特 (Heubner,  
Otto Leonhard 1812—1893)——萨克  
森的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法兰克福议  
会的议员(左派)；萨克森革命政府的成  
员，在逃走时被捕，1850年判死刑，改  
终身监禁，1859年遇赦出狱。——163  
--165.

## ji

基奥尔巴萨 (Kiolbassa)——西里西亚农  
民，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48.

基克 (Kick)——斯蒂凡·波尔恩 1848年  
在柏林建立的工人结义会的中央委员。  
——92.

基佐，弗朗斯瓦-比埃尔-吉约姆 (Guizot,  
François-Pierre-Guillaume 1787—  
1874)——见第一卷人名索引。——  
26、187.

济多夫，卡尔·列奥波特·阿道夫 (Sy-  
dow, Karl Leopold Adolf 1800—  
1882)——柏林的传教士，施莱艾尔马  
赫尔的拥护者；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  
议会议员(右派)。——29.

济格尔，弗兰茨 (Sigel, Franz 1824—  
1902)——1849年任巴登革命军最高指  
挥官。——171、178.

济金根，弗兰茨·冯 (Sickingen, Franz  
von 1481—1523)——骑士，1522—  
1523年贵族起义的军事领袖和政治领  
袖。——252、265—270.

吉尔克 (Gierke)——施泰廷市的法律顾  
问，自由主义者；1848年是普鲁士国  
民议会议员(中间派右翼)，普鲁士农业  
大臣(1848年3月至9月)。——26、  
32、36、60.

吉佩里希 (Gipperich)——维利希-沙佩  
尔分裂集团斯特拉斯堡支部的领导人。  
——198、200.

## jia

加格恩，亨利希·威廉·奥古斯特 (Ga-  
gern, Heinrich Wilhelm August,  
Freiherr von 1799—1880)——男爵，  
黑森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自由主义者；  
1848年是预备议会议员和法兰克福国  
民议会议长(中间派右翼)；帝国内阁  
授(1848年12月至1849年3月)。——  
21、32、39、101、153、154、160、161、303.

加里波第，朱泽培 (Garibaldi, Giuseppe  
1807—1882)——意大利革命家，民主  
主义者，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  
在反对奥地利的战争中，1848年率领  
义勇军参加皮蒙特军一边奋不顾身地  
战斗；1849年4月至6月为罗马共和  
国国防的组织者；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  
领导意大利人民为争取民族解放和国  
家统一而斗争。——312、324、325.

## jie

杰弗雷斯，乔治 (Jeffreys, George)——  
英国首席法官，1685年，他在镇压蒙  
斯公爵起义时，曾判处几百名起义者以  
死刑和流刑。——175.

## jin

金克尔，哥德弗利德·约翰 (Kinkel, Gott-  
fried Johann 1816—1882)——诗人

和政論家，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1849年巴登-普法爾茨起義的參加者；被普魯士法庭判處終身監禁，從獄中逃出，流亡英國；他是倫敦小資產階級流亡者的領袖之一；反對馬克思和恩格斯。——119、167、174、187、194、197。

### ka

卡爾貝，威康(Karbe, Wilhelm) — 在1848—1849年革命中，是柏林很受歡迎的民眾演說家。——23。

卡萊爾，托馬斯(Carlyle, Thomas 1795—1881)——見第一卷人名索引。——187。

### kang

康德，伊曼努爾(Kant, Immanuel 1724—1804)——233、243、255。

康普豪森，盧道夫(Camphausen, Ludolf 1803—1890)——見第一卷人名索引。——15、17、19、21、28、31、32、38、47、60、86、101、159、212、220、357。

康塔多爾，羅倫茲(Cantador, Lorenz)——杜塞爾多夫的商人，1848年參加那里的市民自衛團；1848年12月因号召武裝反抗王國軍隊而被捕，1849年3月獲釋，逃亡美國。——147、148。

### ke

科爾韋克(Kohlweck)——1848年是柏林工人工資鬥爭的領導人之一。——94。

科薩克，恩斯特(Kossak, Ernst 1814—1880)——柏林的小品文作家和評論家，1847年創辦《閱報室》報，後來又創辦《星期一報》，該報至1869年始停刊。——85。

科蘇特，路德維希〔拉約什〕(Kossuth, Ludwig(Lajos) 1802—1894)——匈牙利民族解放運動的領袖，在1848—1849年的革命中領導資產階級民主派；匈牙利革命政府的首腦；革命失敗後逃往土耳其，後來流亡英國和美國；五十年代初曾尋求波拿巴主義者集團的支持。——111、195。

克萊因，約翰·雅科布(Klein, Dr. Johann Jacob 約1818年生)——科倫醫生，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1852年科倫共產黨人案的被告，被陪審法庭宣判無罪。——195。

克萊斯特，亨利希·馮(Kleist, Heinrich von 1777—1811)——45。

克勞澤，恩斯特(Krause, Ernst)——五金工人，柏林機器製造工人聯合會會員，曾參加1848年6月18日于柏林舉行的手工業者和工人團體代表大會。——90。

克里斯提安·卡爾·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Christian Karl Friedrich August 1798—1869)——什列斯維希-霍爾斯坦-宗得堡·奧古斯滕堡公爵，1852年把產業賣給丹麥。——16、301。

克利蓋，海爾曼(Kriege, Hermann 1820—1850)——見第一卷人名索引。——80、81。

克列美爾(Krämer)——見舍爾瓦爾。

克呂格爾，弗里德里希(Crüger, Friedrich)——參加1848年6月18日于柏林舉行的手工業者和工人團體代表大會的科尼斯堡工人聯合會的代表。——90。

克倫威爾，奧利弗(Cromwell, Oliver 1599—1658)——十七世紀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化的

貴族的領袖；1653年至1658年是英格蘭、蘇格蘭和愛爾蘭的“Lord-Protector”(護國公)。——244。

克羅伊澤爾，格奧爾格·弗里德里希 (Creuzer, Georg Friedrich 1771—1858) ——德國語言學家和考古學家。——256。

克洛普什托克，弗里德里希·哥特利勃 (Klopstock, Friedrich Gottlieb 1724—1803) ——223。

克洛茨，克利斯提安·阿道夫 (Klotz, Christian Adolf 1738—1771) ——語言學家，哥丁根和哈雷的教授；萊辛的《內容的信》就是為反對他而寫的。——334。

### kong

孔西得朗，維克多 (Considérant, Victor 1808—1893) ——見第一卷人名索引。——89。

### la

拉德茨基，約瑟夫 (Radetzky, Joseph, Graf 1766—1858) ——伯爵，奧地利元帥，奧地利駐意大利軍隊的總司令。——55。

拉登堡，阿達爾貝特·馮 (Ladenberg, Adalbert von 1798—1855) ——反動的普魯士官僚的代表人物；文化大臣 (1848—1850)。——57。

拉登多夫，奧古斯特 (Ladendorff, August) ——普楞茨勞一個市參議員的兒子，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革命年代很長時期任柏林一個人民團體的主席；1854年被普魯士高等法院以“叛國罪”判處幾年徒刑，後來是德國人民黨黨員，參加過國際工人協會洛桑代表大會

(1867)。——199, 203, 217, 225。

拉馬丁，阿爾丰斯-瑪麗-路易·德 (Lamartine, Alphonse-Marie-Louis de 1790—1869) ——見第一卷人名索引。——97。

拉美特利，朱利安·奧弗利·德 (Lametrie (La Mettrie), Julien Offray de 1709—1751) ——法國醫生和哲學家，機械唯物主義的卓越代表人物。——229。

拉薩爾，斐迪南 (Lassalle, Ferdinand 1825—1864) ——45, 120, 136—151, 213, 216, 236—246, 254—269, 271—273, 275—281, 283—288, 294, 296—307, 312, 313, 323—335, 337—340, 343—366。

### lai

萊布尼茨，哥德弗利德·威廉 (Leibniz Gottfried Wilhelm Freiherr von 1646—1716) ——男爵，德國數學家和唯心主義哲學家。——233。

萊辛，哥特霍爾德·埃夫拉伊姆 (Lessing, Gotthold Ephraim 1729—1781) ——139, 142, 233, 240, 245, 258, 325, 330, 334, 348, 349。

賴德律-洛蘭，亞歷山大-奧古斯特 (Ledru-Rollin, Alexandre-Auguste 1807—1874) ——見第一卷人名索引。——27, 143, 191。

賴夫，威廉·約瑟夫 (Reiff, Wilhelm Joseph 約1824年生) ——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科倫工人聯合會會員，後來是工人教育協會書記；1850年被開除出盟；是1852年科倫共產黨人案的被告。——195, 201。

賴辛施佩格，彼得·弗蘭茨 (Reichen-

sperger, Peter Franz 1818—1895)  
— 司法官吏, 天主教政治活动家;  
1848 年为预备议会和普鲁士国民议会  
議員 (右派); 后来在中间党起领导作  
用。——25、53、56.

### lang

朗格, 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 (Lange,  
Friedrich Albert 1828—1875) ——  
見第一卷人名索引。——230、239、240、  
287、334、358、359、361.

### lao

劳貝, 亨利希 (Laube, Heinrich 1806—  
1884) —— 見第一卷人名索引。——  
139.

### le

勒克尔, 奥古斯特 (Röckel, August 1814  
—1876) —— 音乐家, 1849 年德累斯頓  
五月起义的参加者, 1862 年始被从罪  
犯教养所释放。——165.

勒澤尔, 彼得·盖尔哈特 (Röser, Peter  
Gerhard 1814—1865) —— 科倫的雪  
茄烟工人; 1848—1849 年是科倫工人  
联合会的副主席, 《自由、友誼、劳动》报  
的发行人; 1850 年为共产主义者同盟  
盟員, 1862 年是科倫共产党人案主要  
被告之一; 后来成为拉薩尔分子。——  
193、195、201.

### lei

雷特維茨, 奥斯卡 (Redwitz, Oskar,  
Freiherr von 1823—1891) —— 男爵,  
浪漫主义-天主教詩人。——226.

雷希貝克, 貝恩哈特 (Rechberg, Bern-  
hard, Graf von 1806—1899) —— 伯

爵, 奥地利首相 (1859—1860) 和外交大  
臣 (1859—1864)。——207.

### li

李卜克内西, 威廉 (Liebknecht, Wilhelm  
1826—1900) —— 177、182、187、193、  
201.

李嘉图, 大卫 (Ricardo, David 1772—  
1823) —— 見第一卷人名索引。——  
192、247、248、256.

利奧, 亨利希 (Leo, Heinrich 1799—  
1878) —— 見第一卷人名索引。——  
192.

利希諾夫斯基, 費里克斯·馬利阿 (Li-  
chnowski, Felix Maria, Fürst von  
1814—1848) —— 侯爵, 西里西亚的大  
地主, 反动的普魯士軍官; 1848 年是法  
兰克福国民议会議員 (右派), 法兰克  
福九月起义期間被杀。——41、135.

### lie

列列韦尔, 約阿希姆 (Lelewel, Joachim  
1786—1861) —— 見第一卷人名索引。  
——106.

列曼, 阿伯特 (Lehmann, Albert) ——  
在倫敦的德国工人, 正义者同盟和倫敦  
德国工人教育协会主要成員; 共产主义  
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員; 共产主义者同  
盟分裂时, 参加維利希-沙佩尔分裂集  
团。——188.

列斯納, 弗里德里希 (Leßner, Friedrich  
1825—1910) —— 魏瑪的裁縫, 共产主  
义者同盟盟員; 在 1852 年科倫共产党  
人案中被判三年要塞監禁; 1856 年起  
流亡倫敦, 是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員,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195、201.

列特, 威廉·阿道夫 (Lette, Wilhelm

Adolf 1799—1868)——普魯士国家官吏, 1848年創立立宪俱乐部, 是普魯士众議院議員, 1867—1868年是帝國議會議員, 1865年創立女子从业促进会(列特协会)。——88.

## lin

林登貝克(Lindenberg)——罪犯教养所里的犯人, 五十年代末期奉封建分子之命, 充当密探反对普魯士亲王。——219.

林格斯(Rings)——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 侨居倫敦。——200, 201.

林普勒尔(Rimpler)——普魯士退伍炮兵少校, 1848年6月至11月任柏林市民自卫团指揮官。——14, 61, 64.

林索倫, F. 威廉·馮(Rintelen, F. Wilhelm von 1869年死)——法学家, 柏林最高法院樞密顧問, 普魯士国民議會議員, 奧格斯堡《总汇报》編輯。——53, 58.

## long

隆格, 約翰奈斯(Ronge, Johannes 1813—1887)——見第一卷人名索引。——192.

## lu

路德, 馬丁(Luther, Martin 1483—1546)——266.

路德維希·奧托(Ludwig, Otto 1813—1865)——德國作家, 小說《天地之間》的作者。——227, 228, 264.

路特希尔德, 詹姆斯(Rothschild, James, baron de 1792—1868)——男爵, 巴黎路特希尔德銀行的行长。——212.

路易-菲力浦(Louis-Philippe 1773—1850)——見第一卷人名索引。——5, 26, 31, 34.

卢格, 阿尔諾德(Ruge Arnord 1802—1880)——見第一卷人名索引。——81, 165, 173, 191, 192, 228, 233, 258, 358.

卢赫特, A. (Lucht, A.)——参加1848年6月18日于柏林举行的手工业者和工人团体代表大会的柏林机器制造工人联合会的代表。——90.

## lü

呂斯托夫, 弗里德里希·威廉(Rüstow, Friedrich Wilhelm 1821—1878)——民主主义軍事作家, 1860年参加加里波第的远征, 担任參謀長。——324, 325, 330, 331.

## luo

洛貝尔图斯-雅格左夫, 約翰·卡尔(Rodbertus-Jagetzow, Johann Karl 1805—1875)——見第一卷人名索引。——18, 19, 26, 27, 30, 32—34, 55, 56, 66, 69, 162, 224, 245, 246, 248, 277, 279—281, 283, 293, 309, 316, 326, 336, 358, 359.

罗伯斯庇尔, 馬克西米利安-瑪利-伊西多尔·德(Robespierre, Maximilien-Marie-Isidor de 1758—1794)——見第一卷人名索引。——81.

罗恩, 阿尔勃萊希特·泰奧多尔·艾米尔(Roon, Albrecht Theodor Emil, Graf von 1803—1879)——伯爵, 普魯士元帅和陸軍大臣(1859—1873); 曾进行普魯士軍事改革。——313, 317, 338.

罗克特, 奧托(Roguet, Otto 1824—

1896) — 詩人, 1869 年以后在达姆斯塔特任文学和历史教授。 — 226.

罗雪尔, 威廉 (Roscher, Wilhelm 1817—1894) — 見第一卷人名索引。 — 253, 254.

罗伊特, 弗里茨 (Reuter, Fritz 1810—1874) — 用低地德語写作的德国詩人。 — 228.

罗伊特, 麦克斯 (Reuter Max) — 普魯士警探。 — 197, 198.

### ma

馬丁尼 (Martiny) — 1863 年普魯士邦議會中的东普魯士議員。 — 359.

馬克思, 卡尔 (Marx, Karl 1818—1883) — 12, 23, 61, 80, 90, 95, 97, 98, 100, 101, 106, 107, 119, 122, 125—134, 137, 139, 140, 142, 143, 145, 147, 148, 150, 168—170, 176, 179—181, 186—188, 191, 194, 198—203, 217, 234—242, 245—248, 250, 253, 254, 256, 262, 268, 285, 294—296, 300, 304—307, 313, 323, 324, 327, 332, 345, 349, 350, 364.

馬克思, 燕妮 (父姓威斯特华倫) (Marx, Jenny [geb. von Westphalen] 1814—1881) — 卡尔·馬克思的夫人和助手。 — 235.

馬提, 卡尔 (Mathy, Karl 1807—1863) — 巴登的政論家和政治活动家, 温和的自由主义者, 巴登邦議會中的反对派的領袖之一; 1848 年是预备議會和法兰克福国民議會議員(中間派右翼); 后来是俾斯麦政策的拥护者(民族自由党人)。 — 83.

馬志尼, 朱澤培 (Mazzini, Giuseppe 1805—1872) — 見第一卷人名索引。 — 191, 192, 329.

### man

曼托伊費尔, 埃德文·汉斯·卡尔 (Manteuffel, Edwin Hans Karl, Freiherr von 1809—1885) — 男爵, 1848 年任国王的侍从武官, 1866 年对奥战争和 1870—1871 年对法战争中任司令官。 — 56, 57.

曼托伊費尔, 奥托·泰奥多尔 (Manteuffel, Otto Theodor, Freiherr von 1805—1882) — 普魯士国务活动家; 反动的貴族官僚的代表; 内政大臣 (1848 年 11 月至 1850 年 12 月), 1849 年是第二議院議員; 首相和外交大臣 (1850—1858)。 — 57, 161, 165, 197, 207, 209, 212, 217—220, 242, 308—311, 314, 317, 321, 362.

### mei

梅尔克尔,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 (Märker (Märcker), Friedrich August 1804—1889) — 柏林刑事法庭庭长, 自由主义者; 1848 年是普魯士国民議會議員(中間派), 司法大臣 (1848 年 6 月至 9 月)。 — 31.

梅洛斯拉夫斯基, 路德維希 (Mieroslawski, Ludwig 1814—1878) — 波兰革命者, 历史学家和軍事专家, 1830—1831 年和 1846 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 1848 年是波兰起义的軍事領袖, 后来是西西里島起义的領袖; 1849 年是巴登-普法尔茨革命軍的司令官。 — 106, 172.

梅特涅, 克雷門斯·温采尔·洛塔尔 (Metternich, Clemens Wenzel Lothar, Fürst von 1773—1859) — 見第一卷人名索引。 — 6, 7, 20.

## mi

米尔德, 卡尔·奥古斯特 (Milde, Karl August 1805—1861)——布勒斯劳的布厂厂主, 自由主义者; 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議員和議長(右派), 商业大臣(1848年6月至9月)。——25、31。

米凯尔, 約翰奈斯 (Miquel, Johannes 1828—1901)——見第一卷人名索引。——182、287、365。

米勒, 亨利希·馮 (Mühler, Heinrich von 1813—1874)——普魯士文化大臣(1862—1872)。——348。

米努托利, 尤利烏斯 (Minutoli, Julius, Freiherr von 1805—1860)——男爵, 普魯士官吏和外交家; 1839年任波森警察总监和地方长官, 1847年至1848年6月任柏林警察总监; 后来在外交界任职。——14。

米希勒, 卡尔·路德維希 (Michelet, Karl Ludwig 1801—1893)——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 黑格尔主义者, 柏林大学教授, 黑格尔著作的出版人之一。——288。

## mo

莫尔, 約瑟夫 (Moll, Joseph 1812—1849)——見第一卷人名索引。——80、95、119、121、129、174、181。

摩萊肖特, 雅科布 (Moleschott, Jakob 1822—1893)——生理学家, 生于荷兰, 庸俗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229、231。

## mu

姆罗斯 (Mrs)——1848年是普魯士国民议会的議員。——48。

## na

拿破侖第一, 波拿巴 (Napoleon I. Bonaparte 1769—1821)——見第一卷人名索引。——289、354。

拿破侖第三 (Napoleon III.)——見波拿巴, 路易。

## nai

奈斯·馮·埃森貝克·克利斯提安·哥德弗利德 (Nees von Esenbeck, Christian Gottfried 1776—1858)——植物学家和自然哲学家, 爱尔兰根、波恩和布勒斯劳的教授; 1848年在柏林参加“工人結义会”, 1849年被开除, 1852年在布勒斯劳被免职。——78、91。

## ni

尼布尔, 巴特霍尔特·格奥尔格 (Niebuhr, Barthold Georg 1776—1831)——普魯士国务活动家和历史学家。——219。

尼古拉一世 (Nikolaus I. 1796—1855)——見第一卷人名索引。——104、189、191、206、218、219。

## nuo

諾特萊克, 彼得 (Nothjung, Peter 1821—1880)——裁縫, 1848年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科倫支部成員和科倫工人联合会委员会委員; 1849年5月愛北斐特起义的参加者; 1851年担任共产主义者同盟特使时被捕, 在1852年科倫共产党人案中被判六年徒刑; 后来成了拉薩尔分子。——195、196、201。

## pa

帕拉茨基, 弗兰蒂舍克 (Palacký, František 1798—1876) ——捷克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十九世纪中叶捷克民族运动的领袖。——112.

帕麦斯顿, 亨利·约翰·坦普尔 (Palmerston, Henry John Temple, Lord 1784—1865) ——子爵, 英国政治活动家, 起初是托利党人, 1830年以后是辉格党右派领袖之一; 曾任外交大臣 (1852—1855) 和首相 (1855—1858 和 1859—1865)。——235.

帕托夫, 艾拉兹穆斯 (Patow, Erasmus, Freiherr von 1804—1890) ——男爵, 普鲁士国务活动家, 温和的自由主义者; 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右翼); 商业大臣 (1848年4月至6月) 和财政大臣 (1852—1862)。——47、49、220、309、333.

### pi

皮列特 (Pilet) ——施滕达尔的陪审官, 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中间派)。——26、49、50.

皮佩尔 (Piper) ——警察顾问, 五十年代末是莱茵省工厂视察员。——217.

### pu

普尔塔勒斯, 阿伯特 (Pourtalès, Albert, Graf von 1812—1861) ——伯爵, 普鲁士外交家。——207.

普法尔 (Pfeil, Graf) ——伯爵, 五十年代是普鲁士贵族院议员。——215、217.

普芬德, 卡尔 (Pfänder, Carl 约 1818—1876) ——见第一卷人名索引。——187、188、193.

普富尔, 恩斯特·亨利希·阿道夫·冯 (Pluel, Ernst Heinrich Adolf von

1779—1866) ——普鲁士将军, 反动的军事宫廷权奸的代表人物; 曾任纽沙都省省长 (1832—1848), 1848年3月任柏林警备司令, 1848年4月和5月指挥镇压波森起义; 1848年9月至11月任普鲁士首相和陆军大臣。——43、45、49、53—55、120、121.

普拉顿-哈勒明德, 奥古斯特 (Platen-Hallermünde, August, Graf von 1796—1835) ——见第一卷人名索引。——240、241、260、334.

普林斯-史密斯, 约翰 (Prince-Smith, John 1809—1874) ——见第一卷人名索引。——223.

普鲁士亲王——见威廉一世。

普鲁士王储——见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

蒲鲁东, 比埃尔-约瑟夫 (Proudhon, Pierre-Joseph 1809—1865) ——见第一卷人名索引。——87—89、147、204、248、328、345、349.

### qi

契尔奈尔, 赛米尔 (Tzschirner, Samuel 约 1817—1870) ——包岑的律师; 1848—1849年革命期间是萨克森极左派的领袖; 德累斯顿五月起义期间是革命政府成员, 参加了巴登-普法尔茨起义, 后逃亡。——163.

齐格勒, 弗兰茨 (Ziegler, Franz 1803—1876) ——1840年起任勃兰登堡市市长, 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中间派左翼), 由于支持拒绝纳税的决议而被控, 被免职并被判要塞监禁, 1865年起又是普鲁士议员, 后来是帝国议会议员。——27、67、228、287、310、316、326、332、358、359.

齐茨, 弗兰茨·亨利希 (Zitz, Franz. Heinrich 1803—1877) ——美因兹的律师, 民主派政治活动家; 1848年是预备议会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議員 (左派); 1849年参加巴登-普法尔茨起义, 后来流亡美国。——172、173.

## qu

屈韦特尔, 弗里德里希·克利斯提安·胡貝尔特·馮 (Kühlwetter, Friedrich Christian Hubert von 1809—1882) ——普魯士国务活动家; 内政大臣 (1848年6月至9月)。——31、34.

## rong

荣克, 格奥尔格·哥特洛普 (Jung, Georg Gottlob 1814—1886) ——見第一卷人名索引。——66.

## sa

薩克森国王 (König von Sachsen 1836—1854) ——見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二世。

薩維尼, 弗里德里希·卡尔·馮 (Savigny, Friedrich Karl von 1779—1861) ——見第一卷人名索引。——8、275、279、287.

## sai

塞万提斯·薩維德拉, 米格尔·德 (Cervantes Saavedra, Miguel de 1547—1616) ——240.

## sha

沙弗果奇 (Schaffgotsch) ——西里西亚伯爵世家, 大地主。——46.

沙恩霍斯特, 盖尔哈特·約翰·大卫·馮 (Scharnhorst, Gerhard Johann Da-

vid von 1775—1813) ——普魯士將軍; 曾在格奈澤瑙屬下参加普魯士軍事改革工作, 起过领导作用。——45.

沙皇 (Zar 1825—1855) ——見尼古拉一世。

沙皇 (Zar 1855—1881) ——見亚历山大二世。

沙佩尔, 卡尔 (Schapper, Karl 約 1812—1870) ——見第一卷人名索引。——80、95、119、120、121、125、129、148、187、188、193、194、197—200、202.

莎士比亚, 威廉 (Shakespeare, William 1564—1616) ——240.

## she

舍尔瓦尔, 朱利安 (約瑟夫·格列美尔, 克列美尔, 弗兰克) (Cherval, Julien (Joseph Grämer, Krämer, Frank)) ——普魯士警探和煽动分子。——198、200.

## sheng

圣西門, 克劳德·昂利·德·魯夫洛瓦 (Saint-Simon, Claude-Henri de Rouvroy, comte de 1760—1825) ——見第一卷人名索引。——177.

## shi

施蒂納, 麦克斯 (約翰·卡斯巴尔·施米特的笔名) (Stirner, Max (Pseudonym von Johann Caspar Schmidt) 1806—1856) ——見第一卷人名索引。——229.

施拉姆, 康拉德 (Schramm, Konrad 約 1822—1858) ——德國革命者,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 1849年起流亡倫敦, 《新萊茵报, 政治經濟評論》的負責发行人; 同盟分裂时, 仍然是馬克思的拥护

- 者。——182、187、188、193。
- 施莱艾尔马赫尔，弗里德里希·恩斯特·丹尼尔 (Schleiermacher, Friedrich Ernst Daniel 1768—1834) ——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神学家和传教士。——256。
- 施莱根施坦，路德维希·罗特·冯 (Schreckenstein, Ludwig Freiherr Roth von 1789—1858) ——男爵，普鲁士将军，封建贵族的代表；陆军大臣 (1848年6月至9月)。——32、118。
- 施略费尔，弗里德里希·威廉 (Schlöffel, Friedrich Wilhelm 1800—1870) ——见第一卷人名索引。——41、173。
- 施略费尔，古斯塔夫·阿道夫 (Schlöffel, Gustav Adolph 1828—1849) ——前者之子，大学生，资产阶级左派民主主义者，1849年参加巴登-普法尔茨起义，6月21日在瓦洛豪伊塞尔附近阵亡。——85、86、98、134、173。
- 施梅林，安东 (Schmerling, Anton, Ritter von 1805—1893) ——骑士，奥地利国务活动家，自由主义者；1848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議員 (中間派右翼)，帝国内閣的内政大臣 (7月至9月)，首相和外交大臣 (9月至12月)；奥地利的司法大臣 (1849—1851)。——40、41、153。
- 施米特，朱利安 (Schmidt, Julian 1818—1886) ——新闻工作者和文学史家，同古斯塔夫·弗福塔克一起主编《边境使者》杂志 (1848—1880)，1862—1863年任《柏林总汇报》总编辑。——232、233、264、333—335。
- 施奈德，弗兰茨 (Sznayde, Franz 1790—1850) ——波兰革命者；1849年是普法尔茨革命军指挥官。——172。
- 施奈德尔第二，卡尔 (Schneider II, Karl) ——科伦的律师；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是科伦民主协会的主席，1849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莱茵报》案中的辩护人；1852年是科伦共产党人案的辩护人。——119、125、148。
- 施塔耳，弗里德里希·尤利乌斯 (Stahl, Friedrich Julius 1802—1861) ——见第一卷人名索引。——215、275。
- 施泰祥 (Stechan) ——柏林雪茄烟工人；1848年工会斗争的领导人之一。——94、203—205。
- 施泰因，罗伦兹·冯 (Stein, Lorenz von 1815—1890) ——见第一卷人名索引。——216。
- 施泰因，尤利乌斯 (Stein, Julius 1813—1883) ——布勒斯劳的高级教师，民主主义的政论家；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議員 (左派)，柏林民主俱乐部主任；1849年是第二议院議員 (极左派)；后来是《布勒斯劳报》总编辑。——39、42、43、45、336。
- 施泰因豪尔，E. F. (Steinhauer, E. F.) ——参加1848年6月18日在柏林举行的手工业者和工人团体代表大会的汉堡工人教育协会的代表。——90。
- 施特劳斯，大卫·弗里德里希 (Strauß, David Friedrich 1808—1874) ——见第一卷人名索引。——228、243。
- 施特雷克富斯，阿道夫 (Streckfuß, Adolf 1823—1895) ——德国作家，1848年参加民主运动，1851年由于写《伟大的法国革命》一书被控叛国，但被宣判无罪。——347。
- 施滕策尔，古斯塔夫·阿道夫·哈拉尔特 (Stenzel, Gustav Adolf Harald 1792—1854) ——布勒斯劳的教授，历史学家，自由主义者；1848年是法兰克福国

民議會議員(左派, 后来是中間派右翼)。—108, 109, 160.

施梯伯, 威廉(Stieber, Wilhelm 1818—1882) — 見第一卷人名索引。——15, 85, 196—198, 201, 203, 217, 309.

施瓦曾貝克, 費里克斯(Schwarzenberg, Felix Fürst zu 1800—1852) — 侯爵, 奥地利国务活动家; 镇压 1848 年維也納起义后, 任首相。——208.

施韦林(-普察尔), 馬克西米利安·亨利希·卡尔(Schwerin (-Putzar), Maximilian Heinrich Karl, Graf von 1804—1872) — 伯爵, 普魯士国务活动家, 自由派貴族的代表人物; 1848 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議會議員(右派); 曾在康普豪森內閣任文化大臣(1848 年 3 月至 6 月); 1859—1862 年任內政大臣, 后来是民族自由党人。——15, 47, 220, 309, 324, 359—351, 364.

施文尼格爾(Schwenniger) — 哈姆的測量師, 1848 年斯蒂凡·波爾恩在柏林建立的工人結义会的中央委員。——91, 92, 203, 204.

### shu

叔本華, 阿尔都尔(Schopenhauer, Arthur 1788—1860) — 德國唯心主义庸俗哲学家。——131, 228, 233.

叔尔茨, 卡尔(Schurz, Karl 1829—1906) — 小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 1849 年参加巴登-普法尔茨起义, 金克尔的拥护者; 1852 年流亡美国, 参加了美国内战; 后来任美国駐西班牙公使, 參議員和內政部长。——119, 179.

舒尔采(-德里奇), 弗兰茨-海爾曼(Schulze (-Delitzsch), Franz-Hermann 1808—1883) — 小資產階級經濟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1848 年是普魯士国民

議會議員(中間派左翼); 德国合作事业的創始人, 鼓动工人利用儲金建立生产合作社; 六十年代是进步党的領袖之一。——27, 29, 34, 51, 52, 70, 162, 224—226, 276, 309, 316, 322, 349.

### si

司徒卢威, 古斯塔夫·馮(Struve, Gustav von 1805—1870) — 律師和政論家, 小資產階級民主主义者和联邦共和主义者; 1848 年是預備議會議員; 1848 年巴登起义和 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領袖之一; 流亡英国, 后至美国; 站在北方各州一边参加了美国内战。——21, 41, 177.

### tai

泰霍夫, 古斯塔夫·阿道夫(Techow, Gustav Adolf 1813—1893) — 曾任普魯士軍官, 1848 年参加柏林的革命活动, 后任普法尔茨革命軍參謀長; 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 1852 年移居澳大利亚。——38, 172, 178, 179, 187, 188.

泰辛(Teichen) — 罪犯教养所的犯人, 五十年代末期奉曼托伊費尔之命, 盜窃馮·格拉赫將軍同俄国宮廷的秘密信件, 即所謂“緊急信件盜窃案”。——219.

### te

特賴奇克, 亨利希·哥特哈爾特·馮(Treitschke, Heinrich Gotthard von 1834—1884) — 資產階級历史学家和帝国議会议員, 《普魯士年鑑》的發行人; 工人运动的可惡敌人和反动的煽动性著作的作者。——304, 358, 359.

特吕茨施勒尔, 威廉·阿道夫·馮 (Trützschler, Wilhelm Adolf von 1818—1849) —— 德累斯頓上訴法院陪審官, 1848 年是法蘭克福國民議會議員 (左派), 1849 年巴登起義時任曼海姆的民政委員, 被軍事法庭判處死刑后被槍殺。——79、173、174。

特韦斯騰, 卡尔 (Twesten, Karl 1820—1870) —— 1845 年起任柏林市法院顧問, 1861 年后是普魯士眾議院議員 (屬于進步黨)。——318、357。

## tu

土伊斯豪斯 (Tüshaus) —— 閔斯特爾高級法院的顧問, 天主教士; 1848 年是普魯士國民議會議員 (右派)。——53。

## tuo

托特, 卡尔·哥特黑爾弗 (Todt, Karl Gotthelf 1803—1852) —— 薩克森的政治活動家, 1836 年起是薩克森邦議會議員, 1849 年 5 月是革命政府成員, 流亡蘇黎世。——163。

## wa

瓦尔德克, 貝奈狄克特·弗蘭茨·利奧 (Waldeck, Benedikt Franz Leo 1802—1870) —— 柏林高級法院顧問, 民主主義者; 1848 年是普魯士國民議會左派領袖之一, 副議長, 1849 年是第二議院議員, 後來是進步黨人。——24、27、30、34、38、44、65、66、68、82、161、196、217、309、316、357、360。

瓦尔德爾賽, 弗里德里希·古斯塔夫 (Waldensee, Friedrich Gustav, Graf von 1795—1864) —— 伯爵, 普魯士將軍, 陸軍大臣 (1854—1858), 軍事作家。——165。

瓦蓋納, 海爾曼 (Wagener, Hermann 1815—1889) —— 德國政論家, 俾斯麥的擁護者。——37、38、57、215、216、219、229、362。

瓦格納, 阿道夫 (Wagner, Adolph 1835—1917) —— 德國經濟學家, 1878 年創立基督教社會黨; 俾斯麥政策的擁護者。——288。

瓦格納, 理查 (Wagner, Richard 1813—1883) —— 165、263。

瓦列斯羅德, 路德維希·萊因霍爾特 (Walesrode, Ludwig Reinhold 1810—1889) —— 見第一卷人名索引。——73、309、310、348。

## wan

萬哈根·馮·恩賽, 卡尔·奧古斯特 (Varnhagen von Ense, Karl August 1785—1858) —— 見第一卷人名索引。——140。

## wei

魏德邁, 約瑟夫 (Weydemeyer, Josef 1818—1866) —— 見第一卷人名索引。——234。

魏斯, 古伊多 (Weiß, Guido 1822—1899) —— 見第一卷人名索引。——73。

魏特林, 克利斯提安·威廉 (Weitling, Christian Wilhelm 1808—1871) —— 見第一卷人名索引。——81、87、91、176、202。

維登布魯赫, 路德維希·馮 (Wildenbruch, Ludwig von 1803—1874) —— 普魯士外交家; 1848 年任駐哥本哈根公使。——16。

維爾特, 格奧爾格 (Weerth, Georg 1822—1856) —— 見第一卷人名索引。——99、100、134、135。

維格尔斯, 尤利烏斯 (Wiggers, Julius 1811—1901) ——神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1844 年是梅克倫堡立宪議会的議員, 1853 年由于叛国罪被判刑, 后来是帝國議會議員。——199.

維利希, 奧古斯特 (Willich, August 1810—1878) ——普魯士少尉, 因政治信仰退职;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 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中是一个志願队的指揮官; 1850 年同盟分裂时同沙佩尔一起是反对馬克思的宗派集团的領袖; 1853 年流亡美国, 在美国内战中任北方各州的將軍。170、172、182、187、188、193—195、197—202.

維特根施坦, 亨利希·馮 (Wittgenstein, Heinrich von 1800—1868) ——科倫市參議員, 自由主义者; 1848 年是科倫地方长官和市民自卫团指揮官, 同年 11 月以后是普魯士國民議會議員 (右派)。——120.

維騰巴赫, 丹尼尔·阿尔伯特 (Wyttgenbach, Daniel Albert 1746—1820) ——荷兰古代語言学家。——256.

威廉一世 (Wilhelm I. 1797—1888) ——見第一卷人名索引。——4、7、8、10、13、28、31、39、104、173、174、219、220、227、304、308、309—319、322、333、365.

威斯特华倫, 斐迪南·奧托·威廉·馮 (Westphalen, Ferdinand Otto Wilhelm von 1799—1876) ——普魯士反动的国务活动家, 內政大臣 (1850—1858); 燕妮·馬克思的異母兄。——217、220.

韦耶尔斯, 彼得·威廉 (Weyers, Peter Wilhelm 約 1814 年生) ——杜塞尔多夫的工人, 1848 年 11 月被捕, 1849 年因进行革命宣傳而受审。——148、149.

## wen

文巴尔克, 卢道夫 (Wienberg, Ludolf 1802—1872) ——德国作家和批評家, 青年德意志派的代表人物。——228.

文迪施格雷茨, 阿尔弗勒德 (Windischgrätz, Alfred Fürst zu 1787—1862) ——侯爵, 奥地利元帅, 1848—1849 年是奥地利反革命派的領袖之一, 1848 年指揮镇压布拉格六月起义和維也納十月起义; 后来又指揮镇压匈牙利革命的奥地利軍隊。——55.

文克尔曼, 約翰·約阿希姆 (Winckelmann, Johann Joachim 1717—1768) ——德国考古学家和艺术史家。——255.

文克尔布列希, 卡尔·格奥尔格 (Winkelblech, Karl Georg 1810—1865) ——1839 年起是卡塞尔高級工艺学校教授, 1848 年是黑森选帝侯國議會議員, 主張实行保障中等階級生存的社会改革。——74—77、92.

## weng

翁魯, 汉斯·維克多·馮 (Unruh, Hans Victor von 1806—1886) ——普魯士工程师和政治活动家, 温和的自由主义者; 1848 年是普魯士國民議會中間派右翼的領袖之一, 同年 10 月起是該會議長; 进步党創建人之一, 后来是民族自由党人。——26、43、45、49、51、55、56、58、59、62、63、66、68、127、162、316、328、352、361、362、363、364.

## wo

沃尔弗, 斐迪南 (Wolf (f), Ferdinand 1812—1895) ——見第一卷人名索引。——99、187、193.

沃尔弗, 威廉(Wolff, Wilhelm (Lupus) 1809—1864) ——見第一卷人名索引。——90、95、98、99、120—122、129、134、160、170、181。

沃尔弗, 貝恩哈特(Wolff, Bernhard 1811—1879) ——柏林《国民报》的老板, 沃尔弗电讯社的創立人。——328。

### wu

烏尔班(Urban) ——柏林的兽医, 民主主义者; 1848年是柏林街垒战和襲击軍械庫的領導者之一。——15、23。

烏特克, 亨利希(Wuttke, Heinrich 1818—1876) ——資產階級历史学家, 大德意志党的創建人之一。——293。

### xi

席貝, 奧古斯特(Schiebe, August 1779—1851) ——德國教育家, 从1831年至1850年是萊比錫商业学校校长, 資產階級商业科学的創立人之一。——138。

席勒, 弗里德里希·馮(Schiller, Friedrich von 1759—1805) ——139、227、233、334。

席利, 維克多(Schily, Victor 1810—1875) ——特利尔和巴門的律師, 参加过1849年的巴登起义, 后来流亡瑞士和巴黎, 第一国际的积极成員。——119、167。

希尔施, 威廉(Hirsch, Wilhelm) ——汉堡的店員, 五十年代初是普魯士派往倫敦的警探。——199—201。

西蒙, 路德維希(Simon, Ludwig 1810—1872) ——波恩的律師, 1848年是法蘭克福国民議會議員(极左派); 1849年流亡瑞士, 1855年以后住在巴黎。——187。

西姆桑, 馬丁·爱德华·西吉茲蒙特·馮(Simson, Martin Eduard Sigismund von 1810—1899) ——普魯士政治活动家和法学家; 1848—1849年是法蘭克福国民議會議員(中間派右翼), 1848年12月至1849年5月任該會議長; 1848年11月曾以帝國特使身分到柏林; 1849年是第二議院議員(左派); 后来是民族自由党人, 德意志帝國議會議長(1871—1874)。——72、155。

### xie

謝弗尔, 約瑟夫·維克多·馮(Scheffel, Josef Victor von 1826—1886) ——德國后期浪漫主义詩人。——226。

謝林, 弗里德里希·威廉·約瑟夫·馮(Schelling, 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1775—1854) ——見第一卷人名索引。——256。

謝林, 海爾曼·馮(Schelling, Hermann von 1824—1908) ——前者之子, 普魯士法学家和国家官吏, 柏林市法院檢察官(1861—1863), 普魯士司法大臣(1879—1889) ——347。

### xin

辛克尔代, 卡尔·路德維希·弗里德里希·馮(Hinckeldey, Karl Ludwig Friedrich von 1805—1856) ——普魯士政府官吏, 1848年起任柏林警察總監。——197、217—219、237。

### xue

雪恩, 亨利希·泰奧多尔·馮(Schön, Heinrich Theodor von 1773—1856) ——見第一卷人名索引。——232。

雪恩萊因, 約翰·魯卡斯(Schönlein, Johann Lukas 1793—1864) ——見第

一卷人名索引。——72.

## ya

雅科比, 約翰 (Jacoby, Johann 1805—1877) ——見第一卷人名索引。——23、24、27、33、55、56、246、310、357—359.

雅科比, 亞伯拉罕 (Jacobi, Dr. Abraham 1832年生) ——柏林医生;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 1852年科倫共产党人案的被告, 被陪審法庭宣判无罪; 后来流亡美国。——195.

雅恩, 弗里德里希·路德維希 (Jahn, Friedrich Ludwig 1778—1852) ——爱国体操运动的发起人, 法兰克福国民議會議員。——24.

亞里士多德 (Aristoteles 公元前384—322年) ——見第一卷人名索引。——255.

亚历山大二世 (Alexander II. 1818—1881) ——俄国沙皇 (1855—1881)。——305.

## ye

耶拉契奇, 約瑟夫, 布契姆伯爵 (Jelačić (Jelačić), Josip, Graf von Bužim 1801—1859) ——奥地利將軍; 1848年任克罗地亚、斯拉佛尼亚和达尔馬西亚的总督; 积极参加镇压奥地利和匈牙利的1848—1849年的革命。——122.

耶林, 魯道夫·馮 (Jhering, Rudolf von 1818—1892) ——有影响的資產階級法學教師。——287.

## yi

伊曼特, 彼得 (Imandt, Peter) ——克雷費爾特的教師, 民主主义者, 克雷費爾

特工人联合会主席; 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在科倫和特利尔工作; 后来流亡, 他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 同馬克思和恩格斯有联系。——119、167.

伊梅尔曼, 卡尔·列貝萊希特 (Immermann, Karl Leberrecht 1796—1840) ——見第一卷人名索引。——27.

## yue

約翰 (Johann 1782—1859) ——奥地利大公, 被法兰克福国民議會选为德意志帝国摄政 (1848年6月至1849年12月); 站在王侯反动派一边。——32、33、40.

約克·馮·瓦尔騰堡, 汉斯·大卫·路德維希 (Yorck (York) von Wartenburg, Hans David Ludwig, Graf 1759—1830) ——伯爵, 普魯士元帥。——232.

## zai

載勒尔, 塞巴斯提安 (Seiler, Sebastian 約1810—1890) ——見第一卷人名索引。——187、193.

## ze

澤姆佩尔, 哥德弗利德 (Semper, Gottfried 1803—1879) ——德國建築師。——165.

## ZUO

左伊隆, 亚历山大·馮 (Soiron, Alexander von 1806—1855) ——法学家, 1848年是預備議會議員, 五十人委員會委員和法兰克福国民議會議員, 1851年后在曼海姆当律師。——83.

**保尔·拉法格著**

思想起源論	王子野譯	0.85 元
財產及其起源	王子野譯	0.75 元
宗教和資本	王子野譯	0.52 元

**奧古斯特·倍倍爾著**

婦女與社會主義	沈端先譯	1.65 元
自傳(我的生平)	薄芝宇譯	將出版

**弗蘭茨·梅林著**

德國社會民主黨史(第一卷)	青載繁譯	1.50 元
馬克思傳	楊靜遠等譯	將出版
論歷史唯物主義	李康譯	0.21 元
中世紀德國史	張才堯等譯	將出版

**卡爾·李卜克內西著**

軍國主義和反軍國主義	易廷鑽譯	1.00 元
------------	------	--------

**羅莎·盧森堡著**

資本積累論	彭尘舜等譯	1.55 元
國民經濟學入門	彭尘舜譯	1.10 元
社會改良還是社會革命?	徐堅譯	0.50 元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